

德语国家资讯与研究

第六辑

*Information und Forschung über
deutschsprachige Länder*

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国家资讯与研究》编辑部 编

顾 问 梅兆荣 顾俊礼
主 编 殷桐生 刘立群
副 主 编 姚晓舟 姚 燕 吴 江
执行编辑 包葛耿 周海霞
德语编辑 李 克 (Patrick Kühnel)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

目录

采访精撷

- 对中国驻欧盟大使杨燕怡女士的访谈····· 本刊编辑部 3
对德国商会驻北京代表的采访····· 尚欧 9

新闻鸟瞰

- 外交新闻····· 于芳 15
经济新闻····· 徐丽莉 21
媒体新闻····· 周海霞 25
政治、社会与文教新闻····· 史笑艳 28

热词诠释

- Schwarze Null 和 Russlandverstehher ····· 关海霞 33
Willkommenskultur 和 Terror-Tourismus ····· 徐四季 36

外交观察

- 德国统一是怎样实现的····· 梅兆荣 41
试论“泛社会主义”····· 吴兴唐 48
漫谈中德创新伙伴关系····· 王晓瑶 55
德国和中国——我们关系中有了什么变化? ····· Martin Thümmel 58
欧债危机以来德国在欧洲的角色探析····· 于芳 61
德国难民危机政策探析····· 黄萌萌 刘立群 67
英国退欧公投计划与德国各方反应析论····· 李倩瑗 刘立群 76

经济视野

德国的科研创新政策（上）·····	殷桐生	85
瑞士创新政策探析·····	任丁秋	97
欧盟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李微	104
乌克兰危机对德国经济的影响·····	刘惠宇	113
新一轮希腊债务危机与德国·····	孙嘉惠	122
法兰克福人民币离岸市场的现状与利弊分析·····	李冰溪 张凯	129
基民盟、基社盟和社民党《联合执政协议》的经济等部分（译文下）	陈扬 丁思齐 王少辰	137

文教论坛

从人口与家庭看战后德国社会的变化·····	王涌	175
漫画在外语复合型课程教学中的应用——以德语讲授的德国外交课程为例·····	吴江	184
和而不同——浅议西方“聚合”理念与中国辩证式和谐观的同与异·····	赵倩	191
德国政治性电视讨论节目——争论文化的体现？·····	潘颖	197

科研环视

科研新动态·····	邹露	207
------------	----	-----

大事记

德国外交经济大事记（2015年4月1日至2015年9月10日）·····	李倩瑗	215
--------------------------------------	-----	-----

Inhaltsverzeichnis

Interviews

Interview mit Frau Yang Yanyi, chinesische Botschafterin bei der EU	Die Herausgeber	3
Interview mit Frau Alexandra Voss, Delegierte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 in Peking	SHANG Ou	9

News aus der Vogelperspektive

Außenpolitik	YU Fang	15
Wirtschaft	XU Lili	21
Pressemeldungen	ZHOU Haixia	25
Politik, Gesellschaft, Kultur und Bildung	SHI Xiaoyan	28

Modewörter und was sie bedeuten

Schwarze Null und Russlandversther	GUAN Haixia	33
Willkommenskultur und Terror-Tourismus	XU Siji	36

Außenpolitik im Fokus

Wie es zur Deutschen Einheit kam	MEI Zhaorong	41
Zum Begriff „Ponsozialismus“	WU Xingtang	48
Reflexionen über die deutsch-chinesische Innovationspartnerschaft	WANG Xiaoyao	55
Deutschland und China – Was ändert sich an unseren Beziehungen?	Martin Thümmel	58
Deutschlands Rolle in der Europäischen Schuldenkrise	YU Fang	61
Reflexionen zur Flüchtlingskrise in Deutschland	HUANG Mengmeng, LIU Liqun	67
Großbritanniens Brexit-Pläne und die deutschen Reaktionen	LI Qianyuan, LIU Liqun	76

Wirtschaftliche Horizonte

Deutschlands Forschungs- und Innovationspolitik (Teil 1)	YIN Tongsheng	85
Zur schweizerischen Innovationspolitik.....	Ren Dingqiu	97
Die QE-Politik der EU	LI Wei	104
Der Einfluss der Ukraine-Krise auf die deutsche Wirtschaft	LIU Huiyu	113
Deutschland und der nächste Akt im griechischen Schuldendrama.....	SUN Jiahui	122
Untersuchungen zum Renminbi Offshore-Center in Frankfurt.....	Li Bingxi, Zhang Kai	129
Der wirtschaftliche Teil und andere Teile des Koalitionsvertrages von CDU, CSU, SPD (Übersetzung Teil 3)	CHEN Yang, DING Siqi, WANG Shaochen	137

Kultur- und Bildungsforum

Die gesellschaftlichen Veränderungen im Nachkriegsdeutschland aus demographischer und familiärer Sicht	WANG Yong	175
Einsatz der Karikaturen im Fachunterricht-am Beispiel der deutschsprachigen Lehrveranstaltung „Deutsche Diplomatie seit 1945“	WU Jiang	184
Harmonie in Vielfalt: Der deutsche Synergiebegriff und das chinesische Konzept der dialektischen Harmonie	ZHAO Qian	191
Polit-Talkshows in Deutschland – Ein Musterbeispiel der Streitkultur?.....	PAN Ying	197

Forschungsrundschau

Neue Forschungstrends.....	ZOU Lu	207
----------------------------	--------	-----

Das Wichtigste in Kürze

Wichtige Ereignisse in Politik und Wirtschaft vom 01.04.2015 bis 10.09.2015	LI Qianyuan	215
---	-------------	-----

采 访 精 撷

对中国驻欧盟大使杨燕怡女士的访谈

本刊编辑部

一、2015年是中国欧盟建交40周年，请您评价一下中国和欧盟目前总体关系及发展前景。

中欧关系历经四十年发展，已经成为当今国际关系中最重要双边关系之一。总的看来，中欧关系发展是平稳的、向前的、向好的。之所以这样说，主要基于以下几点：

其一，中欧有共同利益和战略共识。面对深刻复杂变化的国际形势，复苏乏力的世界经济，日益增多重大跨国性和全球性挑战，中欧均主张将双方两大力量、两大市场、两大文明结合起来，共同构建以“和平、增长、改革、文明”为主要内涵的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共同推动多边主义，共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有效的方向发展，共同促进各自改革发展稳定及地区和世界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不可回避，由于历史文化背景、社会制度、发展阶段不同，中欧之间存在矛盾和分歧，随着交往加深，还会遇到新问题新挑战。但可以预期，中欧对话合作的战略需求和战略取向远大于彼此差异和矛盾，中欧将坚持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彼此关系。

其二，中欧有较为稳固的对话机制。经过多年培育和完善，中欧之间有年度领导人会晤及其引领的三大对话机制——高级别战略对话、经贸高层对话、高级别人文交流对话机制，并有70多个磋商机制，涵盖政治、外交、经贸、工业、农业、科技、能源、城镇化、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社会、文化、教育等诸多领域。通过这些对话机制，双方不仅就涉及彼此发展的重要问题和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增进理解、扩大共识，总结和规划各领域交流合作，也以建设性方式妥善处理经贸摩擦和分歧，着眼大局，求同存异。这为中欧关系稳定发展、合作不断推进提供了机制性保障。

其三，中欧互为重要市场和发展伙伴。中欧经贸关系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具活力的经贸关系之一。多年来，欧盟是中国最大贸易伙伴、最大进口来源地、第二大出口对象地区，中国是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一大进口来源地、第二大出口市场。2014年，中欧贸易额突破6000亿美元，同比增长近10%，是建交时的250倍。2014年，中国对欧非金融类直接投资98.5亿美元，首次超过当年欧盟对华投资额，增幅达172%，双方投

资、金融等领域合作也不断取得进展，人文交流亦十分活跃。中欧各领域务实合作，成为促进各自发展和创新的主要动力，也是塑造发展创新、增长联动、利益融合的世界经济的重要动力。

其四，中欧致力于合作应对全球性挑战。中欧肩负着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与安全的重要责任。双方都认为，当今世界，谁都不能独善其身，谁也不能独霸天下。推动世界经济复苏也好，政治解决国际和地区热点也好，应对各种全球性问题也好，都需要国际社会对话协商，通力合作。基于这样的共识，中欧在应对伊朗核、加强国际防扩散体系、气候变化、重大传染性疾病预防、反海盗、打击跨国组织犯罪等领域和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国际多边机构内开展了密切协调与合作。中欧在双边、地区和全球层面的对话与协调将对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产生更大的战略性影响。

二、请您介绍一下2015年6月底举行的第十七次中欧领导人会晤有关情况。下一阶段，中欧关系有哪些新抓手和重点方向？

于2015年6月底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第十七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是继2014年习近平主席对欧盟总部进行历史性访问后，中方领导人同欧盟机构新一届领导人的首次接触，是中欧关系站在新历史起点时的一次重要活动，也是庆祝中欧建交40周年的一个高潮。

围绕深化中欧政治互信、聚焦中欧务实合作、对接中欧发展战略、提升中欧关系水平的主线，李克强总理同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深入交换意见，总结过去，规划未来，达成广泛共识。其中

主要亮点是，确定今后一个时期中欧合作的五个增长点或者说五个新着力点：一是对接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欧洲投资计划；二是建立中欧互联互通合作平台；三是深化信息技术领域对话与合作；四是建立中欧法律事务对话机制；五是扩大人文交流、便利人员往来。除上述外，中欧双方一致认为，要继续落实《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积极推进正在开展的合作，尤其是尽早达成一个全面的中欧投资协定，加强金融、科技创新、气候变化等领域的务实合作。

总之，这次会晤清晰勾勒了下阶段发展中欧关系、深化务实合作的重点方向，取得了丰硕成果。中欧双方发表了会晤联合声明和关于气候变化的联合声明，并就加强科技、知识产权、海关合作等签署多项合作文件。

三、如何评价欧盟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和作用？

欧洲是世界多极化中的一极。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进程中，欧盟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1. 欧盟是世界最大经济体。2014年欧盟28个成员国经济总量为18.5万亿美元。欧盟是全球最大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进出口方、世界8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欧盟的农业、畜牧业、制造业和服务业水平居世界领先地位。欧盟的规则制定能力和规范能力强，它同美国联手，以占世界GDP40%的经济实力制定80%的世界经济规则。近年来，在低油价和欧洲央行量宽政策推动下，欧盟经济复苏前景趋好。

诚然，欧盟发展也不乏挑战。世界经济增长缓慢，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加剧，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后起直追，希腊债务危机、乌克兰危机和难民危机接踵而至，欧盟经济全面复苏步履艰难，欧洲范围内疑欧情

绪上升。

新形势下，欧盟着眼维护和提高其竞争优势，努力推进一体化进程，重点推动欧洲投资计划、经济与货币联盟、单一资本市场、单一数字市场、能源联盟、欧洲交通走廊建设等改革调整，并积极推进“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谈判，加强同新兴市场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交流合作，在二十国集团等地区和国际组织中谋求发挥更大作用。

无论从机遇还是挑战角度看，作为世界最大的发达国家集团和第一大经济体，欧盟将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继续占据重要位置，其经济走势和欧洲一体化进程对世界发展与繁荣的影响不可小觑。

2. 欧盟对世界和平稳定举足轻重。欧洲是两次世界大战的发源地。欧洲联合自强、走一体化道路的初衷之一，就是避免战争，实现永久和平。

根据1993年生效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1997年《阿姆斯特丹条约》，欧盟奉行共同的外交与安全政策，目标是维护其共同价值观、根本利益和独立，加强欧盟及其成员国的安全，维护和平与国际安全，促进国际合作，发展民主与法治，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具体实践中，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呈现一些特点。

其一，欧盟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规则制定。无论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伊朗核、中东和平以及全球治理、气候变化、债务危机、农业补贴、打击海盗、反倾销投诉、移民和难民等议题上，都能听到欧盟声音，看到欧盟烙印。究其动因：一是欧盟要争取于其有利的外部环境，保障和扩大它在国际贸易、金融、能源和市场等领域的优势地位；二是捍卫和推广欧洲的价值观和社会制度，按照欧洲的人权、民主、法治、自由理念和实践改造世界；三是适应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大势，通过多边主义和全球治理应对各

种挑战。

其二，欧盟的外交与安全政策不乏干预性。这在欧盟对其周边和中东、非洲等地区安全危机的处理，以及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中反映得十分明显。这种干预性同美国直接、蛮横的军事和政治干涉有所区别，更多表现为民主、人权等舆论和政治外交斡旋的“软介入”，以及制度、规范甚至军事干预的“硬压制”，欧盟对利比亚的军事干涉就是一个典型。

其三，欧盟在重大外交与安全事务上难以形成统一意志。外交与安全政策本质上属于欧盟成员国的主权范畴，如此加之欧盟成员国历史传统、发展水平、国际地位和特定问题上的利害远近不同，因此很难用一个声音说话，按一个步调行进。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有的成员国强烈反对单边主义和对伊动武，有的则积极主战，坚定同美英站在一起。在移民和难民问题上，欧盟内部也莫衷一是。

总之，对欧盟在世界和平与安全事务中究竟在扮演什么角色，这是一个欧盟内外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

3. 2014年4月中国政府发表的题为“深化互利共赢的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第二份对欧盟政策文件，阐述了中方对欧盟和中欧关系的看法：“欧盟是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世界多极化的重要战略伙伴，是中国实现‘新四化’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合作对象。加强与发展中欧关系是中国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之一。”

中欧在支持《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原则及其普适性、推动政治解决伊核问题、气候变化、环境和生物多样性、全球治理等国际事务的对话合作表明，中欧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两大主题上有共同利益，在

一些国际地区问题上有相似看法和主张，双方完全可以通过对话扩大共识，友好合作。

同时，由于历史文化传统、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阶段的差异，以及中欧相关产业竞争增加，中欧在经贸等发展问题上、人权等意识形态问题上，以及在如何处理一些国与国争端问题上存在分歧与摩擦。

中方不回避这些差异和分歧，更重要的是，中方始终主张和坚持本着平等相待和相互尊重的精神，加强中欧战略对话和国际事务磋商，以增进了解，缩小分歧，求同存异，相向而行，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共同支持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推动国际合作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地区稳定，共同促进世界经济复苏和可持续增长维护和平与稳定。

四、如何看待希腊债务危机及其对欧元区和欧盟未来发展的影响？

于2009年爆发的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已持续多年。导致这场危机的是希腊由来已久的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以及国际金融危机对希腊旅游业和航运等支柱产业的严重冲击。希腊主权债务危机，不仅给希腊本国造成重大损失，也给欧元区经济发展带来很大影响。

多年来，希腊政府和人民一直在努力克服债务危机，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洲中央银行“三驾马车”也实施了救助。不久前，欧盟等国际债权人同希腊政府正式达成新一轮即第三轮救助协议，为希腊债务问题的解决创造了条件，也为欧元的稳定注入信心。对此，中方表示欢迎。

作为欧盟的全面战略伙伴，中方一贯支持欧洲一体化进程，对欧洲的未来充满信心。我们乐见繁荣的欧洲、团结的欧盟、强大的欧元，愿看到希腊早日克服危机，实现经济

社会稳定发展。中方也将继续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原则，推动中欧务实合作深入发展。

五、欧盟曾多次对我国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搞“双反”。在双方成功解决光伏贸易争端后，欧盟对华贸易政策是否有所变化？

不可否认，欧盟过去对中国采取一些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对中欧经贸关系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中欧经贸往来规模大、范围广，双方在交往过程中难免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这仅是“发展中的烦恼”。有“烦恼”并不可怕，关键在于双方要能客观理性地看待和处理彼此的矛盾和分歧，着眼大局和长远，展示务实与灵活，以建设性态度通过友好协商找到符合双方共同利益的解决办法。中欧通过对话和磋商妥善解决光伏案说明，对话和合作是中欧实现共赢的必然选择，而采取单边保护主义措施不是解决中欧两大贸易伙伴之间贸易摩擦的途径。

当前，中欧作为全球两大重要经济体，彼此互为重要贸易伙伴，利益融合紧密，已逐渐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深化经贸合作既符合双方共同利益，也是各自现实需要。基于此背景，近年来，无论在管控贸易摩擦还是深化经贸合作上，中欧双方总体保持相向而行。双方均展现出通过对话协商化解贸易分歧的意愿，也体现了对摩擦的管控能力。同时，双方主张从长远和全局出发，紧紧抓住互利共赢这一主线，做大做强合作蛋糕，扩大利益契合点。

新一届欧盟领导人上任以来，中欧贸易环境总体良好，贸易摩擦管控得当。目前双方正集中精力推进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相信这将为中欧经贸关系的提质升级创造新契机，推动中欧经贸关系朝着更加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六、目前在欧盟国家的中国留学生超过28万人，在中国的欧盟国家学生和学者超过4.5万人。您如何看中国同欧盟人文交流发展趋势？

“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人文交流向来是中欧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014年年初，习近平主席在访问欧盟总部时提出中欧构建“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就包括扩大和深化中欧人文交流。

在2015年9月中旬举行的中欧高级别人文交流对话机制第三次会议上，刘延东副总理进一步阐述了中方对深化中欧人文交流的主张，揭示了中欧人文交流的趋势和前景。具体而言，我们将在以下方面扩大中欧人文交流：

一是深化人文交流，为和平伙伴关系凝聚民心。中国人民和欧洲人民是爱好和平的。70年前，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人民同欧洲人民浴血奋战，捍卫了人类和平事业。在天下仍不太平的今天，我们愿同欧洲人民一道，铭记历史，珍爱和平，超越发展阶段、意识形态、文化传统、社会制度的差异，相互尊重，平等相处，共同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共同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

二是深化人文交流，为增强伙伴关系汇集民力。在中国发展战略包括“一带一路”倡议同欧盟发展战略对接过程中，我们将围绕中欧经贸投资、科技创新、节能减排、产能合作、健康服务、城镇化建设等领域合作，扩大中欧地方、企业和民众的交流，增进对彼此市场和发展环境及规制等的了解，为建设亚欧大市场，做大共同利益的蛋糕，实现“1+1>2”的效果而努力。

三是深化人文交流，为改革伙伴关系广

纳民智。中欧都处在深化改革，调整转型的关键阶段。中国正在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欧盟也在自我变革和调整。我们愿同欧方一道，坚持互相尊重彼此的改革道路，互相借鉴彼此的改革经验，共享创新资源，开展联合科研攻关，共同提高治理水平。这包括继续开展创新政策对话和战略磋商，共同鼓励和支持面向前沿、惠及民生的联合研发。启动遥感科技“龙计划”第四期合作，推动“欧洲哨兵”系列先进地球观测卫星数据纳入“龙计划”共享体系，搭建卫星导航、地球观测、空间科学与探测技术的全面交流平台，探索农业、航空、核能等领域务实合作的新途径。

四是深化人文交流，为文明伙伴关系夯实民意。我们将发挥中欧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的统领作用，坚持官民并举、多方参与，面向基层、面向人人：继续扩大学生学者交流规模，实施中国—欧盟千名青少年交流计划，推动中国高校建立欧洲区域与国别研究中心，欧洲高校建立中国研究中心，打造高等教育交流合作平台，鼓励开展高质量的合作办学，共同培养高层次人才；推动中欧文化创意产业领域合作；推进广电媒体交流合作，如合作拍摄电影、电视剧并互办影视节展，反映彼此经济发展、历史文化、社会生活，加强经典与现当代作品的互译出版，鼓励双方媒体专业人员开展诸如培训、研讨会、影视节展等形式的交流互鉴；推进中欧青年政策对话的常态化、机制化，利用好互联网、社交媒体等新手段，建设中欧青年拉手网，打造有影响力的品牌交流项目，促进青年组织、各界青年相互结对；巩固和深化妇女经济赋权、参政议政、提升能力、权益保护等方面的交流合作，通过加强中欧高层女性领导者对话、共同举办专题研讨会、开展培训项目等方式，分享政策成果和最新实践，促进性别平等；进一步加强旅游领域合作，采

取更多措施为商务人士、旅游者和学生提供签证便利。

可以预期，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欧教育、科技、文化、媒体、青年、妇女、旅游等领域合作将愈来愈广、愈来愈深，中欧关系将更具韧性、更有热度、更加蓬勃。

七、北外是我国拥有最多外语语种的大学，已开设了欧盟全部官方语言，您是该校校友，请您对我校开展外国语言文化学习谈一些感想和建议。

北京外国语大学前身——北京外国语学院是我的母校。我于1975年毕业于我校英语系。我非常自豪，我校一直以一流师资、一流教学水平，努力培养一批批活跃在国家外交、外事、国际经贸、对外文化交流、国际传播、英语教育等领域的国际型、通识型优秀人才。

根据多年外交实践和观察，我以为，要更好适应形势发展和工作需要，宜坚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教学：

一是坚持全面和严格的语言基本功训练，即培养听、说、读、写、译的能力，掌握外

国语言文学的基本理论与知识。

二是培养和提高学生的沟通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和思辨能力，包括培养学生直接用外文思维和表达的能力。现实工作中，一个普遍现象是先用中文思维，然后转换成外文，再进行交流。这多多少少会影响沟通的效果。

三是在进行诸如文学概论、语言学导论等学科训练的同时，加强诸如中国国情与历史文化、国际政治与经济、外国社会与文化、跨文化交际与传播等方向的专业教学，积极引导选修国际关系、国际经贸和法律等专业，做到内外兼修。

四是培养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能力。无论做什么工作，都离不开科学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尤其是外交外事工作，政治性很强，没有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纵然外文水平很高，也难以胜任。

五是强化终生学习理念。任何一个领域、一个岗位，都有它的独特性和专业性。要适应工作需要，必须善于学习、善于钻研、善于积累，包括努力掌握和熟练运用本专业的专业词汇和表达方式，提高职业化和专业化水平。仅仅凭借大学毕业时的那点底子，是无论如何不足以驾驭肩负的工作和重任。

Interview mit Frau Alexandra Voss, Delegierte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 in Peking

Shang Ou

Shang: Wo steht Deutschland mit seinem viel versprechenden Projekt „Deutsche Industrie 4.0“ heute?

VOSS: Industrie 4.0 steht für die Idee, die physische und virtuelle Welt zu verschmelzen – und das insbesondere im Bereich industrieller Prozesse. Maschine-zu-Maschine-Kommunikation oder das Internet der Dinge bedeuten für die deutsche Industrie die Chance einer erheblichen Effizienz- und Flexibilitätssteigerung, denn es lassen sich neuartige Geschäftsmodelle und erhebliche Optimierungspotenziale in Produktion und Logistik erschließen. Derzeit besteht in diesen Bereichen innerhalb der deutschen Industrie noch viel Entwicklungspotential. Insofern ist in den nächsten Jahren mit einer erheblichen Zunahme einer digitalisierten Produktion sowie neuartiger Technologien und Komponenten zu rechnen. Deutschland verfügt über eine überdurchschnittliche Industriequote von circa 23 Prozent an der

Wirtschaftsleistung, ist Weltmarktführer in etlichen Industriezweigen und exportiert viele wissensintensive Produkte. Damit hat die deutsche Industrie die Möglichkeit, im Wandel zur Industrie 4.0, einen nicht unerheblichen Vorsprung im internationalen Wettbewerb zu erreichen. Gegenwärtig findet man jedoch in Deutschland noch eine Art „digitale Zweiklassen-Gesellschaft“ vor: Auf der einen Seite stehen Unternehmen, die in die Entwicklung neuer Softwaresysteme investieren und auf eine digitale Vernetzung der Produktionsstufen sowie auf Automatisierung setzen, auf der anderen Seite findet man jedoch auch Unternehmen, die bisher noch kaum entsprechende IT-Architekturen in die Produktion integriert haben. Insbesondere KMUs gehören in vielen Fällen zu jenen Unternehmen, die bisher wenig im Bereich Industrie 4.0 aktiv sind. Nur 24 Prozent der kleinen und mittleren Unternehmen schätzen derzeit den Grad ihrer Digitalisierung als hoch oder sehr hoch ein.

Shang: Der deutsche Wirtschaftsminister S. Gabriel hat bei seinem China-Besuch im Juli eine Absichtserklärung mit dem chinesischen Minister für Industrie und Informationstechnologie Miao Wei unterzeichnet. Es geht darin um die Zusammenarbeit beim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Wo ist Ihrer Meinung nach das größte Potenzial in Bezug auf die Kooperation im Rahmen der Industrie 4.0 zu erschließen?

VOSS: Im Transformationsprozess Chinas, von einer Exportnation mit arbeitsintensiver Fertigung hin zu einer auf Dienstleistungen, höherwertigen Technologien und Binnenkonsum ausgerichteten Wirtschaft, sind die Lohnkosten sowie andere Kosten in den letzten Jahren stetig gestiegen. Energiereserven sind nach wie vor begrenzt und die Nachfrage nach Produkten von hoher Qualität steigt. Eine Lösung liegt möglicherweise in der digitalen Vernetzung der Industrie. Auch China hat das Potential erkannt und engagiert sich deshalb verstärkt im Bereich der Industrie 4.0. Dass Deutschland und China hier nach Möglichkeiten einer verbesserten Zusammenarbeit suchen, liegt nahe. Deutsche Unternehmen gehören im Bereich der intelligenten und effizienten Fertigung zu den führenden Unternehmen und bringen das nötige Know-How und eine große Bandbreite an Erfahrung in den Bereichen Technologie, Forschung und Entwicklung, aber auch im Bildungs- und Trainings-Sektor mit.

Deutschen Unternehmen in China, die traditionell vor allem in technologischen und wissensbasierten Branchen wie im Automobil- und Maschinenbau tätig sind und in China auch F&E betreiben, bietet sich nun die Möglichkeit, Chinas Wandel durch z.B. Kooperation im Bereich der Automatisierungs- und Produktionstechnolo-

gie mit zu gestalten. Besonderes Potential bietet sich hier vor allem für den deutschen Mittelstand – dem ein Großteil der in China vertretenen deutschen Unternehmen zuzurechnen ist.

Auch im Bereich gemeinsamer Standards und Normen ist eine enge Zusammenarbeit erwünscht, denn eine reibungslose Maschine-zu-Maschine-Kommunikation kann nur im Rahmen von gemeinsamen technischen Standards und ähnlichen IT-Architekturen stattfinden. Auch im Hinblick auf IT-Sicherheit sind in China agierende deutsche Unternehmen verstärkt an einer gemeinsamen Lösung mit China interessiert. Die Zusammenarbeit im Hinblick auf intelligente Fabriken funktioniert nur dann, wenn für die Sicherheit der Daten und den Schutz geistigen Eigentums gesorgt ist, Geschäftsgeheimnisse gewahrt werden und kein Wissen des Unternehmens unkontrolliert abfließen kann. In den letzten Jahren wurden in diesen Bereichen bereits viele Richtlinien vereinbart und von der chinesischen Regierung umgesetzt. Diese bilden das Fundament einer Partnerschaft auf Augenhöhe. Um diese Partnerschaft weiter zu entwickeln und die Zusammenarbeit deutscher und chinesischer Unternehmen politisch zu flankieren, haben der Bundesminister für Wirtschaft und Energie Sigmar Gabriel und der chinesische Minister für Industrie- und Informationstechnologie Miao Wei eine gemeinsame Absichtserklärung zur Kooperation im Bereich Industrie 4.0 – Made in China 2025 unterzeichnet.

Shang: 2015 gilt als das Innovationsjahr zwischen Deutschland und China. Miao Wei sprach sogar von einer neuen Phase der industriellen Kooperation zwischen beiden Ländern. Was sind die größten Herausforderungen und die

größten Sorgen der deutschen Unternehmen mit Blick auf China?

VOSS: Die Deutsche Handelskammer hat in ihrer jährlichen Geschäftsklimaumfrage zwischen dem 11. Mai und dem 12. Juni dieses Jahres 439 Unternehmern vor Ort zu ihrer gegenwärtigen wirtschaftlichen Situation in China befragt. Laut dieser Umfrage sieht der Großteil der befragten Unternehmen die größten Herausforderungen im HR-Bereich. 82,4% geben an, dass das Finden von qualifizierten Mitarbeitern eines der größten Probleme ist. Der Mangel an gut ausgebildeten Arbeitskräften ist für die deutsche Wirtschaft ein existentielles Problem. Viele deutsche Unternehmen sind in China auch im Bereich F&E tätig. Insbesondere in diesem Bereich wird qualifiziertes Fachpersonal benötigt, da Forschung vor allem in technologischen und wissensbasierten Branchen stattfindet. Momentan sehen 99 Prozent der deutschen Unternehmen, die Forschung und Entwicklung in China betreiben, die Suche nach qualifiziertem Personal als größte betriebliche Herausforderung an. Speziell betrifft dies Unternehmen außerhalb von First-Tier-Städten, da diese Regionen qualifizierte Fachkräfte weniger anziehen. Gründe für deutsche Unternehmen, sich noch nicht im Bereich Forschung und Entwicklung in China zu engagieren, sind neben dem Mangel an qualifiziertem Personal auch die Sorge um den Schutz des geistigen Eigentums sowie der Fokus auf Forschung in Deutschland. Andere Personalfragen, wie steigende Lohnkosten und die Bindung von qualifizierten Arbeitskräften, vervollständigen die Liste der Top drei Herausforderungen deutscher Unternehmen in China.

Shang: Wie könnte man solchen Problemen

am besten begegnen?

VOSS: Um dem Fachkräftemangel zu begegnen, sollte die Ausbildung gut ausgebildeter Fachkräfte gemeinsam weiter vorangetrieben werden. Durch eine verstärkte Zusammenarbeit von deutschen und chinesischen Unternehmen, Hochschulen und anderen Bildungsträgern, können hier gemeinsame Lösungsansätze gefunden werden. Um die Ausbildung von chinesischen Fachkräften verstärkt praxisorientiert zu gestalten, engagieren sich deutsche Unternehmen und die AHK in China seit längerem in den Bereichen der dualen Ausbildung sowie Mitarbeiterqualifizierung und kooperieren hier mit chinesischen Stellen. So ist die AHK bereits an einer Reihe von deutsch-chinesischen Kooperationsprojekten der beruflichen Bildung beteiligt, etwa zur Ausbildung von Industriemechanikern, Werkzeugmechanikern und Mechatronikern. Solche und ähnliche Projekte sollten weiter gefördert und ausgebaut werden. Die Verantwortung, qualifiziertes Personal zu halten, liegt dann im Wesentlichen bei den Unternehmen selbst. Wichtig ist dabei, Mitarbeiter zu entwickeln, zu fördern und an das jeweilige Unternehmen zu binden. Deutsche Unternehmen versuchen dies etwa, indem sie Trainingsprogramme im Bereich der Personalentwicklung initiieren und finanzieren, um das eigene Personal weiterzubilden.

Shang: Chinas Aktienmärkte halten die Börsen rund um die Welt auf Trab. Die Kurse schwanken ab und zu. Beunruhigt diese Stimmung die deutschen Unternehmen in China?

VOSS: Der Aktienmarkt ist für Chinas Realwirtschaft insgesamt noch von relativ geringer

Bedeutung. Dennoch gehen von den Turbulenzen psychologische Auswirkungen aus. Ein verhaltenes Konsum- und Investitionsverhalten der chinesischen Bevölkerung wird auch deutsche Unternehmen treffen. Insgesamt sind dies allerdings Entwicklungen, die sich schon vor der Krise an den Börsen abgezeichnet haben. Deutsche Unternehmen beobachten intensiv die aktuellen Entwicklungen und stellen sich darauf ein, dass sich das Wachstum in China dauerhaft verlangsamt und möglicherweise auf fünf bis sechs Prozent abkühlen könnte.

Deutsche Unternehmen in China haben ihre Erwartungen bereits an das veränderte Geschäftsumfeld und die neue wirtschaftliche Realität angepasst. Sie gehen von einer langsameren Steigerung ihrer Umsätze und Gewinne aus, schätzen dabei jedoch das Wachstum in ihrer jeweiligen Industrie positiver ein als die allgemeine Konjunkturentwicklung. Die Stimmung unter den deutschen Unternehmen vor Ort ist im Allgemeinen weiterhin positiv und zuversichtlich. Investitionen sind nach wie vor geplant, vor allem

Unternehmen aus Branchen mit hoher Wissens- und Technologieintensität erwägen neue Investitionen in den Bereichen moderne Produktion sowie Forschung und Entwicklung. Das zeigt die aktuelle Umfrage der Deutschen Handelskammer in China unter den Unternehmen vor Ort.

Shang: Wie bewerten Sie die Gesamtentwicklung der Realwirtschaft in China überhaupt?

VOSS: Die chinesische Wirtschaft befindet sich weiterhin in einem Transformationsprozess, hin zu einem nachhaltigeren Wirtschaftsmodell mit einem gemäßigeren Wachstum. China hat langfristig gesehen weiterhin hohes Wachstumspotenzial, bedarf aber auch Reformen, um die Wirtschaft für die Zukunft zu rüsten. Die aktuellen Entwicklungen zeigen, dass dies kein einfacher Prozess ist. China ist als zweitgrößte Volkswirtschaft neben der EU und den USA ein Kernmarkt für deutsche Unternehmen. Dies wird sich auch bei niedrigeren Wachstumsraten nicht ändern.

采访者简介：尚欧，本刊特约记者。

新闻鸟瞰

外交新闻

于 芳

一、对欧关系

在过去数月中，德国密切关注欧洲的一体化进程、安全与经济发展。

6月，德国完成批准同格鲁吉亚、摩尔多瓦和乌克兰的联系国协定。德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德国如此快速地批准同东欧伙伴国家的联系国协定，体现了德国同这些国家的友谊、伙伴关系和团结。德国希望加强与这些国家在经济、文化和政治各个方面的关系，该协定的批准提供给了良好的法律基础。

7月，在欧盟对希腊做出新一轮救助的关键时刻，德国尽管同其他成员国有不同意见，但始终坚持，在德法联手的情况下，欧盟有能力实现平和的利益平衡和政治妥协，即便需要进行长期的谈判。

8月，德国同法国、俄罗斯、乌克兰的法

律专家就乌克兰宪法改革、去集中化等法律问题进行了良好交流，希望能为该地区的政治进程带来新的动力。^①8月27日，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表示，很高兴看到乌克兰政府和私人债权人达成一项全面重组乌克兰国债的计划，他称这是迈向经济稳定的重要一步，加上国际社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助，为乌克兰在国家、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改革及现代化转型奠定了基础。德国在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多边、双边框架下，拟在紧急状况中快速提供短期措施和长期的结构性项目。除了5亿欧元的借贷之外，该计划还包括最多1亿8千万欧元的项目资助。^②9月1日，乌克兰东部停火协议正式生效，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表示，停火生效令人鼓舞，他呼吁冲突双方继续保持停火状态，进行政治对话，在停火和安全局势上取得的成就是解

① Auswärtiges Amt: Außenminister Steinmeier zur Einigung der Ukraine mit privaten Gläubigern, http://www.auswaertiges-amt.de/DE/Infoservice/Presse/Meldungen/2015/150827_BM_UKR.html, letzter Zugriff am 8.9.2015.

② Auswärtiges Amt: Außenminister Steinmeier zur Waffenruhe in der Ostukraine, http://www.auswaertiges-amt.de/DE/Infoservice/Presse/Meldungen/2015/150902_BM_Waffenruhe_Ostukraine.html, letzter Zugriff am 8.9.2015.

决冲突的关键。^③

从5月到9月，德国外长分别同多位欧洲国家外长会见，力图推进和这些国家的双边关系，以及如何应对当前欧洲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施泰因迈尔5月会见了爱沙尼亚外长和阿尔巴尼亚外长。6月4日德国外长会见了乌克兰外长，主要议题是双边关系，特别是贯彻落实明斯克协定，以解决东乌克兰冲突，以及乌克兰政府的改革议程。6月24日，德国外长会见了英国外交大臣，就深化双边关系及欧盟政策问题、国际问题交换意见，特别是西巴尔干半岛的局势发展和难民、移民政策。7月3日，德国外长会见了捷克外长并签署了战略对话共同宣言。双方除了交流现实的欧洲问题和国际问题之外，主要谈及深化双边关系，两国一致认为战略对话将为德国和捷克的关系提供新的框架。9月1日，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在外交部同西班牙外长进行会谈，主要内容是深化德国和西班牙的双边关系，特别是欧洲移民政策和现实的国际危机和冲突。

除了现实政治问题以外，德国也寻求和西欧发达国家在全球性问题上的合作，掌握议程设置的话语权。如德国外交部、法国驻德使馆和英国驻德使馆在6月17日举办气候外交日活动，旨在激发人们对气候变化共同应对的意识。法国使馆的讨论会主要以应对气候变化的具体措施为议题，参会者关注气

候变化对地区的影响，国际合作的政治措施，以及欧盟所扮演的角色。^④

二、德国在欧洲之外的区域外交重点

德美关系

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德国重视同美国的人文交流，特别是促进两国青少年之间的项目交流，拟打造面向未来的跨大西洋伙伴关系。2014年美国削减了德美议会促进项目（PPP）的费用，2015年美国宣布增加该项目的资助，德国负责德美合作的协调人表示，此举有利于加强德美合作和相互理解。联邦总理、外长和其他联邦议员都在过去向美国提出过提高资助的希望，能让德美两国的青少年对对方国家的文化有所了解，为未来的跨大西洋伙伴关系打下坚实的基础。

2014年年底，德国马歇尔基金会成立了德美关系未来展望工作小组，目的是全面观察德美关系发展的基础，并在未来加强德美关系的发展。2015年5月底，该工作小组发表了报告“变革时代中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此，德国的德美关系协调人宣布，该报告对德美关系现状、潜力和挑战进行了综合分析，并对未来德美关系紧密发展重要途径提出建议。该报告的重点目标是赢得青年一代对德美关系的重视和推动。^⑤

德国外交部和国际记者计划注册协会董

③ Auswärtiges Amt: Europäischer Tag der Klimadiplomatie 2015 in Berlin: Deutschland, Frankreich und Großbritannien diskutieren gemeinsam, <http://www.auswaertiges-amt.de/DE/Infoservice/Presse/Meldungen/2015/150611-Klimadiplomatie.html>, letzter Zugriff am 8.9.2015.

④ Auswärtiges Amt: Europäischer Tag der Klimadiplomatie 2015 in Berlin: Deutschland, Frankreich und Großbritannien diskutieren gemeinsam, <http://www.auswaertiges-amt.de/DE/Infoservice/Presse/Meldungen/2015/150611-Klimadiplomatie.html>, letzter Zugriff am 8.9.2015.

⑤ Auswärtiges Amt: Koordinator für transatlantische Beziehungen Hardt zur Veröffentlichung des Berichtes “Longstanding Partners in Changing Times”, http://www.auswaertiges-amt.de/DE/Infoservice/Presse/Meldungen/2015/150529-Ko_TRA_Longstanding_Partners.html, letzter Zugriff am 8.9.2015.

事会共同设立亚瑟·F. 伯恩斯奖，每年评选一次，对彼此国家的政治、经济或社会问题进行报道的德国记者和美国记者将各选出一名获奖者。此外，国际记者计划注册协会董事会还评选出对德美关系的最佳评论，并颁发乔治·F. 凯南评论奖。两个奖项的金额分别为2000欧元。2015年6月初，外交部颁发了2015年亚瑟·F. 伯恩斯奖，获奖人是《明镜周刊》驻美国记者马库斯·费尔登吉尔辛（报道题为《女民工》）和《国家地理》记者安德鲁·卡里（《柏林印象“从墙开始”》）。^⑥

亚洲

亚洲的地区冲突和安全问题一直是德国外交关注的重点之一。

5月15日、16日，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出访黎巴嫩和约旦，除了同两国外长会面外，还视察了叙利亚难民的救助项目及约旦的难民营。出发前，德国外长表示，叙利亚内战已经持续五年，目前还看不到尽头，由此造成严重的难民问题，1200万人逃离家园，400万进入叙利亚的邻国。约旦和黎巴嫩早已达到接受难民的最大数量，德国不会袖手旁观，在2014年已经和40个国家和组织达成协议接收难民。目前难民的安置问题已成为最为紧迫的现实问题。

6月，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会见韩国外长，重点讨论了如何深化双边关系，推动实现东亚和平的问题。

8月，联合国声明支持推动叙利亚会谈，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表示此举将会带来叙利亚问题的最终解决，德国将与该地区的当事各方保持密切联系，推动和平进程，希望冲

突双方能积极参与到谈判中。8月17日，德国外交部发言人就大马士革郊区发生的空袭表示，无辜平民不应成为暴力行径的牺牲品，希望当事各方能通过对话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

8月18日至26日，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在外交部分别会见了阿曼外长和阿联酋外长，双方的核心议题主要包括双边关系的建设以及地区性问题的解决，特别是和平解决也门问题、叙利亚局势以及打击“伊斯兰国”。

8月，阿富汗发生了多起袭击事件，导致约80人丧生，其中有平民，也有武装人员，还包括一名美国士兵，数百人受伤。德国外交部发言人对此表示强烈谴责恐怖袭击，认为恐怖袭击的唯一目标是让阿富汗变得更加不稳定，打消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希望。联邦政府表示将会继续支持阿富汗政府维护国家稳定的努力。

除了亚洲的安全局势之外，德国也很重视在亚洲的经济利益潜力开发。6月9日在德国外交部举行了“印度洋大会”，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表示，德国外交政策出现了一个新的重点。印度洋数百年来一直是贸易、经济、政治和文化的重要空间，占世界1/3的人口生活在这一区域，90%的世界贸易在此完成。德国与印度洋地区的国家必须加强合作。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主席贝克指出印度洋海洋安全的现实挑战——不应狭义地理解海洋安全，而是应从人类安全的维度、不安的根源来理解。艾伯特基金会强调了非洲专家对海洋安全问题的看法。尽管在这方面国际合作取得进展，但海盗、毒品走私和非法捕捞都为印度洋地区带来不安定因素，因此必

^⑥ Auswärtiges Amt: Auswärtiges Amt verleiht deutsch-amerikanischen Journalistenpreis, http://www.auswaertigesamt.de/DE/Infoservice/Presse/Meldungen/2015/150603_AA_verleiht_deutsch_amerikanischen_Journalistenpreis.html, letzter Zugriff am 8.9.2015.

须从发展的政策角度入手来解决。^⑦

北非

7月30日，联合国大会采纳了德国和加蓬的倡议，首次通过野生动物反走私决议案。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表示，打击非洲的野生动物走私不仅仅是保护物种，而是一项外交和安全政策。动物走私的收益将会资助犯罪或恐怖活动，不利于非洲国家的发展，也不利于社会稳定。联邦环境部长也对此表示，野生动物反走私无法仅凭非洲解决，只有来源国、中转国和目标国共同合作，才能有效打击走私，该决议案的通过有利于国际社会团结起来，打击走私。^⑧

8月28日，外交部长施泰因迈尔同突尼斯外长会谈，主要话题是德国与突尼斯共和国的关系，特别是支持突尼斯民主稳定、打击恐怖主义。此外，双方还讨论了地区性问题，特别是突尼斯邻国利比亚的局势问题。

8月初，南苏丹国内战争双方决定开始和平对话，德国外交部发言人对此表示赞赏，认为南苏丹的内战已经造成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应当立刻停止，南苏丹必须重新回到和平、民主化和发展经济的道路上。德国政府将会继续支持南苏丹的和平进程，呼吁南苏丹进行关于和平进程的公开讨论，但南苏丹政府关闭报纸和电台于此目标无益。8月18日，施泰因迈尔对南苏丹冲突双方的基本协定表示赞赏，认为此举能减少流血和苏丹

人民的痛苦。但有报道称南苏丹政府正把矛头对准公开寻求和平的个人和机构，施泰因迈尔对此表示担心，德国支持国际社会的努力，也支持采取措施防止和平进程遭到破坏。

埃及法老图坦卡蒙木乃伊的金面罩修复工作得到了德国外交部的支持。2015年9月1日，德国外交部在文化保护项目的框架内为该文物的修缮提供了50,000欧元的资助。自2015年9月开始，位于开罗的德国考古研究所和美因茨的罗马·日耳曼中央博物馆与一家德国-埃及科学委员共同展开此次文化保护项目。德国和埃及之间的合作有助于推进两国在考古和文物修缮方面的交流。^⑨

三、和平与安全问题

8月5日，在日本遭两枚原子弹轰炸七十年之际，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在柏林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能给人类带来灭顶之灾，仍旧需要尽全力实现一个无核武的世界，这是德国政府对外明确宣示的一个目标。尽管困难重重，但同伊朗核问题上取得的成功表明，困难时候也能寻找到出路，联邦政府坚持寻求减少核武的办法。

8月24日，在墨西哥坎昆召开了武器贸易协定缔约国第一次大会。德国位列其中，积极推动更多国家签署、批准和贯彻这项重要的国际法协定，并支持缔约国和观察国贯

^⑦ Auswärtiges Amt: Außenminister Steinmeier eröffnet internationale Konferenz "The Indian Ocean – A Maritime Region on the Rise", <http://www.auswaertiges-amt.de/DE/Infoservice/Presse/Meldungen/2015/150605-Indian-Ocean-Konferenz.html>, letzter Zugriff am 8.9.2015.

^⑧ Auswärtiges Amt: VN-Vollversammlung verabschiedet auf Initiative Deutschlands und Gabuns erstmalig Resolution gegen Wilderei und Wildtierschmuggel, http://www.auswaertiges-amt.de/DE/Infoservice/Presse/Meldungen/2015/150730_BM_VN_Vollversammlung_Wilderei_Wildtierschmuggel.html, letzter Zugriff am 8.9.2015.

^⑨ Auswärtiges Amt: Auswärtiges Amt unterstützt Restaurierungsarbeiten an der Goldmaske des Tutanchamun, http://www.auswaertiges-amt.de/DE/Infoservice/Presse/Meldungen/2015/150901_Tutanchamun.html, letzter Zugriff am 8.9.2015.

彻协定规定，致力于推动世界和平与安全。

四、人权政策及人道主义救援

德国人权专员施特雷塞尔原定于6月22日前往俄罗斯同俄罗斯行政、立法、司法界代表会谈，其中包括与俄罗斯人权代表和公民社会代表见面。俄罗斯方面通过口头和书面方式表示不希望德国人权专员到访。施特雷塞尔表示震惊，认为此举有损于德俄关系，是将国际合作视为威胁并加以限制。他提出，对话和相互理解才是危机时期两国相互信任的关键。此次出访被取消令他失望。

7月3日，联邦政府人权专员宣布，鉴于也门当前极端穷困、冲突不断、难民激增，饮用水缺乏，疫病肆虐，外交部决定为也门再提供100万欧元人道主义救援，至此，德国外交部在2015年一共提供了580万欧元人道主义救援资金。

8月17日，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对埃及新近通过反恐法表示担忧，认为该法通过限制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来打击恐怖主义的做法是错误的，基本人权长期不受重视无法实现持久稳定，正是在困难时期，尤其有必要保护和捍卫人权。

在世界人道主义救援日8月19日，德国人权政策和人道救助专员施特雷塞尔公开表示，人道主义救援仍旧是德国道义责任的一部分，德国外交部将会针对不同的需求提供支持。

8月21日，德国人权专员施特雷塞尔就南苏丹发生针对记者的暴力事件表示震惊，他呼吁南苏丹政府尊重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尊重记者的职业行为，认为压制公开辩论对南苏丹和平进程毫无帮助，南苏丹必须尊重人权，回到和平、民主化和经济发展的轨道上来。

8月25日，俄罗斯军事法院对两位乌克兰

籍导演分别做出20年和10年徒刑的判决。德国人权专员施特雷塞尔呼吁俄罗斯当局尊重两位导演的权利，俄罗斯作为欧洲委员会的成员有义务遵循国际人权标准。

8月29日，埃及有三名记者被判处三年徒刑，8月31日德国人权专员施特雷塞尔表示，对埃及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受到限制感到十分担忧。2015年8月17日，埃及通过了一项反恐法律，对本国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有所限制，在施特雷塞尔看来，这些对基本权利的限制不利于埃及政府稳定局势，在任何情况下，特别是在艰难时期，必须保护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

8月31日，德国人权专员施特雷塞尔就也门发生的针对民用设施的袭击表示，摧毁民用设施会让当地的人道主义形势和人们的生活供给变得更加糟糕。他呼吁当事各方尊重国际法，停止对民用设施的袭击，也门冲突不能用军事手段来解决。他表示继续支持联合国特派员实现人道主义停火的努力，结束军事冲突，寻求政治解决方案。

鉴于目前的难民局势，德国外交部提供了100万欧元人道主义救援资金。8月26日，施泰因迈尔表示，在欧洲邻国的难民陷于困境、寻求保护的时候，德国不能袖手旁观，应当支持当地政府承担起责任，快速有效地帮助难民。即便是在困难时期，欧盟也始终坚持自己的价值观，不会让邻国独自承受，因此，难民将在欧盟范围内采取比较均匀地分配的取向，德国在向欧盟难民政策提出的十点计划中已经提出该项建议。9月9日，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和经济部长加布里尔在柏林公开表示，欧洲只有同舟共济才能处理好安置难民的问题。欧盟需要统一的欧洲难民政策，欧盟委员会的大胆提议指明了正确的道路。这份建议内容包括，欧洲面临的责任由多个国家来共同承担，德国支持欧盟委员会关于建立长期的责任分摊机制的建议。在

处理难民潮的过程中，最根本的问题是要厘清难民潮产生的原因，德国认为应当在欧洲层面上采取令人信服的行动。^⑩

五、纪念活动

5月7日—12日，德国外交部举办了题为“德国与以色列建交50周年——独特关系的历史时刻”的展览。这个展览是德国外交部和新犹太教基金会柏林中心共同进行的项目，展示了德以关系建交以来的发展立场，除了图片和信息展板外，还有电影展映和对前以色列驻德大使的采访。^⑪

2015年是德国加入北约60周年，6月30日，德国外长、国防部长和北约秘书长在德国外交部进行了庆祝活动。2015年也是德国签署《联合国宪章》70周年，德国外长称，联合国已经成为当今国际秩序的核心支柱，没有联合国就无法实现世界和平与安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需要的正是联合国这种有最大合法性和全球行动能力的国际组织，这是符合德国利益和外交政策。联合国的维和行动是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手段，当今最重要的目标是保护平民。德国会继续支持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并将在联邦政府对此展开讨论。

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在德国和巴西的政府磋商结束时谈及社民党元老埃贡·巴尔去世的消息，高度赞扬了埃贡·巴尔的高瞻远瞩，其新东方政策和“以接近求变化”的政策改变了历史的走向，使得德国和欧洲的统一成为可能。埃贡·巴尔认为，欧洲的和平要和俄罗斯一起才能完成，而不是脱离俄罗斯。^⑫

德国和波兰签署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在2016年迎来25周年纪念，德国政府负责德波社会合作的协调人表示，德国和波兰在条约基础上进行了充满信任的合作，这份条约不仅加速了德国和波兰二战后的和解进程，也使得两国政府关系更为密切。条约自签订以来，两国社会间交往日益频繁。为了庆祝条约签署25周年，两国外交部推出一项活动，并公开向社会征集周年庆祝的图标。

1990年签订的“2+4”条约为德国重新统一铺平了道路，2015年是该条约签订25周年。9月11日，德国外交部举行了纪念活动，外长施泰因迈尔邀请了六个缔约国的时代见证人参加，其中包括联邦德国前外长汉斯-迪特里希·根舍、前民主德国外长马库斯·麦克尔、前法国外长罗兰·杜马。^⑬

作者简介：于芳，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讲师，博士。

⑩ Auswärtiges Amt: Außenminister Steinmeier und Wirtschaftsminister Gabriel zu Vorschlägen der EU-Kommission zur Migrations- und Asylpolitik, http://www.auswaertiges-amt.de/DE/Infoservice/Presse/Meldungen/2015/150909_BM_Migrationspolitik.html, letzter Zugriff am 8.9.2015.

⑪ Auswärtiges Amt: 50 Jahre deutsch-israelische Beziehungen – Auswärtiges Amt und Centrum Judaicum präsentieren Ausstellung, http://www.auswaertiges-amt.de/DE/Infoservice/Presse/Meldungen/2015/150506_50Jahre_dt_isr_Beziehungen.html, letzter Zugriff am 8.9.2015.

⑫ Auswärtiges Amt: Außenminister Steinmeier zum Tod von Egon Bahr, http://www.auswaertiges-amt.de/DE/Infoservice/Presse/Meldungen/2015/150820_BM_Egon_Bahr.html, letzter Zugriff am 8.9.2015.

⑬ Auswärtiges Amt: Gedenkveranstaltung zum 25. Jahrestag der Unterzeichnung des “Zwei-plus-Vier-Vertrags”, http://www.auswaertiges-amt.de/DE/Infoservice/Presse/Meldungen/2015/150909_zwei_plus_vier.html, letzter Zugriff am 8.9.2015.

经济新闻

徐丽莉

一、德国经济总体情况

柏林德国经济研究所（DIW）的景气晴雨表显示：德国国内生产总值在2015年第三季度同比增长0.4%。DIW景气研究主任斐迪南特·费希特纳希望人们不要对德国经济增长做出过于乐观的预期：鉴于目前欧元区严峻的形势、人们对中国经济的担忧以及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情况，德国经济不久也会增长乏力。^①

DIW景气指标从第二季度的104点增加到第三季度的107点。尽管如此，柏林经济研究所请人们谨慎对待经济增长，因为许多指标预示着德国经济的下滑。该所景气专家西蒙·容克指出：目前工业生产停滞不前而且投资增长缓慢，对外贸易也将减缓经济增长的速度。根据DIW的预测，德国出口前景将会变得暗淡，但消费会刺激进口。

按照ifo研究所的计算，德国2015年的经常性项目收支盈余将继续增加并会达到2500亿欧元，远超过2014年的2160亿欧元，

最大的驱动力来自商品交易。商品出口盈余将达到创纪录的2700亿欧元，而服务和国外收入为负200亿欧元，这一发展的原因是欧元的疲软促进了德国的商品出口。另外，国际市场原油价格的下降使得德国原油进口成本降低。值得一提的是，尽管目前利率水平很低，但经常项目收支盈余依然保持增长。在利率水平正常的情况下，德国经常项目收支将额外赢得几百亿的盈余，达到2800亿美元，位列世界第二位，仅落后于中国。中国由于进口的减少，经常性项目收支盈余将由2200亿美元增长到3300亿美元。

鉴于德国经常项目收支盈余的增加，德国资本出口在2016年预计将增长到年度经济总量的8.4%，超过2014年的7.5%。欧盟认为，从长远角度看，资本出口比重最多不应超过6%，但愿意成立一个资本市场联盟，以支持向南欧各国出口资本。^②

景气方面令人高兴的消息来自劳动市场。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5年8月德

① DIW: Pressemitteilung vom 02.09.2015, letzter Zugriff am 03.09.2015.

② http://www.cesifo-group.de/de/ifoHome/presse/Pressemitteilungen/Pressemitteilungen-Archiv/2015/Q3/pm-2015_0917_Leistungsbilanz.html, letzter Zugriff am 17.9.2015.

国失业人数为 279.6 万，失业率为 6.4%。^③ 就业增加与工资显著提高会继续促进德国消费的增加，进而推动经济增长。在第三季度，能源价格下降会支持私人消费的增长。2015 年 8 月 25 日的 ifo 研究所商业气氛指数又一次攀升。^④

其中工商业的商业气氛指数达到了 108.3 点（7 月份为 108.0 点）。企业对自身的目前经营状况更加满意，但对未来的预期不是十分乐观，因为德国经济是世界经济大潮中唯一挺立的岩石。

加工业的商业气氛指数略微下降，原因在于工业公司对未来谨慎预期，但企业对自身的目前经营状况也是更加满意，只有少数的企业计划在未来的几个月中扩大生产。批发商业的指数有所下降，前一个月对自身经营状况的良好预期在本月未能继续保持。零售业的商业气氛指数达到了 2011 年 6 月以来的新高，商人们对自身经营状况极其满意，对未来的预期也持续乐观。在建筑业，该指标达到 2014 年 3 月以来的最高点。建筑企业对自身目前经营状况尤其满意，其对未来的预期也继续乐观。

2015 年 9 月德国联邦统计局公布了本年度前八个月消费者价格指数。4 月至 8 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增长率分别为 0.5%、0.7%、0.3%、0.2% 和 0.2%。增长幅度最大的是烟酒、住宿与宾馆服务、保持健康等，五个月的平

均增长率分别为 3.16%、2.76% 和 2.04%。教育、房屋、水、电、燃气、交通、获取新闻等方面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均为负。^⑤

2015 年德国的国家税收收入远远高于预期：按照 DIW 的计算，联邦、州和县市三个层面的税收收入达到 6720 亿欧元，比 2014 年同期增加了 280 亿欧元，高出官方 5 月的预期 50 亿欧元。DIW 财政专家克里斯蒂娜·凡·道尔凡登（Kristina van Deuverden）指出：税收收入会继续强劲增长，原因在于劳动力市场的良好状况。就业和工资的增长提高了人们的收入，进而提升了消费，使得增值税收入增加。个人收入所得税和公司税也有增长，这就意味着企业在 2015 年可以期待相对较高的利润。联邦可以用这些增收的税收收入来解决德国目前面临的难民潮等问题。2016 年国库仍可以期待强有力的税收增长，预计增加近 180 亿欧元。^⑥

德国股市在 2015 年 4 月达到了创纪录的 12 400 点，之后股市经历了几轮调整，8 月时股市下挫。8 月 24 日是黑色星期一，Dax 股指下跌至 9300 点。8 月世界各国股市震荡的原因在于对中国经济增长和世界经济景气情况的担忧和美国近期将做出的利率调整。^⑦

DIW 的景气研究人员预测：2015 年德国国内生产总值将增长 1.8%，2016 年将达到 1.9%。但是他们强调，风险非但不会减少而且会增

③ <https://www.destatis.de/DE/ZahlenFakten/GesamtwirtschaftUmwelt/Arbeitsmarkt/Arbeitsmarkt.html>, letzter Zugriff am 11.9.2015.

④ <http://www.cesifo-group.de/de/ifoHome/facts/Survey-Results/Business-Climate/Geschaeftsklima-Archiv/2015/Geschaeftsklima-20150825.html>, letzter Zugriff am 28.08.2015.

⑤ https://www.destatis.de/DE/ZahlenFakten/GesamtwirtschaftUmwelt/Preise/Verbraucherpreisindizes/Tabellen_/VerbraucherpreiseKategorien.html?cms_gtp=145112_list%253D2%2526145118_list%253D3&https=1, letzter Zugriff am 10.9.2015.

⑥ http://diw.de/de/diw_01.c.513774.de/themen_nachrichten/steuereinnahmen_steigen_staerker_als_erwartet.html, letzter Zugriff am 15.09.2015.

⑦ <http://www.handelsblatt.com/finanzen/anlagestrategie/trends/dax-anstieg-bis-auf-11-000-punkte-boersianer-erwarten-goldenen-herbst/12323484.html>, letzter Zugriff am 17.09.2015.

加。在欧元区仍有一些国家持续与债务危机和高失业率做斗争，并面临着银行领域的问题；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的增长仍然很脆弱；美国的利息转折会使更多的资本从新兴国家流出，进而可能降低其经济景气活力。

虽然德国的对外贸易为明年德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减弱，但会一直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问题不是出在出口本身，而是国内需求的增长导致进口的显著增加。由于劳动市场状况良好以及物价的稳定使得私人消费持续增加，继续保持景气支柱的地位。目前德国涌入了大量的难民，其消费需求也会增加德国的内需。虽然难民数量的激增导致联邦、州和县三个层面的支出增加，但公共财政预算在 2015 和 2016 两个年度保持盈余状态。^⑧

二、难民潮与德国经济

德国工业界的总裁们认为：目前涌向德国的成千上万的难民对德国经济来讲是个大好机会。戴姆勒公司首席执行官迪特·蔡澈（Dieter Zetsche）在 9 月法兰克福汽车展的准备阶段中表示：在最理想的情况下，目前接纳的这些人可以成为下一个德国经济奇迹的基础，正如 50、60 年代数以百万计的外籍劳工为联邦德国的繁荣做出了贡献一样。保时捷、赢创工业集团（Evonik）以及德国邮政也表示将向难民提供更多帮助。

联邦劳动部长安德烈·纳勒斯（Andrea Nahles）和联邦劳动局的负责人弗兰克·于尔根·魏泽（Frank-Jürgen Weise）预计，在难民潮初期，德国失业率将上升。但是从长远来看，劳动市场和职业研究所预计，难民在就业市场上不会带来负面影响。假设有 22 万人融入就业市场，而其中有 20% 的人有大学学历或职业培训资格证书，那么失业率将上

升仅 0.07 个百分点。根据该研究所的计算，德国工资水平将保持不变。

此外，莱茵-威斯特法伦经济研究所（RWI）的研究员托马斯·鲍尔（Thomas Bauer）也安慰说：“我们从移民研究中得知，就算有很大的移民潮，对就业市场的影响也是非常微小的。”在大多数研究中，对失业没有影响。这“并不是意味着，移民会夺走当地人的就业位置。而且移民对工资水平的影响也几乎无法估计。在某些研究中，结果甚至是正面的”。

但是让难民融入德国劳动市场是一个重大的挑战。联邦劳动局下属的劳动市场与职业研究所（IAB）的资料显示，从长远来看，能够留在德国的难民申请者中有 55% 将具备执业资格。劳动市场和职业研究所调查了两万名刚来德国的避难者，其中有将近 1/4 的人已完成职业培训，有接近 2/3 的人没有接受过职业培训。但这一调查也不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

联盟议会党团的中产阶级和经济联合会主席卡斯滕·林内曼（Carsten Linnemann）在给商报的一篇嘉宾评论中写道：“大部分到我们这里来的难民，短期，甚至中期，在我们的就业市场上是没有机会的。”这位基民盟的政治家预计，只有一小部分难民能够较快融入社会，而且可以填补一些专业职位。但他也指出：“缺乏专业人士的问题无法通过给与避难权来解决。”为简化劳动市场的融入，劳动市场和职业研究所建议，除了密集的语言培训外，须加快对学历的认证，并在学校和大学提供量身定制的教育和培训机会。

德国经济研究所的研究给予了人们信心，他们认为德国经济将在接下来的这几年来从移民大潮中获益。该研究所预测，如果没有移民，德国经济在 2016 年的增长，将会比有移

^⑧ http://diw.de/de/diw_01.c.513837.de/themen_nachrichten/diw_konjunkturprognose_deutsche_wirtschaft_bleibt_auf_kurs.html, letzter Zugriff: 17.09.2015.

民的情况下减少 0.25%。原因在于：在住房、培训和融合方面的公共开支有所增加。此外，难民还将得到经济上的帮助，他们会把这其中的一部分用于消费。这相当于一个微型的经济刺激方案。

而 RWI 托马斯·鲍尔则认为难民潮在初期不会对经济增长带来大的影响。他在接受德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但是从长远来看，这个难民潮在未来，会对德国的经济增长带来激励，如果我们可以让难民成功融入劳动力市场。”^⑨

三、行业与企业要闻

1. 法兰克福车展（IAA2015）

9月15日法兰克福车展开幕。其主题为“联网世界中的汽车”。汽车行业协会主席威丝曼先生（Wissmann）看到了汽车行业发展的未来：汽车将成为移动的交流平台。^⑩

保时捷董事会主席马蒂亚斯·米勒（Matthias Müller）也指出：汽车世界正经历着巨大的变革：新的驱动方案、汽车自主化（Autonomisierung）以及网络在汽车内的应用都为汽车行业打开了新的可能性，而汽车行业也面临着巨大的变革。^⑪

大众集团在车展前夜发布未来发展三大战略方向：一是要成为电动汽车市场的领导者，并实现新能源汽车的量产，同时也将实现产品线中相当大部分车型为新能源汽车。二是数字化战略——“大众将把每一辆汽车发展成行驶的智能手机。同时，大众全球的数字化公式营销也正在进行中。”三是自动驾驶。

2. 拜耳公司改组

医药和化工企业拜耳股份公司进行了14年来最大的企业改组，放弃了目前的控股结构转回原来的整合在主品牌“拜耳”下的集中的组织结构。新的结构将于2016年1月生效。在与科思创（Covestro）材料科技业务分离之后，拜耳公司将集中于生命科学领域。^⑫

3. 创维收购美兹（Metz）公司

创维已于2015年4月中旬签约收购濒临破产的德国老牌电视企业“美兹”的电视机业务，收购金额不到1亿元人民币。对创维来说，德国是开启欧洲市场自主品牌之旅的第一站。但美兹公司面临裁员的问题：从事电视机业务的219名现有员工只有152人可以继续在公司工作。^⑬此后，美兹公司重获新生。在柏林消费电子博览会（IFA）上，美兹公司与其中国所有者创维公司第一次共同参展。^⑭

作者简介：徐丽莉，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讲师，博士。

^⑨ <http://www.dw.com>, letzter Zugriff am 14.9.2015.

^⑩ <http://www.handelsblatt.com/video/panorama/iaa-frankfurt-2015-das-auto-wird-zur-mobilen-kommunikations-plattform/12320242.html>, letzter Zugriff am 15.9.2015.

^⑪ <http://www.handelsblatt.com/video/unternehmen/made-in-germany/talk-wege-in-die-neue-mobilitaetswelt/12326304.html>, letzter Zugriff am 16.9.2015.

^⑫ http://www.handelsblatt.com/unternehmen/industrie/konzernumbau-bayer-erfindet-sich-neu/12342544.html?navi=UNTERNEHMEN_2_TOP-NEWS_12342544, letzter Zugriff am 17.9.2015.

^⑬ <http://www.handelsblatt.com/unternehmen/it-medien/traditionsmarke-ueberlebt-chinesen-retten-tv-hersteller-metz/11699686.html>, letzter Zugriff am 1.5.2015

^⑭ <http://www.handelsblatt.com/my/unternehmen/it-medien/metz-auf-der-ifa-die-wiedergeburt-einer-deutschen-ikone/12275204.html>, letzter Zugriff am 5.9.2015

媒体新闻

周海霞

一、德国媒体关注人民币贬值

对于人民币贬值一事，德国媒体提出，人民币贬值导致中国出口商品价格下降，这对中国经济发展有益，但对于那些与中国有紧密贸易合作的国家而言，则意味着不利影响，比如美国和德国都开始担心对华出口需求下降。报道称：“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人民币贬值的结果具有不确定性。”^①

德媒认为，德国工业界对此虽忧心忡忡，但同时德国工业界还是能冷静面对人民币贬值以及中国最新的经济发展状况。德媒指出，对于德国经济界人士而言，人民币贬值并非完全在其意料之外，可以理解为是中国因为经济发展放缓所采取的应对措施，因为中国出口产业疲软，政府担心中国经济硬着陆。而且“中国经济发展只是放缓，并非倒退，只是意味着其经济发展速度不及2009年经济

危机之后的发展速度。”^②

同时德媒表示，德国工业界之所以能够冷静对待人民币贬值，另一个原因在于众多德国企业，尤其是业界的领头羊企业如巴斯夫等，虽也已切身感受到对华出口需求下滑趋势，但他们其实已经有所准备。近几年来，这些企业已经在对华贸易中逐渐改变生产结构和贸易策略，扩大公司在中国/亚洲本土的公司生产能力，以避免受到汇率变动的影响。德媒表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使得与中国有紧密贸易合作关系的西方工业国家被迫寻找新的导向。^③

关于人民币汇率的走势，德国商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约尔格·克拉默（Jörg Krämer）认为，人民币贬值的趋势还会持续数月，因为中国经济自身发展放缓，很多在华投资者遭受损失，股市和房地产领域都是如此，如今他们更愿意将投资转移到中国境外。^④

① Scholtes, Brigitte/ Klein, Bettina: Yuan-Abwertung in China Währungskrieg oder bloße Dramatisierung, 21.08.2015, Deutschlandfunk, http://www.deutschlandfunk.de/yuan-abwertung-in-china-waehrungskrieg-oder-blosse.724.de.html?dram:article_id=328973, letzter Zugriff am 20.09.2015.

② Ebenda.

③ Ebenda.

④ Ebenda.

二、德国媒体评议中国阅兵

德媒对于中国阅兵仪式的报道主要包括三个议题：1. 中国意欲通过阅兵式展示军事实力；2. 中国的和平意愿与裁军计划；3. 中国国内的反日宣传。

德媒表示，中国此次阅兵展示了当今中国的军事实力^⑤，虽然中国士兵的人均军费开支远低于美国，但中国在阅兵式上展示的武器装备却越来越先进。报道称，此次阅兵是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阅兵仪式，这让很多日本人感到不安。^⑥

同时德媒指出，展示军事实力仅是中国阅兵式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在于中国在阅兵式上所强调的促进世界和平的意志。相关报道都提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阅兵仪式上宣布中国将裁军 30 万。^⑦

另外，德媒还表示，中国目前存在一波抗日宣传的浪潮：艺术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里展出抗日主题的展览，电视中播放抗日剧，影院也有三部大制作的抗日影片上映。^⑧

最后，德国媒体对于阅兵仪式期间北京的空气状况和安保措施等也有所关注。报道表示，北京上空又出现蓝天白云，多家工厂

停产，大型的建筑工地全部停工，私家车实行单双号限行措施。报道也提到为保障阅兵仪式顺利进行，中国采取了严格安保措施，比如临时关闭机场，加油站停止营业，推迟中小学开学时间等等。^⑨

三、华为智能手表广告出现拼写错误引争议

华为（德国）公司在柏林打出的一块宣传该公司智能手表的巨型广告牌近期引发德国媒体关注，原因是该广告牌上出现了两个拼写错误：Android 写成了 Andriod；(des) Produktes 写成了 (des) Productes。德国媒体称，拼写错误虽然可能人人都犯过一两次，但是在这样一个仅有寥寥数语的巨型广告牌上，出现两处拼写错误则就另当别论了。媒体表示，华为公司显然并不关注文字校对这一重要细节，认为华为公司的节俭用错了地方。^⑩大多德国媒体报道此事时主要采取讽刺的态度。报道称，华为巨幅广告上的拼写错误醒目刺眼，称这让华为公司颜面尽失，也让人对华为公司的产品质量产生质疑：“希望华为的设备本身没有问题”^⑪。但也有媒体认

⑤ Zand, Bernhard: Gewaltige Militärparade: China zeigt, was es hat, in: Der Spiegel, am 03.09.2015, <http://www.spiegel.de/politik/ausland/china-feiert-weltkriegsende-mit-grosser-waffenparade-a-1051160.html>, letzter Zugriff am 20.09.2015.

⑥ Ebenda.

⑦ (Verfasser unbekannt): Kriegsgedenken mit Waffenschau, 03.09.2015, in: Tagesschau, <http://www.tagesschau.de/ausland/militaer-china-101.html>, letzter Zugriff am 20.09.2015.

⑧ Kolonko, Petra: Blauer Himmel über Peking, 02.09.2015, in: FAZ, <http://www.faz.net/aktuell/politik/ausland/asien/peking-bereitet-parade-zum-ende-des-zweiten-weltkriegs-vor-13776786.html>, letzter Zugriff am 20.09.2015.

⑨ Ebenda.

⑩ (Verfasser unbekannt): Hat dieses Berliner Werbeplakat denn niemand Korrektur gelesen? 16.09.2015, in: Stern, <http://www.stern.de/panorama/plakat-huawei-blamiert-sich-mit-zwei-rechtschreibfehlern-6454756.html>, letzter Zugriff am 20.09.2015.

为，华为公司歪打正着，恰恰这两个拼写错误让华为原本没有任何特别之处的广告引发了巨大的关注，^⑪甚至有报道猜测这种错误是否是有意为之。^⑫

作者简介：周海霞，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副教授，博士。

⑪ (Verfasser unbekannt): Rechtschreib-Panne! Huawei blamiert sich mit Riesen-Plakat in Berlin, 16.09.2015, in: Berliner Kurier, <http://www.berliner-kurier.de/kiez-stadt/krasse-tippfehler-rechtschreib-panne-huawei-blamiert-sich-mit-riesen-plakat-in-berlin,7169128,31823292.html>, Letzter Zugriff am 20.09.2015.

⑫ (Verfasser unbekannt): Rechtschreibfehler in Huawei-Plakat – peinlicher Fauxpas oder brillante PR? 17.09.2015, <http://www.xn-darber-spricht-die-welt-epc.de/rechtschreibfehler-in-huawei-plakat-peinlicher-fauxpas-oder-brilliant-pr/>, letzter Zugriff am 20. 09.2015.

政治、社会与文教新闻

史笑艳

一、难民问题

截止到2015年8月，已经有近十多万来自叙利亚和中东地区的难民通过塞尔维亚进入欧盟境内。塞尔维亚总理武契奇公开发言表示，他认为这些难民并非罪犯或恐怖分子，而是可怜的无助人。因此，塞尔维亚出于人道主义原则拒绝关闭边境，没有像匈牙利那样在175公里边境线上竖起3.5米高的铁丝网来阻挡流离失所的难民。连续数月，欧盟各国始终无法就如何分摊难民问题取得共识。欧盟委员会提出的固定分配方案也无法通过，英国和各东欧欧盟成员国反对接受此方案。目前，欧盟各国完全是在自愿原则的基础上处理难民接收的问题，各成员国在如何分摊难民问题上始终存在分歧。例如波兰开始拒绝继续接收难民，声称自己面临来自乌克兰的潜在难民潮的威胁。

近期，德国总理默克尔再次呼吁欧盟各成员国共同公平合理地接收难民。默克尔认为，欧盟28个成员国不能期待只由三四个国家来单独承担接收难民的任务，各成员国应当讨论如何合理地共渡难关。在参加杜伊斯堡的公民对话时默克尔强调，要尽一切力量

在寒冬到来之前为更多的难民提供合适的住所。此外，默克尔也提出，那些并非难民的非法移民应尽早打消认为可以在德国居留的幻想。面临着日益严峻的难民潮和如何解决难民住所并将他们融入德国社会的问题，德国政府仍在寻找合适的解决方案。与此同时，德国各地的极右翼势力频繁游行滋事、制造混乱。德累斯顿市附近的海德瑙尔镇曾发生由极右分子和新纳粹分子制造的反难民示威游行，游行过程中大量警务人员受伤，一名极右翼犯罪分子被捕。针对近期极右翼分子和新纳粹分子制造的暴乱，默克尔并未马上直接高调表态。她的沉默被各界质疑和指责。近日她的发言人申明，总理对极右翼和新纳粹的仇恨性言论表示厌恶。德国副总理加布里尔也抵达海德瑙尔镇，他声称将严厉打击极右翼分子和新纳粹分子的极端行为。

近期N24 Emnid机构一次社会调查结果显示，74%的德国人要求政府严厉打击极右翼势力，18%的德国人认为政府应该打击极右翼势力，只有3%的德国人认为政府不应该严惩极右翼势力。在难民问题上，36%的德国人要求政府继续加大帮助难民的力度，32%的德国人认为政府的难民政策得当，24%的

德国人认为政府为难民做的已经太多了。根据问卷调查的结果，只有 40% 的德国人对默克尔总理针对难民政策和避难政策所做出的危机管理表示满意，47% 的德国人认为默克尔总理对难民问题的处理并不得当。

二、德国的社会阶层

自 70 年代起，人们就把一个社会中的人群分为上、中、下三个阶层。对阶层归属的划分有三方面标准，即职业归属、收入状况和受教育程度。

按照欧盟的定义，如果居民可支配收入低于所有居民可支配平均收入的 60%，那么他们就属于面临贫困风险的人群。例如，据 2014 年微观财政调查，个人每月可支配收入低于 917 欧元的居民就是面临贫困风险的人群。越没文化越贫穷，虽然德国社会中的贫穷人口近年来比重比较稳定，但受教育较少的人群处境越来越差。按照德国联邦统计局的定义，最高只有十年制初中毕业文凭且未完成任何职业培训教育的群体是具有初级职业能力的人群，最高只有高中毕业文凭且未完成任何职业培训教育的群体是具有中级职业能力的人群。德国联邦统计局 2014 年统计表明，全德国居民中有 15.4% 的居民正面临贫困的风险。数据显示，东西德统一 25 年后，原东德和原西德地区在这一统计数据上仍存在巨大差异。在原东德地区面临贫困风险居民的比例为 19.2%，在原西德地区面临贫困风险居民的比例为 14.2%。

《上、中、下》是联邦政治教育局出版的描述德国社会阶层的新书。在书中讨论了“谁属于德国社会的精英阶层？”“德国的中产阶层过得怎么样？”“谁正面临贫困的风险”以及“机会和收入是怎样公正地在德国社会分配的？”这几个问题。从收入角度而言，社会的中产阶层是指每月净收入在 1160

至 2460 欧元之间的单身人群和每月净收入在 2400 至 5160 欧元之间两个孩子的家庭。社会的上层阶级分为两个群体：一个群体是在职的对社会具有影响力的精英人才；另一个群体则是真正的富豪。真正的富豪是那些具有高额资产，在有生之年无需为日常生活再去工作的人群。社会学家通常可以较清楚地剖析中低阶层人群的生活方式，但却难以了解到上层社会的世界。社会学家米歇尔·哈德曼教授认为，德国的精英人群虽然和普通德国人生活在一个“平行世界”中，但是在精英阶层的世界里有不同的准则。哈德曼教授曾经对德国最富裕的 1000 人进行过研究，他认为与普通人群相比较，德国的精英阶层对社会中的不平等现象批判较少，这些精英人群中有很多人在童年和少年时代生活条件就非常优越。在哈德曼教授看来，这说明在德国成功经常是祖传的。在德国最重要的 1000 个具有影响力的人群中，2/3 的人出生于德国最富有的占德国人口 3.5% 的家族。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人极力淡化阶级背景，推崇劳动创造财富的思想。社会阶层相对开放，人们较容易通过努力得到晋升，中下阶层在社会财富方面的占有比例有所增加，上等阶层占有的财富相对减少。中产阶层给社会带来了政治和经济的稳定，整个社会暂时告别了阶级竞争。然而，自从上个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收入方面的两极分化又开始日益加剧。富裕人群的财富积累愈来愈快，中下阶层的收入则稳中有降。德国 60% 的居民属于中产阶层。虽然这个阶层较为稳定，人们没有严重的危机感，但过去 60、70 年代时的那种完全的安全感也已荡然无存，对中产阶层而言，获取符合市场需要的教育和知识背景是决定个人社会阶层去向的关键。如果一个人接受的教育不符合市场的需要，他很可能降一个阶层，而如果一个人接受了另外的符合市场需要的教育，那他很可能上升到社会的上等

阶层。与战后时代相比，现在的德国中产阶级有了更多新的机会，但他们面对的风险也增加了。根据2014年Allensbach问卷调查的结果，59%的德国人认为德国社会的资产分配是不公正的，只有21%的德国人认为德国社会的资产分配是公平的。然而，在失业率接连下降的大环境下，德国人似乎又都能轻易地接受目前的资产分配状况。看来，与社会的资产分配状况相比，广大民众似乎对拥有广泛的就业机会更为关注。只要看到面前可分配的蛋糕在不断增长，人们对资产分配不平等的抱怨就不会是个问题。然而一旦可分配的蛋糕不增而减，到那时人们对资产公正分配的讨论必然会骤然升温。

三、君特·格拉斯生前最后一部作品出版

Steidl出版社在德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君特·格拉斯去世近半年之后，出版发行了他生前最后一部名为《关于有限》的作品。根据出版社介绍，此书共176页，内容多为对生命晚期的思考，涉及肌体的衰竭和死亡，

也有对上帝的思考。8月28日，此书在德国各大书店上架。

君特·格拉斯是当代德国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1927年10月16日，他出生于但泽市的一个商人之家。二战结束后，他是著名的作家协会“47社”的成员。1959年，君特·格拉斯的第一部小说《铁皮鼓》在世界范围取得成功，1999年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2015年4月13日，87岁的君特·格拉斯在吕贝克医院因感染而去世。

直到去世前，君特·格拉斯都在撰写《关于有限》一书，现在君特·格拉斯最后的这本书在哥廷根跟读者见面了。众多摄影团队、记者和出版商齐聚哥廷根，位于哥廷根一条僻静小街上的君特·格拉斯档案馆里站满了一百多人。大家对这本书的第一印象是：告别了幽默，对德国当代社会进行了述评。《关于有限》这本书里有君特·格拉斯直到去世前最后一天都在创作的散文、诗歌和铅笔画。Steidl出版社精心为本书挑选了封面、纸张和字体颜色，力图将君特·格拉斯最后这本告别的书作为一个工艺品奉献给读者。

作者简介：史笑艳，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讲师，博士。

热 词 诠 释

Schwarze Null 和 Russlandverstehar

关海霞

一、Schwarze Null (黑零)

“Schwarze Null”是由执政的联盟党提出的一个财政目标，意为在新的预算年度，不再进行新的借债。故称为“黑零”，提出该计划的是德国财政部长、基民盟的朔伊布勒，而基民党在德国政坛的代表色就是黑色。

2014年9月，德国财政部长、基民盟的朔伊布勒向议会递交了德国财政预算报告。报告指出，德国2014年将新增债务65亿欧元，2015年，联邦政府将实现新增债务为零的目标，国家财政将实现数十年来的第一次收支平衡。^①朔伊布勒指出，这也会成为接下来这三年内的一种发展常态。同年11月，联邦议会以474票赞同，113票反对，通过了该预算报告。

2014年底，德国政府宣布2014年德国成功实现不借新债，达到财政预算的收支平衡。这是德国从1969年以来的第一次。朔伊

布勒也由此比原计划提前一年实现了原来的目标——2015不再进行新的举债(Schwarze Null)。朔伊布勒也因此成为了德国数十年来第一位实现收支平衡的财政部长。这一目标能够提前实现，主要因为2014年德国的税收收入增加了；此外，德国国债的利率持续维持在较低的状态，减少了德国政府的利息支出，这也让德国政府受益匪浅，目前德国十年期的国债在市场上的利率只有0.4%。这可以说是历史性低利率的结果，也是欧债危机的结果，因为，欧债危机以来，德国国债一直被投资者认为是更安全的国债。

对于联盟党来说，这个预算政策可以说具有历史性意义：^②

首先，这是财政政策的一个重要转折点。2014年的预算方案给未来几代人释放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由联盟党领衔的联邦政府将不再借新债。在今后的几年，政府的目标也是一如既往地保证新增债务为零。

① (Zeit unbekannt), Michael Klein: “die Schwarze Null im Blick”, in: <http://www.das-parlament.de/2014/12/WirtschaftFinanzen/49961476/326784>, letzter Zugriff am 04.09.2015.

② (Schriftsteller und Zeit unbekannt), “‘Schwarze Null’ ist ein historischer Erfolg”, in: <https://www.cdu.de/sites/default/files/media/dokumente/150113-flugblatt-schwarze-null.pdf>, letzter Zugriff am 04.09.2015)

其次，这也证明支出减少了，说明前期的支出政策是富有成效的。严格的支出政策是此次财政成功实现“零新增负债”，而财政收支达到了平衡的基础。

再次，这也说明了政府的收入在增加。2014年联邦新增收入55亿欧元。收入的增加首先要归功于就业率的上升——这说明了政府的经济政策对德国来说是十分有效的。

最后，更重要的是，联盟党实现了2013年大选时许下的两个重要诺言：一是“2014年实现零新增债务（Schwarze Null）”；二是不以提高税收来实现零新增债务的目标。

联盟党认为，德国政府成功实现“零新增债务，财政收支平衡”也为欧盟其他国家在稳固财政上树立了榜样和信心。德国会一如既往地欧洲以及共同货币的稳定发挥作用。

许多经济学家也对“零新增债务”的目标持赞同观点。他们认为，该目标提高了民众对政府工作的信任，更加相信政府的工作是具有责任感的；其次，“零新增债务”让私人投资者更有安全感，愿意在一个值得信赖的国家再次投资，这样可以刺激国家的经济；再次，实现平衡预算的时间也已经成熟：只要预算实现“零新增负债”，那么，现在，在经过几个预算年度，随着创纪录的税收收入的增加，其结果是水到渠成的；第四，“零新增负债”是一个事关公平的话题。过去40多年的支出已经给下几代人都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联邦政府的负债目前已累计达到了13万亿欧元。最后，“零新增负债”也给欧洲其他国家的一个重要信号：德国，作为欧盟的领头羊，可以让人很信服地去要求危机国家进行财政稳固计划，因为德国本身也是这么做的，并且成功做到了。

但是，这一目标也遭到了不少预算专家的反对。他们认为，德国政府为了保证财政纪律，减少了投资，这会削弱目前已经放缓的德国经济。其次，如果国家不再投资，那

么也会吓退私人投资者。坚持“零新增负债”会迫使德国经济走向衰退。再次，实施该目标的时间也并不是很合适。资本市场的利率已降到了历史低点。谁想给将来投资？现在正是时候。第四，平衡的财政收支并不会带来更多的代际公平。为了不借新债，朔伊布勒减少了德国真正需要的一些必要开支，比如增加全日制幼儿园、学校，整修铁路、街道等基础设施。这些支出是为下一代不得不支付的。但到那个时候，成本会更加高，因为这些基础实施可能已经完全残破不堪。第五，“零新增负债”还会导致社会不公正。朔伊布勒的财政计划将计划减少对福利体系的补贴。那就意味着，老百姓要交更高的保费。这样，从所占比来说，穷人交的要比富人多。

虽然德国政府在2014年提前一年实现了“零新增负债”的目标，几十年来首次实现了财政收支平衡，但是到2015年底，德国经济将如何发展，利息会如何演变，税收收入是否还会维持高水平，这一切还没有定论，还存在很大变数。因此，到2015年底，德国财政能否继续保持“零新增负债”，实现财政收支平衡，还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二、Russlandverstehener 俄国通

克里米亚战争和乌克兰内战把俄罗斯推到了风口浪尖上。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指责俄罗斯，也有一些人试着站在俄罗斯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为俄罗斯辩解，或者同情俄罗斯的处境。“俄国通”就专指这类人，带有明显的讽刺意味和否定。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在多个场合为俄罗斯公开辩护，表达他对俄罗斯立场的理解。施罗德表示，“俄国通”已经成为了一个冲突概念。带有该标签的人会受到抨击、诽谤，因为他引发了一场与众不同的辩论。施罗德说：“我非常愿意去理解俄罗斯、俄罗斯人民和他们的政策。对于被誉

为‘俄国通’我并不感到羞耻，相反，我感到非常自豪。”^③同时，这位前总理还警告美国和欧盟，不要在乌克兰危机上对俄罗斯进

行新的制裁，这种相互的制裁只会给双方带来利益的损害。

作者简介：关海霞，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讲师，博士。

③ (Autor unbekannt): Ex-Kanzler bei Wirtschaftstreffen: Schroeder wirbt fuer Vertrauen zu Russland, in: <http://www.spiegel.de/politik/ausland/ex-kanzler-bei-russlandtag-schroeder-warnt-vor-weiteren-sanktionen-a-994799.html>, 2014, letzter Zugriff am 04.09.2015.d

Willkommenskultur 和 Terror-Tourismus

徐四季

一、欢迎文化 (Willkommenskultur)

欢迎文化是指一个社会（包括政治家、企业、教育机构和广大民众）对移民所展现的积极态度，它让移民感受到受到这个社会所有成员的欢迎，而非歧视。

德国联邦移民和难民事务局（BAMF）将移民迁入过程划分为3个阶段：融入准备、初步定位和落户德国。根据这个阶段模式，针对新迁入者的“欢迎文化”是指前两个阶段；第三阶段被称为“认可文化”。在圆桌会议“接纳社会”的报告中，联邦移民和难民局如此定义欢迎文化：“通过具有吸引力的框架条件欢迎新迁入者，并以认可的态度接纳其融入德国社会。欢迎文化适用于所有的合法迁入者。”具体来讲，欢迎文化针对的目标群包括：

- 有移民背景的德籍公民；
- 有特权的外国公民（外交人员及其家属）；
- 来自欧盟其他国家的迁入者；
- 婚姻移民；
- 来自非欧盟国家、有工作许可的劳动力；
- 准入的难民；

- 获准政治避难者；
- 安置难民；
- 无特权的外国公民。

依据移民融入政策指数（Migrant Integration Policy Index, MIPEX），德国在2015年参加调查的38个国家（主要是欧盟国家）中位列第十，这也是德国首次在欢迎文化测评上进入欧洲前十。德国在“取得（德国）国籍”（3/38）和“劳动力市场灵活性”（4/38）方面表现较好，在“家庭团聚”（24/38）、“健康”（22/38）、“打击歧视”（22/38）、“长期居留”（19/38）和“教育”（16/38）方面仍然有待改进。据此，移民政策集团项目负责人 Thomas Huddleston 说，在融入政策方面，德国目前堪称是其他国家的楷模。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德国在帮助移民融入方面做了很多政策改进的工作。例如2012年4月1日颁布实施的《改进国外职业资格认证法（Gesetz zur Verbesserung der Feststellung und Anerkennung im Ausland erworbener Berufsqualifikationen）》（简称《认证法》）为移民融入德国劳动力市场提供了重要保障。在2015年夏秋之交，面对世纪难民危机，德国社会积极向身陷困境的难民提供人道救援；德国政府及时

将难民政策列为国家任务，采取多重措施吸纳难民，并敦促欧盟各成员国共同化解危机，向世人展示了德国令人尊敬的欢迎文化。

从国民经济角度出发，德国营造欢迎文化的首要原因在于专业技术人员的匮乏。德国的人口发展趋势导致德国迫切需要高素质劳动力，因此有意到德国工作的外国人应该受到重视。目前，营造欢迎文化，促进多元文化和国际化发展不仅是一项重要的软区位因素，还是赢得国际投资和高素质人才的前提条件。2015年4月，《明镜周刊》评述到：“从平均年龄来看，迁入者比德国人年轻，因此他们可以削弱老龄化的不利影响。拥有高等教育文凭的人越来越多，他们的素质在不断提升。……以人数多少为序，迁入者主要来自波兰、保加利亚、意大利和罗马尼亚——并非特别陌生的文化区域。因为很多移民都是成年后才来到德国，不在德国上学，所以不会对德国的教育体系造成额外的负担。因为外国人所缴纳的税费从均数上看明显高于领取的社会福利，所以他们是减轻了社会福利国家的负担。”

二、恐怖旅游 (Terror-Tourismus)

恐怖旅游是指以旅游名义进入动荡地区，参加伊斯兰激进主义活动。

据美国的情报机构估计，近年来有来自80多个国家的1.5万名外国战斗人员潜入叙利亚境内，其中不少人加入“伊斯兰国”以及和“基地”组织相关的激进组织。

为遏制外国战斗人员加入激进组织，联合国安理会于2014年9月24日在当月轮值主席、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主持下召开反恐峰

会。峰会一致通过了第2178号决议，要求采取措施打击外国战斗人员前往叙利亚和伊拉克加入当地激进组织，还要求各国通过法律阻止本国国民加入“伊斯兰国”等激进组织。具体来讲，决议要求限制加入激进组织的外国战斗人员的旅行，切断对这些人员的财政支持，并要求所有国家通过有效措施遏制恐怖主义分子的国际流动。该决议案具有法律约束力。奥巴马高度评价这一“历史性”决议。外界普遍认为，美国欲通过安理会会议推动跨国反恐立法，同时进一步构建打击伊拉克和叙利亚等地激进组织的新“反恐联盟”，推动美军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军事行动。

在德国，恐怖旅游问题近年来也日渐突出。据不完全统计，2013年就有约270人以旅游名义离开德国，作为志愿者参加叙利亚内战。德联邦内政部认为，这些人会对整个欧洲带来危险——这些年轻人带着坚定的信念前往叙利亚，在那里学会了杀人手段，学会将仇恨转化为行动；等他们返回欧洲之后，将会成为随时有可能从事恐怖行动的“定时炸弹”。分析家认为，这些来自欧洲的恐怖主义分子其实对伊斯兰世界几乎毫无认知，是极端的生活方式和掌握生杀大权的可能将这些年轻人引入歧途。

为此，德国政府响应安理会的决议，加大了对赴叙作战的德国志愿者的打击力度。联邦议会于2015年初通过决议，相关部门可以吊销准备从事暴力活动的恐怖主义分子的护照，以阻止其出境。分析家认为，吊销护照不足以消除恐怖旅游现象，因德国人持个人证件就可经土耳其中转赴叙利亚；目前至少已发现20起这样的案例。进一步的、更严厉的反恐措施正在讨论中。

作者简介：徐四季，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讲师，博士。

外交观察

德国统一是怎样实现的

梅兆荣

1949年，德国分裂为两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即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简称“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或“西德”和“东德”。这是二战结束后苏美英法四个战胜国分区占领、共同管制德国期间，美苏争夺势力范围的产物，也是欧洲分裂为两大政治、经济、军事阵营的重要标志。40年后，随着柏林墙的倒塌，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制度不同、分属于北约和华约的两个德意志国家又在四大国的博弈和妥协中重新实现了国家统一，为欧洲回归统一创造了条件，也成为东西方冷战宣告结束的一个重要标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德国的分裂和重新统一是欧洲战后历史上具有转折性意义的重大事件。

从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到1990年10月3日凌晨联邦德国领导人在柏林前帝国大厦的平台上宣告德国重新统一，前后历时仅329天，而德国重新统一需要解决内外两部分错综复杂的问题。内部问题是指东西德之间要就实现统一的方式和步骤，包括建立经济、货币和社会联盟取得一致，使两部分在政治上、经济上、法制上以及社会保障上重新合二为一；外部问题是指如何解除四个战胜国对德国作为整体和柏林的特殊权利

和责任，统一后德国的联盟属性，确认德波边界的永久性以及苏军从东德撤离等问题。这么复杂而浩大的工程如何得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顺利完成，不愧是国际政治中的一个“奇迹”。1998年出版的《德国统一史》第四卷《争取德国统一的外交政策》一书，讲的就是解决德国统一外部问题的整个过程，包括各方在此过程中的利益分歧、相互博弈、最后妥协的内幕。

笔者时任中国驻西德大使，从当时的联邦德国临时首都波恩密切跟踪了德国重新统一的全过程，深感统一是东西德两部分广大民众的共同愿望，但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得以实现，却归因于当时有利于德国统一的所有必要条件同时存在的偶然性。早一年，由于一些条件尚不成熟而不可能；晚一年，很可能因外部环境发生变化而使这一机遇丧失。在这个意义上，德国的重新统一可以说是“必然性”和“偶然性”巧合的结果。这一论断几年后得到了在德国统一过程中曾扮演重要角色的时任前联邦财政部长、基社盟主席魏格尔先生的认同。

那么，1990年前后德国统一的国际、国内背景或者说“框架条件”是怎样的呢？正如上述《德国统一史》第四卷《争取德国统

一的外交政策》一书作者指出的，欧洲政治的“框架条件革命”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波兰团结工会运动”。而后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改革”在东欧国家蔓延，对这股向西方靠拢的潮流起了鼓励和推动作用，1989年初这股潮流也明显地到达东德这个“前沿国家”。处于西方宣传强烈影响下的东德民众对生活状况和统一社会党执政者的不满日益增长，群众性的抗议活动不时发生，成千上万的人想方设法西逃；东德国家领导人昂纳克日益受到戈尔巴乔夫的冷落，东德统一社会党领导层一片混乱；社会上供应匮乏，国家财政极为困难，外债高达400亿马克。这一切表明，东德统一社会党的统治地位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而紧跟波兰推行改革的匈牙利，1989年9月突然开放与奥地利的边界，不再履行阻止东德人经过匈牙利逃亡西德的“国际主义义务”，之后又出现了东德人以旅游者身份到波兰、捷克向西德使馆申请“避难”的轰动事件，使东德阻止逃亡的政策措施失灵。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东德统一社会党的领导不得不决定“有序地”松动阻止东德人去西德的隔离措施，但在混乱中却因“失误”而造成了柏林墙的无序开放，引发了局势的重大变化。

柏林墙的倒塌出乎西德领导层的意料，但联邦德国总理科尔预感到形势将发生急剧变化，要充分利用这一难得的机遇。当时人们对德国统一的前提有三点考虑，即必须符合东西德人民的意愿；四大国必须同意并须保证欧洲大陆所有国家的安全；统一范围限于两个德国和柏林，必须承认德波奥得-尼斯河边界的永久性，即德国放弃已归入波兰的东普鲁士地区。鉴于柏林墙开放后出现的混乱局面，科尔首先与美、法、英三国领导人沟通，一方面通报柏林墙打开后的形势；另一方面探听西方三国领导人的反应。科尔在通话中强调，德国扎根于西方，即欧共体

和北约，这是为了稳住西方盟国，同时也是显示尊重战胜国的权利，暗示三大国不要采取什么行动，相信联邦政府有能力处理好这突如其来的变化。

对柏林墙倒塌后的新形势，有关各方反应不一。戈尔巴乔夫强调战后存在两个德国并存的现实不能改变，战胜国的权利不容损害，这主要关系到柏林的地位、盟军的驻扎、德国的边界以及东西德的结盟状况。美国意识到可能出现德国统一的问题，强调不可避免的事情要“审慎地演变”，要维护美国在欧洲的主导地位，防止美国在欧洲的地位被边缘化，确保德国留在北约和美国在欧洲的驻军不受影响。法国的对德政策目标是防止德国成为强权政治因素和欧洲安全风险，主张通过欧洲一体化控制西德，通过把西德融入北约和美国在西德驻军使西德处于两大军事集团交汇处的“前沿地带”，确保法国处于“二线”。因此，虽口头上赞成德国有自决权，但主张维持现状，不赞成德国统一。英国强调均势，主张法德和解、美军长期驻留欧洲大陆，并把西德维系在西方联盟，认为西德作为北约忠实成员不可替代，但又担心德国主导欧洲或陷入对苏依赖，从而危害欧洲均势和安全。北约首任秘书长英国人伊斯梅爵士有句名言，说北约的功能就是“将美国人拉进来”“将俄国人挤出去”“将德国人摁下去”。撒切尔夫人认为德国统一会对欧洲稳定带来危险，主张建立一个“拒绝阵线”。东德莫德罗总理主张固定两德并存局面，坚持东德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主权的合法性，并忠于华约和经互会的国际义务，建议两德之间建立“条约共同体”，开展“史无前例的紧密合作”，但拒绝任何统一的思想。

面对上述形势，西德的态度是反对“固定两德并存”，要求东德统一社会党放弃垄断领导地位，否则不予援助。注意到东德人逃亡浪潮无法阻止，东德群众游行示威的口号

从“我们是人民”转向“我们是一个民族”，以及苏联虽在公开表态中反对单方面改变东西德并存，私下里却放风可以考虑建立“邦联结构”的两面性，联邦德国政府决策圈大为振奋，决定亮出自己的主张先声夺人，以稳住不安全感日益增长的公众，引领局势走向和国内外舆论。1989年11月29日，科尔总理抢在联合执政的自民党、反对党和外国伙伴之前提出《十点纲领》，对保持现状的主张提出另一种选择。该《纲领》组合了人们熟知的联邦德国政府的主张和措辞，提出了两德建立“邦联结构”的建议而未用“邦联”这个措辞，但指出最终目标是实现统一。之所以用“纲领”而未用“计划”这个措辞，是为了表明不设时间表；不用“邦联”也是为了表明最终目标是实现德国统一。为了保密和取得惊人效应，科尔在向联邦议会宣布该“纲领”之前，未与联合执政伙伴自民党商议或通气，仅在发表前6小时向美国总统布什做了通报。

对于科尔的《十点纲领》，戈尔巴乔夫的反应是强烈“愤怒”，指责西德未予磋商或预告信息就提出“具体的统一行动计划”。美国关注该“纲领”未提及德波边界问题和未来德国的联盟属性，对此科尔作了解释，说明未讲明联盟属性是出于策略考虑，实际上这两个问题都可以解决。随后美国提出了对德政策四点原则：奉行自由的自决原则；统一的德国必须保持为北约和欧共体成员；统一必须有步骤地、和平地进行；现存边界的不可侵犯性必须得到尊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对《十点纲领》表示“反感”，强调德国重新统一不在议事日程上。法国的态度介乎保留和反对之间，担心德国统一后会反对欧洲统一。为此，密特朗决定1989年12月6日访问基辅，希望借助戈尔巴乔夫反对德国统一的态度确保德国不可能很快统一，这样法国无需过于冷落德国；12月20日密特朗又访

问东德，以示承认东德作为主权国家的存在并支持其继续存在的愿望。值得注意的是，科尔在密特朗访问东德前一天访问了东德德累斯顿市，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成了西德决心加速统一进程的转折点。

柏林墙倒塌6周后，科尔政府对不同的利益格局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与西德和美国主张德国统一相对立的，是法英的怀疑派和煞车派集团以及公开反对统一的东德和苏联。但东德的形势持续恶化。1989年11、12两个月就有约18万人逃离东德，1990年开始每天约有2000人移居西德，这对东德经济动脉意味着大出血。鉴此，科尔政府得出结论，必须使统一的目标具体化并争取所有参加方认同。为此需要做三方面的工作：一是消除苏联的安全疑虑；二是使西方盟友放心；三是听任东德瓦解，拒绝莫德罗提出的条约共同体建议。同时，对苏联领导人有针对性地做工作，软硬兼施、恩威并重，因为取得苏联的原则同意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为解决四大国对德国的特殊权利和责任以及德波边界问题，需要确定一种谈判机制。经过多方试探、商议和权衡利弊，最后确定同意美国国务院提出的“2+4谈判”机制，即两个德国和四个战胜国的六方会谈。

1990年初，苏联内外交困局面凸显，主要是供应困难，一些加盟共和国闹独立，一些地方出现暴动，加上东德政治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国家处于解体过程，苏联领导人不得不面对现实。是年1月7日，谢瓦尔德纳泽外长向联邦德国政府试探提供食品援助的可能性，科尔当即表示同意并于2月中旬以2亿2千万马克联邦补贴资金提供14万吨食品以及大量衣物和日用品。这一慷慨之举产生了积极的政治效果。1月底戈尔巴乔夫召开顾问会议讨论德国问题，结论是除了军事行动之外任何选择均可考虑，决定在德国政策上全面后退。嗣后戈尔巴乔夫改变调门，

声称德国统一原则从未被怀疑过，两个德国的产生有其历史原因，现在要加以修正不能在大街上解决。东德莫德罗政府只好跟着宣布自己的统一计划，但仍以较长时间为出发点。戈尔巴乔夫原则上批准莫德罗的统一构思，但强调统一后的德国应实行中立，不得加入北约。尽管如此，科尔政府为戈尔巴乔夫在德国统一问题上的转变深受鼓舞。

1990年1月31日，苏联驻西德大使克维钦斯基转交戈尔巴乔夫邀请科尔于2月10日去莫斯科作非正式访问的信函。科尔在访苏前夕收到了美国总统布什的信件，除表示支持德国统一外，还表达了对美军驻留德国以及未来东德安全地位的关切，并通报了贝克国务卿访苏印象，指出苏联接受德国统一已不可避免，只是对统一的后果有担忧，主要涉及欧洲安全与稳定和现存边界的可靠性，苏联不接受北约东扩，但暗示可以接受德国留在北约。科尔据此在访苏期间很有针对性地做了戈尔巴乔夫的工作。首先是大肆描述东德的困境和国家解体状况以及苏联40万驻军及其家属面临的问题，以说服戈尔巴乔夫接受统一；同时针对戈氏对安全、边界、统一范围、未来德国的联盟属性以及裁军等问题的疑虑进行游说，表示“北约当然不能东扩到今天的民主德国版图”。会议结束时，戈尔巴乔夫表示：“很可能可以断言，在德意志民族统一问题上，苏联、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之间不存在意见分歧。简而言之，我们在最重要的一点上是一致的，就是德国必须自己做出决定。”这表明，这次会晤清除了德国统一道路上的最大障碍。但这时苏联和东德仍以种种方式尽量拖延谈判，美国则大力支持西德，英、法部分地赞同拖延德国统一进程，各方围绕几个实质性问题仍争论尖锐，主要涉及德波边界问题、统一的模式、未来德国的联盟属性、东德地区的军事地位以及战后苏军占领期间决定的东德地区财产制度，

如土改和没收战犯财产等。

1990年3月，东德地区举行民主选举，结果是科尔支持的基民盟获大胜，这对科尔“在建立德国统一的道路上采取迅速而坚决的行动”又是一大推动。对科尔政府来说，东德局势越是恶化，逃亡人数越多，就越能证明加快统一进程的必要性。当时东德外债高达400亿马克，解决这个问题也是苏联利益所在。于是，科尔便以未来的德苏关系将比现在更好来引诱戈尔巴乔夫，承诺德将与苏联扩大经济合作，不把苏联排斥在欧洲发展之外。为消除戈氏在安全问题上的担忧，科尔从多方面着手做工作：说明未来德国保持北约属性也符合苏联利益，因有利于改变北约性质；德愿承担苏军撤离东德的部分费用；通过裁军和覆盖全欧的安全结构将使北约的继续存在和全德的北约成员属性“相对化”；德国无意排斥苏联于欧洲发展之外，承诺将与苏联更紧密地扩大经济合作。

法国一直处于一种矛盾心态：东德人民的情绪和移民潮使密特朗感到德国统一不可阻挡，戈尔巴乔夫态度的转变又使他意识到不可能指望借助苏联阻止德国统一。因此唯一可能的是延缓德国统一进程，办法是借德波边界问题做文章，这使科尔十分恼火。但科尔意识到一切取决于美法支持和苏联合作，于是决定在依靠美国支持、全面帮助戈尔巴乔夫的同时，尽可能地迎合密特朗。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法的工作：(1)强调欧洲统一与德国统一并不矛盾，相反，没有德国合作就没有欧洲未来；(2)提醒法国注意《波恩条约》规定的西方大国义务，即共同实现德国统一的目标，而现在第一次出现通过和平途径避免欧洲和德国分裂的可能；(3)德国的家园必须在欧洲的屋檐下建设起来，欧共体的统一将因德国统一而得到推动；(4)承诺西德无意将德国统一与移动现存边界联系起来，两德统一后将有约束力地承认德波边界

的永久性；(5)指出东德国家解体、移民潮不断恶化对经济产生灾难性后果，证明了统一的必要性。同时，对法国利用德波边界问题做文章的伎俩作出了强烈的反应。形势的发展使密特朗得出结论，必须适应现实。特别是东德社民党在选举中失利使密特朗进一步认识到，德国统一已是大势所趋，于是不得不发出与西德和解的信号。

从1989年11月柏林墙开放到1990年5月5日“2+4”外长会晤开始，半年时间内东西德之间已开始商谈建立经济、货币和社会联盟并筹备全德选举，苏联已表示同意两德按西德基本法第23条实现统一，即东德加入基本法适用范围，但对统一德国的北约属性仍持拒绝态度，而西德和西方三个盟国已商定要在是年11月欧安会峰会之前必须结束德国统一的国际谈判。这时，戈尔巴乔夫又面临一个难题，即在1990年7月之前如果没有西方资金流入，苏联将丧失国际支付能力，需要总额为近200亿德国马克的贷款。为此，谢瓦尔德纳泽又向科尔提出贷款请求，而科尔也当即作出积极回应，因为他明白：“一个请求其他政府提供财政援助的政府不会奉行持续冲突的方针”。这时，“2+4”外长会晤的议程已定，即边界问题、政治军事问题、柏林问题、最终的国际法解决以及解除四大国权利与责任问题。会晤将分别在波恩、东柏林、巴黎和莫斯科举行。科尔认识到，为使苏联让步，这时关键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针对苏联的经济困境，通过财政刺激促使苏联就范；二是针对苏联的安全疑虑，推动美国对北约做必要的改变。他认为，苏联只有有了安全感和平等感，才能对德国统一说“同意”。

科尔对1990年1月对苏食品援助的政治效应记忆犹新，指示其外事顾问特尔切克偕德意志银行和德累斯顿银行的总裁于5月15日飞赴莫斯科做秘密访问，苏联部长会议主

席雷日科夫在会谈中先是提出急需15—20亿卢布可自由使用的财政贷款，以确保即时支付能力，接着希望西德以优惠条件提供100—150亿卢布的长期贷款。特尔切克表示，联邦政府原则上同意提供援助，但必须是一揽子解决德国问题的一部分。谢瓦尔德纳泽以微笑作了确认。之后戈尔巴乔夫接见了特尔切克等三人，以示贷款援助要求是苏联最高层的行为，并提出优惠贷款的利率应是1.5%—2%，而不是6%；苏联不仅需要优惠贷款，而且需要食品等实物贷款，总金额需要150—200亿马克，7—8年内偿还。戈氏还表示，愿与科尔直接谈判双边伙伴关系条约，并强调必须使苏联人民确信自己的安全没有受到危害，不允许任何一方把某事强加于另一方。特尔切克表示，所有这些都可以意见一致地解决。双方还就一些原则问题进行了沟通，主要是：在双边和多边会谈中搞一揽子方案，包括签订全面的面向遥远将来的双边条约，初定科尔于7月或8月访苏。5月22日，科尔致函戈尔巴乔夫确认特尔切克与苏方所谈内容。戈尔巴乔夫6月9日给科尔回信，虽未确认德国银行贷款与解决德国问题挂钩，但重申德国人民有自决权以及“2+4”谈判可以在11月欧安会峰会前结束，并重申邀请科尔7月下半月访苏，“为我们关系的未来进行深入对话”。

科尔为争取美国的支持和配合，与布什总统多次通话，相互通报情况并商议对策，他们决定再给戈尔巴乔夫一些甜头，主要是利用伦敦西方防务峰会建议华约与北约成员国之间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以示北约的变化。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曾明白暗示：在北约发生变化、对苏提供经济和财政援助以及提供适当的安全保证的情况下，苏联强调的自决权道路就是全德可以成为西方联盟的成员，但西方要为此付出一定的代价，苏联迫切需要可以展示与西方合作成果的证据。

针对这一暗示，布什总统为支持德国统一，发表了9点保证，但仍不足以令苏联满意。正当西方无计可施之时，苏方又提供了启示：如果西方联盟进行“彻底的转变”，苏联在北约问题上即可作出松动。据此，7月6日的伦敦北约峰会在布什总统的力主下发表了《伦敦声明：转变中的北大西洋公约同盟》声明，宣布了北约新的战略特征，提出了十点建议，都是针对莫斯科的利益诉求所作出的反应，主要是解决三个中心问题：(1)强调北约的防御性质，主张结束敌对和放弃侵略，从政治上对德国的东部邻国特别是苏联提供安全保证；(2)赞成裁军谈判应取得进展，支持建立一个更少武器的世界，提出包括常规和核武器的削减建议；(3)响应苏联的建议，主张建设欧洲新的安全大厦，并使欧安会机制化。对此，谢瓦尔德纳泽表示“令人满意”，戈尔巴乔夫同意谢的这个评价。在此情况下，戈尔巴乔夫明确邀请科尔去其家乡访问。

1990年7月14日，科尔率团访苏，目标是排除德国统一道路上的所有障碍。当时，戈尔巴乔夫已在苏共党代会上继续当选为总书记，地位有所加强，但仍面临着内政上反对派的牵制，经济形势和供应状况恶化，通胀压力巨大，国家财政大量亏空，人们期望统一的德国将成为苏联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和外汇供应者，双边经济合作会扩大和深化，从而在政治上起稳定作用。在此背景下，科尔对未来德苏关系准备了一系列设想，包括经济合作和睦邻关系条约，主要是使苏联相信科尔不仅关心“2+4”谈判成功，而且谋求德苏保持良好关系，为戈尔巴乔夫提供足够的证明和承诺，使其经受得住党内反对派的批评指责。两人单独会谈的结果是：(1)1990年11月欧安会峰会前解决德国统一问题；(2)德国统一与实现完全主权并行；(3)德国统一后有自由选择联盟的权利，具体指的就是北约，但不予明说；(4)统一后北约的保护可延

伸到东德地区，未纳入北约的联邦国防军可以进驻，在苏军撤离之后才可进驻纳入北约的联邦德国国防军，德国放弃核武器；(5)苏军在东德的留驻期限为3—4年；(6)统一后德国的武装力量限额37万人，此点应作为裁军谈判的结果公布。作为回报，德方承诺德苏关系将出现新导向，向苏提供经济与财政援助，具体细节主要是金额另议。

1990年7月17日，在巴黎举行的“2+4”外长会晤在波兰外长参加下就波兰西部边界问题达成了五点原则谅解，解决了德国最终承认奥德—尼斯河边界的问题。这五点协议是：(1)统一德国的范围是东西德和整个柏林，德国外部边界随着“2+4”条约的生效而永久确定；(2)统一的德国和波兰应通过签订具有国际法约束力的条约确认两国之间现有的边界；(3)德国现在和将来都不对其他国家提出领土要求；(4)德国统一后的宪法不会有任何违背上述原则的规定；(5)四大国确认知悉缔结双边边界条约的意图，声明随着条约的实现确认统一德国的边界具有最终性质。

细节决定成败。在涉及细节的谈判中，苏、德双方讨价还价激烈。1990年8月27—28日，已升任苏联副外长的克维钦斯基向联邦德国政府提出了苏方诉求的清单，要求德方为苏军撤离东德提供运输费，为安置苏军军官建房，为苏军在东德的驻留提供经费，否则苏军内部会发生“暴动”，并称在3—4年内撤离无法做到。关于签订德苏合作与伙伴关系条约问题，苏方提出德方须在安全与放弃武力问题上作出特别清楚的承诺，否则难以获得批准。在未来经济技术合作方面，必须强调苏联将享有优惠条件。此外，还要解决东德与苏联签订的条约继承问题，苏军在德国的墓地和纪念碑的维护和保护问题以及苏军在占领东德期间实施的法律效力不可否定问题。核心问题是要“钱”。在具体谈判中，德方允诺提供总额为60亿马克，而苏方则要185亿马

克，还要加上补偿苏联将在东德放弃的不动产。德方谈判代表、财政部长魏格尔称苏方的要价是“幻想”，只好交由双方最高领导层决定。9月7日，科尔与戈尔巴乔夫通话，就上述费用总额再次讨价还价。科尔出价80亿马克，戈尔巴乔夫断然拒绝。戈氏的反应表明，如双方不能就费用问题达成协议，9月11日“2+4”会谈最后文件就不可能签署。德方经内部商议后，决定把开价提高到100亿马克，在极端情况下可加至120亿马克，外加允诺提供30亿马克无息贷款。9月10日，科尔再次与戈尔巴乔夫商谈，戈氏把要价降至150—160亿马克，科尔最后把120亿马克补偿费和30亿马克无息贷款悉数放到桌面上，总共150亿马克，双方终于拍板成交。9月11日，“2+4”会晤在莫斯科签署《最后解决德国问题的条约》，解决了三大问题，即：德国的完全主权得以建立；统一德国可以自由选择联盟属性；决定了苏军撤离东德及其具有约束力的时间表。至此，德国统一的外部问题全部解决。9月13日，德苏草签了《睦邻伙伴和合作条约》，并于11月9日戈尔巴乔夫访问统一德国时正式签署。10月12日德苏签署了关于《苏军在联邦德国有限期驻留

的条件与有计划撤离的方式》的条约和《过渡措施》协定。德波边界条约于11月14日签署，但德波《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于1991年6月17日才签署。

总的来看，德国实现了科尔《十点纲领》中所提出的目标，不仅实现了国家统一，获得了完全主权，而且确保了北约属性和植根于西方的国策理念，并维护了欧洲统一。与此相比，以150亿马克的经济和财政援助作为向苏联支付的代价显得微不足道。美国从一开始就支持德国统一，是以德国满足美国的要求为条件的，即统一的德国保持为北约的完全成员，美国保持为一支欧洲力量。法国的利益得到了应有的顾及，确保了德国在政治、军事上属于西方集团，承诺致力于欧洲一体化并最终承认德波边界不可改变。英国尽管以强硬的言辞进行干扰，但在实际操作中不起多大作用，其维护西方防务联盟和保持德国与西方持续挂钩的目标未受影响。对苏联来说，满意的理由最少，戈氏从原有的诉求节节退让，得到的只是全德武装力量的限额和德国的和平保证，以及一些经济支持与财政援助和德苏关系新导向的前景。

作者简介：梅兆荣，中国前驻德国大使。

试论“泛社会主义”

吴兴唐

“泛社会主义”是根据时代的发展，对社会主义观念提出的新的理论。从马克思、恩格斯在将近150年前建立第一个国际无产阶级组织以来，社会主义运动有了历史性的发展，同时也遭受了困难和曲折。但社会主义力量在不断发展中，理论在不断探索中。欧洲以及亚非拉社会主义政党和思潮的发展，已经成为除中国之外的世界社会主义主要力量之一。提出“泛社会主义”理论，意在团结所有社会主义力量和流派，共同为构建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主题的和谐世界而努力。

在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和文化多样化的现时代，我们对社会主义也要有一个全新的观念，就此提出一个“泛社会主义”的论点。所谓“泛社会主义”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多样性。

社会主义是什么？是政治体制、经济模式和文化因子，也是理想信念、社会运动、国际思潮和理论探索。

从现实出发，以宽广的视角，我们可以看到世界上除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之外，还存在着多种多样的社会主义。我们实践并坚持科学社会主义，但我们也应欢迎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探索和实践，以丰富社会主义的

内容。

一、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的论述及演变

1847年6月初，第一个无产阶级的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同盟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起草了一个纲领性文件，即1848年2月发表的《共产党宣言》。恩格斯曾指出，当《宣言》发表的时候，不能把它叫作社会主义宣言，因为在1847年，社会主义意味着资产阶级的运动，共产主义则意味着工人的运动。在1848年欧洲革命中，面对反动力量结成的同盟，革命化了的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结合组成了社会民主党，它们反对封建主义残余，愤恨资产阶级专政，希望团结在以无产阶级为决定性革命力量的周围，组织争取民主的革命运动。1869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德国出现了第一个以“社会民主工党”命名的政党，以后逐渐发展壮大为工人运动中的第一大党，成为欧洲其他国家相继建立社会民主党的样板。马克思当时认为，社会民主党是“工人的党和小资产阶级的党”结合的产物。

但当时在欧洲工人运动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工人阶级政党，大都叫“社会民主党”。对此，恩格斯曾解释说：马克思和我有过一个很好的科学上很确切的党的名称（指“共产党”），可是当时没有一个真正的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现在（19世纪末）真正的政党是有了，可是它的名称在科学上是“不正确的”、“不确切的”。但是，恩格斯“容忍了”使用这个名称。他说：只要党在发展，只要它意识到它的名称在科学上是不确切的，不让这个名称妨碍它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社会民主党这个名称“也许还可以过得去”。1850年马克思也自称是“社会民主主义者”。由于当时“社会民主主义”这个名词包含着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内容，因此实际上被当成“共产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同义语看待。

二、第二国际破产，社会民主主义同共产主义分道扬镳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些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支持帝国主义战争，第二国际宣告破产。

列宁和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列宁提出无产阶级的革命左派必须抛弃社会民主党的“肮脏外衣”，把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中的左翼更名为共产党。十月革命的成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而社会民主党却反对和攻击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从此，国际工人运动分裂为以共产国际和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为代表的两大营垒。

三、社会党：从“阶级党”到“人民党”再到“轮流执政党”的转变

1951年，西欧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在德

国法兰克福组建了社会党国际，提出走“第三条道路”，表示既反对资本主义又反对现实社会主义，主张实施民主社会主义。

1959年，德国社民党“哥德斯堡纲领”提出，德国社民党“已经从一个工人阶级政党变成了一个人民党”，其基本价值是“自由、公正、相助”。

社会党国际的“第三条道路”和德国社民党的“哥德斯堡纲领”对西欧国家社会党产生了巨大影响，为这些党在之后上台执政和参政成为“轮流执政党”做了准备。

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开始，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结构变化所带来的社会结构和阶级构成的变动，传统工人阶级人数减少，“中间阶层”迅速发展。西欧以及日本、澳大利亚的社会党和工党都强调已转变为“人民党”，向一切人开放，特别是向“中间阶层”开放。德国社民党通过转型为“人民党”，选票不断上升。到1972年，德国社民党获得46%选票，成为议会第一大党。

社会党在其执政和参政期间，将其改良主义理论运用于实践，主张民众对社会生活进行广泛的参与，建立混合经济体制，完善多党自由活动的议会民主，推行全面的社会保障政策，制定并执行一整套福利政策。20世纪60年代后期，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反对霸权主义，主张东西方缓和与裁军，推动南南合作和南北对话。这些政策的实施对于加速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提高工人生活水平，维护工人权益以及保卫世界和平起到过一定的积极作用。

战后资本主义的发展基本上是两大模式，即欧洲社会福利市场经济的莱茵模式和完全自由主义的美国模式。社会党的改良主义理论和实践是莱茵模式的基础之一，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改革起了很大的影响。

战后70年间，民主社会主义逐渐由西欧向世界各地发展。战后的最初10年间，社会

党的影响仅局限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20世纪60年代后期，它的影响开始成为拉美和非洲以及亚洲的一些民族主义国家中一股流行思潮。

20世纪70年代初期，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新东方政策”为标志，社会党和共产党的关系出现了缓和与一定程度的合作。

苏东剧变、冷战结束，世界保守右翼势力攻击社会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已可一统天下，欧洲社会党也受到“牵连”，声势下降。英国工党领袖布莱尔，联合美国民主党领导人克林顿，提出“新第三条道路”，得到德国社民党领导人施罗德的响应，以此企图挽回下降趋势。所谓“新第三条道路”，实质是要同社会党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划清界限，向“新自由主义”靠拢。但“新第三条道路”，模糊了社会党的传统左翼立场，失去了雇佣劳动者和“中间阶层”的信任，选票不增反减。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新自由主义”受到质疑，社会党对“新第三条道路”开始反思。社会党左翼主张回归“民主社会主义”（一般来说，“社会民主主义”，词根是“民主主义”，代表社会党的右翼和中右势力，而“民主社会主义”，词根是“社会主义”，代表左翼和中左势力）。

与此同时，西欧国家共产党和东欧国家原执政的共产党，有的易帜改名为社会党，有的也经历社会民主党化，因而增强了欧洲社会党的力量。

战后70年以来，欧洲以及亚非拉的社会党的发展，已经成为除中国之外的世界社会主义主要力量之一。在欧洲，几十年来，社会党作为左翼同右翼保守党轮流执政。执政期间，包括在地方上执政，都积累对现代工业国家的治国理政的经验。即使落选为建设性在野党，社会党对右翼保守政策有一定的牵制，在国际上也会对改革旧的不公正和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作出贡献。

四、新社会运动和新左翼的兴起

西方新社会运动的高潮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反战和平运动和生态运动为主体，形成“绿色和平运动”，进而成立“绿党”。到20世纪90年代之后，同“反全球化运动”相结合，成为西方社会一股重要的左翼政治力量。

新社会运动的产生与发展，有西方国家当时的国内经济和社会因素以及冷战时期的国际背景。

西方发达国家经过战后20年的经济高速发展，造就“经济奇迹”和“高度繁荣”。到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高速工业化和现代化带来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带来生产力要素变化、产业结构变化、劳动力结构变化（白领工人超过蓝领工人）。在科技推进社会发展的同时，负面影响骤增，如能源危机、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特别是西方国家经济繁荣的一个重要基础是取得第三世界国家的廉价石油。石油危机给西方发达国家带来经济危机。如何对待发展与环保之间的平衡成为问题的焦点。加之，里根—撒切尔夫人倡导的新自由主义造成富者越富，普通民众社会生活条件恶化。

与此同时，美苏争夺世界霸权加剧，美国为对付苏联在联邦德国（西德）部署巡航和潘兴II型导弹，成为声势浩大的反战和平运动的导火线。

20世纪70年代中期兴起的新社会运动，从思想渊源来说，可以追溯到1968年激进的学生运动。不管人们几十年来对这场反叛运动有不同的评论和争议，但“创造新世界尝试”的思想遗产是无可否认的。一位当年学生运动积极参加者曾说：“我们在那个年代向这个世界投石头，它所激起的涟漪，现在仍在拍打着我们。”

这场学生运动的思想导师是“3M+G”。“3M”指马克思、毛泽东、马尔库塞，“G”指格瓦拉。马尔库塞是新左翼理论家，学生运动的主要思想鼓舞者。他的理论是，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已经被资产阶级收买，青年学生是改变资本主义的革命的的主要动力，资产阶级媒体以谎言蒙蔽了工人阶级，要以革命行动唤醒工人和广大民众。新左翼还提出，传统政党和议会已沦为资产阶级的工具，要进行“议会外”的革命斗争，成为“议会外反对派”。学生运动沉寂后，一批激进分子后来成为新社会运动和绿党的骨干。

新社会运动区别于传统的社会运动有以下几个特点：1. 新社会运动着眼于全社会当前最集中关心的生态与和平问题，而传统的工人运动中游行示威和罢工只局限于经济问题，而且罢工受到工会的严格控制；2. 新社会运动不受任何政党包括左翼社会党的控制和指导；3. 新社会运动包含各种社会思潮，如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欧洲共产主义、生态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等；4. 新社会运动刚兴起时，着力于议会外的斗争和街头的示威游行，后来逐渐发展为议会内与议会外斗争相结合，特别是绿党参加欧洲议会和德国等国议会之后；5. 新社会运动只有短期和目前目标，没有长远目标。

五、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思潮

战后，亚非拉民族解放和独立运动高涨，广大殖民地国家取得独立，第三世界成为国际舞台上一支重要力量。20世纪50年代大多数取得独立的民族国家宣布实行社会主义或以社会主义为方向，有以下几方面原因：1. 这些民族国家痛恨长期实行殖民主义的西方国家；2. 苏联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中作为主力取得的胜利以及苏联战后的经济建设成就；3. 中国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获得解放的巨大

影响；4. 中国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对这些国家的反帝反殖的民族解放和独立斗争的支持以及独立后的经济等方面的援助。

亚非拉独立后的民族国家的社会主义，带有浓重的民族主义色彩，带有地域特色和强烈的宗教色彩。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亚非拉社会主义还深受民主社会主义政治思潮的影响。

亚非拉国家社会主义的试验是不平衡的，有的取得某些成果，有的则失败了。特别在非洲，由于经济和社会客观条件没有搞社会主义的基础，加之一些国家的过激措施（如全面实施国有化），大多归于失败。但这种社会主义尝试毕竟在人们思想中种下了社会主义种子，而且这种社会主义的追求和因素也成为中国及中国共产党同这些国家及其政党发展平等互利国家关系和持久良好的政党关系的思想基础。

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美国依仗经济10年繁荣，在全世界推行新自由主义，掀起全球“民主化”浪潮，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向第三世界民族主义国家推销美国模式的多党民主制，引起了一些国家的政局混乱。

苏东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走向低潮，亚非拉的社会主义思潮也受到打压，“新自由主义”乘势渗入第三世界国家。然而，“新自由主义”不仅在这些国家“水土不服”，而且造成贫富差距加大，国家破败，民众生活水平大幅下降。“新自由主义”的负面影响，促使第三世界国家重新探索21世纪的新社会主义。

六、左翼思潮在拉美的崛起

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低潮时期，左翼在拉美国家群体性崛起，十分瞩目，也增强了民众对社会主义的期望与信心。拉美左翼也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包括左翼政党、新

社会运动以及所有期待变革的政治力量和社会组织。

拉美左翼崛起的主要旗帜是反对“新自由主义”及其带来的祸害。20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接受西方国家的安排，借新债还旧债，结果引发债务危机。拉美国家寻找摆脱危机的出路。美国及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洲开发银行等在华盛顿召开了一次研讨会，开出一个解救拉美债务危机的药方，即以“新自由主义”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要求拉美国家实行“经济市场化”、“贸易自由化”和“国企私有化”。“华盛顿共识”还要求拉美国家出让某些经济主权，按照西方的设计进行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但“华盛顿共识”不仅没有解救危机，反而加深了这些国家的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一些国家濒临破产。

以此为契机，拉美左翼提出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20世纪末、21世纪初以来，拉美左翼政党相继在委内瑞拉、巴西、厄瓜多尔、阿根廷、玻利维亚、智利、乌拉圭等国上台执政。10多年来虽有起伏，但大的政治格局未变。

委内瑞拉查韦斯的“21世纪社会主义”是拉美现代左翼思潮的代表。查韦斯从2005年初开始，阐述和坚持“21世纪社会主义”。查韦斯认为，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不是苏联模式社会主义，也不追随古巴模式，而是崭新的有委内瑞拉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印第安人的、基督教教义和玻利瓦尔的社会主义”。很显然，查韦斯的“21世纪社会主义”并不是科学社会主义，而是基督教教义、玻利瓦尔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各种思想的混合体。然而，“21世纪社会主义”在经济领域主张国有和集体所有制，在政治领域主张人民民主、参与民主和以人民为主角的民主，同时主张团结、平等、公正，主张

增加社会福利和共同发展，因而具有进步意义。“21世纪社会主义”正在实践与探索中。

七、非洲探索具有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因素相结合的独特道路

冷战结束后，非洲国家受到美国发起的全球“民主化”浪潮的冲击，引发政局一片混乱。进入新世纪之后，在多极化和全球化发展的新形势下，随着新兴国家的崛起，一些非洲国家政党开始思想革新，对内稳定政局，逐步摆脱西方发展模式，重视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对外加强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拓宽合作伙伴。中国从2009年起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2013年南非加入金砖国家，带动一些国家同中俄等国加强联系。

2013年4月成立了非洲政党理事会，着力加强非洲各国政党之间的联系以及同亚洲和拉美政党之间的交流。非洲大多数国家处在工业化初期，它们迫切希望发展同中国以及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以及交流治国理政的经验。

现在，非洲一些政党正在探索理论革新，基本理论主张是走一条具有非洲特色民族发展道路，既不是资本主义的，也不是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以及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他们将民族主义同一些社会主义因素相糅合，而以现代民族主义为旗号，特别希望同我党进行各方面交流，包括理论方面的交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表示赞赏。在国内政策上，他们主张缩小贫富差距，实现社会公正和可持续发展；在国际问题上，非洲国家不断批判旧的不合理、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现有秩序，不断提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和全球治理的合理化建议。

有的非洲政党确定社会主义或类似社会主义的方向。如南非执政党非洲人国民大会

(非国大),主张经济社会转型,实现社会公平和社会变革;又如坦桑尼亚执政党坦桑尼亚革命党,确定政府的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政策和自力更生原则,目标是让人民成为经济的主人,增强生产能力,提高国民经济水平,主张实现这些目标时要考虑当前现实。

八、“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探索

“新马克思主义”主要是战后西方发达国家的左翼知识分子批判资本主义和探讨社会主义未来前景的一种社会思潮和理论探索。前苏联地区、东欧各国以及第三世界一些知识分子也参与其中,他们当中有一批国际上著名的学者和教授,他们的论述往往成为新社会运动的指导思想。

“新马克思主义”没有固定的组织系统或统一的理论体系,涉及生态社会主义、女权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等,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看法也不相同。

近年来,“新马克思主义”着重论述全球化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新马克思主义”的一批学者认为,现在的全球化是西方发达国家垄断资本主导的全球化,导致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向全球扩散,引发地区性或全球性的矛盾和危机。另有一些学者认为,全球化的发展使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内部的“新社会因素”不断增长,为以后的社会主义做了物质准备。

“新马克思主义”提倡者在思想理论界属于左翼。他们在苏东剧变之后,批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特别是对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了批判。在2008年发生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他们激烈批判“新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认为金融资本主

义、虚拟经济和消费主义是产生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原因。他们同时提出了各种社会主义的改革方案。

九、团结所有社会主义力量和流派

依据世界多样性和社会主义多样性的现实,提出“泛社会主义”的观点,意在团结全世界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流派和左翼力量,共同为构建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主题的和谐世界而努力。

团结色彩纷呈的社会主义流派,要摒弃过去曾经存在于国际共运中的“主要打击中间势力”的认识,摒弃过去苏共的“以我为中心”“唯我独尊”,将各种社会主义和进步力量的探索视为“异己”而“革出教门”的观念和做法。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以及全世界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的重要理论基础,同时马克思主义也在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不断探索和创新之中。马克思主义不承认有永恒的真理,不承认任何最终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被人们认识世界开辟了正确的道路,指明了社会发展方向,但没有穷尽对真理的认识。恩格斯在晚年时指出,他和马克思1848年曾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决战已经开始,结局是无产阶级获得胜利;历史表明,当时还没有达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种幻想”。马克思主义只能随着时代发展和同各国具体实践的结合中不断发展,不断创新。

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建设具有划时代意义。它首先表明了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思想;同时表明要紧

密结合中国的现实实际；还强调了“中国特色”，也就是说别的国家的政党和政治组织也

可以探索联系他们国家实际的特殊道路，是否成功要由本国政党和人民的实践来证明。

作者简介：吴兴唐，中联部调研咨询小组成员、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

漫谈中德创新伙伴关系

王晓瑶

2015年是我职业生涯步入第二十个年头。德国之于中国意味着什么，中国对于德国具有怎样的意义，中德关系发展如何以及将向何处去，这些问题时常萦绕在我的心头。

翻开1972年中德建交以来的文档卷宗，“当前中德关系处于历史上最好时期”是两国历任领导人使用频率最高的一句话。这并非外交辞令，而是对中德关系多年来总体保持快速健康发展态势最为明确、有力的印证。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德两国间进行了六次国事访问和20次总理访问。2013年5月，李克强总理就职后首次出访的第一个欧盟国家就是德国。而2015年10月，默克尔总理将进行任内第八次访华。高层领导人之间交往如此频密，在中国和欧盟国家之间绝无仅有。

2004年，中德两国宣布在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框架下建立具有全球责任的伙伴关系。2007年，双方建立战略伙伴关系。2012年，双方决定共同打造面向未来的战略伙伴关系。上述“三连跳”为2014年3月习近平主席访问德国期间双方将两国关系进一步提升至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早在1975年，联邦德国就成为中国在

欧洲的最大贸易伙伴。2002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德国在亚洲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德贸易额突破100亿美元，付出了21年的艰辛努力。突破1000亿美元，则只用了15年。2014年，两国贸易额达1778亿美元，在中国同欧盟国家贸易总额中约占29%。在对华技术转让、直接投资、发展援助方面，德国也走在了欧洲国家的前列。近年来，德国日益成为中国企业赴欧投资兴业的桥头堡。据中方统计，2013年中国对德直接投资项目数量占对欧投资项目总量的44%。德方数据表明，2014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在德绿地投资项目数量最多的国家。

在文化、教育、科技、司法、社会等广泛领域，中德合作不断创造着佳绩。1985年成立的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是中国改革开放后首家汽车合资企业。1992年德国人施拉普纳担任中国男子足球队主教练，成为国足首位“洋教头”。2000年建立的中德法治国家对话，是中国同西方国家建立的首个双边法律交流机制。同年签署的《中德双边社会保险协定》是中国同外国签订的首份双边社保协定。2002年，中德两国率先相互承认高等教育学历。2003年，德国成为首个向中国公民全面开放旅游的欧盟国家。2005年，中德

两国在上海合作建成世界上第一条投入商业运营的磁浮线。2009年至2011年，双方在应对气候变化、能源与环境、电动汽车等领域均建立起伙伴关系。截至2015年8月，两国建立了近80对友好省州和友好城市关系。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大量的数据、协议和实例无言地诉说着中德关系的广度与深度，也一再证明这组双边关系互利共赢的本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始于2011年的总理级中德政府磋商，至今仍是中德两国之间唯一的内阁联席会议机制。在政府磋商的引领下，双方在各领域建立起的60多个对话与合作机制有序开展，为中德关系发展保驾护航，并提供着不竭动力。

可以说，过去40多年里不断换挡提速的中德关系正在高速轨道上运行。然而，我们不能因满足于现状而止步不前。我们应将关注重点从速度转向质量，将目光从聚焦两个国家自身转向放眼全球，以便中德关系在保持现有发展速度的同时持续巩固和深化，并适应两国和世界的发展变化。为此，我所在的中国外交部欧洲司对中德关系和合作现状进行了全面梳理，征求了30多个兄弟部门意见、建议，在此基础上制订了两国中长期合作规划，并同德方开展了全面对接和协商。双方一致同意，将创新作为未来相当长时期中德合作的重点，以进一步突出它互利共赢和开拓创新的特质。2014年10月李克强总理同默克尔总理在柏林主持第三轮中德政府磋商期间，双方发表的《共塑创新——中德合作行动纲要》明确指出：“中德两国互为在各自地区最重要的合作伙伴，愿本着平等、互尊、互利的伙伴精神继续拓展双边关系，这也利于国际合作。创新伙伴关系在此发挥重要作用。”

这份纲要宣布了两国下一阶段110条合作举措和300多项具体项目，不仅是迄今为止中德之间内容最丰富、最全面的共同文件，

也是目前中欧之间涉及领域最广、项目措施最多的双边合作文件。创新和与时俱进精神贯穿纲要始终。例如，双方决定启动中德外交与安全战略对话，大力拓展双方在外交、安全、反恐等领域的合作。再如，开启“工业4.0”合作，促进两国企业在高端制造业的交流互鉴，在标准化领域开展更具系统性和战略性的合作。又如，推进人员往来便利化，缩短签证签发时间，简化签证申请程序，让两国民众能够实现“说走就走”的德国游和中国行。

2015年以来，两国各部门致力于推进落实纲要。3月，马凯副总理赴柏林同德国财长朔伊布勒、央行行长魏德曼举行了首次中德高级别财金对话，双方就宏观经济、中德战略性合作方向、金融稳定、地区和国际经济合作等议题进行深入沟通，取得了21项具体成果。马凯副总理还出席了2015年汉诺威消费电子、信息及通信博览会（CeBIT）开幕式及中国合作伙伴国系列活动，为“2015中德创新合作年”拉开了序幕。6月，习近平主席特使、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访问德国，双方就进一步加强执法安全和反恐合作、促进国际和地区安全稳定深入交换意见。7月，德国副总理兼经济与能源部长加布里尔访华时，双方就推动两国企业开展智能制造及生产过程网络化合作签署谅解备忘录，决定建立联合工作组专门促进上述合作，推进德国“工业4.0”同“中国制造2025”对接。

2015年1月，李克强总理出席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年会时曾引用一句德语谚语：变革之风吹起时，有人砌围墙，有人转风车。中德合作要想长久地引领中欧合作，给两国民众不断带来更多实惠，就需要更多转风车的人，而非砌墙之人。在双边关系良好的氛围中，我也不时听到一些其他声音。在德国，长期以来从意识形态出发对中国的种种偏见，并未减少；不同版本的“中国威胁论”“中国

崩溃论”在德国新闻媒体上仍很有市场；“教会了中国徒弟，饿死了德国师傅”的担心在增多；甚至有人宣称，中德合作只对中方有好处，德方只是吃亏。

这些，都无时不在提醒我，中德合作远非尽善尽美，中德关系发展之路并非通途，对从事中德关系的人来说，筑路架桥、排雷除障和防范风险任重道远。但我坚信，正如习近平主席 2014 年 3 月在德国《法兰克福汇

报》发表署名文章中指出的那样：“中德合作是两大文明的交流对话。……中德合作是两个伟大民族的相互学习。……中德合作是两个经济奇迹创造者的携手并进。”在快速变化的世界格局中，中国和德国相互需要。让我们从新的视角看待自己和对方，以新的思维审视中德关系走过的历程，用新的方式方法谋划中德关系的现在和未来！

作者简介：王晓瑶，外交部欧洲司三处处长。

Deutschland und China – Was ändert sich an unseren Beziehungen?

Von Martin Thümmel

In China sind Bücher beliebt, die beschreiben, was sich in China im Zuge der unaufhaltsamen Modernisierung ändert – und was sich nicht ändert. Aber nicht nur China ändert sich: Wer die heutige Rolle Deutschlands in Europa und der Welt betrachtet, stellt fest, dass im Vergleich zur Lage vor zehn oder zwanzig Jahren ein großer Wandel stattgefunden hat. Es lohnt sich deshalb, nicht nur in Bezug auf China, sondern auch im Hinblick auf die deutsch-chinesischen Beziehungen zu fragen, was gleich bleibt, und was sich ändert.

1. Was sich ändert: Politische Beziehungen rücken in den Vordergrund

Seit einigen Jahren erleben wir eine Rückkehr der Außenpolitik in die internationalen Beziehungen – mit Europa und Asien im Zentrum. Das ändert die deutsch-chinesischen Beziehungen in bisher nicht gekanntem Ausmaß.

Was meine ich damit? Wir erleben gefährliche Krisen in Syrien und Irak, wo das Vordringen der Terrororganisation IS noch immer nicht ge-

stoppt ist. Wir erleben Erschütterungen der internationalen Ordnung durch die Konfrontation um die Krim und die Ostukraine, die die reale Gefahr eines neuen Kalten Krieges zwischen Russland und dem Westen heraufbeschwören. Wir erleben als Resultat dieser Krisen einen seit einem Vierteljahrhundert nicht mehr gekannten Flüchtlingsstrom nach Europa.

Wir erleben eine Verschiebung der Kräfteverhältnisse in Asien und weit darüber hinaus, die in erster Linie dem Aufstieg Chinas geschuldet ist. Gleichzeitig hat die Welt einen historisch einmaligen Schub zu neuer Prosperität erreicht. Daran hat China einen Hauptanteil. Wir Deutschen werden auch nicht vergessen, dass Maßnahmen Chinas zur Wachstumsförderung gerade nach Beginn der globalen Finanzkrise ab 2008 dafür gesorgt haben, dass auch westliche Volkswirtschaften – auch die deutsche – schneller wieder auf die Beine kommen konnten.

Chinas Aufstieg gründet auf seiner Wirtschaftskraft. Daran wird sich auch künftig nichts ändern. Auf der Basis eines historisch einmaligen

Wachstumsmarathons von 35 Jahren beginnt China nun, Gestalter der internationalen Ordnung zu werden. Das ist gut und richtig so. Die Asiatische Infrastrukturbank ist ein Beispiel, die Initiative der Neuen Seidenstraße von Staatspräsident Xi Jinping ist ein anderes. Es werden weitere folgen. Hinter diesen Initiativen steckt mehr als Handelsförderung. Sie enthalten Ordnungsvorstellungen, die anders klingen als wir sie im Westen gewohnt sind. Eine der entscheidenden Zukunftsfragen wird sein, wie diese Ordnungsvorstellungen organisch mit der jetzigen Weltordnung zusammenwachsen können. Die Äußerungen der chinesischen Staatsspitze zu Chinas Weg in der internationalen Ordnung stimmen optimistisch. Aus deutscher Sicht ist wesentlich, dass die Menschenrechte ein zentraler Pfeiler der internationalen Ordnung bleiben, wie dies seit der Allgemeinen Erklärung der Menschenrechte im Jahr 1948 der Fall ist.

Deutschland und China sind in ihrer jeweiligen Region entscheidende Akteure. Deutschland spielt bei der Lösung der Krise in der Ukraine eine vermittelnde Rolle und lässt den Gesprächsfaden zu Russland nicht abreißen. China verhält sich neutral. In Bezug auf die Ukraine eint Deutschland und China das Interesse an einer baldigen friedlichen Lösung des Konflikts auf Basis der Minsker Vereinbarungen, zu denen sich alle Konfliktparteien bekannt haben. Aus Deutschlands Sicht ist Russlands gewachsene Nähe zu China kein Risiko, im Gegenteil: China ist ein starker Verfechter des Prinzips der territorialen Integrität und der pragmatischen Vernunft in den internationalen Beziehungen. Jedoch: Wir leben in einer globalisierten Welt. Ein goldenes Zeitalter in den chinesisch-russischen Wirtschaftsbeziehungen, das Deutschland beiden Ländern

wünscht, wird erst dann anbrechen, wenn das verloren gegangene Vertrauen zwischen Russland und dem Westen wieder hergestellt wird. Hierzu ist Deutschland mit China und selbstverständlich auch mit Russland im unablässigen Gespräch.

Die Ukraine-Krise ist ein Brennglas, das zeigt, dass wir uns in einer Phase der globalen Neuordnung befinden, die sich in erster Linie in Europa und Asien abspielt. Diese vor allem politischen Fragen stehen im Mittelpunkt unserer hochrangigen Gespräche mit China. Unsere beiden einflussreichen Staaten trifft eine besondere Verantwortung, die bedingt, dass wir bei der Lösung internationaler Krisen manchmal einen scheinbaren unmittelbaren und kurzfristigen Vorteil zugunsten tragfähiger Lösungen hintanstellen müssen. Deutschland exerziert dies gerade in der Flüchtlingskrise, indem es mehr Flüchtlinge als jeder andere europäische Staat aufnimmt. Auch im Zusammenhang mit der noch nicht gelösten Staatsschuldenkrise ist es weiter bereit, Solidarität zu üben. China übt Solidarität durch eine immer stärker zunehmende Entwicklungs- und humanitäre Hilfe zum Beispiel für Afrika und Afghanistan. Von strategischer Geduld und Zurückhaltung Chinas wird künftig immer mehr abhängen.

2. Was gleich bleibt: Wirtschaftsbeziehungen sind unser Fundament

Der Erfolg der deutsch-chinesischen Wirtschaftsbeziehungen sucht seinesgleichen. Die Zahlen können in Fachjournalen nachgelesen werden. Wichtig sind vielleicht ein paar Relationen: Mit rund 150 Milliarden Euro Handelsaustausch im Jahr 2014 war der deutsch-chinesische Handel in etwa doppelt so stark wie der russisch-chinesische. Unser Handel ist in etwa so

groß wie der britische, französische und italienische Handel mit China zusammengenommen.

Die Aussichten für die nächsten Jahre sind trotz einiger Probleme im Jahr 2015 glänzend. China muss und wird seine technologische Leistungskraft steigern, was in der Initiative „Made in China 2025“ zum Ausdruck kommt. Deutschland arbeitet seit einigen Jahren ebenfalls zielstrebig an der Stärkung seiner technologischen Leistungskraft. Seit 2005 sind unter den Industrieländern die Ausgaben für Forschung und Entwicklung in Deutschland und Südkorea weltweit am schnellsten gewachsen. Ein Schlüsselbereich ist die Digitalisierung der Industrie, die manche als die nächste industrielle Revolution bezeichnen. Deutschland investiert seit 2013 daher verstärkt in den Bereich Industrie 4.0.

So richtig und unverzichtbar eine Umstrukturierung zu mehr Dienstleistungen ist: Chinas starke Industrie und die industrienahen Dienstleistungen werden die Lebensader des Wohlstands bleiben. Genau dies trifft auch auf

Deutschland zu. Kein Land der Welt ist besser aufgestellt, um an diesem Aufholprozess Chinas teilzunehmen. Manche in Deutschland machen sich Sorgen, China könne zu einem übermächtigen Konkurrenten heranwachsen. Deutsche Unternehmer, vor allem der für Deutschlands Innovationsstärke entscheidende Mittelstand, sind da selbstbewusster. Konkurrenz belebt das Geschäft, wie man in Deutschland sagt. Unsere Industrie steht seit Jahrzehnten im harten Wettbewerb mit anderen Europäern, mit Japan, Südkorea und den USA. Weil wir der protektionistischen Versuchung nicht erlegen sind, sind wir stark geblieben. Wer keine Konkurrenz hat, weil er hinter Schutzmauern lebt, hat keinen Antrieb, Reformen durchzuführen und wird langfristig verkümmern. Und hier liegt die entscheidende Herausforderung: Wir müssen in den nächsten fünf bis zehn Jahren erreichen, dass zwischen chinesischen und deutschen Unternehmen ein fairer Wettbewerb herrscht. Wir sind beide stark genug, um dies zu erreichen.

Autor: Martin Thümmel, Leiter der politischen Abteilung der Botschaft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in China.

欧债危机以来德国在欧洲的角色探析^①

于芳

【摘要】本文透过角色理论的视角，通过官方文本解读德国对自身在欧洲的角色定位，以欧债危机和难民危机中的德国表现来考察德国的角色实践。德国的自我角色期待与角色实践一致，并相对稳定；对德国角色的外部期待则充满矛盾和不确定性，根源在于不同国家之间的利益差别。在应对危机时，德国的角色实践容易受到国内政策的左右，表明危机和挑战根源于欧洲一体化的制度设计缺陷。德国未来角色的关键在于如何发挥其改进欧洲一体化的机制建构。

【关键词】德国 角色 领导者

自欧债危机爆发以来，德国为使欧洲走出危机进行了长期努力，世界各有目共睹。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德国凭借本身的经济优势赢得了更多的政治影响力和较高期望值。早在2012年8月，德国《商报》(Handelsblatt)就发表了关于德国在欧洲角色的文章，标题为《德国角色：拯救欧元和领导欧元》。文章指出，欧债危机发生之后，德国有两大论题，其一是如何救欧元于危机之中。作者认为，德国已经为救欧元支付了足够多的金钱，基于公平原则，德国有权要求欧元区进行改革。然而危机并没有停住脚步，德国必须像在一个家庭深陷危机时一样：救助并改变基本规则。否则德国和欧洲将遭遇可能影响全

球的不幸。关于第二大话题的讨论更为激烈，也更倾向于历史。这是关于身份认同的问题：德国作为新的、强大的、复兴的、有实力的欧洲中心国家，在21世纪会走向何方？德国如何能够在不指手画脚的情况下成为领导？德国将会如何领导欧洲？

欧债危机凸显了德国在欧洲的地位，但是对很多德国人而言，这只是治理危机的副产品，并非德国有意追求的效果，换句话说，德国只是一个不情愿的领导者。2013年6月15日出版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推出一份题为《犹豫的霸权》的“德国特别报告”。报告中指出，德国是欧盟中处于主导地位的国家，在欧债危机中被期待发挥更大作用。

^① 本文受到北京外国语大学2015年度院系自主项目《欧债危机以来德国在欧洲的角色探析》资助。

2015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70周年,对于历史的回顾不禁令人深思如何避免再次出现“德国的欧洲”。媒体中对德国角色的称谓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强权国家”“霸权”等带有负面色彩的词汇,既引发了学者的讨论,也引起了德国民众的不满心理。战后的德国花了很大力气改过自新,避免再次走上不民主的道路,也在过去25年中,努力避免单独成为欧洲的政治中心,主要定位为欧洲的经济大国。然而今天德国再次回到起点,必须对自身定位做出明确的回答:德国在欧洲到底想扮演什么角色?领导者?跟随者?债务管理者?福利监督者?毫无疑问,一定会有人想到德国历史上不光彩的角色。^②

显而易见,对于德国在事实上的领导角色,德国的自我认知和外部认知之间存在着差异,使得德国在扮演该角色时表现为矛盾和犹豫。本文拟透过角色理论的视角,分析德国内部对德国在欧洲角色的认知和实践,为德国作为欧盟领导者角色的未来走向提供判断参考,即德国在欧债危机结束后会回归经济强国角色还是继续走向政治大国。

一、德国对自身在欧洲的角色认知

角色理论认为,角色与社会地位紧密相连,社会地位是角色的静态形式,是个体形成角色认知的基础。角色在内涵上包括权力和责任两个部分。^③对于正在推行更积极的外交政策、谋求国际政治影响力的德国来讲,考察其对于权力和责任的认知具有现实意义,因为德国的政治崛起将对未来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国际秩序产生影响。

本文从两份重要官方文件——2009—

2013年以及2013—2017年两届联邦政府的联合执政协议——来考察德国对自身在欧盟的角色定位,以及对权力和责任的解读。

默克尔政府第二届任期始于2009年,也正是欧债危机开始之初。当时的德国政府已明确意识到:德国面临新的国际挑战,并会在欧洲和世界扮演新的角色,德国要在欧盟和国际组织中扮演建构力量的角色。德国对欧洲的立场体现在如下表述中:德国以实现共同的欧洲为理想,并植根于欧洲,坚持推动统一欧洲的政策,德国未来的和平、自由、安全和富裕都和欧洲的政治发展紧密相连,只有统一的欧洲才能展示德国所坚持的价值观和利益。

德国扮演新角色、实现欧洲理想的方式是:通过国际合作来承担对欧洲和世界的责任,赋予德美合作和欧洲一体化的核心地位,明确承担在欧洲稳定与增长公约中的税务责任,坚持照顾到欧盟内部中小成员国的利益,通过深化和扩大欧盟加强成员国之间的政治协调和社会交流,而德国同欧洲伙伴之间紧密的、充满信任的关系是推动欧洲一体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联邦政府将会推动欧盟成员国在教育、气候保护、空间、安全、防务等领域的合作。

在建设欧洲大厦方面,德国致力于制定可持续发展的、负有责任的欧洲财政政策,推动欧盟实行独立的外交政策,欧盟应当有能力独立预防冲突、并能快速灵活地进行共同行动。德国强调德国和欧洲在中东地区的和平、稳定和民主发展。德国的对外文教政策的一大重点是,加强欧洲的身份认同,为欧洲内部的一体化起到促进作用。

在这个承担责任的过程中,德国也希望扩

^② Ein wunderbarer Bösewicht, <http://www.faz.net/aktuell/politik/europaeische-union/kommentar-deutschlands-rolle-in-europa-13720105.html>, letzter Zugriff am 20.08.2015.

^③ R.Linton: The Study of Man,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 1936, p.28.

大自身的影响力/实力，具体包括：德国希望增加在欧盟和国际组织中的德国工作人员人数，同时也力争使德语成为欧洲机构的工作语言。德国同美国的协调被视作是德国利益的增强剂，能提升德国在欧洲和世界的地位。^④

四年过去，欧债危机非但没有结束，反而成为一场持久战。2013年新政府上台，联合执政协议对德国的角色、责任和欧洲形势的认知有了新的侧重。在国家权力/实力方面，联合执政协议中称，德国在过去几年中的经济发展好于其他欧洲国家，德国在国际金融危机、景气下滑和欧债危机中，能够采取有力行动。在此实力基础上，德国的角色带有更多危机解救者的色彩：欧洲统一大业仍是德国最重要的任务。欧洲伙伴对德国的期望在最近几年中发生了变化。欧盟正经历着有史以来经济、社会和机制上的重大变化与更新，在这个变革时期，德国作为经济实力强大的成员国和稳定锚负有更多责任，背负更多期待。欧债危机还没有结束，在未来几年还需要德国的努力。强大而稳定的欧洲是德国的未来，德国是欧洲第一大经济体，对欧洲负有特殊的责任。

此时，德国对于建立欧洲大厦的目标更为具体，执政协议中有专门一章来阐述欧洲一体化的建设，包括欧盟的民主合法性、走出危机、经货联盟的继续发展、竞争力与就业、社会福利、欧洲外交与安全政策，都提出了具体的行动目标和方式。

德国认为，造成欧债危机的原因较多：过度借债、国际竞争力不足、经济不平衡、结构缺陷、金融市场发育不良。因此，要使欧洲走出危机，必须采取政治措施进行结构性改革、增强竞争力、整顿财政、改善增长和就业。德国始终坚持共同货币。德国的基本

原则是：团结和自负其责是相辅相成的。

德国奉行的基本原则是“没有监管就没有金融市场、没有金融产品、没有金融市场主体”。德国希望能进一步解救欧洲于危机之中，让欧洲成为稳定的、可持续发展的欧洲。其前提条件是欧元成为强大而稳定的货币。欧盟成员国需要通过结构改革和新的增长动力来加强竞争能力。欧洲的社会福利和统一市场的经济自由同等重要。德国协助欧洲国家有针对性的减少青年失业率。德国希望能加强社会福利市场经济体制，使其在欧洲内外得到推广。德国会竭尽所能恢复成员国对欧洲一体化目标的信心，克服欧洲的危机，创造一个政治、经济强大、社会公正的欧洲。与此同时，德语应当同英语、法语一样成为欧洲机构的工作语言，^⑤仍旧是这一届政府努力的目标。

从这两份执政协议中可以看到，德国对自身在欧债危机中的角色定位从“建构者”演化为“富有责任感、促进一体化的角色”，超越了克服欧债危机的近期目标，拟从民主、经济、货币、文教、外交等各方面将欧盟打造为一个独立而强大的力量积极参与到21世纪的国际政治之中。德国对欧盟目标的细化和丰富意味着德国对此承担的责任更为重大。诚然，在执政协议中没有出现任何关于德国“领导者”角色的表述，但对欧盟事实上的领导和推动都蕴含在德国的各项责任和目标之中。同时，德国一再强调，欧洲一体化的进展符合德国的利益，欧洲的未来即是德国的未来，德国始终如一地植根于欧洲，推动欧洲一体化的实现。

德国是世界上名列前茅的经济大国，在军事、安全方面的力量明显落后于其他西方发达国家，即便在欧债危机中起到主导性的作用，也并不意味着德国的目标是为了通过

④ 以上引文均引自2009年的《联合执政协议》。

⑤ 以上引文均引自2013年《联合执政协议》。

经济优势来实现在欧洲大陆的霸权地位，德国的首要目标还是在欧洲的框架内实现自身的国家利益。

二、德国在欧洲事务上的角色实践

1. 欧债危机

欧债危机始于2009年希腊爆发主权债务危机，当时德国正值黑黄政党联盟执政，对希腊危机持沉默和犹豫的态度，并不十分积极施救。德国认为希腊的问题应当由希腊自己解决，并未将主权债务危机视作是欧盟成员国需要共同应对的问题。直到2010年3月欧盟峰会通过了欧元区国家救助希腊的紧急计划，规定欧元区国家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自动提供救助。此后，^⑥德国通过德法合作，提出了一系列整肃财政纪律的措施，以财政紧缩为中心，充分体现了秩序自由主义经济治理理念，目的是建立起欧元区国家的稳定机制，巩固欧盟的根基。

在德国治理危机的过程中，无论是金融稳定基金，还是其他各种救助计划，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必然承担一定的角色。德国坚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参与救助，原因在于，现有的欧盟机制和制度安排明显有不足，希望借助外力保障德国的经济利益。同时，在各项救助计划中，德国承担的财政负担也要远远超过其他国家，此时，德国要求获得对应多的正式参与决定权，在事实上以财政贡献换取话语权。^⑦在后来治理新一轮希腊危机

以及塞浦路斯危机时，德国的角色也呈现出上述特点：一方面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参与，要求欧元区国家整肃、改革财政，以保证本国利益；另一方面在救助过程中扩大自己在欧盟内部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德国对国家利益的考虑和捍卫，体现在行动上处理危机的犹豫、迟疑、严格要求，与“称霸欧洲”的外部评论并不吻合。

2. 难民潮

就在债务危机稍缓之际，欧洲难民危机爆发。奥地利和德国率先同意向涌入欧洲的难民放行，2015年9月6日下午，第一批难民乘列车抵达慕尼黑。德国原本预计接纳45万难民，但从实际情况看，可能会达到80万，用于难民的开支将会高达33亿。^⑧在接受难民问题上，德国意识到单凭一国之力远远无法解决难民安置问题，亟需欧盟成员国的共同分担。不过，其他欧盟国家对德国的提议并未积极响应。大批难民视德国为最终目的地。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在接受报纸采访时表示，德国政府愿意救助难民，是值得骄傲之举，但诸如接受数量和融合程度等问题也不可避免。他认为德国政府紧靠自身无法安置全部难民，需要欧洲国家团结一致，共同努力。目前德国采取的措施是在难民来源国宣讲德国的避难制度和工作的可能性，消除难民对德国过于美好的认知，减少难民前往德国的打算。宣讲措施取得了初步成效，来自科索沃的难民人数有所回落。^⑨

⑥ 郑春荣：《从欧债危机看德国欧洲政策的新变化》，载于《欧洲研究》，2012年，第5期，第2页。

⑦ 郑春荣，刘昊权：《介于利益与价值之间——德国应对欧债危机举措的动因探析》，载于《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3年，第6期，第47页。

⑧ 德国预计接受80万难民，<http://de.haiwainet.cn/n/2015/0906/c456991-29132140.html>，最后访问时间为2015年9月15日。

⑨ Auswärtiges Amt: Flüchtlingspolitik: "Wir brauchen europäische Solidarität.", http://www.auswaertiges-amt.de/DE/Infoservice/Presse/Interviews/2015/150912-BM_WAZ.html，letzter Zugriff am 14.09.2015.

到9月12日,仅涌入慕尼黑的难民人数就超过13,000人,超出了承受能力。德国政府在9月13日晚宣布控制边境,暂停开放。同时,德国仍在呼吁欧盟成员国共同行动。在难民的安置问题上,德国官方口径中多称救助难民是德国的责任,既是实施人道救援的责任,也是坚持欧洲人权价值观的责任,究其深层根源,更是对冲突地区和平与重建的责任。然而,和在欧债危机中一样,德国政府的救助意愿与民众的意愿并不完全一致。部分德国民众对于政府斥巨资安置难民表示不满,66%的德国人认为未来与外来移民的摩擦会增多。^⑩政府出于内政考虑,暂缓边境开放,并同欧盟国家进一步协商安置事宜。

对比德国在欧债危机和难民危机中的表现,不难看出共同之处:德国比较明确而积极地承担责任,强调德国愿意并有能力承担责任,强调欧盟成员国共同承担责任,强调欧盟只有团结一致才能克服危机,拟在危机之中巩固欧洲一体化。这与德国在欧盟框架内实现国家利益的定位完全一致,德国在角色实践上不是在迈向欧洲霸权的地位,而是与自身定位一致,在欧洲的框架内发展德国,增加德国的国际影响力。但这种做法也意味着,政策推行易受到国内政治的掣肘,为民众意愿所左右。

两次危机的爆发,并不仅仅是对德国一国的挑战,而是欧洲大厦在制度设计上的缺

陷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展现出来。欧债危机的爆发成为欧盟改革财政政策的契机,难民危机则意味着,欧盟在难民政策、外交、安全和发展政策上需要加强一体化的程度。如果说德国扮演欧盟领导者的角色,那么它将在上述改革中起到主要的积极推动作用。

三、对德国角色的外部认知

2014年,德国驻华盛顿大使馆进行了一次民意调查,1517名18岁以上的美国人给出了他们对德国的看法。43%的美国人认为,德国是非英语国家中对美国最重要的伙伴,也是起着领导作用的国际伙伴。51%的美国人认为,德国在欧洲起到了“稳定者”的作用,41%的美国人认为德国的角色具有建设性。^⑪

对希腊人展开的一项如何看待德国人的调查显示,在欧债危机问题上,希腊人对德国无法产生好感的原因之一在于,德国人过于严苛,勒令希腊在解决债务危机上节衣缩食,显得过于傲慢。81%的希腊人认为德国的政策旨在通过经济手段统治整个欧洲。自欧债危机以来,希腊人的抱怨远比德国人的多。^⑫希腊人认为,德国在危机应对中实行专制、推行霸权,这种“专制领导”用适合经济强国的处方去医治经济弱国的病症,不仅没有减少问题,反而使很多国家陷入衰退。^⑬以波兰为代表的部分中东欧国家和法国都认

^⑩ 德国接收难民遇到的问题和挑战, <http://mt.sohu.com/20150914/n421089822.shtml>, 最后访问时间为2015年9月9日。

^⑪ Fischer, Sebastian: Neue Studie: US-Bürger sehen Deutschland in Führungsrolle, <http://www.spiegel.de/politik/ausland/us-umfrage-amerikaner-finden-deutschland-stark-a-950252.html>, letzter Zugriff am 08.09.2015.

^⑫ Umfrage: Griechen sehen Deutschland sehr kritisch, http://www.google.de/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cad=rja&uact=8&ved=0CCMQFjAAahUKewjwk-Cv5OnHAhVbGo4KHfEeDF4&url=http%3A%2F%2Fwww.mdr.de%2Ffakt%2Fdvagriechenland100-download.pdf&usq=AFQjCNHgmzXEWD_r_MbSoFqL8ONG9rbc8OQ, letzter Zugriff am 07.09.2015.

^⑬ 金玲:《欧债危机中的德国角色辨析》,载于《欧洲研究》,2012年,第5期,第21页。

为德国的领导作用不可否认，但步伐太小，不够果断，他们不担心德国的实力，而更担心德国不作为。^⑭因为目前的“欧洲”充满利益冲突，裂痕加深，一旦这些裂痕无法补救，欧洲的团结将一去不返。^⑮

在难民潮成为问题之前，不少欧洲人认为德国通过应对债务危机谋求在欧洲的优势地位，对德国要求经济实力相对较弱的国家也采取德国的财政模式十分反感。然而，在安置难民的问题之际，对比德国主动开放边界的做法和其他国家的消极态度，外界又突然发觉德国的举动充满了人道关怀。无论认为德国是在谋求政治领导地位还是对难民充满同情心，都不再适合用过去的目光来考量今天的德国。

德国对自身在欧洲的角色认知相对比较稳定，在债务危机和目前的难民危机中角色实践与自身定位基本一致，但对德国角色的外部期待存在不同的声音，对于角色的最终形成有一定影响。对德国角色的外部期待存在差异，其根源是各国在具体问题上的利益不同。在欧盟内部，德国经济的相对优势反而造成了其他成员国之间的分裂。此外，危机发生以来，尽管德国和其他欧盟国家竭尽全力应对，但始终是以“救火者”的身份在采取近期行动，没有从根源上逐一消除问题滋生的土壤，一直在“应付”危机，却没有从机制上对类似情况“建构”长期有效的统一应急机制。考察德国在欧洲角色的未来走向，应重点关注其“建构力量”如何发挥作用。

作者简介：于芳，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讲师，博士。

⑭ 金玲：《欧债危机中的德国角色辨析》，载于《欧洲研究》，2012年，第5期，第20页。

⑮ Frankenberger, Klaus-Dieter: Wieder im Mittelpunkt,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am 07. September 2015, Politik.

德国难民危机政策探析

黄萌萌 刘立群

【摘要】自2015年初以来，因战乱动荡从中东和北非逃往欧洲的难民迅速增多，给欧盟带来巨大挑战。在严重的难民危机面前，欧盟若干成员国各自为政，对难民配额方案争论不休，暴露了欧盟统一行动力的软肋。德国成为难民首选之地，在欧盟中承担着接纳最多难民的任务。德国总理默克尔在东欧与巴尔干等国拒绝难民之时，决定开放边界接收难民，其“义举”虽获得各方赞誉，但仅一周后德国不得不重新实行边界控制。本文考察德国的难民政策，分析德国为何成为难民青睐之地，从不同角度解读德国最初接纳难民的动因，以及探析德国在短期内调整难民政策、重新实行边界控制的原因。

【关键词】难民危机 居留权 难民身份

一、引言

自2015年初以来，欧洲面临着二战以来最大的难民危机。因连年战乱动荡，从中东和北非地区逃往欧洲的难民迅速增多，给欧盟带来了巨大挑战。2014年有62.6万人在欧盟申请避难，2015年初至9月中旬申请避难者已达70万并仍在增加，其中约50万人横渡地中海，途中意外死亡人数约3000人，造成严重的人道危机。难民潮为欧盟各国带来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各方面很大挑战，各成员国基于本国利益在难民危机中发生激烈争执，再次打击了欧盟要用一个声音说话的理想。匈牙利等东欧国家以及巴尔干国家关闭边界，对难民入境展现出强硬态度；而德国

在接纳难民的问题上表现出更多的同情心，9月6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同意开放边界，接收经匈牙利抵达奥地利的大批难民，此举在国际上赢得了赞许，但这又促使更多难民前往欧洲。为避免出现更大难民危机，仅一周后，德国内政部长德迈齐埃于9月13日宣布恢复边界控制，以制止难民无序流入和恢复有序地接收难民。尽管欧盟内部在难民政策上始终存在分歧，德国甚至再次遭受“特立独行”的批评，不过德国对待难民的积极态度起到了示范带头作用，推动了欧盟很多国家也做出积极响应，并促使欧盟内政部长会议于9月22日达成对滞留希腊、意大利等国12万难民的分配方案。

大量难民北上，将德国、奥地利、瑞典

等拥有较高社会福利的国家作为最终目的地，德国慕尼黑等城市的难民接收能力已达到极限。德国执政联盟内部对难民问题立场存在分歧，基社盟主席、巴伐利亚州长泽霍费尔公开批评默克尔的难民政策，内政部长德迈齐埃也表示德国已无法接收更多难民，民众与媒体对于难民问题的担忧逐渐凸显。难民危机不仅暴露了欧盟在难民政策上的分裂以及统一行动力的羸弱，同时也构成2013年德国大联合政府上台以来最大的政治挑战。由于默克尔总理在对待难民危机问题上人道主义精神的突出表现，诺贝尔委员会10月9日宣布授予默克尔总理诺贝尔和平奖。

二、难民北上德国之原因——德国难民政策探析

难民在德国享有较其他欧盟国家相对优厚的待遇，德国作为欧盟最大经济体也拥有最大劳动力市场，能够吸纳较多劳动力，因此德国成为难民的首选之地。按照德国《避难程序法》规定，如果第三国或失去家园者能证明在原籍国受到严重损害，如死刑威胁、刑讯或非人道的侮辱性对待、由于国际或国内武装冲突生命受到严重威胁，则此类难民在德国属于获得“辅助性保护的难民”(Subsidiär Schutzberechtigter)。^①来自战乱国家或地区的难民如果通过难民身份审核，他们享有居留权、家庭团聚权以及平等就业权。正常的难民审核程序包括：“分配难民申请者”“提出难民申请”“听证与决议”“申

诉”“三年后复检难民身份”等。^②

自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以来，德国政府接收难民申请的数量大幅攀升，仅2015年上半年已收到超过3万份难民申请。2015年“伊斯兰国”陆续攻占叙利亚与伊拉克重镇，当地平民面临的战争威胁与激进组织的迫害与日俱增。叙利亚有半数以上国民逃离家园，4百万难民滞留在土耳其、黎巴嫩、约旦以及伊拉克等中东邻国，有积蓄的难民向蛇头缴纳不菲的偷渡费后逃往欧洲。预计2015全年将有80万难民涌入德国。德国决定对来自叙利亚的难民以及伊拉克的基督教、雅兹迪教派与曼达教教徒加快难民身份审核程序。“听证”程序得以省略，上述国家的难民申请者可书面阐述逃亡理由，德国联邦移民与难民局向难民申请者提供翻译服务。

根据《避难程序法》第3条，难民申请者通过快速审核通道获得“难民身份”在德国享有如下权力：

1. 获得三年的居留权；
2. 获得“难民身份”三个月后可申请家庭团聚，将配偶与未成年子女接至德国；
3. 参加社会融入课程，如德语培训以及职业教育等；
4. 获得“难民身份”后享有难民护照，不必再居住在难民营，具有平等就业权以及自由活动权；
5. 为寻求就业者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或者社会救济。^③

对于尚未获得“难民身份”的庇护寻求者虽然其权力有别于取得合法身份的难民，

① 唐旻：《德国难民政策的历史与现状》，载《德国研究》，2015年，第2期，第47页。

② „Asylverfahren“, Bundesamt für Migration und Flüchtlingen, <http://www.bamf.de/DE/Migration/Asyl/Fluechtlinge/Asylverfahren/asylverfahren-node.html>, letzter Zugriff am 24. 09.2015.

③ „Beschleunigtes Asylverfahren“, Bundesamt für Migration und Flüchtlingen, <http://www.bamf.de/DE/Migration/Asyl/Fluechtlinge/Asylverfahren/BesondereVerfahren/SyrienIrakEritrea/syrien-irak-eritrea.html?nn=1363268>, letzter Zugriff am 24. 09.2015.

比如在审核期间禁止工作，不具备完全的自由活动权，但仍可获得 350 欧元左右的补贴、免费食宿以及医护人员服务。从法律、经济与社会角度可以看出难民选择德国作为居留地的原因。

从法律层面上讲，德国对来自叙利亚与伊拉克的难民采取了更为宽松的政策。制定快速审核通道的同时，对于获得“难民身份”的移民直接给予三年的居留权，此外，在德国有亲属的叙利亚难民可被优先接纳，获得难民身份后享有优先的家庭团聚权。^④而按照《避难程序法》获得“辅助性保护”的难民暂时只拥有一年的居留权以及有限的家庭团聚权，仅当其家庭成员具备充分的人道主义理由以及符合德国政治利益的情况下才拥有家庭团聚权。

从经济角度来看，联邦总理默克尔与副总理加布里尔于 9 月 5 日宣布难民解决方案：提供 60 亿欧元援助资金，其中联邦拨款 30 亿欧元，各联邦州和县市政府获得 30 亿欧元的资金，帮助各联邦州与地方政府建设 15 万个难民安置地。^⑤9 月 24 日宣布联邦再向各联邦州追加拨款 10 亿欧元，联邦最终提供 40 亿欧元。联邦向各州按每位难民每月 670 欧元标准提供资助，以 80 万难民计算，联邦政府为此支出 35 亿欧元，另出资 5 亿欧元建设难民安置处。此方案随之交由联邦议院和联邦参议院审议表决，通过后从 11 月起生效。^⑥

从社会角度来看，德国倡导“欢迎文化”

(Willkommenskultur)，入境德国的难民经常会得到德国志愿者的义务帮助以及民众的物资捐赠。当东欧等国封锁边界以阻止难民入境之时，德国政界对于接纳难民展现出更多的同情心。总理默克尔宣布接纳滞留在匈牙利的难民并且亲自至难民营接见难民，此举赢得了普遍的尊敬，同时也激发了更多难民将德国作为最终目的地的意愿。

三、德国接纳难民的动力

来自叙利亚的小难民“艾兰”9 月 3 日在偷渡过程中不幸溺亡的照片曝光后，德国二战后所看重的“人道主义”价值观承受着巨大考验。政治家在国内民意倾向以及道义的责任之中决定开放国门，派出专列迎接滞留在匈牙利的难民入境。然而，政治决策受多重因素影响，德国政府同意接收难民不仅是出于道义责任，同时也是基于现实利益的考虑。

1. 承担更多国际责任

自 2013 年 11 月德国大联合政府上台以来，德国实施更加积极的外交政策，政要表达出积极参与解决国际危机、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愿望。德国的国际地位已不允许其站在边缘地带旁观世界政治与危机。德国国防部长冯德莱恩认为“德国有义务和责任在解决国际冲突中做出应有的贡献，无论是从安全角度还是从人道主义出发，德国不可以冷

④ „Aufnahmeverfahren syrischer Flüchtlinge“, Bundesamt für Migration und Flüchtlingen, <http://www.bamf.de/DE/Migration/AufnahmeSyrien/aufnahmeverfahren-syrien-node.html>, letzter Zugriff am 24. 09.2015.

⑤ „Bund legt Gesamtkonzept vor“, die Bundesregierung, <http://www.bundesregierung.de/Content/DE/Artikel/2015/09/2015-09-07-koalitionsausschuss-fluechtlinge-merkel-gabriel.html>, letzter Zugriff am 07.09.2015.

⑥ „Besprechung der Bundeskanzlerin mit den Regierungschefinnen und Regierungschefs der Länder zur Asyl- und Flüchtlingspolitik am 24. September 2015“, Bundesregierung.de, http://www.bundesregierung.de/Content/DE/Anlagen/2015/09/2015-09-24-bund-laender-fluechtlinge-beschluss.pdf?_blob=publicationFile&v=4, letzter Zugriff am 24.09.2015.

漠旁观”。^⑦这种角色认同的调整同样体现在此次难民危机之中。

联邦政府为应对难民问题提出一揽子措施，包括：加快难民法律审批程序、提供更多的难民安置营地、增加联邦与各州的财政拨款、敦促欧盟制定统一难民法规、呼吁欧盟各成员国分担责任、增加 3000 名联邦警察以及 10,000 名联邦志愿服务机构的工作人员、向外交部拨款 4 亿欧元用于难民危机管理与预防。德国总统高克与总理默克尔接连走访柏林附近以及海德瑙的难民营，明确批评并且表示不会容忍针对难民的暴力事件。^⑧默克尔发表的演讲中强调：“我们能够搞定！（Wir schaffen das！）”，体现德国在难民危机中承担国际责任的意愿，并且展示大国自信。

2. 经济强势

德国曾经历过数次难民潮。上世纪 90 年代，苏联解体、东欧及巴尔干等国内部冲突等导致大量难民涌入德国。当时德国正处于统一初期，对于新联邦州的大量财政补贴导致了经济下滑，社会福利体系面临巨大压力，德国正承受着统一后遗症。科尔总理对于接

收难民展现出了明显的“不情愿”，甚至警告难民是对德国社会与经济发 展的威胁。^⑨德国重新统一之初，德国难民政策总体呈收紧状态，由于政府对于难民的消极态度以及媒体的渲染，民众对于接收难民整体持怀疑态度。

现如今，德国在欧债危机中能够成为中流砥柱要归功于其长期以来所奉行的以经济紧缩为核心的经济治理模式。在 2011 年通过的《新债务法规》规定至 2016 年联邦结构性赤字最高不得超过 0.35%，而各联邦州至 2020 年不允许产生新债务。^⑩财政紧缩政策使得德国经济较为顺利地度过了危机。得益于劳动力市场稳定以及经济持续增长，2015 年上半年德国的财政盈余达到 211 亿欧元，其中联邦政府实现财政盈余 105 亿欧元。^⑪德国经济部长加布里尔认为德国有能力应对每年 50 万难民，德国强大的经济实力是赋予德国信心克服难民危机的重要原因，稳定的经济形势以及稳固的财政政策是德国在难民危机中提供数十亿欧元资助的重要前提。^⑫欧盟内政部长会议所达成的难民分配方案中，德国由于其庞大的人口数量以及强劲的国民生产总值而承担了最多的难民配额。

⑦ Von der Leyen, Ursula: „Rede der Bundesministerin der Verteidigung, Dr. Ursula von der Leyen, anlässlich der 50. Münchner Sicherheitskonferenz am 31. Januar 2014“, Bundesministerium der Verteidigung, <http://www.nato.diplo.de/contentblob/4123416/Daten/3885836/redevdleyensiko2014.pdf>, letzter Zugriff am 17.02.2014.

⑧ 《默克尔访难民营，誓不容忍仇外行为》，德国之声，2015年8月27日，<http://deguozhisheng.blogchina.com/2620723.html>, letzter Zugriff am 24.09.2015.

⑨ 唐旻：《德国难民政策的历史与现状》，载《德国研究》，2015年，第2期，第51页。

⑩ Bundesministerium für Wirtschaft und Technologie: „Wettbewerbsfähigkeit-Schlüssel für Wachstum und Beschäftigung in Deutschland und Europa“, in: Jahreswirtschaftsbericht 2013, Berlin 2013, S.41-45.

⑪ Forster, Thomas: „Staat erzielt im 1. Halb-jahr 2015 Überschuss von 21,1 Milliarden Euro“, https://www.destatis.de/DE/PresseService/Presse/Pressemitteilungen/2015/08/PD15_306_813.html, letzter Zugriff am 25.09.2015.

⑫ „Bund legt Gesamtkonzept vor“, die Bundesregierung, <http://www.bundesregierung.de/Content/DE/Artikel/2015/09/2015-09-07-koalitionsausschuss-fluechtlinge-merkel-gabriel.html>, letzter Zugriff am 07.09.2015.

3. 劳动力市场需求

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数字显示，2015年德国80%难民申请者年龄在35周岁以下。德国政府同意接收难民同样基于劳动力市场短缺以及人口老龄化的现实考虑。^⑬近年来，德国的失业率在6%左右，德国出口导向型经济需要大量高素质劳动力。德国雇主协会2015年7月研究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5月德国专业人才缺口达到14万，而受过职业教育的专业人才缺口在2020年将达到130万。^⑭过去来自巴尔干以及东欧国家的劳动力素质并不尽如人意，加上本国劳动力人口由于老龄化等原因锐减，促进难民融入劳动力市场，通过职业培训将难民培养成专业人才成为填补德国劳动力市场短缺的一项措施。

来自叙利亚等国的难民需要支付大约5000欧元左右的偷渡费用，很多到达德国的难民其原本经济条件较为富裕或者受教育程度较高，受到战争威胁逃往德国并非仅仅是为了领取社会救济，其工作以及学习的愿望较为强烈。叙利亚难民甚至在汉堡打出标语“我们来德国是要工作和上大学，不是为了吃饭和睡觉”。^⑮将“精英难民”培养成为高素质劳动力成为德国在此次难民危机中较为慷慨的重要原因之一。

4. 人道主义价值观

德国奉行“以利益为导向，受价值观制

约”的外交政策。在2015年9月初，当东欧国家尽力驱离难民之时，默克尔却下令开放边界迎接难民，这和她上任以来多次强调的欧洲价值观不无关联。面对党内外人士对其难民政策的批评，默克尔直接反驳道：“如果我们要开始为我们在紧急情况下露出友好一面的行为道歉，那么德国就不再是我的国家。”^⑯

纵观历史，二战后德国经历社会反思以及公民政治教育，反纳粹以及无联合国授权的战争，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成为其政治以及外交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德国也因此成为“文明力量”国家。此次难民危机中，非政府组织提供志愿者服务，大量民众等候在慕尼黑火车站为难民捐赠食品和衣物，其中很多是退休民众及青年学生。但是随着难民数量大幅激增，民众普遍感受到德国负担过重，无法凭借一己之力救助难民，对于难民危机将引发的潜在威胁也愈发担忧。

5. 民意支持

德国电视二台（ZDF）“政治晴雨表”（Politbarometer）2015年9月11日调查结果显示，在接收难民问题上，有66%的德国人认为德国应该允许滞留在匈牙利的难民入境；62%的德国人认为德国有能力应对此次难民潮，甚至有超过一半的德国人认为到目前为止德国在难民危机所做出的努力仍然不足；

^⑬ Statistisches Bundesamt: „Rund 80 % der Asylbewerber in Deutschland unter 35 Jahre alt“, <https://www.destatis.de/DE/Startseite.html>, letzter Zugriff am 25.09.2015.

^⑭ Bundesvereinigung der Deutschen Arbeitgeberverbände: „Fachkräftemangel bekämpfen: Wettbewerbsfähigkeit sichern - Handlungsempfehlungen zur Fachkräftesicherung in Deutschland“, Berlin 2015, S.8.

^⑮ (Schriftsteller unbekannt): „Hamburg will Flüchtlinge in Arbeitsmarkt integrieren“, <http://www.welt.de/regionales/hamburg/article146039705/Hamburg-will-Fluechtlinge-in-Arbeitsmarkt-integrieren.html>, letzter Zugriff am 04.09.2015.

^⑯ „Kanzlerin wird emotional: Merkel—Dann ist das nicht mein Land“, N-TV.de, <http://www.n-tv.de/politik/Merkel-Dann-ist-das-nicht-mein-Land-article15938301.html>, letzter Zugriff am 16.09.2015.

在涉及劳动力市场的问题上，有 61% 的人认为接收难民将有助于解决德国劳动力短缺的问题；85% 的民众认为应该为难民创造工作机会；面对是否愿意以个人名义向难民提供帮助的问题，有 67% 的德国人乐于为难民提供志愿者服务，有 88% 的德国受访者愿意为难民捐赠财物。^{①7}

德国政府的政治决策离不开民意基础。默克尔作为一名理智的政治家，在欧盟争吵不休之时允许难民入境并非出于一时冲动，也不仅仅鉴于“人道主义”价值观。默克尔打开国门的决定与德国的民意支持密不可分。2015 年 7 月电视台公民对话节目中，默克尔面对巴勒斯坦女孩儿留在德国的祈求时仍然非常冷静地回应德国无法收容所有难民，因此也受到“没有同情心”的指责。^{①8}而时隔两个月，默克尔反驳政治伙伴的指责，为其难民政策辩护道：“到处流传的毕竟不是我和难民的照片，而是许多德国民众在慕尼黑火车站和其他地方欢迎难民的照片，我们不必为这种值得称赞的友好举动而道歉。”^{①9}可见，默克尔接纳难民的决议以民意支持为基础，“以民为名”的决议同样也会因为民意的转向而有所改变。

四、德国重新实行边界控制的原因

德国在开放边界一周之后，内政部长德迈齐埃于 2015 年 9 月 13 日宣布重新实行边界控制。德迈齐埃在其讲话中指出此举是出于安全考虑控制难民潮、保证难民审批程序有序进行的必要手段。^{②0}然而，这并不是德国内政部长的一家之言，重新实行边界控制在大联合政府内部已达成共识。此举成为本次难民危机中德国政策的转折点，虽然突如其来，却并非偶然。无论是从欧盟层面还是从德国国内层面分析，开放边界后德国所面临急剧攀升的难民人数让其措手不及，深感这是仅凭一国之力所无法承受之重。

1. 欧盟分裂的难民政策——无力独自支撑的大国

欧盟统一外交与安全政策在此次难民危机中再次受到考验。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在 9 月 9 日发表《盟情咨文》，呼吁欧盟国家团结一致，共同解决难民问题，向需要保护的难民开放家园。^{②1}然而，9 月 14 日欧盟国家内政部长会议并未就难民分配方案达成一致。直到 9 月 22 日再次召开会议，才以“多数

^{①7} Politbarometer: „Mehrheit findet Einreise von Flüchtlingen aus Ungarn richtig“, <http://www.heute.de/zwei-drittel-finden-einreiseerlaubnis-fuer-fluechtlinge-aus-ungarn-richtig-40060938.html>, letzter Zugriff am 14.09.2015.

^{①8} BBC: „Angela Merkel attacked over crying refugee girl“, <http://www.bbc.com/news/world-europe-33555619>, letzter Zugriff am 17.07.2015.

^{①9} Alexander, Robin: „... dann ist das nicht mehr mein Land!“, in: Die Welt, http://www.welt.de/print/welt_kompakt/print_politik/article146453101/dann-ist-das-nicht-mehr-mein-Land.html, letzter Zugriff am 15.09.2015.

^{②0} Sturm, Daniel Friedrich: „Was de Maizière mit dem ‘Signal an Europa’ wirklich meint“, in: Die Welt, <http://www.welt.de/politik/deutschland/article146366428/Was-de-Maiziere-mit-dem-Signal-an-Europa-wirklich-meint.html>, letzter Zugriff am 13.09.2015.

^{②1} Juncker, Jean-Claude: „State of Union 2015: Time for Honesty, Unity and Solidarity“, European Commission.

票”通过 12 万难民的分配方案，以缓解聚集在意大利、希腊及匈牙利的难民负担。但该“配额制”仍遭到匈牙利、罗马尼亚、斯洛伐克与捷克等国反对。即使这些国家勉强接受欧盟的难民“配额”，但并未停止在边界地区建筑围栏以阻止难民入境。^②东欧以及巴尔干国家对欧盟所号召的难民配额制一直持抵制态度，他们认为欧盟更应该帮助叙利亚难民安顿在其中东邻国，而不是鼓励难民逃往欧洲。9月23日欧盟领导人举行特别峰会，宣布加强欧盟外部边界管理；同意向联合国难民署和世界粮食计划署增加至少 10 亿欧元的援助；加大对黎巴嫩、约旦、土耳其以及其他叙利亚邻国的援助，以协助其应对叙利亚难民危机；通过与土耳其的对话加强在阻止及管理难民潮方面的合作；欧盟还呼吁在联合国领导下继续推进结束叙利亚战乱的国际努力。^③

欧盟发出控制欧盟外部边界以及向叙利亚邻国提供援助的信号，以抑制源源不断涌入欧洲的难民潮，此举在一定程度上仅可起到缓解作用。追根溯源，叙利亚乱局不仅涉及美、俄等大国战略利益博弈，同时还有什叶派与逊尼派等各种宗教势力斗争，国内冲突以及激进组织的崛起。国家内战以及“伊斯兰国”的进攻造成叙利亚境内逾 1000 万人流离失所。战乱不平，欧洲难民危机仍将持续，德国总理默克尔 9 月 23 日在欧盟领导人峰会上呼吁促进各方领导人对话，寻求结束战乱的解决方案，

包括邀请什叶派的伊朗、叙利亚的阿萨德以及逊尼派国家如沙特阿拉伯的各方参与。^④然而，西方盟友美国对此持反对意见，在联合国大会上仍坚持让阿萨德下台。德国在难民危机中不仅要面对欧盟各成员国在共同分担责任中艰难的讨价还价，同时在进一步解决叙利亚危机、缓解欧洲难民潮的问题上也较难与跨大西洋盟友取得共识。

按照 9 月 22 日确定的 12 万难民分配方案，德国因其较高的国内生产总值以及人口数量需要接受 3.1 万名难民，其任务量在欧盟中居首。加上 2015 年上半年到达德国并且递交申请的 18 万难民，德国在开放边界后，难民数量急剧增加，这让联邦各州承受了巨大压力，德国在欧盟内倍感无力。《都柏林公约》逐渐失效，难民首先到达的欧盟国家本应负责难民审核程序，但是大量难民不愿停留在入境国，而是选择继续北上，逃往社会福利较高的德国和瑞典。慕尼黑火车站仅在 9 月初一个周六就迎来了超过 1.2 万难民，德国民众的通勤列车为此受阻，市政府无力为难民在短期内安排足够住处，私房被迫出租成为难民居所，难民营内的骚乱时有发生，德国民众怨声渐起。开放边界导致德国各联邦州的难民承载能力很快达到极限。联邦政府恢复边界控制不仅是出于安全考虑，更是借此向欧盟其他成员国发出信号，呼吁各国共同承担责任，尽快达成强制性与永久性的难民分配方案。德国总理默克尔强调“接收难

② „Durchbruch in Brüssel: EU-Innenminister einigen sich auf Flüchtlingsstrategie“, N24.de, <http://www.n24.de/n24/Nachrichten/Politik/d/5530134/eu-innenminister-einigen-sich-auf-fluechtlingsstrategie.html>, letzter Zugriff am 24.09.2015.

③ „Informal meeting of EU heads of state or government on migration, 23 September 2015 – statement“, European Council, <http://www.consilium.europa.eu/en/press/press-releases/2015/09/23-statement-informal-meeting/>, letzter Zugriff am 24.09.2015.

④ „Flüchtlingskrise - Merkel will mit Assad sprechen“, <http://www.sueddeutsche.de/politik/fluechtlingskrise-merkel-will-mit-assad-sprechen-1.2662573>, letzter Zugriff am 24.09.2015

民并不是德国一个国家的责任，而是欧盟所有成员国的共同责任”。^{②5}

2. 政治伙伴的立场分化以及民意转向

德国执政联盟内部以及各党派之间对于德国的难民政策立场并不一致。默克尔开放国门的决定进一步加剧了德国应对难民危机的压力。不仅其姐妹党基社盟对其难民政策进行了严厉批评，就连基民盟党内意见也并不统一。德国各党派政治家在德国之声的对话节目中就德国是否应该控制边界而产生激烈争吵，接纳难民人数越多的联邦州以及直接负责难民事务的政治家更加倾向于进行边界控制。

巴伐利亚州州长兼基社盟主席泽霍费尔认为默克尔接收难民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并称这个错误将纠缠德国很久，警告德国很快将处于无法控制的困境。^{②6} 慕尼黑市长迪特·莱特（社民党）说道：“目前局势让我们大为震惊，我们必须承认已经没有接纳更多难民的地方了。”^{②7} 德国财政部副部长施帕恩（基民盟）同样对默克尔为难民开放国门的政策表示质疑，担忧源源不断涌入德国的难民将带来严重后果，指出欧盟内部的自由流动是以安全的外部边界为前提，因此匈牙利与塞尔维亚采取边界管控阻止难民入境是正确的选择。^{②8} 德国由于之前对于自身接纳难民的

能力过于自信而并未充分预计到可能的后果，导致各联邦州面对激增的难民不断抱怨其能力已至极限，联邦给予的援助以及财政补贴不足以帮助各州应对此次难民危机。

大部分德国民众虽然仍然乐于向难民伸出援助之手，但当难民数目过于庞大、城市承载难民的能力到达上限、审批程序无法及时跟进、大量难民聚集在火车站等公共场所，德国民众对于“欢迎文化”的热忱递减，民意有所转变，这也是德国决定重新实行边界控制的重要原因之一。德国电视二台 2015 年 9 月 25 日调查结果显示，78% 德国人认为边界控制是一项正确举措；认为德国有能力处理难民问题的人数为 57%，比 9 月初调查数据下降了五个百分点；47% 的人认为难民为德国带来的积极与消极影响参半，而 29% 的人则认为难民仅为德国带来负面影响；对默克尔的难民政策持积极评价的民众达到 50%，而持负面评价的民众也有 43%。在对政治家的评分体系中，默克尔在 9 月 26 日民意调查中排名第四，是其此次任期中的最差成绩，比 9 月初的排名下降两位。^{②9}

2015 年 9 月两次民意调查表明此次难民危机为联邦政府带来政治挑战，德国对于其难民政策所带来的潜在负面后果估计不足，默克尔接纳难民的“义举”所产生的消极影

^{②5} „Deutschland will Grenzen dicht machen“, <http://www.dw.com/de/deutschland-will-grenzen-dicht-machen/a-18712045>, letzter Zugriff am 15.09.2015.

^{②6} „Streit über Flüchtlingspolitik: Seehofer wettert gegen Merkel - und lädt Orbán ein“, <http://www.spiegel.de/politik/deutschland/horst-seehofer-wettert-gegen-angela-merkel-in-fluechtlingspolitik-a-1052455.html>, letzter Zugriff am 12.09.2015.

^{②7} „München am Limit“, http://www.welt.de/newsticker/dpa_nt/infoline_nt/brennpunkte_nt/article_146342154/Muenchen-am-Limit.html, letzter Zugriff am 12.09.2015.

^{②8} Roßmann, Robert: „Jens Spahn kritisiert deutsche Flüchtlingspolitik“, <http://www.sueddeutsche.de/politik/streit-in-der-union-spahn-kritisiert-deutsche-fluechtlingspolitik-1.2645664>, letzter Zugriff am 13.09.2015.

^{②9} Politbarometer Flüchtlingskrise: „Mehrheit fürchtet um Zusammenhalt in EU“, <http://www.heute.de/fluechtlingskrise-fast-zwei-drittel-sehen-zusammenhalt-in-der-eu-gefaehrdet-einbussen-fuer-merkel-40264654.html>, letzter Zugriff am 26.09.2015.

响已经显现，执政联盟内部的批评以及民众的质疑使得联邦政府不得不在一周之内做出迅速调整，重新实行边界控制。

3. 反恐压力以及社会文化冲突

德国面临的困难还在于对难民身份的核实与鉴定，由于无法对蜂拥而至的难民进行及时登记，联邦刑警局警告在数以万计的难民中有可能混入恐怖主义分子。德国更为担心年轻的穆斯林到达欧洲后被激进主义分子洗脑，参与恐怖主义活动。因此德国不得不恢复边界控制，进行难民身份核实以回归正常的法律程序。

社会文化冲突不仅存在于难民与德国社会之间，同样存在于难民的不同群体之间。由于较多难民信奉伊斯兰教，具有与西方社会不同的文化认同与传统，因此如何让难民更好地融入德国社会并且接受德国主流文化成为未来的重大课题。不乏部分德国民众担心由于难民数量过多而导致日后德国社会出现“伊斯兰化”倾向。2014年底，所谓“欧洲爱国者反对西方伊斯兰化组织”（Pegida）就曾在德累斯顿进行大规模的抗议游行，反对德国接收更多的难民。极右翼分子对难民营发起过多次攻击。此外，涌入德国的难民来自不同的宗教派别与种族，有关难民之间产生矛盾、影响社会秩序的负面报道接踵而至。来自阿富汗与叙利亚的难民就因为宗教纷争而在莱比锡的临时驻地产生肢体冲突，导致多人受伤。因此，制定更为完善的难民

融入政策是德国接收难民的前提。如果缺乏完善的社会文化融入机制，吸收更多难民将为德国社会带来较多不稳定因素。

五、结语

德国在此次难民危机中迅速调整政策再次展现了德国虽然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乐于在难民危机中承担更多的责任，但是仅凭一己之力难免力不从心，德国发挥领导作用的意愿不仅受制于自身力量的局限，同时也因为欧盟国家各自为政而倍感掣肘。欧盟的价值观以及统一的外交政策再次受到拷问。欧盟缺乏相互协调的难民政策，若无持续性与强制性的难民配额制度，任何欧盟国家也无法独自面对蜂拥而至的难民潮。

只要中东及北非地区战乱动荡不结束，欧洲难民问题就会长期存在，这对于经历乌克兰危机、刚从欧债危机中恢复些许元气的欧盟来说无疑又是巨大的挑战。难民危机引发一系列新问题并会长期化，在一定程度上还有激化的可能，不过总的来说仍在可控范围之内。作为欧盟最大的经济体，德国不仅需要完善自身的难民融入政策，避免潜在的社会冲突，更需要以欧盟为依托，制定合理的中东和北非政策，对难民原籍国及其邻国提供援助，促进各方政治角色的对话，参与联合国主导的叙利亚危机等解决方案，从源头上对难民危机进行有效的管理与预防。

作者简介：黄萌萌，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

刘立群，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英国脱欧公投计划与德国各方反应析论

李倩瑗 刘立群

【摘要】英国自1973年加入欧共体（后为欧盟）以来，一直不是其“全心全意”的成员国，近年来更与欧盟龃龉不断。2013年初英国首相卡梅伦承诺保守党若赢得2015年大选，将在2017年就英国是否保留成员国资格举行全民公决。2015年5月8日，卡梅伦取得连任，便立即进行外交努力以促进欧盟改革，并决定在2017年举行脱欧公投。德国政界、媒体和学界主流都认为英国应继续留在欧盟内，欧盟与英国唇齿相依，互相需要。在今天以法德为主导的欧盟内，英国如何发挥更大作用且不被边缘化，是英国政府的课题，亦需要德国政府的合作。在英国脱欧问题上，德国及欧盟会尽力与英国达成妥协，寻找利益平衡点。

【关键词】英国 脱欧公投 德国立场

英国虽然于1973年加入欧共体，但因长期奉行孤立原则，英国对欧洲一体化特别是对其深化政策一直持怀疑态度，至今未加入欧元区 and 申根区，而且是欧盟2011年12月峰会上唯一明确表示拒绝加入强化财政纪律新条约的成员国。首相卡梅伦出于多重考虑并迫于国内和党内压力公开表示将举行脱欧公投。2015年9月上旬难民危机爆发后，英国民众脱欧呼声更加高涨。

欧共体成员身份一直在英国存有政治上的争议，欧盟代表了对英国国家主权和威斯敏斯特议会主权的持续且与日俱增的威胁，

而欧盟在一体化过程中要求成员国让渡其部分主权，这也挑战了英国传统的“议会主权”（根据英国经典“议会主权”理论，在英国宪政体制内，英国议会具有至高无上的立法权，法院不能对议会立法提出质疑，更无权加以审查，而议会多数党执政的内阁须对议会负责，从而构成“议会主权”的完整形式^①）。在欧盟朝着更为深入和不断扩大的一体化之时，英国仍被广泛看成一个别扭的伙伴。美国学者W. F. 汉里德和G. P. 奥顿在分析英国与欧共体关系时写道：“英国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在感情上与欧洲大国分离开来的习性。

① 洪邮生：《欧洲国际关系的演进——现实逻辑与价值取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283页。

英国人有一种隔绝的心理状态。他们把欧洲看作要么是无足轻重的假日旅游的理想场所,要么就是一些令人厌恶的军事冲突的发源地。这种分离不仅是地理上的,而且也是文化和历史上的。”^②

但英国作为欧洲大国,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外交传统和与美国的“特殊关系”也对欧洲一体化发展有着重要影响。而且即使独立于欧盟之外,英国政府的行动自由也会受限于欧盟及其在世界贸易和投资中的影响,并且无从对欧洲政策产生影响,所以英国并非脱离欧盟就可以不受欧洲一体化的影响,而且脱离欧盟也绝非易事。对于与欧洲大陆的关系,丘吉尔曾经有过一句名言:“我们和欧洲在一起,但从不属于欧洲。”英国与欧盟关系在战后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是对这一名言的验证。

一、英国与欧盟关系发展

自1973年英国加入欧盟以来,就在涉及让渡部分主权的若干重大问题上表现得十分敏感和谨慎,与其伙伴国龃龉不断:1989年12月,撒切尔夫人否决了制定统一的“欧洲宪章”议案。1990年10月,撒切尔夫人再次否决建立欧洲中央银行、实施经货联盟第二阶段的计划。由于其不妥协态度导致其政府内部分裂,她被迫于1990年11月辞职。1992年9月16日,英国退出欧洲货币体系。1998年1—6月,英国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采取行动促进欧元如期启动。布莱尔政府鉴于英国国内对主权问题的传统观念和根深蒂固的疑欧情绪顾虑重重,决定暂不加入欧洲单一货币。

2009年爆发的欧债危机改写了英欧关系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格局。英国退欧公投设想产生,是卡梅伦政府欧盟政策演变的结果,也是欧债危机背景下英国“审时度势”后的选择。在2011年12月9—10日欧盟布鲁塞尔峰会上,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龙佩说,欧盟成员中有26个国家领导人表示愿意加入新条约强化财政纪律。英国是唯一明确表示拒绝加入新条约的国家。2012年7月,保守党右翼超过百名议员给首相卡梅伦联名写信,要求他在任期内宣布于2015年选举结束后举行欧盟成员资格全民公决。卡梅伦马上对此表示反对,但不排除将来就此问题进行全民公决的可能。时任外交大臣的黑格宣布将审查欧盟权能对英国的影响,内容涉及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自2010年联合政府上台后,英欧关系发生一定变化。2013年1月23日,卡梅伦发表演讲,正式承诺保守党政府如能赢得2015年大选,将最早在2017年底就英国是否保留欧盟成员资格举行全民公决。他明确表示支持英国留在欧盟内,但前提是需要通过修改欧盟条约或英国与其他欧盟成员国谈判的方式在劳工法、福利制度等方面修改欧盟法律。在演讲中,卡梅伦还提出了欧盟未来发展五原则:1.提高欧盟成员国的全球竞争力;2.加强欧盟政策灵活性,尊重成员国多样性;3.确保欧盟和成员国间权力的双向流动,欧盟也要建立向成员国归还权力的机制;4.加大成员国议会权力,增强欧盟民主合法性;5.对欧元区内外国家同样公正对待。另外,他在讲话中明确反对以双速欧洲作为解决成员国间差异的方案,这一方案存在中心国家和边缘国家差异永久化的风险。^③

② 汉里德, W. F. / 奥顿, G. P.:《西德、法国和英国的外交政策》,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295—296页。

③ „Beschleunigtes Asylverfahren“, Bundesamt für Migration und Flüchtlingen, <http://www.bamf.de/DE/Migration/AsylFluechtlinge/Asylverfahren/BesondereVerfahren/SyrienIrakEritrea/syrien-irak-eritrea.html?nn=1363268>, letzter Zugriff am 24. 09.2015.

2015年5月,保守党在大选胜出后立刻启动公投准备工作,英国首相卡梅伦随即对荷兰、法国、波兰和德国进行了旋风式访问,以期在英国举行脱欧公投之前争取欧盟统一进行大规模改革。英国政府中的政治精英虽然疑欧主义者甚多,但目前英国政府还是希望在2017年以前能够同欧盟进行谈判促使其改革,卡梅伦希望的欧盟改革主要包括:1.有效限制来自其他欧盟成员国的移民及其在英国享受的社会、医疗福利;2.确保单一市场规则不能向欧元区成员国的利益倾斜,以保护本国在欧盟范围内的经济利益;3.欧元区在进一步融合的情况下,确保伦敦金融城的地位和利益不受影响;4.确保各国议会有阻止新立法建议的权力。卡梅伦的要求遭到东欧国家的普遍抵制,尤其是在涉及移民和劳动力自由流动方面。^④5月27日英国新一届议会举行开幕大典,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议会发表演讲称,英国将在2017年底之前举行全民公投,以决定英国是否脱离欧盟。她表示,英国政府将重新协商英国与欧盟之间的关系,并希望欧盟的改革能符合所有成员国的利益。5月28日,英国政府向下议院提交并公布了有关“脱欧公投”的议案,承诺将在2017年底之前举行投票。

二、德国各方反应

1. 政府表态

德国多位领导人都明确表示希望英国能够留在欧盟内。2015年5月29日,在卡梅伦访问德国的记者会上,默克尔在谈到英国脱欧公投时明确表示:“德国非常明确地希望英国能够留在欧盟内,为了能留住英国,并不排除修改欧盟条约的可能性。”她强调,在欧盟共同市场、立法和减少官僚机制等方面,英德两国都有共同的利益和立场。她还表示将会在欧盟改革方面成为英国“具有建设性的伙伴”。欧盟有关条约的更改并不是没有可能的,但共同市场和人员自由流动的原则不可更改。她认为,双速欧洲是如今欧盟的现实,而且这一现实今后将会长期存在。目前,欧盟内并没有社会福利联盟,这就使得人员自由流动会产生问题,出现一些国家滥用社会福利的不公平现象。她还表示,德国将与英国一起找寻欧盟改革的方案。默克尔强调:“欧洲曾多次验证了‘有志者事竟成’这句谚语。”如果一个成员国有关改变的意愿,欧盟就应该就此做出反应、拿出方案。^⑤德国财政部长朔伊布勒表示,英国退出欧盟是“不可接受且无法想象的”。德国政府将竭尽所能将英国留在欧盟内部。^⑥德国前外长韦斯特韦勒在任外长期间曾表示,希望英国留在欧盟内部,同时也希望推动经济和货币联盟的深化改革。

④ 刘栋,黄培昭:《争取更大权力 谋求更多利益——以“退”为进,英国催促欧盟改革》,载《人民日报》,2015年6月2日。

⑤ Pressekonferenz von Bundeskanzlerin Merkel und dem Premierminister des Vereinigten Königreiches Großbritannien und Nordirland, 29. Mai 2015, <http://www.bundesregierung.de/Content/DE/Mitschrift/Pressekonferenzen/2015/05/2015-05-29-pk-merkel-cameron.html;jsessionid=C44FCBEDC51D66F6174E9F07E8E68229.s3t2>, letzter Zugriff am 26.08.2015.

⑥ Ausstiegsszenarien: Britischer Bericht hält EU-Austritt für machbar, 03.08.2014, <http://www.spiegel.de/politik/ausland/grossbritannien-eu-austritt-laut-studie-fuer-london-gangbare-option-a-984230.html>, letzter Zugriff am 26.08.2015.

德国政府也需要对辅助性原则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应在欧盟内部保持各成员国的差异性，但欧洲并不是成员国国家利益的简单之和，而是命运共同体。^⑦德国副总理、经济和能源部部长加布里尔在文章中谈到“多速欧洲”。他认为，一个强大的欧盟需要能推动欧盟继续向前发展的国家，但同时允许欧盟各国与欧盟联结的紧密度有所不同。^⑧

2. 媒体观点

德国主流媒体也倾向于反对英国脱欧，例如《英国人需要欧盟》(Die Briten brauchen Europa)一文的题目便阐明了这一立场，并且列举了英国自加入欧盟以来外贸经济方面的增长：与欧盟国家的贸易额增加了3.3%，而与欧盟外国家的贸易额仅增加了1.3%，如今48%的英国商品和服务均向欧盟国家出口，可见，孤立并不适用于今天；^⑨《金融时报》主编理查德·兰伯特(Richard Lambert)和欧洲改革中心委员会委员约翰·斯普林福特(John Springford)共同撰写的《疑欧主义者之岛》从经济角度阐述了这一议题：1. 共同市场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大于自由贸易区；2. 欧盟成员国的身份并不会使英国的对外贸易减速；3. 英国部分企业认为英国受益于欧盟共同市场，对英国脱欧持反对态度。^⑩

德国《时代周报》前主编特奥·佐默(Theo Sommer)在其文章中明确反对英国退出欧盟，并对卡梅伦政府的这一做法表示批评，认为这不论对英国还是欧洲都将是一场灾难。他认为，卡梅伦目前有两大任务：1. 在与欧盟伙伴国的磋商中争取尽量多的妥协以满足疑欧主义者的要求；2. 他与欧盟伙伴国的谈判涉及的改革不能触及欧盟核心。同时完成这两项任务几乎是不可能的。^⑪德国在以下方面支持英国的主张：削减欧盟机构，更加坚定地执行“辅助性原则”(该原则是指：只有当欧盟成员国不能足够承担某项任务，且只有欧盟介入才能更好地完成该项任务时，欧洲联盟才能介入与参加^⑫)，甚至包括缩减没有固定工作的外国移民的社会福利。佐默认为，英国退出欧盟对所有国家都是有害无利的。如果英国退出欧盟，欧盟将减少12.5%的人口、14%的经济总量，并且失去一个重量级的军事伙伴，对其在世界舞台上的重要性产生影响。而英国会失去其重要的海外市场，也对其在国际舞台的地位产生不利影响。佐默还对卡梅伦政府的做法提出批评，他指出，卡梅伦希望可以取消欧盟四大自由流动(货物、资本、服务和人员)中人员自由流动的做法遭到其他欧盟成员国和欧盟委员会的强烈反对。欧盟委员会前主席巴罗佐和现任

⑦ Außenminister Westerwelle: Wir wollen, dass Großbritannien in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bleibt, 23.01.2013, <http://www.auswaertiges-amt.de/DE/Europa/Aussenpolitik/Aktuelles/130123-RedeCameronEU.html>, letzter Zugriff am 26.08.2015.

⑧ „Gabriel wirbt für Europa der unterschiedlichen Geschwindigkeiten“, 29.05.2015, <http://www.zeit.de/politik/2015-05/europa-gabriel-debatte>, letzter Zugriff am 26.08.2015.

⑨ Blond, Phillip: Die Briten brauchen Europa, 18.12.2012, <http://www.zeit.de/politik/ausland/2012-12/Brauchen-die-Briten-Europa>, letzter Zugriff am 26.08.2015.

⑩ Lambert, Richard/Springford, John: Die Insel der EU-Skeptiker, 27.01.2014, <http://www.capital.de/meinungen/die-insel-der-eu-skeptiker.html>, letzter Zugriff am 25.08.2015.

⑪ Sommer, Theo: Cameron muss konkret werden, 05.06.2015, <http://www.zeit.de/politik/ausland/2015-06/grossbritannien-eu-austritt-brexit-david-cameron>, letzter Zugriff am 25.08.2015.

⑫ 连玉如：《再论“德国的欧洲”与“欧洲的德国”》，载《国际政治研究》，2014年，第6期。

主席容克均对此表示反对。容克表示，人员自由流动是欧盟的基本原则，取消此项意味着其他的自由流动也可能失效，这是他无法接受的。佐默还援引托马斯·弗兰肯费尔德(Thomas Frankenfeld)在《汉堡晚报》的文章，其中批评英国一直以来都希望从欧盟获取大量利益，同时希望通过各种利己的特殊规定免于承担令人不快的义务。^⑬

3. 资深政治家、学界及其他

2014年，德国资深政治家、社民党人埃贡·巴尔(Egon Bahr)在其文章中认为，英美特殊关系一直是英国外交政策的决定因素，并且一贯阻挠欧洲一体化的进程。英国不愿被欧盟束缚，尤其是其外交和安全政策受到束缚。德国前总理勃兰特曾认为应该让民主发源国英国加入欧盟并得以实施，后来他认为自己错了。1949年乔治·凯南在其著作中就曾提到英国不可能同欧洲紧密联系，与美国的特殊关系一直享有优先。但现在这一情况应有所改变：英美特殊关系应该与英国在欧洲的利益协调，这样欧盟就可以成为多极化世界中的一极。共同市场应该与金融中心伦敦的优势相结合，继续甚至深化其发展。而且，英国应保留其在安全和外交问题上的自主行动能力，这包括英美在情报方面的紧密合作。^⑭

德国埃尔朗根-纽伦堡大学教授罗兰·施图尔姆(Roland Sturm)在其《英国政治》一书(“Politik in Großbritannien”)中表

明其对英国欧洲政策的看法。虽然英国媒体、政界以及主流媒体对欧盟和欧元存疑，但欧洲一体化在英国外交政策中仍然不可或缺：英国同欧盟的经济联系非常紧密。另外，英国决策者非常清楚英国需要欧盟来解决如金融危机、环境变化以及国际恐怖主义等国际问题。大部分英国政治精英认为，英国欧盟成员国的身份所带来的利大于弊。欧盟内部的官方语言既不是德语也不是法语，而是在欧盟内较少人作为母语的英语。但英国政府必须向国内民众说明一体化进程与英国的国家利益是吻合的，并尽量消除国内各方面的疑欧主义，在这一前提下英国才有可能成为欧盟值得信赖的成员国。^⑮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赵怀普教授认为，英国同欧盟的关系会是一个“有理、有利、有节的讨价还价”的过程。“有理”即基于利益英国必然要求通过谈判推动欧盟改革；有利即保守党刚刚获胜，国内支持率较高，同时德法也希望英国留下；有节即如果卡梅伦政府的意图并不是想让英国真正退出欧盟，则必须在对欧谈判中保持克制。^⑯

德国资产规模最大的德意志银行于2015年5月成立专门小组，评估英国脱欧对其在英国业务的影响，考虑一旦英国退出欧盟，该银行是否要将部分业务撤出英国迁回德国。该银行是首个正式开始评估英国脱欧对其业务影响的银行。目前该银行在英国有近9000名员工。

^⑬ Sommer, Theo: Die EU muss Cameron nicht noch mit Füßen treten, 28.10.2014, <http://www.zeit.de/politik/ausland/2014-10/europaeische-union-grossbritannien-david-cameron>, letzter Zugriff am 26.08.2015.

^⑭ Bahr, Egon: Zeit für ein Europa mit England, <http://www.sueddeutsche.de/politik/debatte-um-englands-eu-austritt-zeit-fuer-ein-europa-mit-england-1.2220937>, letzter Zugriff am 25.08.2015.

^⑮ Sturm, Roland: Politik in Großbritannien, VS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S.226-227.

^⑯ 黄洋:《“英国大选及其影响”学术研讨会综述》,载《欧洲研究》,2015年,第3期。

三、结语及展望

1. 英国经济和金融政策与德国推行的严格的财政金融纪律有所不同

诚然，英国以退欧公投相要挟，也是其对欧盟发展方向不满以及要求欧盟改革的表现。由于德国主导了当前欧盟的改革方向，其经济主张、金融政策和发展模式与英国并不相同。以德国为代表的多数西欧和北欧国家以实体经济立足，有能力执行严格的财政金融纪律及推行金融交易税。但英国是欧盟成员国中金融业最发达的国家，金融业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0%，如果执行严格的财政金融纪律并推行金融交易税，其金融业将由于欧盟的严格管制而失去活力，最终有可能丧失其作为欧洲金融中心的地位。^{①⑦}

2. 英国作为单一制、君主立宪的民主国家（威斯敏斯特体系）与德国作为联邦议会共和制国家（联邦制）的政治体制有所不同

德国和英国均为欧盟中的大国，两国政治制度有着明显不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一个联邦议会共和制国家，而英国是一个单一制、君主立宪的民主国家（威斯敏斯特体系）。两国在欧盟中的表现以及两国的欧洲政策差异性较大（“德国思想中的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与英国式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传统的对立——哈耶克”）。

欧盟正在推行的一体化强化措施以成员国进一步的主权让渡和政治协调为基础和前提，这与历来坚守欧盟“单一市场原则”、反对超国家发展方向的英国也形成严重对立。英国有着“光荣孤立”的传统，保守党不相信任何主权转让行为。

3. 德国和英国两国欧盟政策不同处

德国以欧洲为中心的外交战略定位和英国对欧盟的若即若离截然不同，这从德英两国领导人的讲话中也可以看出：

2013年12月18日，第三届默克尔政府诞生后首个政府声明中强调德国在欧洲的责任，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仍是大联合政府最重要的任务之一。默克尔在2014年新年讲话中也谈到欧盟合作对德国的重要性并指出，德国的进步始终取决于欧洲能否向前、主权债务危机能否被最终克服。德国外交部“回顾2014——集思外交政策”项目的总结报告题为《危机、秩序和欧洲》，施泰因迈尔在该总结报告中强调：“如果涉及全球化的建构，德国只有在欧洲框架内才有行动能力。德国在国际政治中良好而又具建设性的角色只有在欧洲以及通过欧洲才能实现。”^{①⑧}

而反观英国，2013年1月23日，迫于党内和国内压力，英国首相卡梅伦发表了关于英国与欧盟关系的重要讲话。他说，欧盟面临三种挑战：欧元区的问题正在促使欧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欧洲的竞争力在下降；欧盟与公民之间缺乏民主责任感。

4. 英国退欧前景预测：

本文认为，英国的未来离不开欧盟，而欧盟的发展亦离不开英国，双方相互需要，彼此借重。英国是欧洲一体化的受益者，英国的繁荣和稳定离不开欧洲共同市场；而作为欧盟中的重要国家，英国重要的政治地位和国际影响也是欧盟所看重的，而且英国退欧势必会影响欧盟根基，确实对双方来说都是一场灾难。英美特殊关系与英欧关系并非此消彼长，英国恰可利用其与两方的紧密联系，成为美国和欧盟的桥梁，如“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

^{①⑦} 崔洪建：《英国：退出欧盟？》，载《世界知识》，2012年，第23期。

^{①⑧} Auswärtiges Amt: Projektteam “Review 2014 - Außenpolitik Weiter Denken”, seite 11-12.

协定”(TTIP)谈判。美国总统奥巴马也曾在讲话中明确反对英国退出欧盟。英国权威民调机构 YouGov 对于英国和欧盟关系的民调结果(2015年8月18—19日)显示:44%的英国人认为英国不应退出欧盟,而37%的民众则支持英国脱欧;36%的英国人认为英国与欧盟重新谈判可以带来有限但重要的变化;67%的民众认为其他欧盟成员国希望英国留在欧盟内,但不会为使其留下采取很多措施和改革;41%的英国民众认为如果在脱欧公投中支持英国脱欧的人较多,英国政府会再次与欧盟谈判并进行第二次公投。^{①9}

不过9月上旬突然爆发难民危机,欧盟力图在成员国中分配难民接受名额,英国政府表示不接受欧盟的难民配额,民众中主张脱欧的声音也明显上升。《星期日邮报》9月6日民调显示,43%的受访者称投票支持脱离欧盟,40%的受访者称投票支持继续留在欧盟,17%的人仍拿不定主意。这是支持退出欧盟的阵营首次在民调中处于上风。民调结果还显示,在希望英国留在欧盟的民众当中,有22%的人表示如果难民危机恶化他们可能会改变主意。而9月中旬公布的英国小企业联合会(FSB)调查结果是:约47%的小企业希望留在欧盟,近41%的小企业希望退出,另有10.7%犹疑不决。

从目前情况看,英国脱欧公投是否最终导致英国脱欧成为现实,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英国与欧盟双方肯定要继续举行多轮谈

判。妥协、让步、谈判是欧盟和德国的传统和优势,在面对英国脱欧问题上,欧盟会尽量与英国达成妥协,寻找利益的平衡点。英国的利益诉求并非全然无理,其在欧盟改革方面的建议亦有可取之处。以退促建的做法虽然有失偏颇,但如果反对的声音能够促进和推动欧盟机制改革,也不失为一件好事。

在各国日益紧密联系的今天,在国际组织中的益处良多,尤其是在曾经经历分裂和战争的欧洲内。欧盟对于其成员国来说不仅是狭隘的经济合作平台和载体,更是促进各国多方面合作的重要平台。发展至今日,欧盟绝不仅是经济联盟,欧盟定期举行的首脑峰会和部长级会议使得各国政策可以很好地协调。“用一个声音说话”意味着成员国在国际舞台上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更多地参与各类国际事务,但同时可能需要让渡部分主权,这可能又会触及某些国家如英国的底线。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如何更好地贯彻辅助性原则,在其中找到平衡,也是欧盟改革亟需解决的矛盾和问题。

英国要求欧盟改革,也是想在欧盟中拥有一定的建构权力,可以参与构建欧盟各方面制度中去,力图摆脱在欧盟中被边缘化。卡梅伦对欧政策并非放弃欧盟这一可资借重的重要战略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以退为进,希望能根据自身的欧洲观影响和塑造欧盟未来走向。^{②0}在今天的欧盟内,英国如何发挥更大作用并且不被边缘化,是英国政府的课题,亦需要德国政府及欧盟各国的合作。

作者简介:李倩媛,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博士研究生。

刘立群,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①9} YouGov Survey Results, 18.08.2015, https://d25d2506sfb94s.cloudfront.net/cumulus_uploads/document/t3_aybmt2/Copy%20of%20InternalResults_150819_Europe_W_1.PDF, letzter Zugriff am 02.09.2015.

^{②0} 王展鹏:《面对国际体系调整和国家实力变化的双重挑战——英国,不敢作中等国家》,载《人民日报》,2014年7月23日。

经济视野

德国的科研创新政策（上）

殷桐生

【摘要】德意志民族是一个智慧的民族，善于创新。2015年又是中德创新年，所以写了本文。本文分成上、下两大部分，从创新理论切入，沿着国际上通用的创新指标体系、德国的创新指标、科研创新体系、创新的重点、重要项目及立法、科研创新的财政资源、科研创新的人力资源、科研创新的特点、加强国际合作、问题与改革建议等10个专题，对德国的科研创新政策进行了全面的阐述和剖析，突出了它的成功之处，也指出了它的问题，便于我们学其所长，避其所短。

【关键词】科研 创新 财政资源 人力资源

I. 创新理论

创新这一概念古往有之，但创新理论的产生则还是近百年的事情，创始人是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他于1912年发表了《经济发展理论》一书，首次提出了“创新”理论，认为创新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是把一种从未有过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他突出企业家的创新利润，指出发明是新工具或新方法的发现，创新则是新工具或新方法的实施。1939年，他在《经济周期》一书中引入了充满活力的企业家这一要素来解释经济景气波动的现象，指出少数几个有开拓精神的企业家可以吸引其他人共同参与，这样就产生了经济繁荣。

此后熊彼特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形成了新熊彼特假设，认为在绝对企业规模（即所谓新熊彼特假设I）或相对企业规模（即所谓新熊彼特假设II）与技术进步之间存在关系。前者认为，研发的效率随着企业绝对规模的增大而提高；后者则认为，革新活动与相对企业规模有关。企业必须事前拥有市场实力并且有望在限定的时间内获得创新利润，占据垄断地位，从而为研发投入积累必要的资金，以免第三方迅速进入市场。到了上世纪80年代，新的实证研究又表明，上述技术进步与绝对和相对企业规模之间存在普遍因果联系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相反，工业的特性如生产技术、产品被授予专利的可能性和市场增长的差别倒是决定着一个行

业的发展进程，而行业的发展进程同时也决定了绝对和相对企业规模及技术的进步。

熊彼特提出的创新概念非常广泛，包括了技术创新、市场创新和制度创新。根据熊彼特的创新概念，技术创新是一个将科技成果变为生产技术或新型商品的过程。这一概念后来被解释为“技术创新是科技成果的商业化过程”，并获得了普遍的认同，认为技术创新的确切概念应该是从新产品或新工艺设想的生产，经过研发、工程化、商业化生产到市场应用这一过程的一系列活动的总和。

二战后出现了创新扩散模式。在这一研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美国学者埃弗雷特·罗杰斯（E. M. Rogers）。他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一个创新扩散理论，认为创新扩散受创新本身特性、传播渠道、时间和社会系统的影响，通过大众传播可以说服人们接受新观念、新事物和新产品。

1960年，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提出了他的“经济成长阶段论”，将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分为5个阶段，1971年又增加了第6个阶段。这6个阶段是：传统社会阶段、准备起飞阶段、起飞阶段、走向成熟阶段、大众消费阶段和超越大众消费阶段。

进入21世纪，学界对创新的影响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认为这是各创新主体、创新要素交相复杂作用下的一种现象，是创新双螺旋结构（指技术进步和应用创新）共同演进的产物，进而提出创新2.0模式。该模式源自美国自然科学基金的一个研究项目，即，科技政策科学。这是刚兴起的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主要目的是制定严谨的科技政策体系，

理解其运行机制，并应用其创新成果。研究的基础是正确理解科技创新，如创新的行为基础，如何理解技术的研发、采纳与扩散？科技创新群体是如何发展和演变的？这也是创新2.0的主要研究课题。

至于创新政策的涵义国内外学者尚无统一的定义，大致可以涵盖以下几个方面：1. 创新政策是一个政策体系，涉及多个领域；2. 创新政策的目的是为了提升技术创新的速度、引导技术创新的方向、扩大技术创新的规模和规范创新主体的行为；3. 创新政策的核心功能是促成创新成果与技术应用之间的良性循环；4. 创新政策涉及从基础研发到技术创新再到技术商业化的整个过程。

今天德国的学者们认为：创意或是新知识还不能说是创新。只有当某一创意已成为新产品、新服务或是新流程，并已成功地得到了实际运用且进入了市场才算是创新。于是，他们往往用以下公式来表示创新：创新 = 创意 + 发明 + 扩散（ $\text{Innovation} = \text{Idee} + \text{Invention} + \text{Diffusion}$ ）^①

II. 国际上通用的创新指标体系

国际上通用的创新指标体系主要有5种，即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发布的《国家创新指数》，欧盟发布的《创新联盟记分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和康奈尔大学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和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发布的《世界竞争力年度报告》。其指标体系和特点如下：

^① Müller-Prothmann, Tobias/Dürr, Nora: Innovationsmanagement, 3. Auflage, Carl Hanser Verlag München, 2014.

表 1 评价指标体系情况

发布机构	名称	指标体系	特点
欧盟委员会	创新联盟记分牌 2014	包括创新动力、企业行为、创新产出 3 个一级指标, 8 个二级指标, 25 个三级指标	全部是统计指标, 均与创新有关。尤其重视中小企业创新活动和人力资源因素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康奈尔大学	全球创新指数 2013	包括创新投入、创新产出 2 项一级指标、7 项二级指标、21 项三级指标和 84 项四级指标。创新投入包括体制机制、人力资本与研究、基础设施、市场成熟度和企业成熟度 5 个二级指标; 创新产出包含知识和技术产品、创意产出 2 个二级指标	评价范围超过创新联盟记分牌, 指标设置有政治(价值)倾向性; 创意产出的三级指标中有许多新指标, 比较适用于西方英语国家
世界经济论坛	2013—2014 全球竞争力报告	包括制度、基础设施、技术准备度、创新等 12 个部分, 114 个三级指标, 其中调查指标 83 个。其中, 企业成熟度和创新两部分与创新驱动紧密相关, 合计有 16 个基本指标	调查指标占多数, 创新指标少, 直接相关的指标只有 7 个
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	世界竞争力年度报告 2013	包括经济表现、政府效率、企业效率和基础设施四个模块, 20 个二级指标, 333 个三级指标, 其中调查指标 125 个。基础设施模块又分为五个部分, 其中“技术基础设施”和“科学基础设施”主要用于衡量各国的科技竞争力, 共包括 46 个 4 级指标	与科技和创新相关的指标主要在“技术基础设施”和“科学基础设施”, 包含了常用的科技投入与产出指标。部分国家评价结果与国家创新指数比较接近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	国家创新指数 2013	包括创新资源、知识创造、企业创新、创新绩效和创新环境等 5 个一级指标和 30 个二级指标	主要反映创新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作用, 指标涵盖了创新活动全过程

资料来源: 摘自宋卫国等的《国家创新指数与国际同类评价量化比较》, 2014 年 11 月 2 日。

显然, 各指标体系的共同点和不同点都很大。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提出的《国家创新指数 2014》的 5 项一级指标中, 中国在创新资源、企业创新、创新绩效、创新环境方面均有提升, 知识创造则下降 1 位。其中, 企业创新指数位列第 13, 上升了 2 位。该报告称, 中国主要指标已达到世界领先水平。2013 年, 中国研发经费投入达 1912.1 亿美元, 首次超过日本, 升至世界第 2 位, 与

美国的差距进一步缩小。同年, 国际科学论文 (SCI) 数量达到 21.3 万篇, 居全球第 2 位, 但仍只有美国的一半不到。国内发明专利申请量连续 4 年居世界首位, 国内发明专利授权量排名第 2, 居日本之后。^②

III. 德国的创新指标

根据上述《创新联盟记分牌 2014》《全球创新指数 2013》《2013—2014 全球竞争力力报

^② 王田歌:《国家创新指数报告发布 中国创新能力稳中有升》, 载《羊城晚报》, 2015 年, 第 7 期。

告》《世界竞争力年度报告 2013》和《国家创新指数 2013》的统计,德国的创新指数分列第 3、未进入前 10、第 4、第 9 和第 10。^③

2013 年初,欧盟发布 2012/2013 年度“创新经济体”排名,瑞士名列第一,德国第二。在知识资产(专利申请、应对社会挑战类专利申请)、创新者人数(与创新生产、营销相关的中小企业数)方面德国占有绝对优势。

2014 年 10 月,德国电信基金会(Deutsche Telekom Stiftung)、德国联邦工业联合会(Bundesverband Deutscher Industrie e.V.)、弗劳恩霍夫体制和创新研究所(Fraunhofer-Institut für System- und Innovationsforschung, ISI)、联合国大学(United Nation University)、马斯特里赫特大学(Maastrichter University)和欧洲经济研究中心(Zentrum für Europäische Wirtschaftsforschung)联合发布了《2014 年全球创新指标》,德国排名第 6 位,获 56 分,仅次于瑞士(76 分)、新加坡(65 分)、芬兰(60 分)、比利时(58 分),同瑞典相同。

该报告还进一步指出了涉及德国科研创新的 5 大相关主体(经济界、科学界、教育界、国家和社会)的创新绩效。其中经济界的创新成果下降了一个百分点,从第 3 位降至第 5 位。主要原因是风险资本投资减少,国际专利申请下滑,知识密集型服务机构的就业不振,企业的研发投入羞涩;科学界创新成果有所增加,列第 9 位,但落后于 2009 和 2010 的水平。与其他国家相比,科研创新的成果明显增加,这主要是因为科研力量增强,但专利申请却减少了,出版额也收缩;教育界创新成果有所改善,首要原因是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测试的成绩提高,

加上高校教育进一步国际化,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的博士生增加,居第 11 位,获 48 分,有进步,但仍未摆脱德国创新指数软肋的地位。国家对创新成果的贡献有提高,继续了 2002 年以来的积极发展态势,获得了 55 分,列第 8 位,主要原因是教育领域做出了新的贡献,科研投入增大,但政府对企业研发活动的支持依然滞后。社会对创新成果的贡献列世界的第 11 位,居中游,主要弱点是其框架条件不够完善。^④

一国的创新成果主要反映在以百万人论计的学术成果(指出版物)和技术成果(指专利申请)上,也反映在出口研究密集型商品等方面。2015 年,欧洲专利局(EPA)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4 年,德国共申报了 27.4 万项专利,连续 5 年创历史新高,继续保持欧洲申请专利最多国家的桂冠,在全球继续列第 3 位,仅次于美国和日本。2012 年德国的出版物占世界所有学术出版物的 7.2%,列第四位,仅次于美国、中国和英国。在出口研究密集型商品上德国居世界第 12 位,在工业研发投资上欧盟内 10 个研究最强的企业中 5 个来自德国。2010 年引进新产品或新服务的德国企业就占了 42%,高于欧盟所有国家。

IV. 德国的科研创新体系

德国十分重视全方位科研创新体制的建设。主要反映在下列几个方面:

1. 四大部分

德国的科研创新体制主要可分为四大部分:①科研和创新体制的基本结构;②学术和技术转让渠道;③科研和技术政策体系的

③ 宋卫国等:《国家创新指数与国际同类评价量化比较》,2014年11月2日。

④ Deutsche Telekom Stiftung/Bundesverband Deutscher Industrie u.a.: Innovationsindikator 2014, 10.2014.

管理；④结构改革和科技专门化及其国际比较。^⑤

2. 四个层次

从创新系统的构成来看，德国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层次：政策决策与管理层、咨询与协调层、科学协会和研究执行层以及私营部门和工业协会层。

政治决策与管理层由联邦与各州的议会及政府构成，负责科研创新的决策、立法、实施和管理；咨询和协调层主要有科学委员会、创新与增长咨询委员会以及联邦州文教部长常设会议等，主要负责为联邦和州政府提供与科研创新政策相关的建议和咨询；科学协会和研究执行层主要有研究基金会和马普学会等，这些协会既从事科研，又负责制定并执行相关政策及资金分配；工业协会主要指联邦工业协会、工商协会和工商大会等。他们负责就特定的课题为其成员提供各种与研究创新相关的服务。

3. 四个体制

德国的创新系统又可以分为四个体制：即专业化中介服务体制、企业创新生态体制、公共科研体制和双重教育体制。

4. 创新中心

1983年，德国成立了第一个创新中心——柏林创新中心。之后，创新中心便像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近200个城市先后建立了类似的中心。此类创新中心大多是由公共基

金支持和建立的，主要任务是向辖区内的新创新公司提供研发场所、通信设施技术服务和咨询服务等。^⑥

5. 两大类科研机构

德国官方在统计科研创新数据时一般都将其分为高校内和高校外两大类科研机构。^⑦在统计资金和人员投入时则分为经济界、政府和高校等。

根据2012/2013年冬学期的统计，德国现有高校428所^⑧，主要包括三大类：一是综合大学（Universitäten），又称“学术大学”（Wissenschaftsuniversitäten），有108所，这是德国高校内科研的主力军；二是专业大学（Fachhochschulen），有216所，其主要特点是除必要的基础理论外，偏重于应用和应用研究；三是艺术学院和电影学院等，又称“艺术大学”（Kunsthochschulen），有52所。它们也承担一些与专业相关的科研活动。此外，还有6所师范大学（Pädagogische Hochschulen），17所神学高校（Theologische Hochschulen）和29所管理专业大学（Verwaltungsfachhochschulen）。

今天为了推动大学的科研创新战略，德国开始实行《精英计划》（Exzellenzinitiative）^⑨、高校公约（Hochschulpakt）和《科研创新公约》（Der Pakt für Forschung und Innovation）。《精英计划》分三个层面进行资助：“未来计划”（Zukunftskonzepte）、“精英集群”（Exzellenzcluster）和“研究生院”（Graduiertenschule）。

⑤ Joanneum Research, Technopolis, ZEW: Das deutsche Forschungs- und Innovationssystem: Endbericht, Studien zum deutschen Innovationssystem Nr. 11-2010, Kurzfassung.

⑥ 沈玉芳，张之超：《德国创新中心建设的发展概况和有关政策》，载《上海综合经济》，2002年，第10期。

⑦ 有人将其译为“非高校”，笔者考虑还是按原意译为“高校外”较为妥帖。

⑧ Wikipedia: Liste der Hochschulen in Deutschland, destatis.de, letzter Zugriff am 12.07.2015.

⑨ Wikipedia: Exzellenzinitiative, letzter Zugriff am 12.07.2015.

《精英计划》目前已经实施了两轮，正在实施第三轮。所谓“未来计划”是指遴选几所大学实施长期科研创新规划，被遴选的大学便被称为“精英大学”，可以获得科研资助。第一轮10所大学申报，选中3所：慕尼黑大学、慕尼黑工业大学和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第二轮新增6所：亚琛工业大学、柏林自由大学、弗莱堡大学、哥廷根大学、海德堡大学、康斯坦茨大学；第三轮重新遴选，共选中11所：亚琛工业大学、柏林自由大学、柏林洪堡大学、不莱梅大学、德累斯顿工业大学、海德堡大学、科隆大学、康斯坦茨大学、慕尼黑大学、慕尼黑工业大学和图宾根大学。

“精英集群”是资助一个有关经济或社会的重要课题，该课题要由25位来自不同地区和单位的杰出学者在某一牵头单位共同完成。《精英计划》三轮分别资助了18、20和43个精英集群，对每个精英集群每年资助650万欧元。

资助“研究生院”的宗旨是使该院能更好培养博士生，能为他们提供精英级的学术指导和一流的科研条件。参加指导教授的科研不是主要的，博士生的科研才是主要的。《精英计划》三轮分别资助了19、21和45个研究生院，对每个研究生院每年资助100万欧元。

推行这些计划的目的是要使高校能够开发新的课题，建立新学习条件，检验新学习方案，成立新学院，引进国外的研究人员，发表世界级学术论文以及专利战略等。

此外，要加强对科研创新接班人的培养工作。2013年，全德国大学生为260万，其中一年级新生507,000人。2011年，在德国高校的全部外国人为10%，在“研究生院”

为36%，在“精英集群”为24%，在“未来计划”为37%。2013年，外国新生第一次超过了10万人，比2012年提高了5.8%，占全部大学生的19.9%。

高校外的科研机构应首选马普学会（含82个研究所）、亥姆霍兹联合会（含18个自然科学-技术和医疗-生物独立的研究中心）、弗劳恩霍夫协会（含66个研究所）、莱布尼兹科学联合会（含89个研究机构），但远不止这“四巨头”。从研究人员上看，只有54%的高校外科学家在这四大科研机构中工作；从研发投入来看这“四巨头”也只占到74%。

除此之外，还有联邦和各州的专门科研机构（其中联邦的科研机构有43个）、科学院、科学图书馆和科学博览会以及400多个“其他（科研）机构”^⑩以及民间科学研究机构（如企业间的研究与投资以及联邦工业合作研究会等）。其中联邦和各州的专门科研机构占了高校外科学家的21%，经费的11%；科学院、科学图书馆和科学博览会占了高校外科学家的10%；“其他（科研）机构”则占了高校外科学家的15%，它们对整个德国创新体制的贡献也很大，仅就承担企业委托的研发任务来看，就同弗劳恩霍夫协会的数额相当。

从德国的科研机构看，大学内科研机构还是主要的，但大学外科研机构也很强大。与国际发展总趋势不同的是，德国对高校外的科研相对更为重视。1981年时，德国高校外的科研还落后于经合组织各国，而到了2007年则大大超出了经合组织各国的水平。其中只有日本和奥地利尚能保持较为稳定的发展势头，但日本波动幅度较大，而奥地利则水平偏低。这就意味着，整个经合组织中

^⑩ 德文的原文是 sonstige Institutionen。Institutionen 的原意就是“机构”，为了使中国读者更好理解，特做此处理。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像德国这样持续突出地对高校外科研加以重视。

说是相对重视是因为这是同其他国家相比，而在德国国内，高校内的科研显然还是高出高校外的科研。但高校外的科研认为自己有两大优势：跨学科科研和长线科研，而且这一优势还在不断扩大。3/4 的高校外科研机构认为它们奉行的跨学科原则是它们超过高校内科研机构的优势，而马普学会则在这一方面落后；2/3 的高校外科研机构认为它们同高校内科研机构不同之处在于它们从事的大体是长线科研项目，但弗劳恩霍夫协会的各研究所却是例外，它们都是从事工业相关课题的研究。亥姆霍兹联合会各研究中心则主要是提供科研的技术基础设施。如果一个研发资源的可比定义来统计，则德国的高校内科研和高校外科研的比例应为 2/3:1/3。

V. 创新的重点、重要项目及立法

德国的科研创新特别重立法（包括项目立法）。仅本世纪以来，德国就先后出台了以下一系列重要创新法规，推动了德国的科研创新活动。

1. 2002 年，有关高校教师特权的改革（Reform des Hochschullehrerprivilegs）^⑪ 法律生效，允许高校教师主动从事专利申请和使用。

2. 2002 年，《教授报酬改革法》（Gesetz zur Reform der Professorenbesoldung）^⑫ 生效，在高校全面引进新的教授工资制度。学术大学和专业大学教授的工资均分为 W2（3724

欧元）和 W3（4522 欧元）两档基本工资，外加与其学术成绩挂钩的浮动工资；青年教授的工资等级为 W1（3260 欧元），三年后如被续聘，则每月可以增加 260 欧元津贴。此外，政府还投入 1.8 亿欧元，支持高校设立 3000 个青年教授席位。

3. 2004 年，联邦政府与各州政府签订了《研究与创新公约》（Der Pakt für Forschung und Innovation）^⑬，规定研究领域的五大合作伙伴，即马普学会、亥姆霍兹联合会、弗劳恩霍夫协会、莱布尼兹科学联合会以及作为科研资助单位的德国研究基金会（Deutsche Forschungsgemeinschaft, DFG）的研究经费每年应保持 5% 的增幅。该法原本只适用于 2005—2010 年，此后顺延至 2011—2015 年，2014 年 12 月 11 日又决定将该法延至 2016—2020 年。

4. 2005 年，联邦教研部推出《精英计划》（详细内容已在前文中阐述），旨在提高高校的科研创新活动。该计划第一期从 2005 年到 2011 年，共投入 19 亿欧元；第二期从 2012—2017 年，共投入 27 亿欧元。

5. 2006 年，联邦教研部制订了《科技人员定期聘任合同法》，规定将公立科研机构研究人员的定期聘任合同最长期限放宽至 12 年或 15 年，以留住和进一步培养科技精英人才。

6. 2006 年，联邦政府首次发布了《新高科技战略——为德国创新》报告。^⑭ 这是德国发展高科技战略的第一阶段（2006—2009）计划，共确立五大核心要素和 10 大未来研究

⑪ BMBF: Reform des Hochschullehrerprivilegs, verabschiedet vom Bundestag am 30.11.2001, trat am 07.02.2012 in Kraft.

⑫ Bundesregierung: Der Pakt für Forschung und Innovation, 2004.

⑬ Ebenda.

⑭ BMBF: Die Neue Hightech-Strategie — Innovation für Deutschland, <http://www.bmbf.de/de/24375.php>, letzter Zugriff am 09.07.2015.

任务，总共投入 146 亿欧元。

五大核心要素是：一、附加值和生活质量是未来的首要任务；二、联网和转让；三、经济界的创新力度；四、有利创新的框架条件；五、透明和参与。

第一核心要素“附加值和生活质量是未来的首要任务”含 6 大任务：即（1）数字化经济与社会；（2）可持续经济与能源；（3）创新的劳动世界；（4）健康的生活；（5）智能移动；（6）文明安全。

10 大未来研究任务包括：碳中和、高能效和适应气候变化的城市；作为石油替代品的可再生资源；能源供应的智能重建；个性化医疗能更好治病；通过有针对性的预防和营养增进健康；增强老人的自理能力；可持续移动；因特网对经济的服务；工业 4.0 以及安全认同等。

7. 2007 年，联邦议院通过了《高校框架法》（Hochschulrahmengesetz）^⑮，对高校的各方面，特别是对高校的科研创新工作做了全面的法律规定。

8. 2007 年，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签署了《2020 高校增加招生名额公约》（Hochschul-pakt 2020 für zusätzliche Studienplätze）^⑯，主要是解除联邦与各州政府合作的禁令，要求双方共同出资，通力合作，以保证大学能提供足够的学习名额，满足社会对高素质人才不断增长的需求。2014 年 12 月 11 日联邦和各州又决定，从 2015 年开始要增加 760,033 大学生名额，仅联邦层面为此就要增加 99 亿欧元的投入。

9. 2009 年，颁布《促进职业晋升进修法》（Gesetz zur Förderung der beruflichen Aufstiegsfortbildung）^⑰ 为在职人员提供晋升进修的条件。全法共分 8 章 30 条，涵盖资助措施、人员条件、资助、收入及资产的折算、组织、程序、资金提供和罚金及过渡和终结规定等。

10. 2010 年，德国政府发布了《创意、创新、增长——德国 2020 高科技战略》^⑱，这是 2006 年发布的《新高科技战略——为德国创新》报告的第二阶段计划。重点关注 5 个需求领域：气候 / 能源、保健 / 营养、移动、安全和通信。并提出了第一批“未来项目”，修改、补充了第一阶段的 10 大任务，包括：碳中和、高能效和适应气候变化的城市；作为石油替代品的可再生资源；能源供应的智能重建；个性化医疗更好治病；通过有针对性的预防和营养增进健康；高龄老人也能生活自理；2020 年德国有 100 万辆电动汽车；有效保护通信网络；少消耗能源还能多用因特网；能接触并获得世界知识；明天的劳动世界和组织。

11. 2010 年，“顶尖集群竞赛”（Spitzencluster-Wettbewerb）规定^⑲ 颁布，决定开展顶尖集群竞赛，每个集群要展示其战略规划、研究能力和资金资助条件，接受评审委员会审议。竞赛共分三轮，每轮可以推出 5 个优胜集群，它们在 5 年中每年可以获得 4000 万欧元的资助，全部 15 个优胜集群共可获得 6 亿欧元的资助。

12. 2012 年，联邦政府推出了《高科技战略行动计划》，从 2012 年至 2015 年投资约 84

^⑮ BMBF: Hochschulrahmengesetz, in der Fassung der Bekanntmachung vom 19. Januar 1999 (BGBl. I S. 18).

^⑯ Bundesregierung: Hochschulpakt 2020 für zusätzliche Studienplätze, 2007, letzter Zugriff am 23.07.2015.

^⑰ BMBF: Gesetz zur Förderung der beruflichen Aufstiegsfortbildung, Stand 01.07.2009.

^⑱ BMBF: Ideen. Innovation. Wachstum——Hightech-Strategie 2020 für Deutschland, Bonn Berlin 2010, letzter Zugriff am 09.07.2015.

^⑲ Wikipedia: Spitzencluster-Wettbewerb, letzter Zugriff am 09.07.2015.

亿欧元，以推动在《创意、创新、增长——德国 2020 高科技战略》框架下未来研究项目的开展。

13. 2012 年，联邦议院通过了《科学自由法》，即《关于大学外研究机构财政预算框架灵活性法》。据此各大学外研究机构将获得更多经费和人事的决策权。

14. 2013 年，在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德国正式推出《德国工业 4.0 战略计划实施建议》，吹响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号角。所谓的“工业 4.0”概念就是以智能制造为主导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搞智能化制造。该战略旨在通过充分利用信息通信技术和信息物理系统相结合的手段，将制造业同智能相结合，向智能化转型，建设“智能工厂”，实现“智能生产”，从而把德国的科研创新活动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15. 2013 年，联邦政府通过了《新研究框架计划》(das neue Forschungsrahmenprogramm) 和《数字化议程 2014—2017》(Digitale Agenda 2014—2017)^⑩，要求集中研究信息技术安全，防止网络攻击，提高德国竞争力。联邦教研部决定在 2020 前拨款 1.8 亿欧元资助该计划。《新研究框架计划》包含 5 个研究重点：即新高科技同信息技术安全、安全和可靠的信息通信技术、信息技术安全的使用领域、个人隐私和数据保护等，是新高科技战略的一部分。该计划的目的是应对数字化对经济和社会的挑战，如数字化世界的安全问题、大数据问题、创新与未来的生产区位问题，如微电子学，工业 4.0 以及数字世界的服务问题等。

16. 2014 年，联邦教研部颁布了《议程过程“保障和建构未来——研究巨大的社会挑战”》(Agendaprozess „Zukunft sichern und gestalten – Forschung zu den großen gesellschaftlichen Herausforderungen“)^⑪，集中研究当代社会的巨大挑战和应对举措，涉及全球化、日益增多的多样化和人口结构变化引起的社会变化。

17. 2014 年，联邦教研部颁布了《为明天的生产、服务和工作而创新》这一新科研计划 (das neue Forschungsprogramm „Innovationen für die Produktion, Dienstleistung und Arbeit von morgen“)^⑫，主要涵盖了以下 6 大领域：建构未来的生产、帮助新产品和新技术实现突破、绿色和文明生产、生产未来的移动工具、资助中小企业网络以及知识是生产力的钥匙等。

VI. 科研创新的财政资源

德国科研创新资金基础雄厚，研发支付主体包括经济界、各级政府机构和非经营私人机构等。主要有两大渠道，即德国公共科学资助和民间科学基金会。德国的公共科学资助渠道主要有下列各个单位：德国研究基金会、德国学术交流中心 (DAAD)、洪堡基金会和民众奖学金基金会；民间科学基金会则包括科学资助者联合会、大众汽车基金会、蒂森科学基金会和克虏伯基金会等。

德国的研发投入近 10 年来一直呈上升趋势，2011 年，德国研发的支出达到了创纪录的 751.58 亿欧元，2012 年，研发支出估计为 794 亿欧元，首次达到国内生产总值 2.98% 的高度，接近“里斯本战略”规定的 2020 年应

⑩ BMBF: das neue Forschungsrahmenprogramm und Digitale Agenda 2014-2017, letzter Zugriff am 08.07.2015.

⑪ BMBF: Agendaprozess „Zukunft sichern und gestalten – Forschung zu den großen gesellschaftlichen Herausforderungen, letzter Zugriff am 08.07.2015.

⑫ BMBF: das neue Forschungsprogramm „Innovationen für die Produktion, Dienstleistung und Arbeit von morgen“, letzter Zugriff am 07.07.2015.

达到国内生产总值 3% 的水平。^{②③} 在 2008 年德累斯顿教育峰会上，联邦和各州政府就以下目标达成了共识：即到 2015 年把德国的全社会用于教育与研究的经费总额提高到国内

生产总值的 10%。其中既包含了欧盟“里斯本战略”的目标——研发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也包含了联邦政府的目标——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7%。^{②④}

2008—2012 年德国研发投入与执行主体

年	投入主体占比			执行主体占比		
	经济界	政府	其他	经济界	国家	高校
2008	67.3	28.4	4.3	69.2	14.0	16.7
2009	66.1	29.8	4.1	67.6	14.8	17.6
2010	65.6	30.3	4.1	67.1	14.8	18.1
2011	65.6	29.8	4.5	67.7	14.5	17.8
2012				66.9	14.8	18.3

资料来源：联邦统计局、科学统计基金联合会和联邦教研部，2015，自行列表。

1981—2011 年各研发支付主体提供的财政资源数额

年	支付主体				支出总额 单位：百万 欧元
	各级政府机构		经济界	非经营私人机构	
	单位：百万 欧元	占公共财政比	单位：百万 欧元	单位：百万 欧元	
1981	8981	3.2	11,154	78	20,214
1983	9475	3.2	13,011	86	22,571
1985	10,587	3.4	15,896	68	26,551
1987	11,114	3.3	18,831	122	30,067
1989	11,864	3.3	21,064	166	33,094
1991	14,821	3.2	23,935	196	38,952
1993	15,491	2.7	23,973	122	39,586
1995	15,735	2.6	24,733	104	40,572
1997	15,608	2.6	27,036	141	42,785
1999	15,965	2.7	32,411	205	48,581
2001	16,814	2.8	35,095	222	52,131
2002	17,210	2.8	35,904	242	53,356
2003	17,136	2.8	38,060	176	55,372

②③ BMBF: Bundesbericht Forschung und Innovation 2014, Kurzfassung, Bonn, Berlin 2014.

②④ 王炜：《德国2020 高科技战略：创意·创新·增长》，载《科技导报》，2011年8月29日。

续表

年	支付主体				支出总额 单位：百万 欧元
	各级政府机构		经济界	非经营私人机构	
	单位：百万 欧元	占公共财政比	单位：百万 欧元	单位：百万 欧元	
2004	16,791	2.7	38,394	208	55,393
2005	16,761	2.7	39,569	164	56,494
2006	17,310	2.7	42,281	211	59,802
2007	18,183	2.8	43,768	217	62,168
2008	19,874	2.9	46,890	207	66,971
2009	21,388	3.0	46,019	176	67,583
2010	22,480	3.1	47,409	164	69,889
2011	23,446	3.0	51,448	264	75,158

资料来源：联邦统计局、科学统计基金联合会和联邦教研部，2015年，自行列表。

1. 经济界的科研创新投入

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德国在实现研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3%目标的进程中，经济界是最重要的主体。2008—2011年期间它们承担着最高为67.3%、最低为65.6%的研发投入，每年提供2/3的研发投资经费；从绝对值来看，德国经济界1981年的研发投入为111.54亿欧元，2011年就增加到514.48亿欧元，增加了4.6倍，遥遥领先于各级政府的研发投入，确实无愧为德国资助科研创新的主力军。

2. 各级政府机构的投入

德国的各级政府机构对科研创新的投入大致占总额的1/3。政府的投入主要分为两大部分：资金的投入和人才的投入。据统计，从1981—2007年德国对高校科研的投入每年几乎都保持在国内生产总值的0.4%左右，对高校外的科研投入虽略有波动，但也一直保

持在每年国内生产总值的0.35%左右。^{②5}政府的资助手段和渠道主要为项目资助、委托研究和机构资助。

据统计，从2005年到2013年联邦政府的研发支出提高了60%，达到145亿欧元。大学的研发支出提高了6%，研究机构的支出提高了3.3%。德国政府资助企业创新的方式很多，包括欧盟、联邦、州政府给予的优惠政策、优惠贷款、项目资助等。同时，德国在企业税收优惠方面经常帮助企业将其研究成果尽快转化为产品，并给予适当的补贴，包括减免企业从事研发而增加的个人所得税、资产税等；增加因购买研究开发设备、仪器及专利的补贴等。

德国政府还制定出能推动创新的收入分配政策。例如：德国允许大学推广教授拥有的发明专利，获益分配的通常比例是：发明专利所有人、专利推广人和大学各得1/3；德

^{②5} Joanneum Research, Technopolis, ZEW: Das deutsche Forschungs- und Innovationssystem: Endbericht, Studien zum deutschen Innovationssystem Nr. 11-2010.

国还专门制定政策，鼓励弗劳恩霍夫应用研究促进协会及其研究所的创新行为，这是因为弗朗霍夫协会在生物技术、微系统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新材料、光电及半导体照明、新能源及可再生能源、先进制造等领域具有雄厚的创新实力。因此联邦政府也给予它特殊的政策支持，允许它使用以下措施：一是弗朗霍夫协会及其研究所的技术发明人可以无偿使用职务发明创办企业；二是协会或研究所用资金对创新型企业入股，一般占总股份的25%，扶持2—5年，如果企业开

发创新产品获得成功则转股退出；三是研究所给聘为研究员的技术发明人发一年的工资，第二年技术发明人不再具有研究员身份而在公司领工资。

VII. 科研创新的人力资源

科研创新的另一重要资源是人力资源，是指参加科研创新的研究人员，包括技术人员和其他人员。在这些方面德国提供的资源也很丰富。

1995—2012 年德国（全勤当量的）人力资源

年份	研究人员	技术人员及其他人员	人员总数		工作部门（%）		
	人数		每 1000 就业者中		经济界	高校	政府部门
1995	231,128	228,010	459,138	11.7	61.7	21.9	16.4
2000	257,874	226,860	484,734	12.3	64.5	20.8	14.7
2005	272,148	203,130	475,278	11.6	64.1	19.9	16.0
2010	327,953	220,573	548,526	13.2	61.5	22.0	16.5
2012	342,700	236,500	579,200	13.7	61.6	21.9	16.4

资料来源：联邦统计局、科学统计基金会和联邦教研部，2015，自行列表。

人力资源是衡量创新的重要指标，是以千名就业者论计的研究人员的数量，主要是指包括国内外研究人员、技术人员及其他人员的数量和质量以及科研后备力量。从科学家的人数来看，经济界为大户，高校和政府部门次之，2012年的占比分别为61.6%，21.9%和16.4%。

德国提高科研人员数量和质量的主要手段是：1. 提高薪酬；2. 提高权利；3. 提高晋升的广度和深度；4. 努力引进国外的科研人员，减少国内研究人员的流失。

德国十分重视科研后备力量的培养，即

大学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培养。德国实行12年制义务教育，公立学校学费全免，儿童入学率百分之百，大学入学率达42.7%。采用的手段是：1. 提高大学入学率；2. 特殊资助各高校的研究生院；3. 促进本科生和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参加科研的机遇和条件；4. 努力扩大高校中的外国留学生比例。

在这里要特别提到德国享誉全球的职业培训政策，这不仅是推动德国经济发展的“秘密武器”，也是德国科研创新的一条重要渠道。

作者简介：殷桐生，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瑞士创新政策探析

任丁秋

【提要】瑞士是一个极富创新能力的国家。创新是瑞士经济发展的动力，构成瑞士国家竞争力的基础。瑞士联邦政府制订和颁布了教育、研究和创新政策（2013—2016年），引导和支持创新活动的持续发展和深化，以保持瑞士在研究与创新方面的国际领先地位。本文将探讨瑞士创新政策的目标原则、组织机构和实施要点，并提出对我国的启示及建议。

【关键词】创新的国度 创新园 研究与创新促进法 研究与创新政策

瑞士是一个极富创新能力的国家，被称为“创新的国度”^①。瑞士经济成功的基本要素在于构造和培育了一个国家创新体系，并不断调整优化使之趋于完善，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原始发动机和最大行为主体。在市场经济体系的制度框架内，在政府创新政策的引导和支持下，企业的创新活力得以充分施展和发挥。正是在以企业为核心主体的创新体系基础上，瑞士形成并长期保持了国家整体的独特竞争优势。2014年7月，美国康奈尔大学、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联合发布《2014全球创新指数报告》，瑞士第四次名列榜首。

面对创新取得世人瞩目的成绩，瑞士人

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们认为：“研究和创新是一种总是关注未来的活动，因而人类面临持续的挑战。我们总是需要研究什么东西还没有被研究，发现那些还没有被发展的事物，制造那些还没有被销售的产品。”^②正当全球高度评价这个小国创新奇迹之时，瑞士已经加快了研究和创新的步伐。

一、瑞士创新政策的目标宗旨

瑞士《联邦宪法》第64条规定：“联邦应推动科学研究和创新。”瑞士联邦议会于2012年批准了《研究与创新促进法》^③，该法对1983年旧法进行了全面修订。新的《研究与

① [瑞士]R·詹姆斯·布雷丁：《创新的国度——瑞士制造的成功基因》，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

② www.sbf.admin.ch: Forschung und Innovation in der Schweiz.

③ www.sbf.admin.ch: Bundesgesetz über die Forderung der Forschung und der Innovation (FIFG).

创新促进法》共有7章58条,包括总则、促进、协调与规划、信息-报告义务、质量保证、统计、瑞士科学与创新署、附则。该法对于“创新”的概念加以界定如下:创新,意即科学基础上的创新,是指通过研究,特别是应用导向的研究及其成果的应用,发展新产品、新方法和新过程,对经济和社会产生效益。

根据《研究与创新促进法》,联邦应促进科学研究,促进科学基础上的创新,应支持研究成果的运用,保障科学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保证联邦用于支持研究、创新的资金得到有效的使用。联邦政府肩负着引导和促进创新的明确使命,瑞士宪法和《研究与创新促进法》是联邦政府制订创新政策的法律依据。

瑞士联邦政府提出教育、研究和创新的极端重要性,以及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认为“各类知识是个人取得社会成功的最重要因素。教育和研究在知识的形成、传播和使用构成发挥关键作用,并构成总体创新水平的基础,进而驱动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④因此,创新并非是一项独立或孤立的事物。创新与研究、教育紧密相连,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各自承担不同的责任和工作内容。

由于教育和研究是创新的决定性因素,创新与研究更是密不可分,故创新政策通常与教育、研究政策一道出台,构成一揽子政策框架。因此,瑞士联邦政府统一制订了2013—2016年教育、研究和创新的政策指南^⑤,确立了教育、研究和创新部门的工作目标。

瑞士联邦政府对于教育、研究和创新体系,提出总体政策目标:在机会平等、可持

续和竞争的原则基础上,将瑞士建成研究和经济活动基地。具体有以下4个政策要点:(1)通过知识的生产、传播和使用,加强社会和谐;(2)分配更多资金来培训下一代研究者和职业工人;(3)创造平等机会,通过保证教育,使所有个人得以发挥其全部潜能;(4)推动可持续发展,使教育、研究和创新体系服务于社会、经济和环境利益。

瑞士联邦政府关于教育政策的总体目标是:满足劳动者拥有普通教育或职业教育资历的要求。具体有以下8个政策要点:(1)保证教育的广泛性和分散化,实行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双轨制;(2)保证教育的高质量,巩固瑞士高等教育的国际声誉;(3)增强瑞士职业教育在国内外的地位;(4)提高青年的学习能力和就业能力,保证95%的学生达到高中学历水平;(5)保持教育体系的开放性,鼓励职业学校、普通大学、国际文凭学校等各类学校的学生以及教师进行国际性流动;(6)保证国际文凭大学预科课程的质量;(7)贯彻联邦关于高等教育基金和合作的法律;(8)为继续教育和职业培训创造一般条件,增强透明度,提高课程质量。

瑞士联邦政府将创新政策与研究政策合为一体。联邦政府关于研究和创新政策的总体目标是:在竞争的基础上保持基金资助的高水平,并进一步巩固瑞士的国际竞争力地位。具体有以下5个政策要点:(1)将瑞士建成富有竞争力的研究和创新基地。(2)保证瑞士未来在科学领域中的领先地位。(3)在国内外投资建设具有战略重要性的研究基础设施。(4)开展研究和创新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5)推动公共研究机构与私人部门之间的研究和创新合作。

^④ www.sbf.admin.ch: Forderung von Bildung, Forschung und Innovation in den Jahren 2013—2016.

^⑤ www.sbf.admin.ch: Leitlinien und Ziele der BFI Politik 2013—2016.

二、瑞士创新政策的组织机构

2013年1月，瑞士联邦经济部与联邦内政部教育科研处合并，成立联邦经济、教育、科研部，下设联邦教育、科研和创新秘书处。这一机构改革强化了教育、科研和创新的内在联系，形成教育、科研和创新政策的完整组织体系。

1. 瑞士联邦技术和创新委员会

瑞士联邦技术和创新委员会原本隶属于联邦经济部的职业教育与技术局。根据新的规定，联邦技术和创新委员会从联邦经济部分离出来，成为专门负责创新促进的联邦机构。

联邦技术和创新委员会负责资助研究和项目，促进科学基础上的创新；鼓励创新的商业想法，帮助创办企业和培训创业者；支持知识和技术转移，推动知识和技术的应用和市场化；掌握国内外项目信息，促进瑞士与外国的跨境创新项目合作。

联邦技术和创新委员会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开展工作：

1) 资助研究和项目。研发基金面向以科学为基础的创新。联邦技术和创新委员会管理研发基金，资助研发项目，帮助创新产品及服务进入市场。这些研发项目通常缺少资金，从别处无法筹资，产品虽有市场潜力但尚未显露，且往往是需要得到政府措施支持的私人部门。研发项目申请按照自下而上的原则，获得资金的决定性因素是项目的创新内容及其市场潜力。同时，联邦技术和创新委员会鼓励公私部门合作，促进大学及研究机构与企业联合进行研究发展项目，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能够利用大学及研究机构的基础设施，而大学及研究机构也可以将研发的产品和服务通过企业进入市场。

2) 促进创办企业和培训创业者。联邦

技术和创新委员会鼓励创新的商业想法，推动创办新的企业，对于知识密集型企业 and 以技术为基础的公司给予大力支持。“技术和创新委员会创业者”项目提供了培训课程模块，讲授创业所需要的技能和方法，指导和帮助创业者如何将商业的奇思妙想转变为一个公司实体，并支持创业者寻找投资人。年轻的创业者还可以申请创业导师和职业教练，对于知识密集型和以技术为基础的公司给予支持。

3) 支持知识和技术转移。联邦技术和创新委员会采取目标和问题导向的方式，推动大学及研究机构和企业之间的知识和技术转移。通过开设和运营国家主题网络，为企业和大学及研究机构提供服务，包括技术转移项目，研究项目信息、公司需求解决方案等。通过支持先进技术和科学研究成果转向企业生产领域，变成可以进入市场销售的产品，变成企业的生产和销售能力，从而提升瑞士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竞争力。将私人企业部门和公共研究机构紧密联系，形成合作共赢的伙伴关系，推动瑞士创新经济的持续发展。

联邦技术和创新委员会通过以上三方面的资金资助，构成一条“创新促进链”，首先将基础性研究和应用型研究相链接，以研发项目基金推动基础性研究，促进新办企业和培训创业者、支持知识和技术转移则集中于应用研究领域，从而推动了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创新活动。其次，在企业 and 大学及研究机构之间形成链接，通过政策手段和工具克服创新的体系障碍，消除存在于公共研究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的壁垒。

2. 瑞士国家科学基金

根据瑞士《研究和创新促进法》，瑞士国家科学基金是科学研究领域的联邦促进机构，它为科学研究提供资助。按照瑞士《研究和创新促进法》的界定，科学研究分为基础性

研究和应用性研究。基础性研究是以获得知识作为首要目标的研究；应用性研究是以针对和解决实际问题作为首要目标的研究。

国家科学基金主要为独立的基础新研究提供资助，重点支持和扶植的对象是：优秀的研究项目、高素质的科学接班人、研究基础设施、国际研究合作。国家科学基金特别注重扶植年轻科学家的成长。

瑞士国家科学基金的项目资金是开放性的，面向所有的科学研究领域。国家科学基金在调查基础上，由内部工作组评估和分析，制订项目资助计划，同时也制订规则，界定研究人员在研究项目中的科学责任。研究项目的前期工作、竞争性和国际合作都是衡量的因素。2015年6月24日，联邦政府批准了3个新的国家研究项目，即“更智能保健”“抗药性：一个医疗方法”和“大数据”，这些项目均由瑞士国家基金具体实施。

2013—2016年间，瑞士国家科学基金将接受联邦政府32.7亿瑞郎的资助。

3. 学院联合会

学院联合会是指瑞士艺术和科学研究院，这是一个战略性的联合会，于2006年由4家研究院组成，即由瑞士科学学院、瑞士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瑞士医疗科学学院、瑞士工程科学学院组成。根据瑞士《研究和创新促进法》，学院联合会是促进研究的机构，每年要确定关于研究促进的目标，通过国际教育、研究和创新秘书处接受联邦的资助。学院联合会的主要活动包括：沟通和交流学术信息，分享学术研究资源和经验，协调学院之间的关系，支持和帮助创新活动，宣传和传播研究成果，合作开展业务等。

学院联合会关注教育、研究和创新领域

的发展状况，探求这种发展对于社会的影响及后果。重视和提升科学知识生产和应用的责任意识，认为这种责任意识应是建立在道德基础之上的。学院联合会在科学和社会之间发挥桥梁作用，促进社会公众对科学技术问题的理解，鼓励科学与社会之间基于伙伴关系的对话。学院联合会开展与海外有关机构和国际组织的合作，进行科学和科学政策方面的学习和研究，通过提供科学援助支持研究工作，所参与的中长期科学研究项目，有瑞士历史大词典等。

三、瑞士创新政策的实施步骤

瑞士联邦政府创新政策的核心目标是：进一步巩固和加强瑞士的国际竞争力地位。为实现2013—2016年的创新政策目标，瑞士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实施步骤。

1. 继续增加资金投入。2013—2016年间，瑞士联邦用于教育、研究和创新的总支出约为260亿瑞郎，其分配比例如下：ETH^⑥系统95.8亿，瑞士国家科学基金37.2亿，职业教育和培训35.8亿，州立大学31亿，应用科学大学21.5亿，空间事务5.8亿，创新促进机构5.5亿，非大学研究机构3亿，与教育、研究和创新体系相关的国际合作2.4亿，瑞士艺术和科学研究院1.2亿，奖学金1亿，欧盟研究框架项目21.8亿，欧盟教育框架项目1.5亿。^⑦

2. 启动瑞士创新园建设。根据新的《研究和创新促进法》，瑞士的创新园建设，要超越狭隘的地域性观念，应服务于国家整体利益，保持国际竞争力、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可持续发展。瑞士创新园的目标是：通过提供良好环境和扩展潜力的空间，吸引国内外的

⑥ 瑞士高等技术学院及其研究机构。

⑦ www.sbf.admin.ch: Forderung von Bildung, Forschung und Innovation in den Jahren 2013—2016.

研究和发展投资，巩固和加强瑞士作为创新基地的国际领先地位。

2014年夏季，联邦政府批准了关于创新园的议案。

2015年5月，创新园基金设立，这是一个私人性质的伞状组织。该基金的工作任务是以国际视野经营创新园，负责贷款管理，协调各区点的关系，支持园区的网络化建设，推动园区的创新活动，关注园区的未来发展，也成为创新园和联邦政府之间的纽带。基金的核心任务是对创新园建设提供资金支持，并不直接做出任何关于各区点的决定。

创新园将于2016年开始运作。2014年已确定设两个中心区，分别设在苏黎世和洛桑联邦理工学院。另外建设三个网络基地，分别建在阿劳、西北部瑞士和比尔地区。其中比尔是2015年5月根据专家组建议增补的。关于创新园各个区点，是由各区点的赞助商（各州）负责的。联邦政府不直接参与创新园的经营，政府与赞助商之间的关系，通过协议加以规定。

依据《研究和创新促进法》，联邦政府的资金可以投入创新园。为支持创新园建设，联邦政府提出两项措施：（1）联邦担保：框架信贷3.5亿瑞郎，用于专项贷款的担保。担保对于专项贷款的期限和用途是有限定的。有了联邦担保，各区点的东道主，可以获得优惠贷款，用来投资研究基础设施建设。（2）土地使用：为支持创新园，联邦所有的土地将以建设权出租。土地租金须按照市场利率支付。关于联邦所有土地出租的问题，由联邦相关权力机构与东道州商量，签订协议。

3. 制定研究设施路线图。瑞士定期编制研究基础设施路线图，将其作为一个战略工具，即提供现有研究基础设施的目录，同时

确定未来重大的研究基础设施建设。近期，瑞士国家教育、研究和创新秘书处更新了研究基础设施路线图。从2013年10月到2014年1月，国家教育研究和创新秘书处和瑞士国家科学基金联合提案，申请重要的研究基础设施，由国家科学基金组织评估申请提案的科学质量，对未来的研究基础设施进行分类和排序。之后由国家教育、研究和创新秘书处协调，将排序好的基础设施项目分配给有关机构，包括ETH领域、州立大学、应用科学大学，加以进一步的评估，并确定2017—2020年预算期的资金额度。

4. 积极参与研发国际合作。长期以来，瑞士在教育、研究和创新领域一直具有开阔的国际视野，形成了很强的国际竞争力。瑞士的研发支出约占GDP的3%，约160亿瑞郎。按照研究人员平均发表论文数量、论文引用率、科学论文影响指数、专利申请占人口比例等指标衡量，瑞士目前在一些国际范围的研究和创新中居于领先地位。

瑞士创造的政治稳定、文化多元，学术自由、资金充裕、生活舒适的研究环境，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优秀人才。据统计^⑧，有25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获奖时为瑞士公民，另有29名诺贝尔奖获得者虽然不是瑞士籍人士，但在瑞士从事研究的时间超过5年。

1953年，瑞士参与欧洲核研究组织（CERN）等机构的国际合作项目。1987年，瑞士参与欧盟研究和技术开发框架计划，故此不断产出优秀成果。在项目申请和获得资金两方面，瑞士都处于领先地位。瑞士还参与了其他诸多欧洲核国际研究计划，如欧洲科研协调机构的项目、国际人类前沿科学计划项目等。联邦政府用于教育、研究和创新的经费中，国际合作项目大约占20%左右。为

⑧ 瑞士联邦政府教育及科学委员会：《瑞士的校园和科学园》。

促进教育、研究和创新，瑞士构建了覆盖全球的科学技术和高等教育网络，包括波士顿瑞士科学中心、上海瑞士科学中心等，以及部分瑞士驻外使馆的科技顾问处。瑞士还积极推动跨境双边研究合作，并优先选择德国、瑞典、丹麦、荷兰等欧洲国家作为创新合作伙伴。

5. 推动公共与私人部门的合作。瑞士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在研究领域的职责分工比较明确，并已实行多年。普通大学及研究机构主要从事基础性研究，私人部门和应用科学大学主要从事应用性研究。联邦政府通过国家科学基金为基础研究提供资助，联邦技术和创新委员会为企业和大学及研究机构之间的知识和技术转让提供资助。这种研究及资助方式的分工，根源于瑞士政治的分权化和自由经济体制的特征。

企业是瑞士创新活动的核心主体。在瑞士企业中，一批跨国公司在本行业领域名列前茅，享誉全球。2015年世界500强企业中，瑞士的雀巢公司、诺华公司、ABB公司等榜上有名。中小企业占总数90%以上，是瑞士经济中异常活跃、生机勃勃的骨干力量。技术创新是瑞士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战略。无论是驰骋世界各地的跨国集团，还是扎根本土的中小企业，都是技术创新的最主动的实践者和积极的推动者。

瑞士私营部门的研究充满活力。瑞士研发支出的2/3是由私营企业资助的。自2000年以来，每年的实际增长率达到18%。瑞士的医药行业的研发投入占私营研发投资的30%以上，机械和信息通信技术也是私营研发投资的重点行业。此外，瑞士私营部门的海外研发投入相当大，堪比其在国内的研发投入数额。

根据瑞士经济创新活动发展（1997—2012）的调查^⑨，2010—2012年，瑞士企业获得的官方资助中，产业占81.7%，其中高科技产业47.3%，传统产业34.4%；服务业占18.3%，其中现代服务业9.5%，传统服务业8.8%。来自公、私部门的持续研发投入，推动瑞士企业不断创新，培育出诸多驰名世界的商标和品牌。该调查显示，瑞士企业创新活动出现多样化趋势，不仅产品创新和过程创新持续发展，组织创新和市场营销的创新也日现其重要成效。

为进一步促进私营企业与公共研究机构的合作，瑞士联邦技术和创新委员会采取了一系列知识与技术转移的战略举措。2012年，瑞士联邦技术和创新委员会通过多级评估，选择一批需要研究创新的国家主题项目。2013年1月将8个主题项目（碳复合材料、设计理念创新、表面创新、生物技术、食品研究、林业创新、光子学和网络物流）发送给企业，并促进企业与大学及科研机构之间的合作。同时，为承接主题项目的企业聘请创新导师，指导和帮助企业，促进创新合作。国家主题网络的开通，为企业与大学和公共研究部门的互动交流，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搭建了平台。

四、瑞士创新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当前，我国正在大力推进创新驱动战略，瑞士的创新政策可供参考与借鉴。

1. 合理制定创新政策。创新与教育和研究紧密相连，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对于知识的生产、传播、扩散和运用发挥关键作用，教育和研究构成创新活动的基础。因此，创新政策应与教育、研究政策统一研究和制定，

^⑨ www.sbf.admin.ch: Die Entwicklung der Innovationsaktivitäten in der Schweizer Wirtschaft 1997—2012.

以形成一个完整的政策体系。我国可以统一制定和发布研究和创新政策，教育政策应与研究和创新政策相互对应和衔接，充分考虑到创新的实际要求、目前发展水平、未来趋势及前景。

2. 细化创新政策目标。对于创新政策的目标，既应确立提升国家竞争力、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保护资源和环境、促进社会和谐等宏大宗旨，也应包含机会平等、公平竞争、个人潜能发挥、个性发展、培养后代等微观要义，使创新政策不仅体现国家的政治主张，也反映人民的期望和要求，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从而更加得到广大群众的关注和拥护，亲身参与创新的实践活动。

3. 明确创新政策重点。所谓重点，是指国家创新政策所重点扶植和资助的对象。一方面，企业是创新的核心主体，要突出和提升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另一方面，大学和公共研究机构同样是创新的主体力量，也应给予高度重视。政府应特别加强企业与大学和公共研究机构之间的沟通和联系，推动先进科学技术的扩散和转移，进入市场化和产业化。瑞士政府的支持企业创新和资助大学

和公共研究机构研究、以及产学研结合方面已经做得相当成熟，我国相对还比较薄弱，需要大力加强。

4. 划清机构职责范围。这里的机构，是指创新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组织。创新政策一经制定，其贯彻和执行需要有相应的组织保证。各类创新政策制定、执行机构的职责范围需要明确划分和规定。为更好地履行推动创新的职责，瑞士联邦政府重视并开展了关于“职权范围研究”，瑞士《研究和创新促进法》第16条专门对联邦的职权范围研究做了规定。我国可以借鉴瑞士的做法，对有关创新促进的组织机构的职责范围进一步加以研究和确定。

5. 研究制定相关法律。我国目前尚未出台关于研究和创新促进方面的专门法律，可以借鉴瑞士的《研究和创新促进法》，开始探讨有关立法的宗旨目标、法律的框架结构、研究和创新的概念界定、研究机构、研究和创新促进机构的定义、政府关于研究和创新促进的责任及其职权范围等，进行相关立法的准备工作。

作者简介：任丁秋，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欧盟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李 微

【摘要】2015年1月，欧元区调和下滑至-0.6%，“通缩”风险迫在眉睫。欧央行终于采取行动，宣布从2015年3月开始进行每月600亿欧元、整体规模超过1.14万亿且至少推行至2016年9月份的购债计划，正式开启“欧版量化宽松”之路。至今，欧版量宽已经实施半年，其短期成效开始显现，欧元区经济缓慢恢复增长，失业率有所下降，通胀率也有回落趋势。但从中长期来看，欧版量宽本身存在不少隐忧，且单一量宽政策无法弥补欧元区经济结构上存在的问题，结构性改革才是治本之策。

【关键词】欧洲央行 量化宽松 通胀预期 结构性改革

2015年1月22日，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宣布，将从2015年3月份开始，进行每月600亿欧元的购债计划，这项计划以“保障物价水平稳定，使欧元区中长期通胀率恢复到低于、但接近于2%的水平”为目标，将至少推行至2016年9月份，购买超过1.14万亿欧元的政府债券及私人债券^①，并因此正式开启“欧版量宽”进程。

欧央行此举可谓“千呼万唤始出来”。从2012年9月，美国开始推行第三轮量宽政策时，欧央行就有效仿美国推出欧版量宽的声音，但最终未能施行^②。而2013年以来，欧元区通胀率持续低于2%，2014年9月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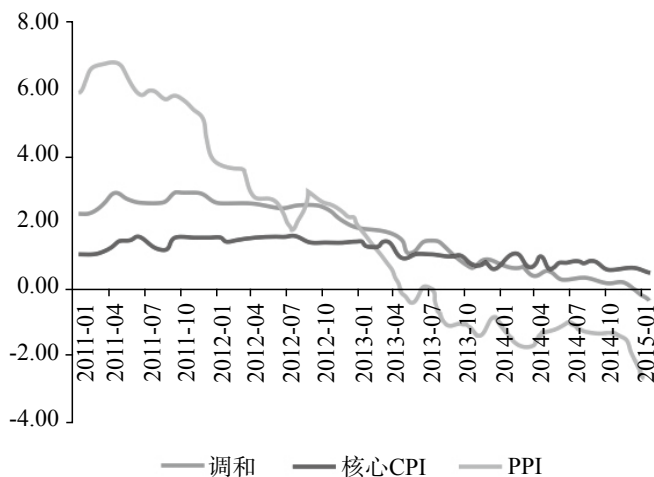
调和消费者物价指数（HICP）甚至只上升了0.3%，创2009年10月以来最小增幅。随着欧元区即将陷入“通缩泥潭”的担忧甚嚣尘上，市场对于欧央行采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但直至2014年底，欧央行也只采用了负利率、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TLTRO）、资产抵押证券（ABS）和资产担保债券（CB）购买计划等“非常规性货币手段”及“类量化宽松货币政策”。2014年12月，欧元区调和CPI同比出现负增长，为-0.2%；2015年1月，这一数据进一步下滑至-0.6%。尽管剔除能源和非加工食品的核心CPI波动幅度较小，但也降至历史低位^③。（见表1）

① 欧央行官方网站：http://www.ecb.europa.eu/press/pr/date/2015/html/pr150122_1.de.html，2015年1月22日。

② 陈坤：《欧洲量宽政策只能解燃眉之急》，载《法制日报》，2015年1月29日，第010版。

③ 徐秀军：《量化宽松能否拯救欧元区》，载《当代金融家》，2015年，第3期，第102页。

表 1：2011.1—2015.1 欧元区 CPI 与 PPI 月度同比增长率变化情况（单位：%）



资料来源：徐秀军：《量化宽松能否拯救欧元区》，载《当代金融家》，2015年，第3期，第102页。

在上述情况下，欧洲央行最终推出“欧版量宽”，实属用尽所有手段之后，无奈之下打出的“最后一张牌”。这张牌虽然在意料之中，但与之前市场普遍预测的5000—6000亿QE购债计划相比，其规模超出1倍。可见，德拉吉对欧版QE寄予重望，希望通过这最后的王牌重振欧元区经济，恢复物价水平，降低失业率。到目前为止，量宽政策已经实施了半年。而德拉吉在2015年9月3日表示，将为重振景气“做出一切尝试”：欧央行的量宽政策是“弹性”的，必要时“可以延长、也可以加码”。^④

“欧版量宽”出台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它具有怎样的“欧洲特征”？它能否达到欧央行的预定目标？从中长期而言，它将对欧洲乃至世界经济起到怎样的作用？本文将从实

施的背景和原因、实施方式、实施效果、前景预测等几方面出发，对此次欧央行量化宽松政策进行分析。

一、欧版量宽的实施背景及方式

1. 实施背景：

1) 欧元区经济增长乏力、即将陷入通缩泥潭、失业率高企不下

欧央行推出量宽之路经历了重重困难。由于其继承了德国央行的衣钵，一直以维护物价指数稳定为首要政策目标，且购债行为从法律上而言违背了《里斯本条约》中的第123及125条规定^⑤。虽然2012年2月2日通过的《建立欧洲稳定机制条约》为欧央行购买成员国债券开了绿灯，但从严格意义上

④ Draghi bereit zur mehr QE: Was heißt das für Anleger: <http://www.manager-magazin.de/finanzen/artikel/marken-partner-deutsche-bank-draghi-bereit-zu-mehr-qe-was-heisst-das-fuer-anleger-a-1051384.html>, letzter Zugriff am 04.09.2015.

⑤ 即所谓的“不救助条款”。按照这两条规定，欧洲央行不得向陷入主权债务危机的成员国政府提供贷款，也不能为其债务提供担保或承担责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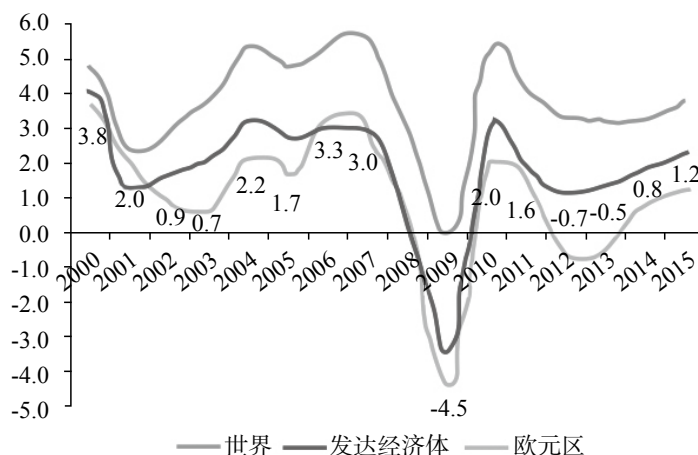
来说，还是打的擦边球。再加上欧元区核心国家德国对量宽政策一直持反对态度，因此，虽然从2014年开始，欧央行推出量宽政策的声音就不绝于耳，但最终宣布却拖到了2015年初。这充分说明，欧版量宽实属“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就连发出反对声音最强烈的德国，在欧洲法院裁决欧洲央行量宽政策合法时，也称这与柏林当局的观点一致。^⑥

2014年以来，欧元区经济增长乏力，通胀率进入负值区域。虽然自2013年第二季度的-1.8%的负增长率之后，2014年欧元区经济有所反弹，但仍在低位徘徊。2014年欧

元区经济增长率为1.1%，与同期世界经济整体增速及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速均有一定差距（表2）。此外，2014年12月，欧元区通胀率下降至-0.2%，2015年1月更是跌至-0.6%。“通缩”危险近在眼前。

与此同时，2014年12月，欧元区失业率达11.4%，同期美国失业率为5.6%。希腊2014年10月的失业率高达25.8%，法国失业率也在10%以上^⑦。更为严重的是，失业问题已由经济领域向社会领域传染，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成为欧洲的重大挑战。^⑧

表2：2000—2015年欧元区经济增长率变化情况（单位%）



来源：徐秀军：《量化宽松能否拯救欧元区》，载《当代金融家》，2015年，第3期，第102页。

2) 欧央行用尽各种常规及非常规货币手段，却收效甚微

2014年6月11日，欧央行的隔夜存款利率首次出现负值，以期鼓励银行释放资金，

拉动信贷，同时通过通胀预期拉高人们的消费和投资欲望。但从8月份的数据可以看出，“该复苏计划并未起到作用”^⑨。因此，从9月开始，欧央行再次降息，并宣布开始定向

⑥ 陈坤：《欧洲量宽政策只能解燃眉之急》，载《法制日报》，2015年1月29日，第010版。
 ⑦ 范佳奕：《浅析欧洲量化宽松政策》，载《财经界（学术版）》，2015年，第9期，第32页。
 ⑧ 郑联盛：《欧元区量化宽松政策面临的问题与影响》，载《经济纵横》，2015年，第4期，第88页。
 ⑨ Draghi, Mario: Introductory Statement to the press conference (with Q & A), www.ecb.europa.eu/press/pressconf/2014/html/is140904.en.html, 09. 04 2014.

长期再融资操作，首次注入资金 826 亿欧元。10 月 2 日，德拉吉再次“出击”，公布了购置资产抵押证券和资产担保债券的细节。这是非常具有“量宽”特色的举措，尤其是对 ABS 的购买计划，被德意志银行分析师称为“私有领域 QE”。^⑩

在上述“组合拳”出击下，欧洲央行曾经信心满满，认为 2014 年欧元区年度调和消费者物价指数将达到 0.6%，2015 年达到 1.4%，2016 年则上升至 1.6%。但 2015 年初，该指数却下降到了 -0.6%，与欧央行的期望背道而驰。因此，欧央行最终在 2015 年 1 月宣布推出真正意义上的欧版量宽，实属“最后一搏”。

3) 政治风险加大，“离欧”“疑欧”情绪高涨

欧央行选在 2015 年 1 月 22 日正式宣布推出欧版量宽，也具有一定的政治考量。从 2014 年 5 月欧洲议会大选中民族主义政党的胜利（席位从上一届的 50 席大增至近 150 席）就可以明显看出，欧元区“疑欧”情绪正在加码，紧缩政策得不到民众的欢心，导致欧元区国家，尤其是重债国家离欧倾向加剧，1 月 25 日举行的希腊大选结果也是该倾向的明证。欧洲一体化进程由于希腊左翼联盟的胜出而遭受重大挫折，因此，量宽政策的出台和实施，具有相当深远和积极的政治意义^⑪。此外，以乌克兰危机为代表的欧洲地缘政治风险加剧，北非地区也持续动荡，中东地区极端主义势力兴起，激化了社会矛盾。在这个时机，欧央行宣布量化宽松政策的出台，有效地传达了一种信号，一种欧洲一体、对抗危机的信号。

2. 实施方式

根据欧央行 1 月 22 日宣布的量宽计划，从 2015 年 3 月起，欧洲央行将从二级市场上每月购买 600 亿欧元的债券，这其中包括之前的 ABS 和 CB 购债计划份额。新扩大的购债对象包括欧元区各国政府、机构及欧洲机构所发行的债券。该计划至少实施至 2016 年 9 月，但最终通胀率要达到低于、但接近于 2% 为政策执行目标。

从购买债券的对象和规模来看，欧版量宽与美联储之前的量宽政策有异曲同工之处，但从执行方式和责任分配途径来看，却具有鲜明的欧元区特征。首先，此次购债由欧洲央行和欧元区成员国央行共同承担，购买份额根据各成员国央行在欧洲央行的资本比例进行分配；其次，20% 的债券（8% 由欧央行购买，12% 由成员国央行购买）风险由欧元区共担，其他 80% 的债券风险由成员国央行自行承担；最后，可购债券评级不得低于 BBB-，且购买单一国债券不得超过发行总量的 33%。^⑫

欧央行购债计划之所以如此复杂，是由于欧元区的超国家性质导致，是必要的。但也正因为这样模糊的执行方式，可能导致市场对欧央行希望传达的信号产生困惑，削弱通胀预期心理作用。

二、欧版量宽的影响分析

1. 欧版量宽取得的成效

在宣布正式推行量化宽松政策的记者会上，德拉吉显得相当乐观。他指出，量宽政

^⑩ 德意志银行于 9 月 5 日发布的研究报告：Deutsche Bank Research: The House View—Fragile Equilibrium, 2014 年 9 月 5 日。

^⑪ 丁纯：《欧版量宽政策并非单纯利好》，载《文汇报》，2015 年 3 月 16 日，第 006 版。

^⑫ 王朔：《欧元区当前的经济困境及未来趋势》，载《现代国际关系》，2015 年，第 4 期，第 54 页。

策的效果将会通过三大渠道传至实体经济，即“投资组合重整平衡效应”、“讯号效应”及“货币政策效应”。^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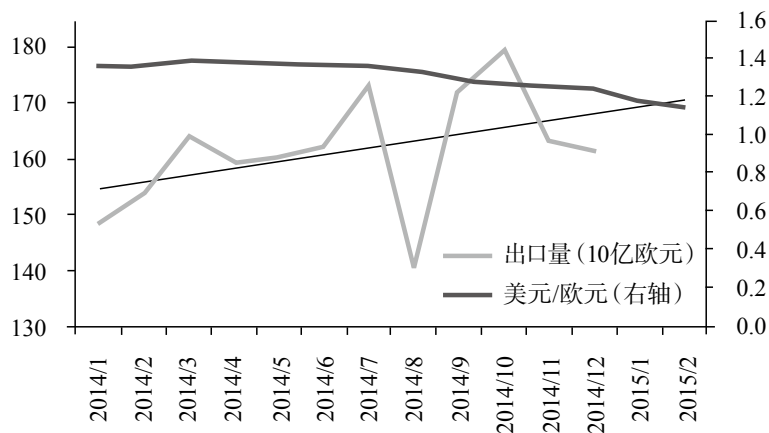
这三大“效应”具有一定的理论及实践基础。首先，欧央行希望通过收购国债，一方面释放现金流动性，另一方面压低国债收益率，以期原本的国债持有者将资金转移出来，投放至资本市场或者实体经济，从而拉动投资和消费，提升经济；其次，通过量宽政策，欧央行释放了一种信号，即欧央行决心提升通胀水平，以期提高通胀预期，扩大消费需求；最后，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欧央行希望营造出有利于投资的市场环境，降低主导利率和企业贷款利率，提振欧元区投资者信心。与此同时，还可促进欧元贬值，一方面扩大出口，另一方面吸引国外资金进入欧洲市场进行“抄底”。

短期来看，欧版量宽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经济提振作用。2015年一季度，欧元区GDP环比增长0.4%，失业率从2014年12月份的11.4%下降至2015年5月份的11.1%。通胀率也从2015年1月的-0.6%上升至5月份的0.3%，脱离负通胀区域。2015年初以来，欧盟与欧元区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和经济景气指数均稳步上升，其中，消费者信心指数已达到危机前水平^⑭。

股市和债券利率方面，在德拉吉宣布欧版QE面世之后，DAX指数立刻升至历史高点。欧元区成员国国债收益率纷纷降低；公司债券方面，雀巢的四年起欧元债券收益率已经变为负数^⑮。

此外，量宽造成的欧元贬值对出口的促进作用也已经显现（见表3）。

表3：欧元汇率与欧元区出口量



来源：陆晓明：《欧元区与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特征、效果及影响比较分析》，载《国际金融研究》，2015年，第4期，第49页。

⑬ 王彭：《欧洲版量宽：债券负收益将带来冲击》，载《商》，2015年，第11期，第9页。

⑭ 财政部亚太中心：《欧央行新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前景如何》，载《中国财经报》，2015年7月4日，第006版。

⑮ 王彭：《欧洲版量宽：债券负收益将带来冲击》，载《商》，2015年，第11期，第9页。

长期来看，欧版量宽将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还无法形成最终定论，但目前可以肯定的是，该轮量宽政策令欧央行基本完成了准最后贷款人的身份，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向统一的财政政策靠拢，推进了一体化的深化^⑩。

2. 欧版量宽中存在的问题

1) 推出时机太晚，规模有限

欧版量宽经历了重重困难，至2015年1月才姗姗来迟。其推出的时机是多被诟病的重要一点，理由包括：

(1) 2014年10月，美联储宣布退出量宽政策。美国与德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的息差目前已攀升至150个基点左右^⑪。此外，与美联储当时实施QE政策正处于全球利率下沉阶段，相反受美国退出量宽政策影响，全球利率水平正逐渐上扬，而欧元区国债的最大持有者是外国实体和个人，这部分被释放出的现金是否会留在欧洲，还是会流向外国市场，抑或回流至美国市场，实属未知。

(2) 欧版量宽的一大政策目的在于压低国债收益率，释放资金流动性，以支持实体经济。但事实上，在欧版QE正式推出之前，欧元区成员国（除希腊外）国债收益率本来就已经很低，例如德、西、意、法四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分别仅为0.45%、1.53%、1.75%和0.65%^⑫。即使能够再压低，其操作空间也非常有限。

(3) 全球大宗消费品价格进入熊市。石油价格持续走低，对于欧元区价格指数会带来消极影响，尽管这并不是结构性问题，但对于目前推出量宽政策、希望看到成效，以促进市场信心的欧元区来说，并不是利好消息。

(4) 推出前拉锯时间过长，政策实施进程缓慢，市场对欧央行的执行力信心已大打折扣，且前期“准量化宽松政策”实施并未得到预期效果，影响市场信心及通胀预期心理的形成。

(5) 从购债规模而言，虽然每月600亿的购债金额已经高于市场预期，但比起美联储QE3的850亿美元仍显不足。此外，欧洲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扩张幅度极为保守，此次购债也仅将负债表规模扩张到3万亿欧元左右，达到2012年初水平，大大低于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扩张程度。

(6) 一些学者认为，此时推出QE，会造成一些国家进行经济整顿的动力下降，不愿继续财政紧缩，从而延迟必要的结构性改革，直到最终人们意识到，量化宽松也不能拯救欧元区时，才会重新展开改革，而到那时，经济情况已经进一步恶化。

二元结构矛盾依然存在

(1) 货币政策应当有财政政策的配合和支持，才能发挥最大作用。但欧元区一直以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分离的局面并未改变，且欧元区成员国在德国的强力要求下，多实施整固财政政策，以降低负债比例，这与欧央行的宽松货币政策背道而驰。

(2) 欧元区内部不平衡，存在明显的“南弱北强”。而此次QE的实施方式将加大这种不平衡。欧央行要求各成员国央行根据资产占比的方式分配购债，且要求被购债券评级达到BBB-，这样，像希腊这种重债国的国家债券就被排除在购买对象之外，释放资金大部分流向经济情况相对较好的欧元区成员国。

^⑩ 丁纯：《欧版量宽政策并非单纯利好》，载《文汇报》，2015年3月16日，第006版。

^⑪ 宁留甫：《欧版量宽的疗效》，载《中国外汇》，2015年2月1日，第20页。

^⑫ Dirk Ehnts: Quantitative Easing der EZB: Worum geht es? unter <http://www.oekonomenstimme.org/artikel/2015/01/quantitative-easing-der-ezb-worum-geht-es/> 22. 01. 2015.

货币传导机制能否真正发挥作用

QE 并不是创造货币供给而是创造基础货币——银行准备金或央行负债。如果要实现 QE 预定目标，需将基础货币转化为货币供给，而这需要银行有贷款动力和能力，也需要市场有借贷需求^{①9}。

(1) 欧元区的企业融资和居民投资结构属于莱茵模式，即更加依赖银行的间接融资^{②0}，银行信贷在欧元区全部社会融资中占比高达 70%，而证券占比在 2014 年不足 20%^{②1}。因此，欧版量化宽松政策主要寄望于信贷市场而非资本市场。欧央行如果希望量宽政策发挥作用，必须希望货币传导机制通过信贷市场实现。但欧元区存在严重的银行“惜贷”情况。之前的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结果就显示，欧洲银行接受低息贷款并转向私人投资领域的动力严重不足，最终效果不佳。这一来是因为欧洲银行还处在去杠杆的过程之中，盈利能力低下，二来是在欧元区单一监管机制的施压下，欧洲银行必须强化自身资产负债表质量，减少贷款发放也是必要之举了^{②2}。

因此，银行新获得的现金流会否释放至私人投资或消费部门，目前依然是个未知数，且从欧洲银行在央行隔夜存款利率为负值的情况下依然将钱存入央行的前车之鉴看来，前景并不乐观。

(2) 与美国不同，欧洲债券市场并不发达，且欧央行的购债计划中，要求购买 BBB- 评级以上的债券，因此，投资者可能并不愿意出售像这样高质量的债券。2015 年第一季度，已有 25% 的欧元区政府债券出现负收益率，也说明了这一困境。因此，欧央行的购债目标份额能否完成也需要等待时间的证明。

(3) 在这一轮的欧版量宽政策中，针对公司债券和 ABS 的购买是直接向实体经济注资、促进关键市场增长的重要手段。但这项购债规模仅占整体 QE 的 20%，力度尚嫌不够^{②3}。

(4) 欧央行所购买的私人部门 / 公司债券原本就属于储蓄性质，即使其持有者由于利率被压低而出售这类债券，也不一定使用得到的资金进行消费或者投资，而有可能寻求其他的储蓄方式。从欧元区前数年的经验来看，财富的增多并未导致需求的上升^{②4}，庇古效应（财富消费效应）之前没有生效，此次 QE 也不一定会使之生效。此外，从投资层面而言，自从 2011—2012 年的长期再融资操作开始，欧元区的货币基数就已经增大，但私人部门的信贷量却并未增长^{②5}，这是因为公司对市场的信心不足，不愿扩大生产。可以说，欧元区的问题关键并不在于流动性不足，而是需求不足，企业投资信心不振，贷款意愿较低。这是结构上的问题，单靠货币政策

①9 陆晓明：《欧元区与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特征、效果及影响比较分析》，载《国际金融研究》，2015年，第4期，第45页。

②0 宁留甫：《欧版量宽的疗效》，载《中国外汇》，2015年2月1日，第22页。

②1 同上，第46页。

②2 宁留甫：《欧版量宽的疗效》，载《中国外汇》，2015年2月1日，第22页。

②3 陆晓明：《欧元区与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特征、效果及影响比较分析》，载《国际金融研究》，2015年，第4期，第49页。

②4 Dirk Ehnts: Quantitative Easing der EZB: Worum geht es? unter <http://www.oekonomenstimme.org/artikel/2015/01/quantitative-easing-der-ezb-worum-geht-es/> 22. 01. 2015.

②5 Ebenda.

无法解决^{②6}。

(5) 根据美国和日本的实践, 通胀预期效应在量宽政策初推出时, 能够产生较大影响。但之后第二轮、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在提升通胀方面的边际效用便迅速衰减^{②7}。欧元区由于量宽推出时间较晚, 已经成为“老生常谈”, 失去新鲜感, 且之前的类量化宽松政策开展过于谨慎, 其对通胀预期的提升效果可能更是要大打折扣。此外, 欧元区成员国政府普遍实施的紧固财政政策也将加剧人们对增加投资和消费的疑虑。

三、欧版量宽的前景预测

1. 量宽还将继续延长、加码

如上文所述, 2015年9月3日, 德拉吉表示, 将为重振景气“做出一切尝试”: 欧央行的量宽政策是“弹性”的, 必要时“可以延长、也可以加码”^{②8}。事实也确实如此。2015年5月份, 欧央行已经加大了资产购买的力度, 当月购买了631亿欧元的公共和私人债务。欧央行还表示, 其5月购买的政府和机构债券规模达516亿欧元, 总购买量升至1467亿欧元; 担保债券购买量也上升100亿欧元, 至851亿欧元^{②9}。此外, 就美国(6年QE, 资产负债表从9千亿美元扩张到4万

5千亿美元^{③0}) 和日本(10年QE, 还在继续)的经验看来, 欧央行原本预期的2016年9月的QE退出时间难以实现。

2. 短期提振经济, 长期还需结构性改革

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 欧元区的经济增长乏力、通胀率维持低位、失业率居高不下等情况从根源上而言, 应是欧元区经济结构问题。要彻底进行改革, 提升生产效率, 提高产品竞争力, 扩大居民内需, 才能真正解决问题。靠单一货币政策难以达到最终的成效。但与此同时, QE对于提升货币量, 加大信贷, 短期内增长通胀预期, 刺激投资和消费, 促进欧元贬值以扩大出口等, 也会起到一定作用。因此, 中短期内的欧元区经济应往利好方向发展。

3. 欧元区QE的外溢效应

对全球经济而言, 欧央行此次推出QE, 正好在美国退出QE之后, 将起到一定的对冲作用。此外, 欧元区经济利好有利于全球经济的发展。但与此同时, 两大经济实体先后退出QE和推出QE, 可能会导致全球资本市场的无序发展和波动趋势。

欧版量宽对中国经济的直接影响相对有限。但中欧贸易关系频繁, 因此将会影响中

②6 国内外多名学者均持这种观点, 例如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所副所长刘明礼(参见《量化宽松独木难支 结构性改革势在必行》, 载《人民日报》, 2015年1月29日第023版)、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经济学教授贝尔特拉姆·舍福尔德(参见《欧版量宽一出 世界平添变数》, 载《新华每日电讯》, 2015年1月24日第003版)等。

②7 宁留甫:《欧版量宽的疗效》, 载《中国外汇》, 2015年2月1日, 第22页。

②8 Draghi bereit zur mehr QE: Was heißt das für Anleger: <http://www.manager-magazin.de/finanzen/artikel/marken-partner-deutsche-bank-draghi-bereit-zu-mehr-qe-was-heisst-das-fuer-anleger-a-1051384.html>, letzter Zugriff am 04.09.2015.

②9 张枕河:《德拉吉力挺QE 欧元难迎反弹》, 载《中国证券报》, 2015年6月4日, 第A04版。

③0 Draghis Milliardenenspiel, unter <http://www.zeit.de/wirtschaft/2015-01/ezb-fed-euro-krise-konjunktur>, 07. 01. 2015.

国经济的外部环境。此外，从汇率角度来看，欧版量宽将推高美元走势，可能会使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形成下行压力。同时人民币兑欧元将升值，可能会影响中国对欧洲的出口。与此同时，欧洲经济复苏乏力造成欧洲资产被低估，融资成本较低，吸引我国企业和投资者登陆欧洲进行投资。截至2015年3月，

包括国家电网、中船、宝钢在内的国企和一些民企在欧洲的发债融资规模已经超过2014年全年^①。

总体而言，欧元区QE的推出对全球和我国的外溢效应比美联储QE外溢效果应要低得多，且从整体和长期来说是利好的。

作者简介：李微，北京科技大学讲师，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博士研究生。

① 丁纯：《欧版量宽政策并非单纯利好》，载《文汇报》，2015年3月16日，第006版。

乌克兰危机对德国经济的影响

刘惠宇

【摘要】自乌克兰危机全面爆发以来，在美国的压力下，欧盟对俄罗斯实施了多轮制裁。然而，制裁是把双刃剑，不仅破坏了欧陆安全环境，也使与俄经济联系紧密的欧盟国家蒙受了不小的经济损失。德国与俄罗斯经贸关系十分密切，是俄罗斯第三大贸易伙伴，俄罗斯主要投资来源国之一，也是俄罗斯最大工业品进口国。与其他欧盟成员国相比，乌克兰危机和对俄经济制裁给德国经济带来的伤害最大。本文在梳理欧美对俄制裁措施及俄罗斯的反制裁措施的基础上，具体分析乌克兰危机及逐步升级的对俄经济制裁措施对2014德国经济的影响；并结合欧盟各成员国对制裁态度存在分歧的最新形势，阐述目前欧盟，尤其是德国、美国及俄罗斯的现状和利益出发点，从而对危机的发展趋势进行展望。

【关键词】乌克兰危机 对俄经济制裁 德国经济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欧美联手制裁俄罗斯，且制裁措施不断升级。尽管俄罗斯自然资源丰富，经济的对外依赖程度较低，但欧美的制裁仍对俄罗斯经济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俄罗斯卢布大幅贬值，外资出逃严重，投资环境进一步恶化。国际油价的连续下降已经使得俄罗斯的对外贸易结构出现显著变化。特别是马航事件发生后，欧美新一轮制裁对俄罗斯经济影响更为明显，俄罗斯的经济几近崩溃。

欧美制裁俄罗斯不仅严重打击了俄罗斯的经济，也使得与俄罗斯经济关系十分密切的欧盟遭受了严重的影响。欧盟是俄第一大

贸易伙伴，欧盟严重依赖俄罗斯能源供应，而俄罗斯国内工业生产能力不足，大量从欧盟进口工业制成品。对俄实施经济制裁措施的负效应已经显现，与俄经济联系非常密切的欧盟等国的经济已经蒙受巨大损失，欧元区经济复苏进程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美国是乌克兰危机事件的最大受益者。尽管美国出台对俄的制裁措施后，俄罗斯针锋相对地出台了部分反制裁措施，但从这些制裁措施效果看，对美国经济实质性影响很小。俄美两国经济联系远远小于欧俄之间。俄罗斯在能源上几乎难以对美国形成掣肘。美国协同欧盟对俄进行制裁，欧盟承担了相

当大的经济损失和风险，美国却成为这一事件中最大受益方。

德国是俄罗斯的最大工业品进口国。德国企业在俄投资规模很大，至今共计 6200 家德国企业在俄罗斯投资了 200 多亿美元，比其他欧盟国家在俄企业的总和还要多。德国约有 30 万个工作岗位直接依赖对俄出口。逐渐显现的制裁负效应已经对德国经济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一、美国及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

2014 年，克里米亚问题爆发后，欧美发起对俄罗斯的制裁。3 月，美国冻结了 11 名俄罗斯官员在美国的资产，并把为受制裁人士服务的俄罗斯银行列入制裁名单。欧盟则对 21 名俄罗斯和乌克兰人实施制裁，拒绝为其发放签证，并冻结其境外资产。

随着俄乌局势恶化，欧美和俄罗斯围绕乌克兰危机展开博弈也愈发激烈。但在马航事件发生前，欧美制裁仍局限在特定个人或组织，只是在制裁范围和力度上有所增加。4 月底，美国宣布对俄罗斯实施进一步制裁。制裁对象包括 7 名俄罗斯官员和 17 家与俄政府关系密切的俄罗斯企业，并拒绝向俄罗斯出口有军事用途的高科技产品。同期，欧盟也增加了制裁人员名单，对俄制裁人数增至 46 人。

马航空难发生后，欧美对俄制裁进一步升级，新一轮制裁以打击俄罗斯经济为主要目标，主要涉及金融、军事和能源行业。7 月 29 日，欧盟各成员国外长齐聚布鲁塞尔，商讨对俄罗斯进行新的经济制裁，内容主要有：禁止

欧盟成员国与俄进行武器贸易，停止向俄石油产业提供高科技设备，限制俄国银行进入欧盟市场融资。8 月 1 日，欧盟宣布对俄罗斯新一轮的经济制裁正式生效。此轮制裁主要是欧盟禁止俄罗斯进入欧洲资本市场，因为这是俄政府拥有 50% 股份的俄罗斯大银行参与欧洲金融活动的重要机会。仅仅 2004 年至 2013 年间，俄罗斯公司已经拥有总额达 480 亿美元的资产，其中 164 亿是由政府和金融机构提供的，2013 年俄罗斯发行债券的 47% 是投向欧洲市场。欧盟同时还对俄实行武器禁运。在“欧盟军事清单”中包含的产品都列为禁运范围。此项禁令从生效之日起开始执行，但有两个例外，一是不适用于该决定生效之前签署的合同，二是不包括维护现有军备所需产品（维修、零配件供应等）。^①

2014 年 9 月 12 日欧盟对俄新一轮制裁进入实施阶段。最新一轮制裁措施加强了对俄罗斯进入欧盟资本市场的限制，限制石油、银行在欧盟境内贷款和融资；在深水石油开发、北极石油勘探、俄罗斯页岩油项目上，欧盟不再提供有关钻探、试井、测井等服务；扩大了对飞机、直升机和坦克等军备或军民两用技术的出口禁令；此外，还有 24 名自然人被欧盟列入“黑名单”，禁止他们入境欧盟并冻结其在欧盟的资产。^②

二、俄罗斯对美国及欧盟的反制裁措施

面对欧美的制裁措施，俄罗斯表现出强硬态度，采取了多种针锋相对的反制裁措施。2014 年 3 月 4 日，俄罗斯曾称，如果美国因

① 参见《欧盟公布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乌克兰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http://ua.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408/20140800683219.shtml>，2014-08-01。

② 参见《欧盟开启新一轮对俄制裁》，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德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http://de.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409/20140900729613.shtml>，2014-09-01。

乌克兰问题对俄进行制裁，莫斯科或被迫放弃美元作为储备货币，拒绝偿还对美国银行的任何贷款；如果美国冻结俄罗斯公司和个人账户，俄罗斯或建议所有投资者清空美国国债。然而，受限于经济实力，俄罗斯的反击目前主要集中在技术领域。针对美国4月宣布的拒绝对俄罗斯发放有军事用途的高科技产品的出口许可证，俄罗斯从国际空间站、美国卫星定位系统、火箭发动机等三个项目上进行了反击。俄罗斯宣布将拒绝美国在2020年以后继续使用国际太空站，有可能暂停对美国RD-180和NK-33火箭发动机的供应，并决定自6月1日起，俄罗斯境内的11个美国GPS信号站将暂停运行。

马航事件后，欧美加强了对俄罗斯经济制裁。在欧美7月29日宣布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措施后，作为回应，俄罗斯在7月31日宣布，俄对波兰的大部分水果和蔬菜实施进口禁令，并表示可能将禁令的范围扩大到整个欧盟。波兰是世界上最大苹果出口国，超过2/3的苹果出口至俄罗斯。根据波兰官方统计，2013年波兰向俄罗斯出口的苹果价值达2.73亿欧元。这一措施对波兰的农业出口将产生重大影响。

此后，俄罗斯陆续对产自欧美的食品和农林渔等产品实施反制裁。8月6日，俄罗斯对欧美制裁进行了全面反击。在食品贸易上，俄罗斯进一步扩大了食品进口禁令范围，宣布禁止从美国、欧洲、加拿大和挪威进口水果、蔬菜、肉类、鱼、牛奶和乳制品。据统计，俄罗斯每年从欧盟进口20亿欧元的水果和蔬菜，从美国进口价值约10亿欧元的食品和农产品。俄罗斯的出口禁令对欧美的农副

产品出口造成了一定影响。在金融上，俄罗斯正加快建立本国独立支付系统，并着手用其他货币代替美元进行资金交易，希望借此减少对欧美金融体系的依赖。在航空上，俄罗斯宣布禁止乌克兰的航空公司航班飞经俄罗斯领空，并考虑禁止欧盟和美国的航空公司航班飞经俄罗斯领空。欧洲和亚洲国家间的最短航线途经西伯利亚。俄罗斯如果禁止欧盟航班经过俄罗斯领空，欧盟的航空公司将不得不绕道其他国家，这将极大地推高欧盟航空公司的成本，预计欧盟航空业将因此损失数十亿欧元。

9月12日，针对欧盟的最新制裁措施，俄罗斯回应业已准备好反制裁措施，将从西方国家的日用消费品及二手车入手进行反击。^③12月1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停止经乌克兰通往欧洲中部和南部的“南溪”管道建设项目，考虑改道土耳其。^④12月4日，普京在国情咨文中说，美国总能找到制裁俄罗斯的借口。这是普京总统任期内第11次发表国情咨文，文中向西方发出了相当强硬的声音。

从总体看，俄罗斯的反制措施所涉及的行业与欧美制裁俄罗斯的行业相比，数量少、含金量略低，难以在贸易和投资上对欧盟形成掣肘，经济层面的较量呈现出欧美强、俄罗斯弱的对峙格局。

三、乌克兰危机对德国经济的影响

与其他欧盟国家相比，乌克兰危机和对俄经济制裁给德国带来的伤害最大。德国与俄罗斯贸易额最大，合作领域包括能源、农业合作、机械设备进出口等。德国是俄罗斯

^③ 参见《欧盟开启新一轮对俄制裁》，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德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 <http://de.mofcom.gov.cn/article/jmwxw/201409/20140900729613.shtml>, 2014-09-01。

^④ 参见《这个冬天，俄罗斯感到有点“冷”》，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14年12月06日，第03版。

主要投资来源国之一，是俄罗斯第三大贸易伙伴，2013年两国外贸总额达到765亿欧元，其中俄罗斯向德国的出口额占405亿欧元，比德国向俄罗斯出口额360亿欧元稍高。但德国有将近四成的原油及天然气来自俄罗斯，造成该国在能源领域对俄罗斯的依赖。欧盟天然气工业协会的统计数据显示，德国2013年从俄罗斯进口的天然气占其年消费总量的37%，进口量在欧盟国家中排第一。此外，2013年欧盟出口俄罗斯的货物达1200亿欧元，近1/3来自德国，这些商品中有很多遭到制裁措施的限制，因为大量来自德国的制造业产品都可以被用于防务和能源行业。德国商会公布的数据还显示，德国有6000余家企业在俄经营，比其他欧盟国家在俄企业的总和还要多，约有30万个工作岗位直接依赖对俄出口。

1. 德国2014年第二季度经济状况

德国经济在2014年第二季度已经遭遇严重冲击。德国联邦统计局2014年8月14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外贸和投资拖累，德国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滑0.2%，为2013年第一季度以来德国经济首次萎缩。此外，8月25日发布的8月份德国Ifo商业信心指数从上月的108下滑至106.3，创13个月以来最低水平。

德国金融市场也受到影响。自美欧7月对俄罗斯制裁升级后，德国法兰克福股市DAX指数由9859.27点持续下跌至目前的9069.47点，吐出年内全部涨幅。而分析人士担忧9000点大关面临失守，三年来由6000点一路飙升至万点以上的德国股市或将转入下行行情。

德国2014年6月国内资本商品订单月率下滑4.6%，德意志银行分析师斯特凡·施耐德认为，这主要受到乌克兰地区冲突影响，并预计资本市场投资者情绪将在未来继续受

此打压。

在实体经济领域，2014年8月出炉的德国工业生产和订单等数据令人失望。尽管德国6月工业产出环比增长0.1%，但整个二季度却下降了1%，尤其是具有指标意义的机械设备生产已连续4个月下滑。同时，6月德国工业订单环比下降3.2%，创下2011年9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德国建筑生产也在年初强势增长后回落。

从微观来看，东欧地区局势不稳的确给一些德国企业造成明显冲击。德国批发和出口协会(BGA)也在2014年8月发出警告称，俄罗斯的食品进口禁令尤其将对德国加工食品企业产生影响。

更令人担忧的是地区局势对德国出口的影响。尽管德国对俄罗斯出口只占其总出口额不到3%，但分析人士担忧地缘冲突风险增加将削弱国际贸易，进而影响到以出口为支撑的德国经济。德意志银行在其8月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中称，当前德国货物装载量已同比下滑15%，预计全年下滑20%~25%，从而影响出口并拖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约0.25个百分点。

俄罗斯是德国运动品牌阿迪达斯的主要市场。受制裁影响，该公司在2014年下半年下调了利润预期，理由是俄罗斯市场疲软，2014年其股票已下跌近40%。

德国军工股莱茵金属表示，俄罗斯制裁将给公司2014年业绩带来负面影响，德国政府取消了该公司与俄罗斯的一笔大订单。自该公司发出警报以来，公司股价已下跌5%。

2014年8月，有消息称俄罗斯正在考虑实施进一步的报复措施，包括对欧美航空公司关闭俄罗斯的领空，这将导致欧洲航空公司每个航班飞行成本增加3万美元。消息一出，德国汉莎航空公司股价随之下跌近3%。

自2013年秋冬季地缘政治开始紧张后，俄罗斯对欧盟猪肉和德国奶酪进行了制裁，

结果 2013 年全年德国农业和食品业对俄出口仅为 16 亿欧元，比 2012 年下降了约 14%。在此背景下，德国经济对俄罗斯制裁的反应愈发敏感。德国工商协会主席万斯莱本曾在 2014 年 8 月指出，按照当前西方与俄罗斯相互制裁力度估算，2014 年全年德国对俄出口可能损失 40 亿欧元，对乌克兰出口将可能减少 15 亿欧元。

德国商业团体、东欧经济关系委员会曾在 2014 年 8 月 25 日发布声明指出，由于欧盟和俄罗斯不断相互实施惩罚性制裁措施，德国出口下跌的趋势可能还将加剧，不排除到 2014 年年底德国对俄罗斯出口大幅下滑 20% 至 25% 的可能性，而这可能影响德国 5 万个工作岗位。该委员会援引德国官方出口数据显示，受俄乌僵局持续的影响，2014 年上半年，德国对俄罗斯和乌克兰出口同比分别下滑 15.5% 和 32%，损失的双边贸易额分别达到 28 亿欧元（约合 37 亿美元）和 8.8 亿欧元。

2. 德国 2014 年第三季度经济状况

随着对俄罗斯新一轮经济制裁的实施，德国经济受到更加严重的打击。2014 年 10 月 6 日，德国《明镜在线》报道，德国工业正遭受冲击，8 月订单量下降近 6%，创 2009 年以来最大降幅。其中，机械和汽车订单下降最为显著，达 8.5%，消费品订单则增长了 3.7%。联邦经济部认为这是由于欧元区经济增长乏力及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导致的结果。德国经济数据持续数月低迷，今年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仅增长 0.2%。^⑤

2014 年 10 月 15 日，德国《世界报》报道，位于曼海姆的欧洲经济研究中心（ZEW）表示，德国 10 月 ZEW 景气指数比上月下降 10.5 点至 -3.6 点，连续 10 个月下跌，也是 2012 年 11 月以来首次出现负值。ZEW 指数衡量未来 6 个月经济发展预期，德国长期中值为 24.5。德国当前景气指数也下降了 22.2 点，仅为 3.2。10 月，欧元区 ZEW 指数下降 10.1 点至 4.1，景气指数则为 -56.8。^⑥

德国联邦统计局 2014 年 10 月 29 日公布初值数据显示，因欧盟与俄罗斯之间的制裁与反制裁措施影响，8 月份德国对俄罗斯出口额为 23 亿欧元，同比下降 26.3%。累计前 1—8 月，德国对俄出口同比下降 16.6%。前 8 个月，德国对俄出口的前三大类商品是机械设备、车辆及零配件、化工产品，分别占对俄出口总额的 22.6%、19.0% 和 10.0%，对俄出口分别下降 17.2%、27.3% 和 5.9%。按前 8 个月出口额统计，俄罗斯已降为德国第 13 大出口目的国，2013 年的排名是第 11 位。

2014 年 11 月 3 日德国 NTV 电视台报道，今年 9 月德国零售业意外遭遇销售冲击，销售额与上月相比大幅下滑 2.9%，为近年来罕见。排除通胀因素，下滑幅度甚至超过 3.2%。经济学家此前预计下滑幅度仅为 0.8%。其中纺织品、服装、鞋类和皮具下滑最为严重。今年 1 月至 9 月，德国零售业销售额同比增长 1.8%，预计全年销售额增长 1.5% 左右。但是德国 GfK 市场研究机构认为，乌克兰危机等地缘政治因素让消费者的信心产生了动摇，然而影响有限，11 月的德国市场景气指数将确定回升。^⑦

⑤ 参见《德国 8 月工业订单量下降近 6%》，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德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http://de.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410/20141000750780.shtml>，2014.10.06

⑥ 参见《德国 ZEW 景气指数降至负值》，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德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http://de.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410/20141000760733.shtml>，2014.10.15。

⑦ 参见《德国零售业遭遇销售冲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德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http://de.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411/20141100792942.shtml>，2014.11。

一直自信的德国机械制造业在乌克兰危机中受到重创。2014年11月3日德国《商报》报道，俄罗斯是德国机械制造业全球第四大出口市场，但来自俄罗斯的需求大幅下降。1月至8月，德俄机械制造业贸易额达到44亿欧元，与2013年同期相比减少了近10亿欧元。由于俄罗斯经济不景气，卢布疲软，直接导致来自俄罗斯的需求下降。2014年德俄机械制造业贸易额将同比减少35%左右。欧盟制裁措施带来的负面影响将在未来几个月继续放大。矛盾激化导致的结果将使德国机械制造业出口愈发困难。^⑧

德国联邦统计局2014年11月6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扣除季节性及通胀因素影响后9月份德国工业订单指数环比增长0.8%，低于经济学家调查作出的2.3%的增长预期。第三季度德国工业订单指数仅增长0.1%。伦敦士登银行VPBank的一位经济分析师表示，第四季度德国工业仍将步履维艰，对俄罗斯的制裁已严重影响到德国工业。^⑨

德国《时代周刊》2014年11月21日报道，对俄制裁将为德国在2014年带来70亿欧元经济损失，相当于德俄贸易总额的1/5。虽然70亿欧元仅相当于德国2013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400。但是从另一衡量指标——经济总量增长来看，70亿欧元的意义则不言而喻：2013年德国经济总量增加110亿欧元。^⑩

四、乌克兰危机最新发展形式分析及预测

1. 欧盟

制裁俄罗斯给刚刚走出债务危机的欧盟经济也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导致与俄经济联系非常密切的德、法、意、西等国经济蒙受损失。据欧盟数据，2014年欧盟损失400亿欧元，2015年为500亿欧元。这已引起南欧国家严重不安，特别是经济增长缓慢的意大利。

法国总统奥朗德于2015年1月5日公开呼吁解除对俄经济制裁。德国领导人也警告称：“加重制裁只会两败俱伤。倘若西方国家进一步加重制裁，将破坏俄罗斯的国家稳定，进而在欧洲‘引发危局’，并对整个世界造成负面影响。在美国和欧盟内部，有一部分人企图借助制裁手段‘击败强大的竞争对手’，但这不符合德国或者欧洲的利益。我们想要帮助解决乌克兰危机，而非迫使俄罗斯下跪求饶。”

明斯克时间2015年2月11日晚间至12日中午，俄罗斯、乌克兰、法国、德国四国领导人就解决乌克兰危机问题举行了马拉松式的会谈，最终达成重要协议规定，乌东部冲突双方将从15日零时开始停火，并随后从交战地区撤出重武器。新停火协议共包含13个要点。

⑧ 参见《德国机械制造业因乌克兰危机受损》，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德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http://de.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411/20141100792943.shtml>，2014.11.11。

⑨ 参见《9月份德国工业订单指数增长不及预期》，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德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http://de.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411/20141100792968.shtml>，2014.11.11

⑩ 参见《对俄制裁令德国经济受损》，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德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http://de.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411/20141100806509.shtml>，2014.11.23。

2015年3月2日的三方布鲁塞尔天然气会谈上,乌克兰与俄罗斯就全面执行冬季天然气一揽子协议达成共识,欧州天然气转运将不受影响。此次努力也是欧盟支持履行明斯克协议作出的具体行动。

2015年3月19日英国国防部证实,35名英军人员现正在乌克兰南部城市尼古拉耶夫对乌克兰军队就医疗护理和防御战术等方面进行培训,培训期为两个月。英国国防部的发言人声称:“一揽子培训计划的第一部分已于3月份开始。”不过,英国政府拒绝向乌克兰军队提供任何致命性装备。美联社随后报道,美国准备今后几周也向乌克兰派出美军教官。

对于美英的行动俄罗斯表示不满,俄罗斯总统的发言人佩斯科夫于3月19日表示:“乌克兰外国教官的存在无助于解决这个国家的冲突……当然,也一再被强调,那无益于增强信任或缓和冲突地区的紧张局势。”

军事对立加剧之际,2015年3月19日28名欧盟领导人在布鲁塞尔参加峰会,就一项计划达成共识,同意将欧盟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保持至2015年底。欧盟成员国目前计划,在6月底前不会做出任何正式延长制裁的决定。但鉴于制裁时间与明斯克协议中的边境条款、年底期限相挂钩,欧盟领导人不太可能在年底前减轻制裁。此次峰会最终推出的方案,实为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奥朗德提出,是在成员国分歧严重情况下的一个“折中”版本。欧洲理事会主席唐纳德·图斯克表示,在明斯克协议得到完全贯彻之前,必须维持制裁。如果俄罗斯年底前主动示好,前述决定将给欧盟放松制裁提供弹性。

事实上,欧盟内部在对俄制裁的问题上存在一定分歧,且正逐步加深。曾任“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智库新闻官的奥康奈尔认为,欧盟内部在对俄制裁问题上分为三大阵

营:持强硬态度的有波兰、波罗的海国家、英国等;态度较缓和的有奥地利、希腊、塞浦路斯和意大利等;而爱尔兰等规模较小、与俄罗斯相隔较远的国家则采取“中间路线”,主张对话和施压并举。事实上,欧盟成员国对俄态度的分歧主要源于经济考量。

德国《焦点》周刊3月20日称,制裁俄罗斯正在分裂欧盟。英国《金融时报》也声称,普京企图像分裂乌克兰那样分裂欧盟,如果克里姆林宫就制裁问题成功分裂欧盟成员国,将是“自由世界的灾难”。

由此可见,欧盟在处理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仍会继续“双管齐下”,既想保持通过制裁向俄罗斯施压,又试图避免欧俄关系“剑拔弩张”以及欧盟内部分歧加剧的局面。同时欧盟也表示,乌克兰进行改革和寻求俄乌冲突解决方案同样重要。

2. 德国

对俄制裁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德国的经济利益,但作为欧盟核心成员国,德国又不得不顾及西方对俄政治态度的强硬一面。德国前总理施罗德早先表示,德国应该与俄罗斯就乌克兰问题加强沟通,经济制裁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德国的东欧经济关系委员会主席阿克哈德-科德斯称:“对俄更多的制裁只会使得我们为这一冲突付出的代价更高。”但在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之间,德国作为欧洲大国不得不付出勇气和代价,放弃部分经济利益,选择政治利益。

虽然在美国的施压下,欧盟谨慎地一步步升级对俄制裁措施,但德国总理默克尔还是公开表示,德国愿与俄罗斯共同应对国际安全挑战,双方往来应继续深化,德方会维护与俄方的伙伴关系原则。德国总理默克尔在2015年3月的欧盟领导人布鲁塞尔峰会上的表现就足以清晰地表明德国的立场与态度。正如德国联邦议院前议员、欧安组织议会大

会前任副主席威利·维默尔所强调的，德国的作用在于恢复与俄开展建设性合作的政策。德国一直游走于争吵不休的美俄双方之间，在不避讳对俄罗斯提出严厉批评的同时，也呼吁急于惩罚俄罗斯的西方国家保持克制，德国总理默克尔很有可能是化解这场危机的关键人物。

3. 美国

而美国对俄罗斯一直保持强硬的态度。美国是乌克兰危机事件的最大受益者。俄美两国经济联系远远小于欧俄之间，据统计，2012年俄美之间的双边贸易额仅为260亿美元，同期欧盟与俄双边贸易额达到3700亿美元。俄罗斯在能源上几乎难以对美国形成掣肘。美国协同欧盟对俄进行制裁，欧盟承担了相当大的经济损失和风险，美国却成为这一事件中最大受益方。

美国一直将俄罗斯视为重大竞争对手，利用乌克兰危机的契机，对俄罗斯进行制裁不仅能够打击俄罗斯的经济，削弱竞争对手，还能够塑造美国在处理国际事件中的威信，维护其国际地位。与欧盟不同的是，美国在能源上不受俄罗斯的掣肘，预计将继续围绕石油和金融业对俄罗斯进行打击。

4. 俄罗斯

欧美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对俄的经济影响巨大。2014年12月16日，俄罗斯遭遇“黑色星期二”：周一，卢布大幅贬值11%引发俄罗斯央行火线加息至17%；外汇市场对于俄央行的加息根本不买账，周二，卢布崩盘贬值幅度一度超过19%；俄罗斯RTS股盘中亦大跌19%，这是该市场1995年以来最大跌幅。宏观经济运行数据表明，俄罗斯经济运行状况迅速恶化，特别是投资减少导致俄经济疲软，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欧盟数据显示，欧盟对俄制裁使俄经济2014年损失230亿欧

元（约合308亿美元）、2015年将损失750亿欧元（约合1006亿美元），分别占俄国内生产总值的1.5%和4.8%。事实上，受金融危机影响，近年来俄罗斯经济一直疲软，2013年经济增长仅为1.3%，处于缓慢的经济复苏过程中。而欧美对俄制裁中断了俄经济复苏进程。2014年12月2日，俄罗斯经济发展部发布经济展望报告，承认明年俄罗斯将会陷入衰退。该报告预计2015年俄罗斯经济将萎缩0.8%，此前这个预测数值为增长1.2%。与此同时，俄罗斯人明年的收入将出现平均2.8%的负增长。

尽管经济上遭受严重打击，但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政府仍有资本对欧美采取强硬态度。从历次政治事件可以看出，“服软”不是俄罗斯政府的风格，因此，即使经济上蒙受损失，俄罗斯更多基于政治利益考虑，在乌克兰问题上仍将保持强硬态度。对俄罗斯而言，无论是克里米亚问题，还是乌克兰在俄欧间保持中立都关系到俄罗斯的核心利益，再加上俄罗斯希望构建世界多极格局的战略目标和俄罗斯从不向欧美屈服的民族性格，预计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将与西方抗争到底。

欧洲知名智库布吕格尔经济研究所政策分析师希尔威亚·米勒说：“欧盟是想以强硬措施逼迫俄罗斯就范，但恐怕这个想法会落空。”米勒分析认为，从欧俄双边经贸关系的紧密程度来看，这种制裁如果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双方都难以承受。从这一点来看，这种制裁的可持续性值得怀疑。俄战略与技术分析中心主任普霍夫指出，如果制裁是无限期的，欧俄将没有机会协商达成一致。

欧盟如果继续加大对俄罗斯制裁力度，使得各方重归谈判桌前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外交努力更加举步维艰。乌克兰危机只能通过政治途径加以解决，制裁、孤立等手段只会激化矛盾，无益于和平。“欧洲改革中心”智库2015年3月发布的报告分析也认为，如

果在乌克兰局势长期得不到缓和的情况下延长制裁，将进一步加剧西方内部已有的分歧，欧盟和美国将很难达成共识。

五、结语

在对俄制裁方面，欧美各国都从政治、经济、安全等多方面考虑着自身的利益。从采取制裁措施的过程来看，欧盟在制裁俄罗斯的问题上显得十分谨慎。不断升级的制裁

措施严重打击了俄罗斯的经济，但同时制裁的负效应也严重影响了欧盟各成员国的经济，尤其是德国的经济。随着紧张局势的缓解，再加上对俄制裁措施给欧盟自身带来的损失使得欧盟各成员国不得不在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之间进行重新思考，欧盟成员国中反对制裁的声音将会越来越高涨，相信德国也会继续发挥自己在此次危机中的举足轻重的作用，毕竟恢复俄欧正常经贸关系仍然是欧洲各国所希望看到的。

作者简介：刘惠宇，青岛大学德语系讲师，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博士研究生。

新一轮希腊债务危机与德国

孙嘉惠

【摘要】自2009年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以来，欧盟、欧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台的几轮救助计划没有对其起到有效遏制作用，5年间希腊的负债率甚至从120%上涨到180%。2015年初，希腊左翼政党上台，宣布反对欧债救助的“三驾马车”主张的财政紧缩方案。在2015年6月到期的希腊主权债务未得偿还的情况下，希腊政府又提出新的举债要求并希望得到债务减记，而以德国为代表的债权国则坚持将希腊政府承诺进行有效改革作为继续救助的前提。一时间，德国因其坚定立场成为众矢之的，希腊退出欧元区似乎大势所趋，德希两国关系僵化。最终，此轮危机以经历多轮谈判后各方妥协作结。本文着重想对新一轮希腊主权债务危机中德国的立场、考量、表现及所受影响进行一番剖析。

【关键词】希腊主权债务危机 德国 立场 影响

自2009年末爆发的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在经历了几轮救助计划之后未见缓解，随着2014年经济的再度下滑，希腊进入了新一轮的危机。对于德国来说，这也意味着在欧盟内部新一轮的经济和外交挑战。

一、希腊债务危机的演进与升级

2009年12月，新上台的希腊帕潘德里欧政府公布，前任政府留下的希腊国家财政赤字高达13%。继而以惠誉为首的三大信用评级机构相继下调希腊主权的信用评级，希腊政府借贷成本大幅提高，国家负债达GDP的近120%。2010年4月，希腊政府宣布其面

临入不敷出的威胁，由此拉开希腊和欧盟债务危机的序幕。

在希腊债务危机爆发伊始，欧元区成员国财长同意拿出300亿欧元，帮助希腊解决燃眉之急。2010年4月，希腊正式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提出援助要求。至此，欧洲“三驾马车”（应对欧债危机三方委员会），即欧盟委员会、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式开始对希腊的全面救助。第一轮针对希腊的救助计划为其提供了共730亿欧元的贷款，其中有529亿来自欧元区伙伴国，另外201亿来自IMF。与之相联的是希腊政府进行改革、推行紧缩财政方案和政策的承诺。

2012年2月的第二轮针对希腊的救助计

划总额达 1429 亿欧元，欧元救助机制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代表欧元区成员国出资 1309 亿欧元参与其中，另外的 120 亿仍由 IMF 提供。^① 伴随“三驾马车”的救助而来的是进一步对希腊政府缩减开支计划的要求。本次救助计划增强了欧洲决策者在希腊救援资金的使用和效率方面的监督权和控制力。

然而，当同样遭遇债务危机的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经济通过改革已得到恢复之时，希腊政府的主权债务却由 2010 年占 GDP 的 120% 上升至 2015 年的近 180%，远超过各方对其 2020 年左右债务达 120% 的预计。这一数字的惊人上涨一方面由希腊政府旧债未偿又不得不举新债、入不敷出的局面所致，另一方面基于希腊经济衰退、GDP 在过去 5 年间减少 1/3 的事实。^②

2015 年 1 月 25 日，以齐普拉斯（Tsipras）为党首的希腊左翼激进联盟党（Syriza）上台，以反对紧缩的党纲吸引选民，明确表示要逆“三驾马车”的指挥而行，“决定希腊自己的命运”。然而，不久后执政党就不得不面临残酷的现实：选举纲领中拒绝财政紧缩、依靠提高税负、控制腐败等措施在庞大的债务和倒退的经济态势面前显得幼稚而脆弱。希腊救助协议的欠款原定于 2015 年 2 月底到期，欧盟在评估希腊的改革计划后同意延长还款期 4 个月至 6 月底。而从 2015 年 2 月起，希腊向德国提出二战索赔、拒绝向欧元区伙伴国提供有关其国内改革进展的最新消息，并将有关希腊救助协议的相关问题提交欧盟峰会等不配合的态度导致国际债权人

不满情绪日益升温，再度增加了关于救助计划谈判前景的不确定性。

2015 年 6 月 27 日，齐普拉斯政府中断了关于新一轮救助计划的谈判，并表示要召开全民公投来决定希腊是否要接受债权人带有附加条件的救助。结果，希腊民众公投以 61% 的反对票否决了在其眼中“屈辱”和“不可接受”的财政紧缩改革方案。希腊寄希望于债权国能给予债务减记，从而为希腊经济复苏提供喘息的空间。因为担心退出欧元区后的希腊新货币没有价值，希腊民众纷纷挤兑养老金。而为了进一步遏制银行破产的风险，希腊政府采取了关闭银行业务、禁止提取现金和禁止跨境汇款业务的措施来防止资金进一步外流和转移。

2015 年 7 月 12 日，各方就希腊接受与先前方案类似的改革建议、债权国注资第三轮救助方案达成妥协。7 月 15 日雅典议会通过之后，欧元区各国也应在本国议会讨论是否通过该提案。最终，希腊于 8 月 12 日与欧盟、欧央行和 IMF 官员就第三轮救助方案进行磋商并达成纾困框架协议，债权人作出让步，同意大幅下调希腊的财政目标并在三年内向希腊提供 860 亿欧元。该协议要求希腊进行经济改革以换取救助资金并涵盖了 3 年计划的要点。8 月 21 日，德国议会以压倒性票数通过了第三轮对希腊的救助方案，财长朔伊布勒表示，应该“给予希腊重新开始的可能”。至此，希腊得以用 ESM 的救助资金偿还之前所欠欧央行 34 亿欧元的债务。

① Böcking, David u.a.: Griechenland-Krise: Alle Antworten zur Krise und den Euro-Folgen, <http://www.spiegel.de/politik/ausland/griechenland-krise-alle-antworten-zur-krise-und-den-euro-folgen-a-1042694.html#sponfact=3>, letzter Zugriff am 18.09.2015.

② (Verfasser unbekannt): Infografiken: Schlüsseldaten zur Europäischen Schuldenkrise, 见 <http://www.bpb.de/politik/wirtschaft/schuldenkrise/194909/infografiken-schluesseledaten-zur-europaeischen-schuldenkrise>, letzter Zugriff am 18.09.2015.

二、希腊债务危机中的德国

在希腊主权债务危机中，作为欧元区主要经济体和希腊的主要债权国，德国自然无法置身事外，其立场是各方关注的焦点。是否救助、为何救助、怎样救助成为德国政府需要解决的问题。

1. 德国的立场

1) 参与救助

在2010年开始的针对希腊的救助中，德国累计出资600亿欧元，这其中包括两次救助计划中的550亿欧元（第一次EFSF中的152亿欧元和IMF的12亿欧元；第二次ESM中的381亿欧元和IMF中的7亿欧元）和通过EZB发放贷款中的50亿欧元。第三次救助计划总量为860亿欧元，其中德国占26%，合232亿欧元。

德国政治民调机构ZDF-Politikbarometer于2015年6月的民意调查显示：70%的德国人认为在希腊改革的问题上欧盟不应该再向希腊妥协让步；而有65%的人认为如果希腊破产，对德国的负面影响不会很强；在5个月的时间跨度内，认为希腊应该退出欧元区的德国受访者比例由37%上涨到51%。^③

作为欧元区的成员国和主要经济体，德国参与希腊债务危机救助的立场是明确的。但是无论是从民意还是从技术层面考虑，如何合理地参与救助对德国而言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2) 如何救助

在希腊债务危机的处理过程中，德国的两位关键人物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联邦总理默克尔和财部长朔伊布勒。从2010年

的欧洲峰会起，默克尔就曾多次声明将尽全力维护欧元区的团结和完整的立场，明确表示希望将希腊留在欧元区，这不仅是出于整个欧元区经济稳定的考量，也具有至关重要的政治和心理意义。

德国财长朔伊布勒着重强调将贯彻和执行强调财政纪律作为德国继续参与救助的必要前提。当希腊拒绝推行紧缩的财政政策而寄望于通过债务减计摆脱困境之时，朔伊布勒表态：希腊应该退出欧元区至少5年。

从危机伊始，德国就坚持将推行紧缩政策作为希腊得到欧盟援助的前提，因为在德国看来，希腊出现经济和债务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缺乏合理有效的财政和税收政策，福利政策与自身经济实力不符。因此，在第三轮救助前，希腊拒绝向债权国给出关于国内改革情况的信息时，在是否继续给予救助的问题上德国采取了强硬的态度。

其次，德国不惜以与IMF僵持为代价，坚持拒绝对希腊进行债务减记。在德国看来，希腊已于2012年收到过来自私人银行高达50%的债务减记，而此时的债务减记既无必要，也不会对希腊经济的复苏起到刺激的效果，相反会给其他债务国家开设恶例。德国副总理加布里尔表示，如果给希腊进行减记，那么德国就没有理由拒绝来自其他国家的此项要求。

德国坚持的是“以援助换改革”，即德国参与第三轮救助计划以希腊政府拿出具体、详细、可落实的改革方案为前提，没有改革，莫谈救助。德国可以接受的妥协是对希腊的债务进行重组，这包括对于还债期限的延长，但对于此前的考量和IMF提出降低利率的建议遭到了总理默克尔明确的拒绝。

^③ (Verfasser unbekannt): Mehrheit: Keine weiteren Zugeständnisse an Griechenland, <http://www.heute.de/deutsche-mehrheit-keine-weiteren-zugestaendnisse-an-griechenland-59-prozent-wollen-dass-die-beiden-naechsten-fussball-weltmeisterschaften-neu-vergeben-werden-38840556.html#>, letzter Zugriff am 18.09.2015.

3) Grexit?^④

希腊退出欧元区的提议是基于如下考虑：在遭遇经济危机时一国通常可以通过使本国货币贬值的手段来增强本国出口产品的价格优势以达到降低贸易赤字的目的。同时，此举还有降低劳动力成本、吸引外资的功能。然而，身处欧元区内的希腊显然没有这种可能性。因此，有经济学家认为，在紧缩政策已经到一定极限而又无法起到刺激经济的效果之时，退出欧元区是希腊经济恢复活力的最后一个可能性，德国财长朔伊布勒就曾建议希腊退出欧元区 5 年。

希腊退出欧元区本身不会对欧元区的经济产生根本上的影响，因为希腊的 GDP 只占整个欧元区的 3% 左右。然而，也有经济学家认为，退出欧元区、降低劳动成本并不解决当下的希腊债务危机。^⑤ 因为希腊本身并无可以出口的主要产品和支柱产业，增加价格优势并不足以解决希腊的贸易逆差问题。此外，由希腊退出欧元区带来的一系列后果却是希腊、欧盟和德国都不愿意看到的：没有欧元区伙伴们的救助，希腊的经济复苏希望更加渺茫。退出欧元区后，经济危机的不断深化很可能给希腊带来政治局面的动荡和国内、地区安全与秩序的不复存在。此外，对于债权国来说，这也意味着投入先前两轮救助计划的资金很可能打了水漂，有去无回。从心理上来说，这对市场、对欧元的信心来说是一次重创。欧元区的完整更具有重大的政治意味，这毫无疑问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倒退或失败。退出欧元区属于欧盟内部史无前例之举，从法律程序来讲，退出的程序将持续两年左右，这期间也会出现希腊国内资金的外流，对希腊经济的恢复无疑意味着釜底抽薪。

2. 德国立场的解析

首先，作为欧元区最重要的经济体、欧洲经货联盟、欧洲共同市场最大的受益者，欧元的稳定和整个欧元区经济的完整对于德国而言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尽管许多经济学家和德国财长都曾建议希腊退出欧元区，以达到货币贬值、依靠劳动力成本的下降来提升希腊本国市场竞争力的目的。然而，史无前例的一国退出欧元区将会带来怎样的经济后果难以估量和承受，而且这也并非希腊经济得到恢复和走上正轨的充分或必要条件。权衡希腊退出欧元区带来的动荡后果及不确定性，德国仍决定继续尽自己努力将希腊留在欧元区内。

2015 年 6 月初，普京会见希腊总理齐普拉斯时，俄方暗示可以借钱帮助希腊偿债。希腊与俄罗斯的眉来眼去令看在眼里的德国总理格外着急。因为在乌克兰危机尚未出现转机的大背景下，身为北约成员国的希腊与俄罗斯走近，这是作为北约和欧盟成员国与代表的德国并不乐见的。因此，救助债务危机中的希腊不仅具有保护欧元和欧元区经济稳定的目的，更富有维持欧盟团结的含义。

3. 德国与希腊的龃龉

自从债务危机爆发，希腊政府迫于“三驾马车”和国际债权人压力推行紧缩政策以来，默克尔和朔伊布勒就常常成为希腊媒体丑化为纳粹的对象，在希腊民众中也遭到了极大的敌视，因为受经济下滑和紧缩政策影响的希腊民众将其看作自身悲惨遭遇的罪魁祸首。尽管许多其他国家也同样坚持“没有改革就没有救助”的原则，但德国因其在欧

^④ Grexit 即英文 Greece 和 exit 的组合，意指希腊退出欧元区。

^⑤ Kritikos, Alexander: Griechenland hat alle Möglichkeiten, <http://www.bpb.de/politik/wirtschaft/schuldenkrise/192987/griechenland-hat-alle-moeglichkeiten>, letzter Zugriff am 18.09. 2015.

元区内特殊的经济地位、在债务危机中较为积极的救助角色和对债务国政策的影响力而首当其冲。此外，有民众认为德国的经济发展也得益于希腊的借债和从德国进口商品。而对于造成希腊债台高筑的局面，发放贷款最多的德国银行也难辞其咎。

2015年2月，希腊总理表示希腊将向德国追讨纳粹德国二战期间给希腊造成巨大损失的赔偿金1620亿元（超过希腊所欠债务总和的一半），德国副总理兼经济部长加布里尔表示，赔款问题早已解决，德国赔偿的“可能性为零”。德国政府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称，德国与希腊的战争赔款问题已于1960年达成支付1.15亿马克的协议，无论从政治还是法律角度，德国都已完成赔付。财政部发言人也表示，德国没有理由与希腊就赔偿事宜举行会谈，各方应集中精力解决当前的实际问题。^⑥这并非希腊首次提及追讨战争赔款，但在主权债务危机的紧要关头重提，难免有威胁之意味，也使本已僵化的德国与希腊关系变得更为紧张。

4. 德国与IMF的博弈

2015年7月初，IMF发布报告称，希腊未来三年预计面临500亿欧元的财政资金缺口，从目前状况来看不太可能通过市场途径弥补缺口，需要债务减记才能渡过危机。而以德国为首的债权人拒绝对希腊进行债务减记，理由也很容易理解：希腊的债务无异于无底洞，债权人借贷旨在助其渡过难关，而从根本上解决希腊的问题需要希腊政府拿出

切实可行且有效弥补资金缺口的方案。没有这样的方案，债权人拒绝进一步援助或进行债务减记。^⑦在以财长朔伊布勒为代表的德国政府看来，希腊的问题并不适用债务减记这个手段。IMF将债权国进行债务减记作为其参与新一轮救助的前提。在2015年8月德国议会就第三轮救助计划投票前夕，默克尔在电视采访中表示确信IMF会加入对希腊的救助。此举意在议会投票前给希腊就此计划拉更多赞成票，因为IMF是否加入救助对许多国家来说至关重要。近期，德国总理默克尔和IMF总裁拉加德都明确向雅典方面表示，关于希腊债务唯一可作调整的就是债务期限，减记债务或降低利率都不在考虑范围内。^⑧

三、希腊债务危机对德国的影响

希腊债务危机对于整个欧元区乃至欧洲的经济状况产生了巨大影响，对德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1. 经济方面

尽管整个欧元区经济都受到了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但从客观上来看，德国从希腊债务危机中却获得了重大的收益。

根据位于德国哈勒（Halle）的经济研究中心IWH于2015年8月10日发布的研究报告，自2010年以来，德国政府从希腊债务危机中获益，累计节省债券利息支出达1000亿欧元。即使希腊拒绝偿付德国通过EFSF、ESM和IMF或直接贷款等多种渠道借出的

⑥ 张旌：《希腊向德国讨二战赔款 金额超过债务总和一半》，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02/10/c_127475975.htm，最后访问时间为2015年9月18日。

⑦ 杜静：《希腊减债：德国为何和IMF“开撕”》，<http://world.people.com.cn/n/2015/0718/c1002-27324633.html>，最后访问时间为2015年9月18日。

⑧ 商务部网站：《拉加德和默克尔：不会减记希腊债务》，<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1/m/201509/20150901103693.shtml>，最后访问时间为2015年9月18日。

900 亿欧元，从收支结余来看，德国仍从希腊债务危机中受益。^⑨早在 2015 年 4 月，绿党对于德国联邦财政部进行的一次调查中也有类似的结论。^⑩

该报告以 2000—2007 年间德国的平均国债利率为基准，并与假定欧元区没有爆发债务危机的情形进行对比，得出结论：希腊债务危机的局势越严峻，德国国债的利率越低，反之则会升高。此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在债务危机愈演愈烈的情势之下，投资者急需寻找相对安全、收益较有保障的投资方式，即安全性转移（Flight to safety）效应。而欧元区中德国几乎是唯一稳定可信的经济体，其债券成为投资者的避风港；类似的原因包括流动性转移（Flight to liquidity）效应，即投资者更倾向于投资经济运转良好、流动性强的主权债务。

此外，据统计，在 2014 年 10 月至 2015 年 7 月间，随着希腊政府与债务危机有关的新动向都会反映在德国主权债务的收益率方面：每当有关希腊的坏消息出现，则德国的主权债务收益率下降 1.5%；反之，每当雅典出现好消息，则德国主权债务收益率便会上升 1.5%。

但该中心专家 Rein Gropp 在接受德国电视一台访谈时也表示，该研究仅聚焦于希腊债务危机在国债利息方面带给德国的影响，关于其给整个经济状况带来的影响，欧元汇率的下跌等各种因素未涉及。^⑪但针对这个问题也有其他专家有不同看法。^⑫

另一方面，作为希腊救助计划条件的改革措施还包括国有资产的私有化。

2. 政治方面

尽管新一轮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僵持长达半年之久，德国拒绝无条件出资救助、坚持希腊推行紧缩方案的立场最终还是得到了落实。一度被妖魔化为纳粹形象的总理默克尔最终却还是与 IMF 主席一起“决定”了希腊的命运。经此一役，德国的执行力和原则性也给伙伴国家和国际社会以深刻印象。

虽然历经坎坷与欧元区分裂的威胁，新一轮的希腊债务危机在各方的妥协和努力下以达成“援助换改革”的共识作结，这意味着成员国退出欧元区这一史无前例事件最终没有发生，避免了欧洲一体化的倒车，至少暂时维护了欧盟的团结。分裂的后果和可能的多米诺骨牌效应都是支持欧洲一体化的深化与扩展的德国所不愿看到的。

四、总结

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希腊自身国际市场竞争力的不足和实体经济的虚弱；身处统一货币区内的希腊没有可能通过货币贬值的手段来刺激出口，加之劳动力成本高、吸引外商投资能力低下，进出口贸易赤字过大；政府缺乏有效的财税征收和监管机制，机构腐败，人员冗杂。各种因素综合导致希腊财政入不敷出，寅吃卯粮。

⑨ IWH: Germany's benefit from the Greek Crisis, http://www.iwh-halle.de/d/publik/iwhonline/io_2015-07.pdf, letzter Zugriff am 18.09.2015.

⑩ (Verfasser unbekannt): Folgen der Finanzkrise: Bund spart kräftig dank niedriger Zinsen, <http://www.tagesschau.de/wirtschaft/bund-zinsen-101.html>, letzter Zugriff am 18.09.2015.

⑪ Ein Interview bei Reint E. Gropp, Institut für Wirtschaftsforschung, über die Studie, <http://www.tagesschau.de/multimedia/video/video-107663.html>, letzter Zugriff am 18.09.2015.

⑫ „Studie zu Folgen der Griechenland-Krise: Deutschland ist der Krisengewinner“, <http://www.tagesschau.de/wirtschaft/deutschland-profitiert-von-griechenland-krise-101.html>, letzter Zugriff am 18.09.2015.

从欧元区的层面来看，各成员国经济异质性强，发展程度与特点相去甚远：发达经济体需要广阔的市场，而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人民购买力则十分有限，由此形成了一种债务国借贷维持、透支消费和债权国出资贷款获得利息和市场的循环模式。然而，这一根本上不可持续的模式正反映出欧元区内各国间统一的货币政策与各自分离的财政和经济政策之间的矛盾，导致单个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威胁到整个欧元区各国经济和财政的安全。

当初加入欧元区的希腊实质上就是一个从经济指标上来看并不符合要求的候选国——不仅没有达到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的国家赤字小于3%、国债不高于60%的要求，且自身没有支柱工业，国际竞争力低下，贸易赤字过高。

截止2015年8月，来自“三驾马车”的两轮共2000多亿的救助并没有帮助希腊摆脱主权债务危机，原因在于其缺乏行之有效的改革方案及其贯彻落实。与其他债务国相比，

希腊国家收入来源不足，而国家支出过大，导致基础财政收支（Primärsaldo）根本不足以偿还债务和利息，新增利息又进一步加重负债。但债权国希望“以救助换改革”，使希腊经济重新走上合理的运行轨道，加之希腊可以从较长还债期内、低利率及通货膨胀的作用下获益。因此，德国拒绝债务减记而接受债务重组的态度表明，其对于希腊经济恢复正常运行、能够在较长远的未来偿还债务的可能性仍抱有希望。

在希腊债务危机中，德国坚持要求希腊整顿财政纪律和推行紧缩政策的立场，将其作为对其提供救助的前提。尽管这一立场一度遭到希腊的抨击和指责，但总体而言，德国的危机处理既符合国内多数选民的期待，也承担了欧元区主要经济体的责任和义务。而从客观看来，由希腊主权债务危机造成的资本向安全、流动性强、质量高的主权债务转移这一效应给德国带来了节省借债利息的积极影响。而这与德国自身坚强的实体经济基础和严肃的财政纪律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作者简介：孙嘉惠，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博士研究生。

法兰克福人民币离岸市场的现状与利弊分析

李冰溪 张 凯

【摘要】法兰克福人民币离岸市场自建立以来积极开展各项业务，在清算、债券发行等支付和融资领域构建稳固平台，为中德之间的“金融丝绸之路”建设奠定良好基础。本文从法兰克福人民币离岸市场上的业务结构和规模、清算模式、参与机构的结构以及市场需求四个方面分析其现状发展，在此基础上总结分析双方在法兰克福人民币离岸市场上的利益点和市场未来将会遇到的挑战。对于今后政策上的建议包括丰富人民币投资产品种类，扩大离岸人民币资金池，加强离岸与在岸、离岸与离岸之间的联动发展，保障汇率和支付体系的稳定与开放等进行剖析。

【关键词】德国 人民币离岸中心 法兰克福

一、前言

2014年，我国人民币国际化进展迅速：全年经常项目人民币结算金额达到6.55万亿元，同比增长41.6%；人民币对外直接投资（ODI）额1865.6亿元，同比增长117.9%；外商来华直接投资（FDI）人民币结算金额8620.2亿元，同比增长92.4%。目前，人民币已成为国际贸易融资的第二大货币、全球第五大最常用支付货币和外汇交易第七大货币。^①

然而，当前我国人民币资本项目仍未完全开放，境外人民币还不能自由进入内地资

本市场进行投资。而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建立不仅能够促进贸易顺差条件下人民币对外输出，通过金融产品和服务刺激境外人民币资金池逐步壮大，还能够保障跨国资本流动的风险在有限的离岸市场范围内可控，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正是在这样的考量下，近年来人民币国际合作成效十分显著，截止到2015年5月末，中国人民银行已与全球32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协议总规模达3.1万亿元人民币；在15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人民币清算安排，覆

^① 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国际化报告2015年》。

盖东南亚、西欧、中东、北美、南美和大洋洲等地。欧洲市场作为我国重点布局区域，2014年央行分别授权伦敦建行、法兰克福中行、巴黎中行以及卢森堡工行作为人民币境外清算行。随着在2015年1月达沃斯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与瑞士银行就在瑞士建立人民币清算安排达成一致，欧洲人民币离岸中心即将呈现“五足鼎立”的壮观景象。

法兰克福作为欧洲央行与德国中央银行以及全球第三大交易所盘踞地，在人民币在欧洲的国际化之路上有着不容小觑的重要性。它置身于欧洲最大的经济体、中国在欧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德国境内。该城还拥有223家银行（其中196家外国银行）和770家保险公司，是德国乃至欧洲重要的工商业、金融服务业和交通中心，同时也是全球第十大人民币离岸中心。^②不仅如此，德国作为“丝绸之路”的终点，在我国人民币国际化、企业及地方政府“走出去”、建立融资平台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2015年3月中德高级别财金对话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交所）、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中金所）与德意志交易所集团（德交所）宣布，计划在德国成立合资交易所“中欧国际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欧所”），推出以人民币计价的“丝路债券”及多项以人民币计价推出的新产品方案，为企业提供人民币的融资平台，打通中德之间的“金融丝绸之路”。据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数据显示，中德之间的良好政治经贸关系极大地推动了人民币的跨境往来：仅2013年9月至2014年9月间，德国境内人民币支付额涨幅便高达273%。

二、法兰克福人民币离岸市场现状

2014年6月19日，中国银行法兰克福分行被授权担任法兰克福人民币业务清算行。11月，德意志银行通过法兰克福人民币离岸清算中心完成首笔离岸人民币交易，标志着德国外资银行在法兰克福离岸市场清算业务的正式开启。回顾近一年来德国人民币业务的发展，成果令人欣喜。据现有数据显示，2015年前3个月，德国市场共处理跨境人民币清算业务1.09万亿元，同比增长15.8%；其中法兰克福人民币清算行办理跨境人民币支付清算业务4506.56亿元，同比增长72.2%，市场占比为41.1%，影响力正逐步扩大。

1. 法兰克福人民币离岸中心的业务结构和规模

从德国市场公司及个人业务来看，截至2015年4月底，法兰克福人民币清算行公司账户1119家，较2013年末新增436家，增长63.8%；个人账户5934个，较2013年末新增2081个，增长46.3%。此外，在德国人民币市场上不乏大型跨国公司积极参与，大众汽车集团和安联保险集团等世界500强企业早在2010年就已在德国法兰克福分行开立人民币账户并叙做人民币业务。截至2015年4月末，大众集团已在中国银行法兰克福分行累计叙做人民币汇款（汇出汇入）1457笔，金额总计1446亿元人民币。

从人民币国际结算来看，截至2015年4月末，法兰克福人民币清算行办理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1346笔，累计叙做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665.36亿人民币，同比上升46.91%。2014年，累计叙做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

^② 中国银行：《人民币国际化观察》，2015年，第4期。

1247.11 亿人民币，同比上升 20.25%，其中信用证通知及其项下交单议付累计叙做 281.55 亿元，同比上升 33.87%，汇入汇款 822.39 亿元，同比上升 53.10%，汇出汇款 143.18 亿元，同比下降 50.56%。总体来说，呈快速上升趋势，但仍旧存在人民币收付不均衡的问题。

从人民币资金交易上来看，截至 2015 年 4 月末，法兰克福人民币清算行为当地客户办理人民币代客交易额为 80.12 亿元人民币，即期人民币交易交易量 0.1 亿人民币。2014 年中国银行法兰克福分行贸易融资累计叙做 19.25 亿元，年末融资余额为 17.75 亿元，较 2013 年末下降 7.23 亿元。2015 年截至 4 月末，年贸易融资累计叙做 23.23 亿元。中德两国作为贸易大国，今后人民币贸易融资规模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从人民币产品上来看，目前法兰克福人民币清算行跨境人民币产品日益健全，不仅涵盖传统信用证、汇款、托收、进/出口押汇、贴现、保理、福费廷等国际结算和贸易融资产品，还通过海内外联动方式为境内外客户提供应收、应付账款融资等特色的跨境人民币结算及融资产品。

2. 法兰克福人民币离岸中心的清算模式

法兰克福人民币离岸中心成立的最重大意义在于能够大幅度简化中德跨境人民币结算。这一点对于中德企业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合理运用人民币组合业务可以节约企业成本，比如企业的汇兑成本。部分德国企业甚至可以利用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将人民币对欧元升值的趋势作为有效避险工具，利用即期、远期人民币对欧元及美元的外汇买卖可以为企业获取汇兑收益，有助于人民币国际化的快速进展。

目前，法兰克福人民币离岸清算中心主要以账面转移模式（Book Transfer）为主。首先，由中国人民银行指定中国银行法兰克福

分行作为当地人民币清算行。继而，德国有人民币业务诉求的金融机构可在中国银行法兰克福开立离岸账户，委托清算行进行人民币业务清算。而作为人民币清算行的中银法兰克福分行则需在境内代理银行（一般是中国银行上海总部或中银香港）开立清算账户，将跨境资金信息通过 SWIFT 系统传递至境内。境内的中国银行上海总部以及其他代理银行便可通过中国现代化支付系统（CNAPS）或中银香港的实时全额结算系统（RTGS）、清算系统为中银法兰克福分行办理资金汇划，代理借贷记人民币同业往来账户，完成与境外参加银行之间的资金结算。（但据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目前境外参加行只能通过境内银行代理进行跨境人民币清算服务，不能从事付款人和收款人都在海外的纯离岸人民币清算服务，也就是说只能从事跨境人民币清算。）

其实，当前的人民币跨境清算模式只是一种过渡性手段。2013 年底，中国人民银行的银发 [2013]168 号新规定，今后将逐步推出人民币跨境支付 CIPS 清算系统，境外参加行可以直接和境内代理行进行相关人民币的划付（即直接联通 debit 和 credit 双方）。一旦 CIPS 建成，将无需再通过境外清算行办理人民币业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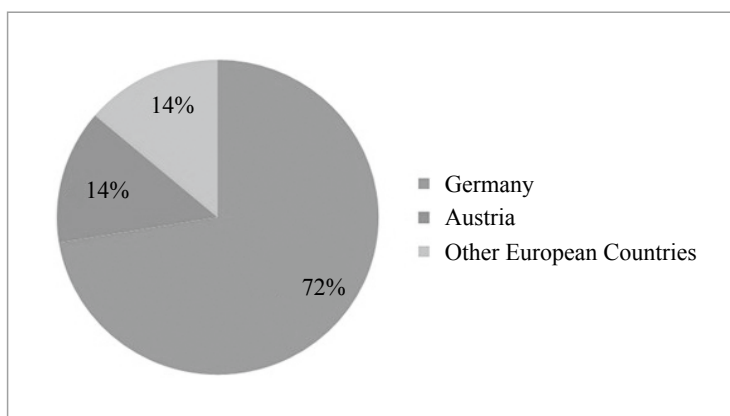
此外，在外资同业银行中，德意志银行、汇丰、渣打、花旗等银行利用境外客户资源优势及专业技术优势，在人民币境外发债、人民币全球现金管理、人民币外汇交易、离岸人民币资产托管等领域积极建立差异化竞争优势，在跨国公司的人民币业务市场上也占有可观份额。例如，德意志银行从 2011 年 2 月份起就已经开始办理人民币业务。根据该行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的答复，该行平均每周都可以开立 20 个人民币账户，可以向企业客户提供人民币汇款、人民币信用证等各类结算服务。

3. 法兰克福人民币离岸市场的结构

法兰克福人民币离岸中心立足于两个市场：国外客户主要包括德意志银行、德国商业银行、德国中央合作银行、德交所、丝路基金、保险公司、私人银行等当地金融机构；国内客户包括国有商业联合、股份制银行和地方性银行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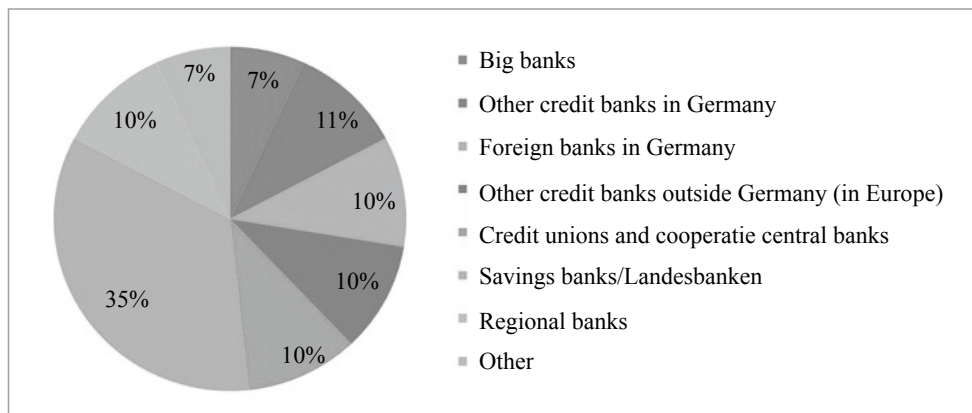
截至 2015 年 4 月末，包括德意志银行、德国商业银行和德国中央合作银行等在内，

已有 32 家外资银行和 6 家海外联行在法兰克福人民币清算行开立了离岸人民币清算账户，共计 38 户，人民币直接清算网络基本覆盖欧元区。开立清算账户的金融机构来源地可大致分为三类，分别是德国、奥地利以及其他欧洲国家。其中德国当地金融机构占据主体，占比 72%，来自奥地利和其他欧洲国家的金融机构占比则同为 14%。



按照金融机构的类别划分，则可大致分为八类。其中储蓄银行/地方银行占最大比例，为 35%；其他种类几乎平分秋色，大型银行占比 7%，其他德国信贷银行占比 11%，

德国境内外资银行占比 10%，境外其他欧洲银行占比 10%，信用合作社与中央合作银行占比 10%，地区性银行 10%，其他占比 10%。



4. 德国人民币市场的需求特点

从目前市场及部分德国企业的反馈来看，当地个人对人民币业务的需求着重于通过部分个人资产人民币化来进行资产保值：出于对欧元未来走势的担忧，不少德国本土客户来法兰克福人民币清算行咨询有关涉及人民币兑换、理财产品、定期存款等问题，希望通过将现有存款转换成人民币存放以进行资产保值。还有一部分当地客户侧重于人民币的现钞兑换，主要是方便去中国旅游、出差使用；对于这些客户来讲，丰富的理财产品、相对优惠的人民币业务价格及稳定的人民币升值潜力将是他们的主要需求。

当地企业开立人民币账户主要目的有两个：一是跨境人民币贸易结算业务。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希望在与国外客户进行贸易往来时使用人民币作为交易货币，尤其是当中国企业在交易中略处于强势地位时，这种现象将更加明显。为顺利完成该类交易，能够方便中国接受人民币款项或向中国支付人民币，不少德国企业也会到金融机构去开立人民币账户。二是资产保值或投机。由于人民币离岸价与中国大陆境内价格的差异性、人民币相对于欧元的大幅波动以及欧元区对欧元未来走势的担忧，导致部分德国企业客户即使与中国没有业务往来也到银行开立人民币账户用以资产保值或投机交易。另外，一些大型公司客户有专门的投资型企业，这些企业资产规模庞大，业务领域涉及各个大洲。对资金管理的要求也更为专业化及细分化，单一的人民币产品已经不能满足有足够资金沉淀的大客户需求，人民币跨境组合产品是吸引这些企业和中行合作的重头戏。因此，对于企业客户来讲，完善的人民币支付系统、全方位的人民币业务品种以及丰富的人民币理财产品将是他们的主要需求。

三、法兰克福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利弊分析

法兰克福人民币离岸中心的成立与发展不仅仅是中国在人民币国际化道路上的重要布局，同时也关系到中德两国的发展利益。参与国际贸易的企业将成为最大的获益方。同时我们还需清醒地认识到，离岸中心的发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其中还需面对不同的困难和挑战。

1. 中方利益

转移企业汇率风险 使用人民币清算能够为中国公司带来一些好处。一是企业使用本国的货币清算可以减少外汇风险和对冲成本。在以往以美金或者欧元结算的过程中，为了减小汇率变动风险，企业在报价通常都保留一些余地，这样才能确保在汇率出现大幅度变化时，仍然保证一定的利润。如果变成人民币清算的话，风险就转由国外的交易方承担。

提高企业资金管理效率 另外的好处体现在现金管理的效率上。例如以前企业收到外币后，由于要出具一些文件或手续，不能马上将外币兑换成人民币，而是需要一段时间后可以换到人民币供资金周转使用。而使用人民币直接收付则可以使人民币立刻进入中方企业的账户中，供企业资金需求，大大提高了企业在现金管理上的效率和控制力。

减少企业汇兑成本 自2014年9月30日以来，银行间外汇市场开通人民币对欧元直接交易，国人赴欧元区国家可以将人民币直接折算成为欧元，而不必像此前那样先折算成美元再兑换成欧元，这意味着可以减少一半的汇兑手续费用。而企业、个人在境外贸易支付中直接使用人民币，更是能够极大程

度地降低经济主体汇兑成本，有利于加强中德两国金融合作，减少对美元的依赖，增强人民币汇率的自主性。

提高人民币国际性 随着人民币离岸中心在法兰克福、伦敦、卢森堡、巴黎的落成，人民币国际化在全球布局中的西欧板块彻底打通，且在每一地区各有侧重。伦敦为全球最大的外汇市场，借助其世界顶级金融中心优势，也在未来的离岸人民币外汇产品发展中起到主导作用。德国作为中国在欧盟最大的贸易伙伴，拥有欧洲大陆最多中资机构驻地，人民币需求相对旺盛。但德国金融监管较为严格，可能对人民币离岸产品发展有所限制。卢森堡是欧洲最大的债券发行中心，也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基金中心，有着欧洲最大的人民币贸易融资量和资金池，目前已上线人民币计价共同基金。巴黎虽然目前人民币业务规模并不大，金融区位优势也不明显，但法中关系紧密，巴黎人民币离岸中心可作为中国与法国发展人民币业务的一个潜在桥梁。

2. 德方利益

消除时差和语言障碍，中小企业获益 中德两国时差7小时，导致德国企业的人民币贸易结算和清算都只能在早上进行。加之语言不同，更为人民币业务在德国的开展增添了壁垒。德国的中小企业是中德贸易的中坚力量，但恰恰是这些中小企业却缺乏大型跨国公司的国际运作机制，也少在香港、澳门或新加坡代理行开户，在贸易清算和结算中会因时差而利益受损。因而在法兰克福设立清算中心，不仅能够为同一时区的整个欧元区的企业提供贸易结算、贸易融资和贸易担保业务，更可以减少交易时间，降低交易

成本，提高产品价格上的竞争力。

提供贸易避险工具 从过去中德和中欧双边贸易的经验看，由于中国企业缺乏对冲风险的外汇期权产品，他们更倾向于在贸易中用人民币支付，而德国以及欧洲企业为避免汇率损失，担心人民币可兑换性等问题，自然更倾向以欧元结算，这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贸易暗礁。法兰克福清算中心可以提供更多样的外汇期权，同时使人民币在德国以及欧洲支付与使用更加便捷，这将促进欧洲企业更多使用人民币支付与结算，为他们带来更多的人民币流动性，进而推动双边贸易的进一步发展。按照法兰克福金融的保守估算，仅从人民币支付一个方面考虑，中国和欧洲在贸易中每年将会节约成本5亿欧元，如果算上整个贸易和投资金融业务，新增收益将更大。^③

提升法兰克福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如果说法兰克福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建立是人民币“走出去”的一次胜利成果，那么在德国人眼中，将人民币引入德国金融市场也是法兰克福作为国际化金融中心的一次战绩。德国央行董事 Jochen Metzger 表示，为争夺欧洲金融中心地位，法兰克福必须抢占先机，迅速部署人民币结算的解决方案。德意志银行甚至表示，人民币的到来有助于完善该行的业务。足由此可见人民币在德国的国际化是具备业界共识的，也是符合双方利益的。

促进两国经贸往来，助力德国经济发展 法兰克福人民币离岸中心能够降低成本，规避风险，为贸易支付提供便利，从而提高当地资金的流动性，有助德国经济发展。而人民币在两国贸易间的流通，能够吸引更多中国企业与德国合作，促使两国在经济和金融方面的联系更加紧密。

^③ 张凯，李冰溪：《法兰克福人民币离岸中心研究》，载《德语国家资讯与研究》第五辑，2015年。

3. 法兰克福人民币离岸中心面临的挑战

法兰克福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建立虽发展迅速，良多益处，但整体而言，仍存在一些弱势方面，在未来仍需克服一些困难：

第一，整体规模相对较小。与最大的人民币离岸中心香港相比，其在全球跨境人民币支付总额的占比是德国的114倍，其人民币存款数额则是德国人民币市场存款数额的83倍。

第二，缺乏有效的人民币投资产品和回流机制。目前因德国当地人民币对公理财产品的匮乏，当地企业收入的人民币一般均兑换为欧元，导致人民币存款自2014年第三季度到2015年第一季度之间持续在116—177亿元水平，无法持续增长。就德国人民币市场而言，人民币外汇市场中以投资避险为主的衍生类外汇产品较少，发展深度不够；人民币股票市场仍未开始发展，且受无关因素干扰严重，投机氛围较浓。

第三，人民币离岸市场与在岸市场仍存在分割。在岸市场人民币汇率频受中央银行政策干预，利率也尚未实现完全市场化，而离岸人民币市场几乎不受金融管制，更能反映人民币真实的市场供求，两个市场间的汇率和利率差异必然会导致以投机为主、缺乏真实贸易背景的套汇、套利行为的发生。例如2015年8月，央行为维持汇率在岸市场抛出美元，买入人民币，造成了人民币在岸价格和离岸价格进一步扩大，大批套利者在岸购入人民币，然后离岸卖出获利，造成我国资本外流加大，外汇储备消耗。

第四，清算系统不够完善。正如上文提到的，当前人民币跨境结算业务依托于制定境外清算行模式，清算行并无法与中国人民银行的CNAPS建立直接连接，导致国内分行实际收到款项往往隔日午夜才能到位。而中国人民银行开发的人民币跨境收付信息管理

系统（RCPMIS）也不是信息实时报送系统，属于事后信息报送、统计、监测。在清算系统方面，主要依靠大额实时支付系统，还未形成独立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系统运行时间仅有8小时左右，很难与其他相距较远时区的跨境业务结算进行接轨，支付指令的处理过程复杂且低效，为资金管理增加了难度。

第五，欧洲各离岸市场相对分割，尚未形成合作互联的网络体系，且各个离岸中心之间存在竞争关系。从欧洲美元市场的发展来看，其起源于伦敦，由不同枢纽的广泛联系构成，伦敦为主要的金融中心，而其他枢纽服务于其他时区和网络，通过资金的自由流动共同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因此，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发展不仅需要上述市场的各自完善，也需要形成合作体系，共同促进人民币资金的流动。

四、对于法兰克福人民币离岸中心的政策建议

国际经验表明，在国际金融中心的离岸交易规模决定了货币的国际地位。对于法兰克福、伦敦等成熟国际金融中心来说，开展人民币离岸业务的主动权在于市场主题的自发选择，而这个水到渠成的过程可能非常迅速，也可能极其漫长。目前，我国正处于汇率体制改革的转折期，人民币资本项目下尚没有实现完全可自由兑换，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的兴起可能会对境内的货币政策和人民币汇率形成冲击。建立起良好的离岸人民币市场秩序，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应将以下几点作为重点关注方向。

第一，拓宽法兰克福离岸人民币投资产品种类。目前法兰克福离岸人民币市场业务仍然集中在贸易结算和融资上，远不及起步最早的中国香港市场——近年来已陆续推出

以人民币计价的基金、货币期货、交易股本证券等。因此，法兰克福人民币离岸市场应当不断丰富离岸市场人民币投资产品，增加境外投资者对离岸人民币市场的投资意愿，以满足不同投资者的投资偏好，扩大离岸人民币资金池。

第二，加强法兰克福离岸与在岸人民币市场的联动发展，开通人民币回流渠道，解决收付不均的问题。首先要循序渐进地开放资本账户。逐步取消外币作为投资性货币兑换成人民币的汇兑限制，并逐步开放国内资本市场，放松管制、提供优惠。可适时增加人民币合格境外投资者（RQFII）额度，允许更多的境外机构加入 RQFII 行列，放宽投资范围。其次，我国也应加强国内金融市场体系建设，加强金融体系的抗冲击性。

第三，维护人民币汇率长期稳定。人民币升值可以提高境外对人民币的接受程度，而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可增加境内外企业对人民币的信心，使用汇率稳定的人民币可以有效防范国际贸易与投资中的外汇风险。我国应打破人民币单边升值的预期，使人民币汇率逐渐趋于稳定，以防止套利套汇现象的发生。其次，应当增加外界对人民币汇率预期的准确性，能够有效利用人民币衍生产品规避汇率风险。

第四，加强各离岸市场的联动发展。近

年来随着瑞士、卢森堡、韩国首尔、新加坡、英国伦敦、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人民币业务不断扩充，适时建立起各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合作互补机制将更有利于扩大人民币在境外的使用范围，有效促进人民币资金的境外流动。就当前而言，各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水平不一，但它们都具有各自的优势，其相互关系应为合作共赢大于相互竞争。

第五，提高我国对外经济发展水平，争取出口贸易中的货币选择权。国家应加大投入，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积极扶持出口企业技术创新，积极研发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差异化程度高的产品，改变我国作为加工贸易大国在国际贸易关系中的附属地位，争取产品定价的主动权，助推人民币成为计价结算货币。此外，国家还应促进我国企业跨国经营，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从而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第六，建立完善人民币跨境支付体系。人民币跨境结算业务的顺利开展需要有完善的金融基础设施作为支持，尤其是设计合理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不仅可以保证人民币跨境支付业务的安全、稳定，而且可以提高结算业务的运行效率。我国应加快步伐建立完善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在保证资金安全的前提条件下，提供多种支付途径，适度简化系统运行程序，提高效率。

作者简介：李冰溪，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硕士研究生。

张凯，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讲师，博士。

基民盟、基社盟和社民党 《联合执政协议》的经济等部分（译文下）

陈 扬 丁思齐 王少辰

我们将根据津贴政策的方针，对所有以往和今后将发放的补贴进行持续的核查。我们要强化联邦财政预算的投资性导向。

优先 / 首要措施

由基民盟、基社盟和社民党组成的联邦政府，在本届立法会议任期内优先实施下列财政措施，这些措施在融资上不受限制。

德国的城市、乡镇、县级的财政应得到进一步减负。2014 年联邦政府承担基本养老保险费用的最后阶段就会开始，这将为乡镇减少 11 亿欧元的财政负担。此外，随着《联邦共享法》（Bundesteilhabegesetz）的通过，乡镇每年将获得 50 亿欧元用于援助融入社会补助金方面的财政负担。而在此法律通过以前，乡镇便开始获得政府提供的每年 10 亿欧元的财政援助。

如何为建设托儿所、日托所、中小学校和高校筹措资金，是各联邦州和乡镇都面临的重大挑战。为更好地解决融资问题，在本届立法会议任期内，所有联邦州将获得 60 亿欧元的援助。倘若这一用于照料儿童的预算

资金不能满足他们的成长需求，政府将根据需要增加投资。

政府额外启动了 50 亿欧元，用于公共基础设施的紧急必要投资。

我们为城市建设额外提供 6 亿欧元，以实现每年 7 亿欧元的投入。

我们要使德国在融资之路上继续前进，实现用于发展合作的资金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为“百分之零点七”（ODA-Quote）的融资目标，为此我们在本届立法会议任期内提供 20 亿欧元。

本届立法会议任期内，政府将为养老金保险在计划之外增加 20 亿欧元补助金。

为鼓励求职者重新就业，资金投入将会增加 14 亿欧元。

联邦将继续为高校外研究机构、高校公约、研究和创新公约以及大学卓越计划提供资金支持。未来，校外研究发展的资金由联邦独自承担，相应的资金达 30 亿欧元。

此外，联盟政府一致决定，在本届立法会议任期内，政府财政资助可供灵活支配部分中的 1/3 用以帮助减轻各州财政负担。

可靠的税收政策

我们的国家依赖于可靠的税收。为此，社会的共识不可或缺，而共识则基于公平的税法，其重点是按能力征税，同时保证没有人牺牲公共利益而逃避纳税义务。税法的具体制定应适应全球化时代下的当代社会的要求和特征：税法必须为企业的革新和投资提供良好的框架条件，以维持并继续增加就业岗位和社会财富。税法并非永恒不变的法律，鉴于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它必须作出适当的调整，以保证其追寻的目标在未来同样可以实现。从总体上看，德国的税法符合当今时代特色，并具有竞争力。在这个不断发展变化的世界，我们将不断完善税法，同时保证纳税人和公共部门便于做计划。

税务简化和税务执行

简化税务是一项长期任务。逐步推进税务简化，是一项重要的政策性目标，其中特别要注重运用现代化的数据处理技术。所有参与征税的群体都将受益于这项长期进程：无论是纳税人、管理者还是税务顾问。在2017年的税额估定期之前，我们将为所有有义务纳税者使用预先填好的纳税申报单。对于没有额外收入的退休人员，自2015年税额估定期开始要使用预先填好的税务申报单，并附有财政部门出具的数据。

我们将扩大公民通过电子平台与财政管理部门交流的机会，全面取消寄发纳税申报纸质凭证。为确保均衡纳税，我们将以风险导向性的参数作为制定纳税申报单依据。

我们会让更多人接受夫妇纳税因素程序（*Faktorverfahren für Ehegatten*）。今后，纳税因素将不再每年制定一次，而是若干年确定一次。只有在收入或收入分配变动幅度较大时，因素才会被调整。此外，我们要求各联邦州通过税务管理部门采取适当措施，使第

四级征税（*Steuerklasse IV*）的因素流程为更多人所熟知。

我们也致力于从企业所得税着手，实施自主估定程序（*Selbstveranlagungsverfahren*），从而进一步完善税收程序法。

我们将在保障各联邦州权限的前提下，通过适当的措施强化联邦税务总局 [*Bundeszentralamt für Steuern (BZSt)*] 的职能。联邦税务总局将继续发展成为各州税务稽查部门的中心联络部门，以便为各州的税务稽查提供更好的支持。另外，它还要成为解决税务问题、提供境外自然人和法人义务经济状况信息的中心联络部门。

为更加有力地打击逃税、社会保险欺诈、打黑工和非法用工行为，我们将完善包括《打击黑工法》（*Schwarzarbeitsbekämpfungsgesetz*）和《工商业管理条例》（*Gewerbeordnung*）在内的法律框架，加强对财政监管部门的人员和信息技术配备，使之运行更加有效。在跨境商品流通的税务征收领域，为改善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风险分析水平，宏观框架条件也应得到完善，从而减轻旅行者负担，更加高效、有针对性地实施监管。

我们将集中管理联邦劳动局（*Bundesagentur für Arbeit*）的家庭补助金部门（*Familienkassen des Bundes*），同时欢迎各州能在各自权限内参与这个集中化的过程。

我们将同各州共同推动税收领域的信息技术扩展，有限制地实施《非适用法令》（*Nichtanwendungserlass*）。在宪法框架内，税法具备的追溯效力应仅限于确保基本税收的安全以及杜绝滥用减税模式。

城乡间在税法方面的合作不应受到妨碍。我们反对通过向城乡征收销售税的方式来增加其协助义务的做法。必要时我们会努力在欧盟法律框架下全面取消通过征收销售税获得收入的可能性。通过对投资领域征税的彻底改革，联邦政府将重新解决如何处理出售

公众持股而获利的税务问题，并从中获得必要的结论。尤其应在天使基金和新兴公司领域对于投资者不直接介入业务情况而产生的特殊不良后果寻求办法。

打击逃税，杜绝避税

我们将坚决打击跨国企业进行跨国的利润转移活动，努力实现税收管理层面的完全透明，打击恶性税收竞争，这些是我们税收政策的中心任务。我们要避免企业在收入方面双重免税和支出方面双重扣税的情况。

2015年完成“解决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提案”[OECD-BEPS (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 -Initiative]，我们积极支持这项旨在应对国际性避税问题的计划。目前我们尚不能在这一倡议的框架内实现目标，因此我们将在国内采取措施，其中包括：企业向未能从事有效商业活动的皮包公司支付款项时，其支出相应的减税部分受到限制，参照《反洗钱法》(Geldwäschegesetz)，为所有参与信任建构过程的经济主体建立公共登记册。

我们也要保证，从许可证使用费中扣除的税收应与许可证接收使用国从使用许可证所获收益中适当缴纳的税收吻合。必要时，我们在德国会率先依照该项国际规定推进这一立法进程。

在财政管理的税收事务中创造更高的国际透明度会极大地促进税收竞争公平，更好地避免逃税现象出现。因此，我们要按照欧盟的规定，在银行业和原料贸易行业中引入各州进行特定报告的做法，这些报告主要涉及所获盈利、造成的亏损状况以及在各联邦州的税务管理部门间已缴税的情况（“州州通汇报” „country-by-country-reporting“）。基于20国集团国家及政府首脑和20国集团各财政部长所做的决策，我们将努力推动经合组织内达成的、旨在交流信息的示范性协议修订工作，使实现税务信息交流的自动化成为国

际性标准。在实现修订之前，我们将会参照6个欧盟成员国之间达成的这份协议，继续就信息交流的自动化事宜签订双边或多边协议。下一步，我们将使欧盟利率准则的适用范围扩大到所有的资本收益、自然人和法人中。

我们将努力使欧盟内的企业税法得到更好的协调，制定统一的企业所得税税基便是其中的切入点。

营业税欺诈是国家财政中最主要的逃税形式。我们要有针对性地运用快速反应机制，以提前杜绝营业税欺诈现象：我们将注意，德国营业税税法的复杂性是必要的。必要时我们还会采取其他行动。对于欺骗行为，各联邦州财政管理部门可以向联邦税务总局这一联络中心寻求帮助，不限行业。

联邦政府将继续为《避免双重征税协定》(Doppelbesteuerungsabkommen, DBA) 确立本国国内的谈判基础。《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不仅应避免双重征税，也应避免双重免税现象（所谓的“白色收入”）。因此，我们将继续就《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中的相关条款谈判，并在此期间确保这些原则体现在国家层面的规定之中。

我们将以离岸金融中心为平台，在国家、欧洲和全球范围内持续打击避税现象。

我们将考察，企业重组税法 (Umwandlungssteuerrecht) 如何实现股份交换和附带资金补偿的重组在免税的同时不与制度相违背。股份交换和增付款 (Zuzahlung) 相结合时，增付款可能会受到份额限制，但不应被完全取消。

我们坚决打击逃税现象。在财政部长大会 (Finanzministerkonferenz, FMK) 的报告出台之前，只要存在行动的必要，我们都将进一步完善关于免受惩罚的自我检举的规章制度。其中的一个出发点是：将来，自我检举的效果有赖于对税法诉讼时效（十年）内情况的完整供述，所以纳税人为免除过去五

年的处罚，还需要纠正、补充或追补更早的一个五年期中的供述。此外，如果未能准确阐明在国外因超过法定时效而免缴税（Festsetzungsverjährung）的某些情况，我们将采用规定的诉讼失效期（Anlaufhemmung）。倘若在若干年后才可知晓国外税务的真实情况，现时便可以继续实施征税。联邦政府将检查，联邦金融监管局（Bundesanstalt für Finanzdienstleistungsaufsicht, BaFin）通过改善向各财政部门的信息传递情况是否能更加有效地打击逃税行为。

营业税，遗产税，地产税

完善稳定的财政资金保障是实现城乡自治的核心，其前提在于有充足的资金，它将使各城乡履行造福公民的职责使命。营业税是城乡收入的重要来源，我们希望在未来的几年内，可以在现行法律的基础上保证规划可行。

现有的遗产税规定使企业内的代际交替成为可能，并且保护工作岗位，该税一直是各联邦州重要的收入来源。

对于地产税，在延续以往城乡具有制定营业税和地产税征收税率权的同时，将与时俱进地对其进行改革。我们要求各联邦州在现行审核程序通过后形成统一的立场。改革旨在确保地产税成为可靠的城乡收入来源，也就是说保障定期的收入，同时建立法律保障。

欧洲银行业联盟

我们需要对金融市场，尤其是对银行领域巧妙地治理。未来，银行自身必须能为危机情况提供更多的资金，而不是像过去一样由纳税人负担。任何想通过从事风险交易而获得高收益的人，也必须为其风险担责。倘若盈利的私有化和亏损的社会化相对立，社会福利市场经济的运行法则也就因此而失去作用。

我们需要一个运行有效的银行业联盟，它

由统一的银行监管、统一的政策规则以及统一的银行破产清算机制构成。我们努力顺利落实银行监管，为避免利益冲突，我们支持欧洲中央银行明确分离监管政策和货币政策。由储蓄银行、合作银行和私人银行构成的德国三支柱模式的特征，必须在监管中得以体现。除小型和区域性货币机构以外，体系内的银行应一律接受欧洲中央银行的直接监管。

在整顿和清算银行方面，我们致力于严格遵守明确的责任担保层级（Haftungskaskade）的政策，保证银行债权人（Bankgläubiger, Bail-In）始终入股。今后，必须优先使财产所有者和银行债权人承担责任，而不是纳税人。存款额小于10万欧元的储户应受到保护。

我们将在法律保障的基础上建立欧洲清算机制，使得银行清算能够及时、有效地进行，并具有效益。我们要设立一个运行顺畅的清算机制，以充分保护各成员国的预算主权。

基于这样的背景，我们将为顺利设立欧洲清算部门提供支持，它将负责体系内的跨境银行；我们也会支持设立统一的欧洲清算基金，预期它将完全由银行的赋税提供资金支持，银行纳税额度主要参照银行的体系相关度（Systemrelevanz，即是否大到不能倒——译者注）、规模以及风险收益。

倘若在设立欧洲基金之前，各国所付的基金、资产所有者和债权人的投资金额全部相加后不能满足银行的清算和重组需要，则由银行所在的成员国对此负责。联邦政府主张，国家财政中用于救助银行的意外性支出不应纳入《经济稳定和增长法》规定的3%赤字标准中。倘若成员国无法独自救助银行，甚至面临经济下行的危险，可按照现行程序申请获得欧洲稳定机制援助。

在德国立法机构作出相应决策、欧洲中央银行正式接管监督功能之后，建立欧洲清算机制的提案一经通过，便可考虑采取银行

直接再融资的新手段，作为临时性方案。依照现行欧洲稳定机制的规定，融资额最高可达 600 亿欧元。如满足相应条件，责任担保层级的政策可以成为最后工具。启用它之前，应确保其他所有被优先考虑的手段都已用尽，且鉴于国家的偿债能力，无法启动欧洲稳定机制中的间接银行计划。我们反对始终让纳税人承担直接的银行风险。

保证存款安全是金融市场稳定性的重要元素。因此，在保留本国特色的前提下（尤其是储蓄银行和合作银行），协调欧洲各国对存款保险制度的要求，这是银行业联盟的又一重要元素。德国的存款保险制度在危机中被证明是稳定的，我们反对在欧盟层面上使存款保险制度一体化。

有行动力的联邦政府、联邦州及城乡

联邦制度是民主体制的一项优势，也是创造德国实力的一项重要因素。面对全球化和欧洲化带来的挑战，我们务必始终保持联邦制度行之有效，无论是联邦、各州还是城乡一级，都能以高度的独自负责的精神履行职责。

城乡是我们社会公共体的中心，在公民生存关怀和当地基础设施方面履行着重要职责。为实现基本法中保障的城乡自治，城乡必须具备行动能力，而金融业的健康发展是其前提。为此，联邦政府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重要的措施有：自 2014 年起，联邦政府将补偿城乡用于基本养老保险和劳动能力欠缺人士基本保障的所有净支出；投入资金，用于扩大护理 3 岁以下儿童的服务；调整用于将大企业剥离（Entflechtung）为小型独立企业的资金，使其在（含）2019 年前保持目前的水平。自 2012 年起，城乡已实现融资盈余，总体势头良好，但各城乡财政状况的差异却很明显。

我们将拟定《联邦残疾人福利法》（Bun-

desleistungsgesetz）、《联邦共享法》（Bundesteilhabegesetz）。上述法律生效后，将减轻城乡在援助融入社会补助金方面的负担。为此，我们将调整旨在帮助残疾人士分享社会成果的新型组织，避免增加组织的支出。

最晚在 2019 年末，联邦和各州间的财政关系要得到重新调整，各州的财政收支平衡状况也需要重新调整，此后各州将不再有结构性赤字。在本届立法会议任期内，联邦政府和各州必须确定其发展方向，并将为此开展对话。

执政联盟将同时设立政府和联邦州都有代表出席的委员会，其中也包括各城乡的代表。委员会将解决联邦体制下的资金供给关系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建议。在本届立法会议任期的中期之前，委员会将递呈下列议题的结果：

1. 《欧洲财政契约》（Europäischer Fiskalvertrag）
2. 创造条件，使各州巩固和长期遵守关于财政预算的新债务规定
3. 联邦各层面的收入和职责分配，以及自负责任
4. 改革各州财政收支平衡的方法
5. 旧债、融资方式和利息负担的状况
6. 团结附加税的前景

4.1. 共同发展，促进机会均等

实施人口结构的变化

基民盟、基社盟和社民党组成的执政联盟将人口结构变化视为全社会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也是社会诸多领域所面临的任务。

我们和各城乡、联邦州以及社会伙伴共同为各年龄层的人群制定政策，以维护国家的社会团结。为此，我们会进一步改进联邦政府的人口战略，通过这一战略为不同的层面和行动主体制定解决方法，协商各方应缴

纳的社会保险费。

我们为不同年龄段的人搭建桥梁。为此，我们将进一步发挥年长者的资历优势，支持企业内队伍的年龄差异化。我们将鼓励企业和劳资伙伴，进一步强化再教育协议在劳资协议和企业协定中的地位。我们要使年长的雇员还可继续找到就业良机，为此，我们要努力实现工作岗位更加良性的发展。

人口结构变化给各地区带来的影响千差万别。比如新联邦州的人口结构变化更大，我们将通过联邦和各州设立的人口门户网站推广当地行之有效的措施。我们要更加积极地做好准备，以便灵活、机智地应对人口结构变化，比如加强运用数字化和移动通信手段。我们通过开展人口优势竞赛，支持有效应对人口结构变化的地区。

我们将设立一个审查程序（人口审查）（Demografie-Check），用于继续重新考察法规计划、路线方针和投资对后代的影响。我们将把有利于家庭确立为立法和行政活动的主导原则。

我们要在全国创造条件，为公民提供良好的照料服务，使城市和农村的发展齐头并进。农村与城市同样有权享有良好的发展机会。我们将进一步改进“农村基础设施倡议”（Initiative Ländliche Infrastruktur），并与各州共同为结构欠缺、尤其是受到人口结构变化影响的地区制定行动方案。加强城乡间的合作是促进农村地区良好发展的重要方式，我们将继续支持城乡合作。

人口变革拉动了对卫生、护理和社会福利领域高素质人才的需求。我们开展专业人才攻势运动和覆盖面广的动员活动，以期提升该类行业的价值。

我们要成为应对人口结构变化的领军国家，并成为提供满足年长者一代需求的新产品和服务的主导市场和主要供应商。

加强家庭建设

我们要促进生活在我们国家中的所有人彼此共处，而无论各人在宗教、政治、世界观或性取向方面的异同。我们要支持那些始终互相承担责任的人们。为此，我们要从用于家庭生活的时间、良好的基础设施和物质保障组成的“三和弦”入手。我们要使儿童和青少年享有健康成长的机会。我们要积极推动实现平等待遇。我们要使男性和女性在家庭、工作和社会领域共同履行职责，并消除当前尤其出现在职业生活中的性别不公。为此我们制定一项政策，该政策既能考虑到当今时代不同的生活走向，同时也能为应对人生各阶段的挑战提供答案。这项政策只有在将社会的人口全面作为服务对象时才是成功的。我们应将家庭、老年人、女性和男性、儿童和青少年纳入到人口发展战略之中，该战略在本届立法会议任期结束后会继续实施。

家庭和职业的结合，家庭教育，看护，学校教育，幼儿日间看护

我们要继续提高幼儿日间看护的质量，旨在整顿人员配备、专业人才的资质认证、进修、供给问题以及语言培训方面的问题。我们要逐步扩展幼儿机构的全日制看护工作。将专业人才进行的语言培训成功纳入“幼儿日托所的重点是营造先机——语言和融入”（Frühe Chancen Schwerpunkt-Kitas Sprache & Integration）的联邦项目之中，我们要使语言培训进一步融入日常教育之中。

联邦政府和联邦各州将继续落实为三岁以下儿童提供日托所名额的法律权利（Rechtsanspruch U 3），并为此启动第三次投资计划。

我们将继续加强幼儿日间护理的建设，改善相关职业的形象。应进一步提高日间护理人士的职业资格水平，改善其工作的框架

条件。这样，幼儿日间看护便符合高质量的护理、教育、培训总纲领。

我们将更加积极地鼓励企业提供幼儿看护服务。我们将继续开展“企业中儿童看护”的促进项目，以此直接激励企业在内部设立儿童护理小组。

家庭是成功要素 (Erfolgsfaktor Familie) 和所在地家庭联盟 (Lokale Bündnisse für Familie)

有利于家庭必须作为企业的中心目标。我们将同德国经济界、工会和大型基金会的顶级联合会共同努力，通过“家庭是成功要素”(Erfolgsfaktor Familie)企业项目使更多企业认识到有利于家庭的益处。《兼顾家庭的工作时间宪章》(Charta für familienbewusste Arbeitszeiten)要求由社会伙伴代表和联邦政府代表组成的委员会每两年递交“家庭和职业世界”(Familie und Arbeitswelt)报告，并附建议。我们支持与城乡以及来自经济界、工会、社会各界的行动主体展开合作，这种合作是在为家庭提出的“所在地联盟”(Lokale Bündnisse)倡议框架下开展的，且行之有效。我们会规划这一进程。

再就业

我们将通过继续实施“再就业前景”(Perspektive Wiedereinstieg)项目，以及创造更多的深造机会，帮助女性和男性在度过稳固家庭的一段时间后，重新找到一份具有社保义务的职业。公共事务部门的人员聘用和提拔也应从积极角度考虑儿童教育的因素，处在组建家庭稳固期的女性和男性不能因此在事业上遭受歧视。

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家庭之中：加强伙伴关系

时间政策：

家庭需要其成员为彼此付出时间，所以

我们将重点制定一项现代化的、以人生经历为导向的时间政策，以帮助女性和男性将职业、家庭和贡献精神结合起来。

我们要使家庭重新成为生活节奏的主导者：雇主、照管机构、学校，政府部门和行政机关、服务部门和交通企业应更充分照顾到各个家庭的时间需求，协调运营时间和服务答疑时间。时间政策极大地提高选择的自由度，提高伴侣的家庭共同生活的质量。

育儿假：

我们将灵活规划 36 个月的育儿假。父母在未征得雇主同意但已适时预先提出要求时，可在子女 3 至 8 岁期间最多享受 24 个月而不再是 12 个月的假期。

父母育儿津贴：

我们将使父母育儿津贴的规定更灵活，以便更好满足父母们的需求，并引入“超额父母育儿津贴”，以改善当前父母育儿津贴的状况。

通过引入“超额父母育儿津贴”我们要使父母们在 28 个月内最大限度地利用父母育儿津贴，同时从事适当的兼职工作，帮助他们，尤其是帮助单亲家庭的父母重新就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结束双重权利消耗的做法(doppelter Anspruchsverbrauch)(即以往父母双方领取津贴的月份总数不超过 14 个月以及对父母在领取津贴期间就业限制的做法)。

我们将通过超额父母育儿津贴实行合作伙伴红利措施，比如可按照父母育儿津贴的 10% 给付。所有领取父母育儿津贴、且双方每周工时均达到 25 到 30 小时的人，都能领取合作伙伴红利。

贴近百姓、扶持家庭的服务：

我们将设立一个服务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各个家庭和年长者可以很快找到提供贴近百姓、扶持家庭服务的合法运营商，并利用这些服务。

尽职的父亲：

一项符合当今时代特色的家庭与平等政策也应考虑男孩和男性的角色。我们要使父亲们在育儿方面和家庭中更积极地发挥作用。框架条件的改善尤为必要，它使父母能合作分配在家庭和职业生活中的职责，让男性能积极承担父亲的角色。

单亲和离婚人士的经济状况：

单亲人士的税收减免额自 2004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以来始终保持在 1308 欧元，应继续提高，今后还将按照子女的数量分等级提升额度。

儿童政策

儿童和青少年福利救济事业：

儿童和青少年福利救济事业应在扎实可靠的经验基础上，通过详细的组织规划，继续发展成为包容、高效且可长期持续、能承载压力的救济体系，其中包括为各种已成系统的援助形式 [如《社会法典 VIII》(SGB VIII)、《社会法典 XII》(SGB XII) 的衔接处，学校赞助商] 提供适当的融资模式。

我们需要青年福利局发挥有效作用，需要同自由的青年福利援助机构建立有效的伙伴关系。所以，我们将大力改进青年福利局的调控手段，同时保障儿童及其家庭享有的权利，并采用以社会区域为导向的预防性思路。我们要与联邦州、城乡及各联合会启动优质对话，就如何推动儿童和青少年福利救济事业重要行动领域的工作进展达成共识。

儿童权利：

保护儿童不受暴力、忽视的侵害，继续推进儿童权利的履行（实施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是本届执政联盟的中心议题。我们将逐一核查各项政策措施和各个法律，审查其

是否与国际上统一的儿童权利相协调。

收养：

我们要继续完善收养程序，使《收养中介法》(Adoptionsvermittlungsgesetz) 与时俱进，强化收养中介的结构。儿童的健康快乐始终是重中之重。

我们将简化获得收养权的途径，提高收养父母陪伴子女的水平，改善对子女抚养的质量。我们将努力在收养法中顾及预期寿命的提高以及延迟组建家庭的趋势这两方面因素，并希望，在收养子女时，这种收养关系不会损害到子女与亲生父母的关系。我们反对代孕行为，因为这损害了人的尊严。在精子捐献方面，我们将在法律中明确规定子女享有对其出生状况的知情权。

联邦儿童保护法 / 联邦倡议早期援助：

我们要进一步提高基于《联邦儿童保护法》(Bundeskinderschutzgesetz) 已经得到改善的儿童保护水平。我们将把从评估《联邦儿童保护法》和当前“早期援助”的联邦倡议中所获取的认识落实到儿童保护的各个领域。这些认识也将指导我们如何设立、规划和继续实施法律规定的基金，以确保先期援助网络体系及家庭给予心理社会学方面的援助。我们也会继续改进前提条件，使儿童和青少年福利救助事业和卫生事业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

我们将开展一系列研究，调查参与者和家庭护理人员在家庭事务方面接受筛选的质量标准及资格。在防止暴力侵害和关系儿童幸福的交往权利相互协调方面，我们将展开科学性调查。

对儿童的（性）暴力侵害，规则体系，前景：

我们要更好地保护儿童、青少年和残疾人士免受暴力，尤其是性暴力的侵害。在本

届立法会议任期内，我们将继续实施有关“在私人、公共机构及家庭领域的从属关系和权力关系中的儿童性虐待现象” („Sexueller Kindesmissbrauch in Abhängigkeits- und Machtverhältnissen in privaten und öffentlichen Einrichtungen und im familiären Bereich“)的年终报告制度，更多地通过规则体系为受害者提供援助。

特别出于对未成年受害者的利益考虑，我们将大幅度延长性犯罪的诉讼时效，因为许多受害者往往在几年甚至几十年后才会说出事实、指控案犯。对儿童和青少年实施的性暴力行为的刑事诉讼在受害人30岁之前不得失效。对残疾人士或其他无抵抗力的受害者施加的事实上违背意志的性侵犯行为，我们将其明确认定为对无抵抗力者实施的严重性暴力行为。为全面保护儿童和青少年免遭性侵害，我们将按刑法174条 (§ 174 StGB) 中的规定，扩大被保护者受到性侵害的犯罪适用情况。

我们将确保负责儿童及青少年性暴力问题的独立专员履行职责，并保证受害者的参与以及独立评定既往的事实。现有的援助基金面向在家庭中的受害者，它将把同教会、各联邦州、联合会和各机构负责的基金合并为一项针对在家庭和机构中的受侵害者的援助基金。为此会成立工作小组，在2014年之前，就如何实施当前已扩充的救助体系提出建议。我们将确保向东部收养所儿童提供基金。

男、女青少年政策：

如今，男、女青少年所扮演的角色是不同的，甚至是矛盾的，他们必须适应新的要求。针对男、女青少年性别特质的工作应得到进一步发展，对性别角色持有的固有观念应得到克服。一项合乎时代要求的平等政策也涉及青少年男性和成年男性。不可因为增加适合青少年男性类工作，而给适合青少年女性类工作增加负担。

独立的青少年政策：

青少年时代是一个特有的人生阶段。我们把青年政策看作一项主要的政策领域，应首先在各联邦州和城乡予以制定。为实现我们的青少年政策目标，我们需要一个强大的联盟，为青少年制定跨部门职能的新型青少年政策，该政策关注所有年轻人的利益。我们同青少年及青年联合会共同完善独立的青年政策的方案。我们要给青年人自由空间，为他们创造机会并提供支持。我们将同青年联合会一并设立“青年核查”(Jugend-Check)计划，以便核查相关措施是否与青年一代的利益相符。

欧洲和国际层面的青年工作：

我们要借助面向所有青年人的青年协会和交流组织来加强青少年和中小學生间的国际性交流，并特别鼓励尚未充分参与其中的青年人参与这些活动。在规划欧盟“伊拉斯谟斯+”(„Erasmus+“)新议程中青少年这一部分时，我们要将校外的青年工作参与者，特别是非正式教育纳入其中。我们要加强在欧盟青年战略框架下的结构性对话。

辅导青年的社会工作，培训，促进机会均等：

我们要让所有在德国的青年人有机会接受符合其能力和兴趣的培训。辅导青少年的社会工作为保证所有青少年的参与和融合作出了重要贡献。通过示范性的试验，我们将继续支持各联邦州和城乡帮助年轻人在从学业到职业的过渡期中都能获得针对个人情况的指导和跟踪关注(第二次机会，青年支持机构Kompetenzagenturen)。

我们与经济界、社会伙伴和公民社会一道为目前的弱势群体增加职业教育的准入渠道。在针对25岁以下人群的《社会法典II》(SGB II)中含有大量的惩罚规则和惩罚实例。

我们要核查其实施效果并作出必要的调整，进一步缩小青年救助体系和其他救助体系之间的衔接漏洞。

青少年联合会工作：

我们支持年轻人以各种青少年联合会建立的自己组织。没有它，民主将难以焕发生机。我们将在联邦一级强化涉及儿童和青少年工作以及青少年联合会工作的基础设施，加大政治和文化教育的力度，从而照顾到有移民背景的年轻人特殊需求。联邦儿童和青少年计划（Der Kinder- und Jugendplan des Bundes, KJP），是确保青少年联合会在联邦层面的中心基础设施良好运行的主要手段。

家庭休假：

我们认同，家庭休假是儿童和青少年辅助的重要部分，我们要通过规划使其既具吸引力，又能经受未来的考验。我们要制定有约束力的质量标准，为家庭休假的日益完善开辟道路。

孕产妇保护法：

孕产妇保护法的改革正在拟订中。我们的目标是：全面的保护、更高的透明度和更少的官僚作风。因此，我们需要对孕产妇保护法的规定作出调整，使其与有关孕妇和哺乳期母亲从业风险的最新认识相一致。

为避免受资助者从联邦母子基金会（Die Bundesstiftung Mutter und Kind）获取的补充性救助基金因交纳押金而遭受损失，我们要共同寻求解决办法，以便使这些资金发挥其原本的作用。

确保平等待遇

联邦反歧视部（Antidiskriminierungsstelle des Bundes）

联邦反歧视部为实现所有人平等共享作

出了重要贡献。我们要逐一落实反歧视部得出的评估结果：

女性比例 / 职业生活的待遇

担任领导职位的女性：

我们要提高德国女性领导者的比例，所以在第 18 届德国议会选举期之始，我们将实施有关企业董事会和监事会中性别比例的法律规定。在员工完全享有共决义务的上市公司中，如其监事会从 2016 年起重新调整人员组成，则其中的女性比例至少应达到 30%。我们将制定一项规定，使因不能达到上述比例情况下空缺的职位仍然保持空缺状态。

我们将要求上市公司或者有共决义务的公司承担如下法定义务：自 2015 年起，企业应确定并公布针对提高监事会、董事会和最高管理层女性比例的有约束力的目标值，相关的报告应透明化。在第 18 届德国联邦议会选举期内首批目标值必须实现，禁止事后将目标值下调的行为。

此外，我们将在私有企业中采取措施，改善女性在企业内各层级的地位。执政联盟将在联邦的职权能力范围内，推行有针对性的平等政策，以提高女性在领导层和委员会中的比例，消除薪资不公现象。为此我们设立了平等度指数（Gleichstellungsindex），并在联邦管理机构中率先积极实施《联邦平等法》（Bundesgleichstellungsgesetz）和《联邦委员会组成法》（Bundesgremienbesetzungsgesetz）中的规定。

我们也要使女性在学术领导机构中的比例至少达到 30%。总体而言，我们将通过实施以阶梯式模型为导向的目标份额，逐步提高女性在科学界的比例。

薪资平等

执政联盟内一致认为，现存的男女性收入差距是无法接受的。我们要同劳资伙伴共

同推动职业领域、劳动评估方面的价值认定,以及对能力、权限和经验的评估。

我们必须达到的目标首先包括提高对护理、看护以及早期幼儿教育工作的价值认可度。为更好落实“同样或同等价值的工作换来同等报酬”原则,我们要提升透明度,拥有 500 名以上员工的企业在依照贸易法作出的财务报告中,有义务对法律标准规定的促进女性发展和薪资平等问题表态。

以此为基础,每名雇员将明确获得个人的知情权。企业应借助有约束力的程序与职员和企业利益代表在各自责任范围内共同消除已经证实的薪资歧视问题。

我们要同劳资伙伴共同启动一项倡议,以便认识并解决劳动合同中结构性的薪资不平等模式。

性别平等的职业选择:

年轻女性和男性的职业和学业选择都带有传统的角色形象观念。就业和学业指导以及在校期间的就业导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正是由于当前数学、自然科学和技术领域以及社会福利、教育和卫生领域缺乏人才,我们要求就业指导能确保性别平等。就业指导必须按照相应的义务向女性青少年和男性青少年提供所有职业和薪资方面的信息。

妇女运动

我们要将包括女性档案在内的现有材料安置在“德国女性数字化档案”(Digitales Deutsches Frauenarchiv)中,并对公众开放,从而推进对德国妇女运动,尤其是民主德国时期和 1989 至 1990 年间转折时期中妇女运动的学术性研究。我们将继续对海伦娜·韦伯奖(Den Helene-Weber Preis)和海伦娜·韦伯预科学校(das Helene-Weber-Kolleg)提供支持,从而提高女性在政坛和有政治决策力的委员会中的影响力,为女性走向政坛铺路。

针对女性的暴力行为,女性之家:

我们将坚决打击针对女性和儿童的暴力行为,为所有受害者提供保护和援助。女性求助电话是受害者寻求帮助的一条重要渠道。我们会统一各个部门打击虐待女性和儿童的暴力行为的措施,并填补救助体系的漏洞。

人口贩卖和性工作场所:

我们要更好地保护妇女免受人口贩卖和强制性卖淫的侵害,更坚决地惩治肇事者。今后不能因为受害者未供述而导致难以对罪犯定罪。我们将根据受害人澄清事实的贡献、在刑事诉讼中的协助以及个人状况,延长其停留权,加强对他们的支持、关怀和咨询。此外,我们在规制性工作领域方面将全面修订《性工作法》(das Prostitutionsgesetz),为维持秩序部门的监督提供更多法律途径。我们不仅打击人贩,还严惩那些有意或蓄意利用受害者的窘迫境遇的人以及滥用这一境遇使受害人从事性行为的人。我们将进一步将剥削劳动力的问题作为打击人口贩卖行为领域的焦点问题。

自己决定如何慢慢变老

充分利用年龄的潜力

我们要提高积极性,消除制度壁垒,使较为年长的人不再被排除在社会之外,而是使自己更好地融入社会,在社会中发挥自己的才能。为此,我们将重新审查各种年龄界限,必要时将对其作出改动。

我们珍视年长者拥有的经验财富。其中许多人都自愿地为社会贡献力量。我们将在人口战略的框架内积极打击年龄歧视现象;通过预防性措施,保证尽可能多的年长者尽可能长期活跃在社会生活中;强化自我救助工作;特别关注年长员工的境况,与经济界和各个协会共同推动老年经济的发展,形成

适于年长者的消费者保护。

多代之家 / 家庭

我们将进一步完善“多代家庭”(Mehrgenerationenhäuser)这一成功的理念,并保持其资金的稳定。多代家庭在体现个性特点的同时,应发展成社会互助和在具体情况进行共享的庇护所和稳固基点,比如它可发展成为包括护理联系点在内的关怀共同体。

因此,我们要创造条件,保障多代家庭能长期存在。我们将同各联邦州和城乡一并考察,需要哪些前提条件才可以尽可能地在所有城乡建立多代家庭。

城乡中的关怀和责任共担

由诸多社会团体和公众代表参与的专家委员会将于2015年春季之前,就“城乡中的关怀和责任共担——建设并确保面向未来的共同体“(Sorge und Mitverantwortung in der Kommune- Aufbau und Sicherung zukunftsfähiger Gemeinschaften)这一议题提交第7次《年长辈状况报告》(Altenbericht)。

尊重性别取向

生活伴侣,彩虹家庭

我们知道,同性伴侣生活关系彰显了当今社会的基本价值。我们将努力消除同性伴侣生活以及一些因为性取向问题在社会各领域受到歧视的现象,取消不利于同性伴侣的法律规定。在同性伴侣收养子女方面,我们将持续推进联邦宪法法院作出的渐进性收养的判决。我们将继续对马格努斯·赫希菲尔德联邦基金会(Bundesstiftung Magnus Hirschfeld)的工作提供支持。我们谴责并坚决反对反同性恋行为和跨性别恐惧症。

我们将把反同性恋和跨性别恐惧症的议题纳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打击种族主义、排外主义、反犹主义、相关不宽容的国家行

动计划”(Nationaler Aktionspla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zur Bekämpfung von Rassismus, Fremdenfeindlichkeit, Antisemitismus und darauf bezogene Intoleranz)之中。

我们将评估修改《人口状况法》后双性人状况得到改善的状况,必要时会加大改善力度,并重点关注变性人和双性人的特殊境遇。

人口融合和移民的规划

德国是一个对世界开放的国家。我们把移民看作是机遇,但并不忽视它所带来的挑战。过去的几年中,我们在促进移民参与和社会团结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移民为我们国家的财富和文化多样性作出了重大贡献。人口融合政策的主导方针始终是促进和要求并重。我们期待,促进人口融合的举措为社会所接受,但也应看到人口融合进程对所有人都有所要求,它是一项全社会的使命。基本法中的价值所设定的秩序适用于所有人。

外籍父母在德国诞生并生长在此的子女,今后将不再被强制选择国籍,多重国籍是可以存在的。其他方面的问题则须遵循现行的国籍法。

共同制定的“人口融合国家行动计划”(Nationaler Aktionsplan Integration),是人口融合政策的基础。人口融合政策也是教育政策,且必须有相应的资金为此提供支持。

促进欢迎文化和认同文化的发展

我们将进一步推动欢迎文化和认同文化的发展,它将促进社会向心力,同时吸引更多我们需要的外国人才。

外国人管理局(Ausländerbehörden)在完善欢迎文化方面行使着关键职能。因此,许多外国人管理局开始将其服务特色更多转向了移民。我们对此表示赞赏,并愿同各州共同推动这一发展态势,通过提供一揽子咨询计划和培训服务,有针对性地扶持各城乡。

每位新移民都有机会获得首次咨询谈话的服务，了解融入社会的渠道。

为新移民提供融入社会的机会应与他们接受咨询的机会更相协调、更好地联系在一起。青年移民部（Jugendmigrationsdienste, JMD）和成年移民咨询处（die Migrationsberatung für Erwachsene Zuwanderer, MBE）也是如此，我们希望将两个部门更加紧密地衔接起来。关于新移民融入社会的各项协定将保证咨询具有法律约束力。我们将继续实施针对有移民背景的母亲提出的“加强资源建设”（Ressourcen stärken）倡议。

欢迎文化和认同文化也要求国家和社会对不同文化开放。我们将使各个生活领域，尤其是义务服务领域（如消防、救护工作）、文化、体育、卫生和护理领域向不同的文化开放。我们认为多样性是一种机遇。因此，我们将在经济界中，同经济界人士共同促进《多样性宪章》（Charta der Vielfalt）和多元思想继续得到完善。我们反对各种形式的歧视。

在联邦政府部门中，我们要继续走“人口融合国家行动计划”所开辟的道路，提高有移民背景人士在公职部门中的比例。其中的一个重点，是争取让年轻的移民者在公务部门得到培训机会。自2014年起，我们将在移民自愿的基础上，参照统一标准，提升移民者在联邦政府部门和业务领域部门的比例。

对国家社会主义党（NSU）右翼恐怖犯罪行为的处理表明，在公职部门尤其是安全部门的业务培训中，必须加强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我们将把零歧视进一步确立为联邦主管相应事务领域中培训和进修深造的目标，并在实践中不断检查其落实情况。移民的各种组织具有重要的桥梁作用。

作为支持移民融入社会进程的伙伴，我们将继续加强对全联邦的专业化组织的建设，也包括信息传播人员和机构的培训（Multipli-

katorenschulungen）以及对构建相关制度、结构体系的资金援助。我们认可媒体领域在呈现移民情况方面的改善，特别是从有移民背景人士在媒体行业的参与度更能看出这一点。然而，我们必须与媒体进一步加强有关跨文化开放问题的对话。比如，我们主张通过导师计划（Mentorenprogramme）促进更多的年轻移民在媒体领域就业。我们要同有移民背景儿童的父母更好地保持联系，为此，我们将发布“强化父母能力”（Eltern stärken）的联邦项目，以使有移民背景的父母们直接参与幼儿日托所和中小学的工作。

掌握德语语言是实现移民成功融入社会的重要前提。我们将提供更多习得德语的机会，继续有针对性地为早期德语习得提供支持。我们支持用于评估和改进语言掌握状况的措施，主张确立共同的标准，目的则在于向儿童提供个性化支持。

我们主张为新的目标群体扩建、开放与职业相关的语言课程。促进移民融入社会的课程是有效的。我们要继续提高其质量水平（针对不同的目标群体和课程规模实行差异化教学，为教职员工提供合适的薪水），我们将继续保证欧盟公民的参与度。经济界也应参与其中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我们将继续促进移民和当地人的和谐共处，对此我们要更充分地利用导师计划（Mentoringprogrammen）（旨在促进教育扶助和家庭扶助关系）。我们将推动志愿性服务组织向不同的文化开放。

促进新移民者的前期融入

移民政策中不能重蹈过去错误的覆辙。移民和融入必须从一开始就携手并进。我们要在新移民入境前，便在其原住国加强实施前期融入性措施，在他们入境后也为他们提供更多咨询指导，其中包括提供新信息，尤其是提供语言习得、职业经历认可方面的信

息，以及教育和医疗卫生制度、以就业或留学为目的的居留可能性等。现有的信息提供状况必须得到改善并联系成网。我们要尽快着手实施移民的融入性措施，比如开设融入性课程。

(以上由陈扬译)

欧盟内部的贫困移民——保持对移民自由的接受态度

我们要保持对欧盟内部移民的接受态度。因此，我们将消除欧盟公民不合理利用社会福利费用的现象。

为提高移民来源国的生活水平，我们将努力促使欧盟从移民来源国征收资金，并有针对性地使用这些资金。为此，我们也将提供一定的行政支持。在欧盟内，我们将力促各来源国在欧盟法律体系框架内对国民颁发欧盟医疗保险卡(EHIC)，且无任何歧视。我们要修改国内法和欧盟法规，以减少社会保障体系对各国移民的吸引力。为此，非常有必要一以贯之地执行政策、整治虚假个体经营者和非法劳工、改善海关和有关部门的现场合作能力、改善有关部门之间信息交换状况、制定有期限再入境的限制以及寻求信息咨询。在考虑到欧盟法院的司法权情况下，求职者基本保障的申请前提条件以及免予征收相关社会福利费用的适用情况须进一步细化。

在个别具有大城市特点的城乡，贫困移民导致在移民融合、生存保障、移民安置以及健康保障方面出现重大问题。我们肯定城乡在克服这些问题方面所作的工作和努力。贫困移民问题较为突出的城乡，近期可以加强利用联邦层面现有和未来的促进计划(比如“福利城市”项目)的力度。

难民保护和人道问题

为给不断调整自己以融入当地生活、被允许长期生活在德国的人以新的愿景，我们

要在《居留法》(Aufenthaltsgesetz)中新增一项法规，使年龄与规定日期不再成为硬性标准。这一改动的基础是2013年3月22日通过的联邦参议院505/12(B)条款[BR Drs. 505/12(B)]。相应居留许可颁发的前提主要是稳定的生活基础。此外，考虑到青少年这一特殊群体的融入能力，青少年申请居留许可的条件将进一步得到简化(居留法25a, § 25a AufenthG)。

在避难者入境数量持续增加的背景下，同时也出于保护寻求庇护者的利益，我们将特别重视缩短避难申请处理的过程。在申请处理的程序方面，到初次决定为止，时间不超过三个月。为使避难法行之有效，我们也将尽快明确无权提出避难申请的人群。

我们将在人事上使联邦移民与难民局更加完备我们将在人事方面使联邦移民与难民局更加完备，以便在避难申请数量提高的情况下保证避难申请程序进行得顺利且合法。

波黑、马其顿和塞尔维亚等西巴尔干国家，将依据《避难程序法》29a (§ 29a Asylverfahrensgesetz)被归入安全来源国家，以使这些国家公民提出的一些无接受可能的避难申请能更快进入审批程序，并尽早结束这些申请人在德国的停留。同时，我们将和这些国家的政府及欧盟委员会一道，努力快速并可持续地提高当地民众的生活水平。

在欧盟边境线上的国家正面对着大量难民涌入的问题。在欧盟的难民政策方面，我们呼吁各成员国之间的团结。

同时，对于欧盟成员国边境合作协调署的边境安全措施以及与第三国的合作，我们始终坚持人权和人道主义标准。我们也必须重视全面履行不遣返原则和海难救助义务。

所谓的“重新定居”计划接纳了许多急需保护的外国难民。这项计划将在与联合国难民署(UNHCR)的合作中得以继续发展，成为常态。最迟到2015年，该计划将在内政

部长会议（IMK）一致通过后，在量的方面得到扩展。我们也将简化重新定居难民的家属随后进入德国的程序。

坚决遣返不需要保护者的情况，我们将研究出协调的战略，并予以论证。鉴于全世界人口流动和移民数量不断增长，我们以更好调控移民和禁止非自愿移民与难民的理为目标，将移民问题更深入、具体地同第三国在发展政策方面的合作结合起来。通过这项举措，我们要将移民、外交和发展政策相互结合，并把遣返和澄清身份等问题纳入其中。应当鼓励移民来源国和过境国在加大打击非法移民力度、合理引导合法移民、加强难民保护方面的合作。为此需要制定一项“移民与发展战略”。

在严重刑事犯罪、有暴力倾向的极端分子和执行关于结束停留的规定等问题上，《遣返法》（Ausweisungsrecht）还需要得到进一步完善，并顾及欧盟法规的适用性，遵守相应法规。

避难申请人和被允许入境人员的有限活动空间（所谓的强制居住）扩展到各国的范围。这里不包括有利于普遍跨国行动自由的国家间协定。在单方面告知目的地的基础上，允许避难申请人和被允许入境人员临时离开所在国一周。对于犯罪人员、违反麻醉剂管制法的人员和即将终止居留的人员，其居留期间的活动空间将受到限制。在学习、工作和工作培训的情况下，通常可以申请免受限制活动空间的规定，并可以申请居住地。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是我们参照的标准，用以对待作为难民单独来到德国的未成年人。我们将把《避难申请程序法》和《居留法》（Asylverfahrens- und Aufenthaltsrecht）中的行为能力年龄提高到18岁以上，由此确立适用于无监护人的未成年难民青少年的救助法具有优先地位。

避难申请者和被允许入境者在三个月后

可以进入劳动市场。在与各州的合作中，我们将向他们提供语言学习课程。

我们将把联邦宪法法院的规定融合进《避难申请者救济金法》（Asylbewerberleistungsgesetz）。

残障人士及非残障人士

没有我们就不要决定我们的事情

新一届联邦政府的残障人士政策之指导思想是包容性社会。无论是否有残障，人们应该一起娱乐、学习、生活、工作、居住。在生活的各个领域，残障人士从最开始就是其中的一份子。残障人士是自身事务方面的专家，我们将着重考虑让他们参与到决策过程中——“没有我们就不要决定我们的事情”。

践行《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

在通往包容性社会的道路上，《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在有关残疾人政治决策方面具有重要地位。我们将同残障人士及其组织一起继续完善国家行动计划。更多的参与、自我决定和日常生活无障碍是重要的阶段性目标。残障人士将更加便捷地使用交通工具、获取信息、进行通信交流和利用各种设施及服务。我们也将特别考虑失聪盲人的生活状况。

强化包容性的就业市场

社会包容的核心部分是积极的就业市场政策。我们关注残障人士融入普通就业市场的过程，并以此长期改善其就业状况。另外，我们赞同并将加强重残人士代理机构的义务参与活动。职业中心须有足够的专业人手，以维护残障人士利益、提供专业咨询，并介绍工作。雇主主要变得更加敏锐，发现残障人士的潜力并为他们创造就业机会。我们将和社会伙伴一起，在针对培训教育和就业的包容倡议框架下，促进残障人士融入职业生

活。我们力求简化从残障人士工坊到就业市场的过渡过程，保障离职权利，运用“就业预算”项目（Budget für Arbeit）实施过程中所得到的经验。

改革“援助融入社会补助金”——发展现代共享权

联邦、各州和城乡为争取更大包容性所共同付出的努力，需要更稳定的法律框架。因此，我们将制定一项针对残障人士的《联邦残疾人福利法》，同时包含联邦与各州的财政联系。其间，我们也将审查联邦共享补助金（Bundesteilhabegeld）是否可行。

对于那些因为严重残疾而在社会生活参与方面受到限制的人，我们要使他们脱离现有的“关怀系统”，并把“援助融入社会补助金”发展成为一种现代共享权。所提供的服务应该符合个人需要，并且按照联邦的统一程序分配给每个人。这些服务不应再以各种机构为中心，而应当以独立的个人为中心。我们将在《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的基础上考虑残障人士的意愿表达权和选举权。残障人士及其组织应该自始至终参与到立法过程中来。

出于对残障儿童及其父母的利益考虑，应当尽可能避免各种救助金体系内的重叠状况，使救助金只出于一个名目。

无障碍使用网络

数字化为残障人士提供无限的可能。因此，我们将考察是否能通过为行政和经济界提供“无障碍网页”来支持残疾人的平等待遇。

公民参与和志愿服务

公民参与

我们的共同体依靠市民社会和公民的参与。我们要继续促进他们参与的可能性。在德国，各个年龄层的人参与到不同的社会领

域：他们活动在消防队和救灾组织，在工会和社会团体，在体育协会，在教区和国内外救助组织，在邻里活动的倡议行动和自救会中，他们也在教育和文化机构工作。市民社会和公民参与让我们的共同体维系在一起，并让它焕发生机。

我们要改善义务参与活动的先决条件。我们将更多吸纳在公民参与活动中得到的经验和想法。我们要设法让每个人的参与活动和义务工作获得更多的认可。“德国公民参与奖”（der Deutsche Engagementpreis）就是认可这些工作的一个表现。我们支持并且促进义工组织的工作。同样，社会福利企业的福利创新也是值得支持的。

我们要让在公民参与活动中提出企业性质的倡议（如乡村商店、托儿所、适合老年人居住的方式、能源计划）变得简单。社团法中应当为这类倡议规定适合的企业形式，避免人力物力的浪费和官僚主义。

联邦志愿服务和青年志愿服务

志愿服务是公民参与和教育服务的一种特殊形式。我们继续发展志愿服务，保留经受过实践检验的多样性，保证高质量，本着市民社会的责任扩展志愿服务。

联邦志愿服务的成功表明，所有年龄层的人都可以并且愿意提供志愿服务。我们要继续改进志愿服务，使它能促进适合各年龄群体的服务方式，提供差异化的教育项目。我们要以联邦志愿服务和青年志愿服务的成功为起点，不断让人们参与到公民活动中来。

我们将和各州、高校、城乡、私企和其他行动主体一起，共同拓展对志愿者的承认文化。我们将通过给志愿者开具统一的志愿服务证明来改善志愿者获得优待的前提条件。

为继续发展志愿服务，我们将着手利用当前科学评估的结果。我们也将支持涉及服务提供者的项目，尤其支持他们要获得附加

的资质形式。为了加强创造一种“承认的文化”氛围，我们将制定一个关于志愿参与活动的总方案，除联邦志愿服务和青年志愿服务外，它还包含联邦国防军的扩展志愿服务。

我们将有针对性地按照志愿者的利益与需要来调整德国青年的国外志愿服务和外国人在德国的志愿服务。为此，我们将整合联邦家庭、老人、妇女及青年部管理所有受到规范管理的国外志愿服务的职责。

考虑志愿服务的教育特性和培养人的取向的特点，志愿服务免缴营业税。

教会和宗教组织

我们将和基督教会、宗教共同体和宗教协会以及自由的世界观共同体加强对话，他们丰富社会生活，并且传播有利于社会凝聚力的价值观。我们尊重每一种宗教信仰。基于我们国家受到基督教深刻影响的特点，我们将致力于发展多样的、平等的社会共处。

基督教会及其社会公益组织在我们社会的许多领域中都必不可少，特别在教育、卫生和公益领域，在照料、护理、咨询和文化等方面。教会大规模的捐献和教会成员的义务参与活动，为教会机构对公民作出贡献创造了可能。为使教会的规划得以保证，我们坚持教会税的体系。只有这样，他们才能继续保证把自筹资金用于公民的福利。同时我们要继续支持教会的服务，并尊重教会对相关机构的影响。

宗教改革运动 500 周年的影响远远超越德国和欧洲，联邦层面将作出相应规划，用于 2017 年宗教改革 500 周年纪念。

我们怀着感激之情改善着我们国内犹太人的生活。我们支持犹太教区，支持犹太人的福利事业，比如在外来移民的融合方面以及教育和文化机构的建立和扩展方面。

我们高度评价和支持穆斯林协会和组织对我们共同体作出的各种贡献，如促进穆斯

林移民及其后代融入社会，加强不同文化和宗教间的对话。因此，我们要继续支持德国伊斯兰教联席会议。

一个开放的社会在宪法秩序的框架内给所有宗教提供发展其信仰的自由空间。

我国行之有效的《国家教会法》是和宗教共同体进行伙伴式合作的恰当基础。

迁出者、被驱逐出家乡者和少数民族

通过纪念日，我们唤起人们对逃亡和被驱逐往事的记忆，这亦是劝诫警示。我们确保被驱逐出家乡者可以回到德国，并且将为迁入他乡的德意志少数民族提供帮助。我们支持已经达成的欧洲少数民族政策协议，并对德国的四个少数民族——丹麦人、索布人、佛里斯兰人和德国吉普赛人（Sinti 和 Roma 两个部族），以及对生活在中东欧、东南欧和前苏联地区国家的德意志少数民族承担义务。

索布语和文化作为索布民族身份的表达应当继续得到维护。因此，我们要长期支持索布民族基金会的工作，并从联邦层面给予财政补贴。

4.2. 城市和乡村的生活质量

住得上，住得好

住房建设联盟

我们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使生活在德国的人能拥有优越的居住和生活质量。我们将满足人口密集的中心区域、许多大城市和大学城对住房不断增长的需求，进行能源利用方面必要的改建，迎接并解决人口和社会方面的种种挑战。为此，我们在住房政策方面采取三重措施——加强投资，恢复福利住房建设，平衡租房法方面的举措和社保政策。我们将所有相关措施总括为一项刺激住房建设、整修楼房以充分利用能源的行动计划。除此之外，我们还努力争取和各州、城

乡以及所有相关的社会行动主体结成联盟。我们还将拓展关于不动产经济方面的对话。

加强住房建设

住房建设补贴和雇员的储蓄补贴保持不变。我们将优化共建共同居住形式（genossenschaftliches Wohnen）的框架条件，并且考察，如何能创造更好的条件以促进人们购买那些成为新建建筑的共建共住部分。

我们会继续促进建成更多的大学生住房。

地产政策

在公共财产领域的那些贷款已转为资本市场资金且不再急需的地产对创造住房建造用地有很大作用。同时，联邦不动产管理局（Bundesanstalt für Immobilienaufgaben）也将会在这一方面继续资助城乡。考虑到城乡许多规划符合公共利益，比如建造使民众有能力购买的住房和创建生机勃勃的城市，我们将会促使地皮折价出售。所以，按照一项财政预算备忘录规定，贷款已转为资本市场资金的地产将被折价出售。未来四年内，地产出售总额被限制在最高1亿欧元以内。此外，为加快联邦不动产管理局促进销售的程序，城乡也要加强利用企业债券的程度。

福利性住房建设 / 住房津贴

我们希望振兴福利性住房建设，并会在2019年底前每年资助相关的联邦州5.18亿欧元。同时，我们希望这些州将资金专款投入到新福利住房的建造、财产的社会公益义务以及对现有住房的公益性修缮方面，也希望相关州可以补充自己的资金来支援这些计划——然后把这些记录在一套详细的报告里，上交联邦。

为直接帮助低收入人群并提高其住房质量，我们要使补贴金额和房租上限适应当前房租发展以及收入变化的情况，以此进一步

调高住房补贴的金额。

可以负担的房租

为让需求者能够负担房屋方面的支出，尤其是那些住房市场紧张的城市中的房屋，我们允许各州5年内证明某些区域住房市场紧张的情况下，可以在该区域将二次出租房屋的房租涨幅限制在当地同类房租的10%以内。新房首次出租和房屋全面装修后续租情况不包括在内。房屋二次出租的租金必须至少达到此前的租金金额。各联邦州证明上述住房市场紧张区域的状况应与制定消除其住房紧缺的措施联系起来。现有规定将房租的涨幅限制在当地同类房屋租金的15%（所谓的租金限度，Kappungsgrenze）以内，且在各州规定的区域内保持3年不变。

装修费用中最多可以有10%转嫁到租金上——这种情况的时间最长到装修费用的分期偿还（Amortisation）之时。通过调整租赁法中不利情况条款（Härtefallklausel，民法第四章，第559条，§ 559 Abs. 4 BGB），房东在房屋整修中如在费用方面提出过分要求时，我们将有效保护租房者的权益。

我们将在所有相关法律领域给出清晰的解释，即只有事实居住以及使用面积才可以成为提出法律诉求的基础，例如在租金的金额、租金增长以及可分摊的暖气和管理费用等方面。

我们力求在地方租房价格水平一览表（Mietspiegel）上通过更广泛的调查研究确定当地的同类租房价，使之尽可能符合租房者的现实情况。

我们认为很有必要采取有效措施来防止房主忽视住房。我们将检验相应的规定。

对于房地产经纪人的佣金，我们要达成全国统一的明确框架条件，并保证质量。房东和房客可以继续作为委托人出现。同时，市场经济的原则仍适用：谁付钱，谁就订购。

我们要在房地产经纪人法中创造鼓励机制，促使消费者在购买不动产时获得更好的咨询服务。为此，我们将努力给消费者提供其他选择，比如酬金的水平符合咨询服务中人力物力消耗实情，与实际结果不挂钩。此外，我们想引入专业资质认证措施，把其他咨询行业的标准应用到房地产经纪人行业。我们将确定房产经管人和不动产经纪人的职业最低要求和责任担保。

我们要拓展为建筑商以及不动产所有者提供的建造劳动和服务中的消费者保护力度，尤其在建筑合同法以及住房的委托管理方面。

使用土地登记数据库后，我们将通过电子程序管控房屋管理者的审阅活动。

适合多代人以及年长者居住的住房

我们支持建设更多适合多代人居住的房屋。尤其是年纪较大的人需要无障碍或少障碍的房屋和周边环境，以便自己决定如何居住，并且要使居住情况符合自身年龄特点。为促使房屋适合多代人居住，我们在房屋改造中将实施“适合年龄的住房改造”计划（Altersgerecht Umbauen），配以投资补助，并且为此补充德国复兴银行的贷款计划。在低碳建筑翻新计划（CO₂-Gebäudesanierungsprogramm）中，要采取附加措施改造房屋，使之无障碍，适合年长者居住，为此要有稳定的补助资金。年长者的公共住房形式也将得到我们的支持，并被作为范例得到促进。

建造及翻新高能效的房屋

我们将把建造及翻新高能效的房屋作为对能源转型的决定性贡献继续推动，我们争取让所有人都能担负高质节能的住房费用。经济性原则、技术开放原则以及放弃强制性房屋翻新，是能源规划中的要点，不可动摇。我们不会使现行规定更加严格，并将测评其成效。

我们将继续支持利用新技术来提高房屋建筑的能源利用效率，来增加再生能源在房屋建筑领域的生产以及应用。我们会继续推行国家促进建筑行业能源咨询的措施，并将其进行整合。

我们将把住宅作为重要行动层面来加强建设，例如在分散供电和供暖方面。我们会调整德国复兴银行借贷计划，在城市改造中充分利用能源，并且在各州征募附加投资。对于受人口结构变化影响特别大的区域，我们要设置改造补贴金，有针对性地促进保养以及建造能源高效、少障碍的房屋。

建筑质量

确保德国建造技术、建造工艺和建材的高水准，我们会加强建筑研究，并开始试点项目，旨在将建筑的经济性目标和能源转型的要求、建筑文化以及新的工艺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在与建筑经济界以及房地产经济界的深入对话中，我们将进一步在可持续的创新规划和建设以及节能建筑工艺方面努力，与“未来建筑的研究倡议”（Forschungsinitiative Zukunft Bau）紧密结合。

我们感受到联邦建筑物起到的典范作用——尤其在建筑文化和节能方面。我们会加强联邦建筑和土地规划局（Bundesamt für Bau- und Raumordnung）在联邦高层建筑方面的专业性指导职能，并将其发展成为一个更有效率的协调中心，主要是为保证质量、稳定成本和遵守交付期限。

大型的公共建筑计划必须在建筑成本和遵守交付期限上更加可靠。为此，特别成立的“大型项目改革委员会”（Reformkommission Großprojekte）将在2015年提出建议。在此基础上，我们将考察，在规划法、交付法、预算法以及其他应用领域中应作出哪些变化？我们将借助降低建筑成本委员会（Baukostenenkommision）来审查建筑材料方面

和建筑程序中哄抬物价的情况，审查哪些标准和成本超过正常限度，尤其体现在改造房屋、充分利用能源方面的标准和成本。

城市以及区域发展

继续改善城市建筑资助

联邦政府将和各州和城乡共同负责，与所有城市发展的参与者进行对话，继续推进城市建设资助的成功模式。为此，我们将每年都提高联邦的资金支持。城市建设资助项目应该在人口结构变化、社会变化、经济情况变化的情况下以及在环保方面给城乡以支持。我们将扩大市民、市民社会主体和经济行动主体的参与，扩大与私人房地产主和房产公司的合作。我们将简化城市建设资助项目和其他资助项目合并为一揽子措施中的手续。我们保证，城乡即使处于财政困境也不会被排除在资助计划之外。我们将继续提高福利城市（Programm Soziale Stadt）计划的价值，在实施其他促进城市建设计划的同时，确保灵活投入资金。

统一德国东、西部城市改造计划

考虑到未来（考虑到团结公约，第 II 个篮子，Solidarpakts, Korb II），我们会把行之有效的城市改建计划凝聚成一个内容更完善、一体化的综合型城市改建计划。

福利城市：确保一体化和共享

我们将在城市建筑资助的框架中把“福利城市”（Soziale Stadt）计划作为社会融合的引领计划继续予以推进。它构成“福利城市”这一跨部门战略的基础。借助该战略，我们把其他部门的项目资金集中起来，投入具有更高一体化要求的领域。

环境

保护与维护自然生态，是我们得以生存

的基础，也是我们对子子孙孙的责任。对我来说，环境保护是对生活质量的投资，我们每个人都有权在生活质量方面提出要求。

可持续发展

对我们来说，促进可持续发展是政府工作的一项基本目标和衡量标准。这在《联合国 2015 年后可持续发展议程》（Post-2015-Agenda für nachhaltige Entwicklung der Vereinten Nationen）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我们将全力加强欧洲可持续发展战略，强化国内可持续发展目标，并实现这些目标，如在政府采购领域。我们要把“可持续发展教育”植根于所有教育领域。联邦议院任命的“增长、富裕与生活质量”调查委员会的调查结果也被纳入考虑范围。议会可持续发展咨询委员会（Der Parlamentarische Beirat für nachhaltige Entwicklung）将重新投入运作，其职能将得到加强，跨部门的协调得到扩展。我们也要审查联邦政府的财政补贴报告中各项措施是否具有可持续性。

创新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益

环境保护、气候保护和提高资源利用效益中的创新，给经济增长提供机会。我们启动了“环境技术出口倡议”（Exportinitiative für Umwelttechnologien），提出对职业和从业资格的新要求，这也适用于双轨制教育的框架。我们在制订一项全面的一体化环境计划，面向 2030 年，提出长期目标和重点。为将创新政策与环境政策进行跨部门整合，我们将继续发展“环境技术整体规划”，并提出“生态创新行动计划”（Aktionsplan für Öko-Innovationen），使“欧盟生态创新行动计划”（Eco-Innovation Action Plan der EU）得以在德国实现。

无论是从经济、生态还是社会角度衡量，资源利用效益都至关重要。到 2020 年，我们

要完成原料生产效率与 1994 年相比翻一番的目标。因此，我们将继续发展德国资源利用效益计划，为提高资源利用效益提供平台。

在资源效率和资源循环利用领域，确保将研究成果应用于中小企业生产具有重大意义。我们将向企业和家庭提供相应咨询，以期提高其资源利用效率。我们将测试原材料监控模式是否行之有效，这种模式也能分析从废旧物资中提取二级原材料（废料与生产垃圾）的流向。

在废物提取二级原材料的经济中，我们的政策将既符合环境与资源保护的目标，又满足经济上的需要。因此，为寻求最有效益、最便宜的原材料回收和再生方法而开展公平竞争具有中心意义。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现有的商品外包装回收责任，将其应用到产品领域。其间，我们将以避免二氧化碳排放、消费者友好和成本效益为导向。

循环经济

我们正在发展循环经济，使之成为可持续的材料流动经济中具有高效益的方法。为使千家万户更容易共同接受回收并重新利用外包装等可回收物的理念，我们将构建相关的法律基础。确保较高的回收利用率、竞争和产品责任是现代循环经济的支柱，必须得到稳固。欧洲废旧电子电器回收的方针将完全体现在国家的法律中，电子与电器废料的回收量将进一步加大，可重复利用产品的回收系统将进一步得到扩展，二手设备的回收也将更加简易。信息与通信技术产品的回收利用需要以信息安全和信息保护为前提。为禁止非法出口电子产品废料，接受出口电子产品废料的一方也有义务提供证明。未来，出口者必须证明出口物不含垃圾。

“利用，但不消耗”是对待土地这种有限资源的原则。按照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规定，我们要在 2020 年前将每日新增土地需求量限

制在 30 公顷以内。此外，我们还会审查，如何在城市内有限的可拓展空间里更好地优化土地使用。我们将继续追踪土地交易的探索模式，同时，也会继续提高规划方式与手段，并关注人口稳定性。我们将努力使小型社区花园受到认可，作为平衡性的使用土地。从生态学角度而言，这种社区花园已经长期获得较高的评价。

自然保护与生物多样性

我们要保护家乡的自然资源财富和生物多样性。国家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要落到实处。国家自然遗产将至少再扩大 30,000 公顷，为此而获得的军事用地将不会私有化，而是交由相关的联邦州、环保组织和基金会使用。由此，我们已经很接近“百分之五自然森林发展目标”和 2020 年要达到的“百分之二野地目标”。“联邦生物多样性计划”（Bundesprogramm Biologische Vielfalt）将继续推行。同时，我们也努力制定和实施“阿尔卑斯山保护战略”。“名古屋纪要”（Nagoya-Protokoll）将尽快在议会中通过并付诸实施。我们将履行国际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承诺，保护、维持与重建森林和森林结构，并努力为此拨款。我们将继续完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 REDD+（译者注：在发展中国家减少森林砍伐和减缓森林退化以降低温室气体排放）计划的机制。我们将改善野生动物保护的情况，反对无证狩猎或捕捞，查处野生动物及制品的非法交易。我们将在全国范围内规范对国外动物以及野生动物的贸易和私人饲养事宜。向欧盟内进口捕兽器或是买卖国外动物的交易所将被严格禁止和查封。执政联盟与其他国家一道，对迁徙路线沿线的鸟类保护给予重视和关注。

防洪

河道空间将进一步拓展。我们将继续推

动国家防洪计划，从环境保护的角度考虑开发河漫滩的可能性，并平衡防洪与农业利益。我们将制订关于防洪的联邦空间规划计划，建立防洪重点区域、撤离空间、行洪区设置的跨联邦州统一标准。

2014年底，我们将在联邦政府的统筹安排下和各联邦州一起拟定一项国家防洪计划。该计划的重点是防洪的跨区域举措以及河道防洪的统一标准。我们要提出“预防性防洪”特殊框架计划。我们要竭尽全力可能性加快规划与审批程序，建设防洪设施。我们会和联邦州一起，审查并协调联邦和各州相关法律规定。我们将同欧洲邻国就防洪事宜积极对话。我们也将更深入地研究和检验洪灾基本损失的框架条件。为改造活水水域和河谷地，我们将开展联邦“蓝丝带”（Blau- es Band）计划，并把“联邦绿色基础设施规划”（Bundeskonzept Grüne Infrastruktur）作为联邦政府规划的决策基础。在协调生态与经济利益的前提下，我们将实施治理易北河的整体规划。在对巴伐利亚州州政府作出的决议进行变通的基础上，我们希望在施特劳宾（Straubing）和威尔斯霍芬（Vilshofen）之间拓宽多瑙河（不含拦河堰）。

水体保护和海洋保护

防止水体富营养化和防止水体污染将进一步得到加强，我们也将促使相关法律具备纠正错误发展的能力。我们将停止为获取肥料而进行的河道污泥清淤行动，并将去除水体中的磷和营养物质。有关处理可能污染水体物质的全国统一规定将得到贯彻落实。我们会在考虑到水体保护的前提下对采矿法进行补充规定，并力求研究出地下空间规划的基础。

我们将努力在公海保护区建立网络，并努力通过谈判在国际层面就公海保护达成共识。我们将落实《欧盟海洋战略框架方针》

（EU- Meeresstrategierahmenrichtlinie），最晚到2020年，我们要使德国的海洋水域达到环境优质级别。为此，我们将划定保护区，防止过度捕捞，并对深海采矿、采油和采气作出明确规定。我们会对欧盟10个“Natura 2000”自然保护区进行渔业管控，以达到保护目的。在禁止海洋垃圾排放，尤其在禁止塑料垃圾随意丢弃方面，我们坚决支持欧盟委员会的举措。联盟党和社民党支持在北极和南极地区设立保护区。我们将在议会批准《南极环境保护议定书》中的责任规定并在国内付诸实施。

环境与健康

我们要改善空气质量，用革新科技减少有害物质的源头。我们还将促进在小轿车和小货车上改装柴油碳微粒滤清器。

尽可能避免任何包装材料、衣物与日用品中对人和自然环境有害的物质。我们追求可持续的全球性化学物质管理，从而通过科学、明确的标准将导致内分泌失调、刺激呼吸道和皮肤以及其他有毒有害的致病物质纳入欧盟《关于化学品注册、评估、许可和限制法案的》（REACH）的管理列表中。国家辅助进行的纳米材料研究将得到进一步加强。

我们将进一步防止食品受到环境有害物质的侵害。我们会使用环境能承受的方式和方法来抵御通过害虫传播到人类及动植物的健康威胁，并注意保护民众的健康。我们将继续研究，如何更好地保护人类免受非电离辐射（如超声波和激光）以及电磁场伤害。

农业与农村

我们高度评价德国农业与食品工业为保障健康饮食、维护多样化经济作物景观作出的贡献。建立一种以多功能、农村企业性质的农业类型是我们在农业方面的目标。这种农业类型在保护资源和环境的前提下生产农

业产品，并将动物的舒适、可持续性和竞争力结合在一起。我们的愿景是结构不同和生产方式不同的农业。它由家庭经营，以地区为基地，且覆盖大范围。这种农业生产方式有助于农村的附加值创造、高收入工作和收入稳定。

贯彻《欧盟共同农业政策》(GAP) 以及发展农村

通过国家对于德国要贯彻《欧盟共同农业政策》的这种方式，我们尤其要重视促进农村的经济、社会和生态发展。农业结构和海岸保护的共同社会任务将被发展成为一项“农村发展共同任务”(Gemeinschaftsaufgabe ländliche Entwicklung)。我们将广泛利用欧盟农村发展专项农业基金(ELER)所提供的促进机会，协调各职能部门的职责。这对农村的一体化发展至关重要。联邦政府内将成立以农村、人口统计以及公共生存关怀为重心的部门。

价值创造与创新

我们要更好地协调农业研究，并在动物舒适、可持续植物保护手段、国内有关含蛋白质饲料促进战略和有利于气候保护的农业领域加强研究。德国农业研究联盟(DAFA)的工作将获得持续支持并成为常态。德国可再生原料研究署(FNR)的工作将扩展到可持续性领域。我们将有针对性地协调在德国进行的研究促进欧洲计划。联邦层面的“生态农业以及农业的其他可持续发展形式”计划将持续进行下去。

德国的奶制品行业生产者对农村的价值创造和经济作物景观的保护作出了重大贡献。我们将继续执行奶制品行业的市场定位路线，并致力于维护有效可信的欧盟食品安全网。

园艺业中节约能源的潜力将得到进一步挖掘。

德国的葡萄种植业在传统经济作物景观的保护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我们支持葡萄种植者追求高质量产品。

我们将进一步推动贯彻“森林战略2020”(Waldstrategie 2020)，并更加注重生物多样性战略的保护目标。小型森林和小型私有森林将通过适当方式被纳入发展计划。各联邦州为达到目标而制定的特有方案保持不变。森林气候保护基金将得到适当的财政支持。

在欧洲种子法新规定的框架下，我们主张保护种子多样性、维护非商业领域的利益以及不限制获取和使用传统种子和地方特有种子种类。在种子繁育方面，我们将努力不再继续限制农场主和从事植物栽培的中小型企业。

我们要继续支持传统的劳动密集型近海渔业，也会加强发展淡水渔业和水产养殖。为保护资源和维持渔业的竞争力，《欧盟共同渔业政策》的改革将付诸实施。执政联盟尤其重视海底保护和存鱼量，重视以减少意外捕捞为目的的捕捞技术和捕捞方式的持续发展。执政联盟将致力于坚定不移地禁止鲸类捕杀和鲸肉贩卖。

地区产品的市场化将得到拓展。为标明地区商品，我们将评估全国统一的“地区之窗”(Regionalfenster)。在此基础上，我们将在必要时确立具有约束力的相应标准。在坚持国际标准和履行部分第三国的特殊要求方面，联邦层面将起到协调作用，以提高官方对农产品出口检验的水平。联邦食品、农业与消费者保护部对于出口管理的权限将得到相应加强。

在签订双边及多边贸易协定时，坚持消费者保护、动物保护和环境保护领域中的欧洲高标准具有核心意义。

非农业投资者和土地私有化

我们将检验法律手段，以确定非农业和

跨地区投资者直接或间接获得农业用地的情况是否合法。

联邦与联邦各州在谈判中要阐明，联邦管辖下的信托用地能否转移给有需要的各联邦州。这样，各联邦州就有机会实行主要针对青年农场主的创业计划。此类土地转让的条件必须与特定的农业结构、环境政策、宪法和财政预算法规定的条件相符合。

农村社会保障

我们将积极陪同农村社会保险改革，农场税费规定将被重新制定。

动物保护和动物健康

我们在全社会开始展开关于动物养殖问题的批判性讨论，并使之发展成动物福利的国家保护运动。这一运动把动物健康法和动物药品法两个相关法律领域结合在一起。减少抗生素使用的法规将得到切实落实。我们将提升动物饲养者的专业知识。同时，我们会为动物饲养系统制定联邦范围内统一的检验与许可程序。这些行动旨在贯彻欧盟统一的动物保护方面的高要求。

我们将努力实现在规定面积的空间里饲养相应数量禽畜这一理念。这一举措的目标在于促进德国发展保护动物福利的饲养方式。我们将就这种禽畜饲养方式的规模展开科学讨论，并且同各联邦州和城乡一道，抓住契机，解决动物饲养笼舍过度拥挤的问题。关于动物实验的替代方式，我们将加紧研究，并在人员配备和财政资助方面为动物实验替代与补充方法研究评价中心（Zentralstelle zur Erfassung und Bewertung von Ersatz- und Ergänzungsmethoden zum Tierversuch, ZEBET）提供更多支持。

伦理与农业

在欧盟层面，我们禁止克隆动物，禁止

进口克隆动物及其肉制品。我们要求生产者履行在克隆动物的后代及其肉制品上注明此特征的义务。

我们将继续禁止对传统养殖培育方式、对以此方式生产的动植物及针对此动植物产品和生产所使用的材料申请专利。此外，我们也将细化相应的欧盟规定。

绿色基因技术

我们认可绝大多数民众对于绿色基因技术的保留态度。

对于用转基因植物饲养的动物制品，我们赞同欧盟对此类产品规定的标识义务。我们坚持对于食品和种子中未获批准的转基因成分持零容忍态度。

土地保护

为避免农用土地进一步流失，出台一项联邦补偿规定已显得刻不容缓，我们将为此努力。

肥料与农药的使用，将遵循对人、畜和环境风险最小化原则。我们将坚决贯彻国家农作物保护行动计划（Nationaler Aktionsplan Pflanzenschutz）。

在占用农业用地的措施出台过程中，对于农业结构的利害得失必须得到切实的考量。尤其是在对能源转型而言非常必要的电网扩展过程中，对土地所有者和土地使用者的补偿不可或缺。

蜜蜂监控

为保障并扩大德国的蜜蜂养殖，联邦与各州的共同努力尤为重要。我们坚持进行已持续多年的研究项目，由此我们也将继续德国蜜蜂监控计划。

农用柴油

为保护公平竞争，我们将继续在现有形

式下对农用柴油进行补贴，谋求欧盟统一能源税方针。

消费者保护

消费者应当具有自己决定的权利。我们希望打造一个消费者友好型的透明市场，在公平、可持续条件下生产和销售安全优质产品。我们的消费者政策，也以加强生产者与消费者相互信任为目的。我们不懈地追求透明度、可比较性，努力有效贯彻相应法律法规，力图根除市场中的不均衡状态。我们的政策以多样的消费者群体为基础。根据市场不同，消费者的需求、利益和所拥有的相关知识也有所不同。在消费者无法自我保护或被过高要求的领域，国家必须提供保护和预防措施。此外，国家还要通过有针对性的广泛信息、咨询和教育来支持消费者。这对于诸如金融市场和数码的新领域尤为重要。为此，我们要委托现有的消费者组织对“金融市场”和“电子世界”进行市场监控。

更好地提高消费者保护组织水平，扩大相关研究

关于消费者问题，我们建立了一个独立的跨学科专家委员会，该委员会设有帮助处理事务的办事处。这一委员会的任务是对重要的消费者问题和各分市场提出意见和建议。

为更好地保护消费者，我们力图使消费者合同法更加清晰明了，更易理解，内容前后一致，实施起来更加有效。提供信息的义务必须以消费者的需求为导向。

两年后，我们要评价治理不当商业实践的法规是否取得了成效。

专业化的消费者中心向国家主管部门通报从大范围调研和市场观察中所获得的认识。

在立法计划方面，消费者检查将得到进一步拓展，以论证消费者获得的效用，并具体得到实行。

如果出现多次违反消费者权益的嫌疑，且相关部门充分论证产生嫌疑的理由，则具有检查义务。联邦网络局（Bundesnetzagentur）、联邦金融监管局（Bundesanstalt für Finanzdienstleistungsaufsicht）、联邦卡特尔局和联邦消费者保护与食品安全局（Bundesamt für Verbraucherschutz und Lebensmittelsicherheit）也将消费者保护视作与其监管行为同等重要的目标。

对于商品评测基金会（die Stiftung Warentest）和联邦消费者保护中心协会（Verbraucherzentraler Bundesverband）的重视将得到进一步提高。商品测评基金会的资产也会得到强化。

数据保护基金会（Die Stiftung Datenschutz）将会被纳入商品测评基金会。

欧洲及国际消费者保护法

欧盟的消费者保护法应当在最低限度协调的基础上得到继续发展。辅助性原则必须得到更大的重视。执政联盟希望德国超越这些最低限度的标准。在涉及对消费者具有特殊效用的情况下，我们支持全面协调欧盟的消费者保护法。

在欧盟与美国的自由贸易协定中，必须坚持消费者保护和数据保护方面的欧洲高标准。

德国调整了飞行乘客规定和全包价旅游法（Pauschalreiserecht）的新规定，主张保持现有消费者保护的水平。包括因姓名更换和旅行证件丢失等事项而收费过高在内的不当做法将被全面禁止。

欧盟就争议解决的替代方式而制定的方针将在近期以利于消费者的方式得以贯彻落实。“网络调解人”将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拓展。我们将检查现有的调解方式是否符合利于消费者的原则。

给消费者更多的透明度和支持

我们要创造基础，引入一种标签，为可

持续使用的产品、服务及该产品的生存周期进行标示。执政联盟将审查，特殊的产品性质是否需要在产品广告中告知消费者。

在欧盟层面上，我们力求将方便改进的措施纳入到生态型设计方针中去。

为提升产品安全性，我们在继续保持德国安全认证标志的同时，主张推行欧盟安全认证标识。在欧盟层面上，我们力促对儿童玩具进行强制性第三方检测。

包括电信和能源行业在内的其他市场中将推行产品信息说明书（Produktinformationsblätter）措施。产品信息说明书和咨询纪要（Beratungsprotokoll，金融领域）是否合适且易于理解，我们将对此定期进行检查并通过标准化等方式予以改进。

国家补助的私人养老服务必须秉持有利于消费者的原则，比如限制管理费用的额度。

金融领域的消费者保护

我们将评价关于实施冻结保护账户的法律规定，尤其注意避免对无冻结账户（Pfändungsschutzkonto）收费过高。

使用透支额不应导致银行客户负债过高。因此，银行有义务在客户进入透支阶段时通知该客户其透支情况；对于长时间的大额透支，银行须向客户就可供选择的透支方式提供较为便宜的咨询服务。

我们将继续推动酬金咨询（Honorarberatung）的实施，使其成为所有金融产品佣金咨询以外的另一种可能性，并对咨询质量提出高要求。主要从事酬金咨询工作的咨询师的职业名称以及教育培训标准将继续得到细化发展。

我们将审查，在投资咨询中使用的咨询协议是否能得到实际应用，并为投资者持续改进该协议。

（以上由丁思齐译）

对能源领域消费者的保护

我们希望通过制定一些规定，例如使用带有预付功能的智能电表等来更好地防止断电和断水的发生。在对公共事业收费的批准方面，应当重视合理制定基本供应价格。应开发各种工具，以确保所提供的能源服务及高效投资的质量能够令客户满意。

数字世界中的安全、自主与透明

我们鼓励相应的技术与创新来确保资料建立以及在此基础上运行的商业模式可以不必收集个体化的私人信息。非匿名资料的建立则必须在有限的法律范围内进行并获得用户的同意。运用评分操作程序的企业必须将该程序报送有关部门。我们将建立相关法律基础，来保障消费者协会督促警告违反信息保护法的行为以及举报玩忽职守行为。

我们要建设用户友好型的移动商务，比如，实现在移动终端设备进行透明化展示以及应用程序退回。在电子产品使用方面，我们要强化消费者应对国际供应商市场权力的权利。在评估针对不诚信商业行为的法律过程中，要特别审查由于消费者在网上侵犯版权而提出警告产生的纠纷数额上限。

安全的食物，透明的食品标记，健康的饮食

执政联盟将使食品监管更好地形成网络，并在德国及欧盟设立统一的标准和合理的监管严密度。

《消费者信息法》（Verbraucherinformationsgesetz）以及《食品饲料法典》第40款（§ 40 Lebens- und Futtermittelgesetzbuch）作了如下改动：在其他不公开和限制的理由减少的情况下，可以合法公开已查明的、情节较为严重的违法行为。

比如在文件资料和标识方面，我们将注意在不影响保护水平的前提下，为小型的地方性企业找到不经官僚程序的解决方法。

我们致力于在欧盟推行以德国为样板的动物健康标识，以及有约束力的、经转基因饲料喂养的动物产品标记，以此来禁止用于食品生产的克隆技术和克隆动物的进口，推进克隆动物及其后代的动物制品的标识义务。食品必须具备标明其来源地和生产地的标识。

4.3. 文化、媒体与体育事业文化

联邦体制中的文化促进

对艺术、文化的促进是一项需要联邦、各州和各城乡各司其职、共同完成的任务。执政联盟将把联邦层面的文化预算进一步提到一个较高水平。文化事业并非我们对未来的补助，而是对未来的投资。

联邦和各州未来应在规划和资金筹措方面更加紧密、更加系统地合作（合作的文化联邦制度）。应为此建立联邦、各州和城乡间的定期交流机制。联邦及各州的文化基金会也应列入其中。

联邦政府支持国内重要的文化机构。针对联邦参与行为制定相应的促进标准，以建立系统化且结构明晰的幕后促进机制。我们迄今所支持的机构在未来需要长期的资金保障，甚至一直到2019年以后。执政联盟将继续推进“投资东部——原东德地区国家文化机构投资”项目（Invest Ost – Investitionen für nationale Kultureinrichtungen in Ostdeutschland）的实施。对以下几个资助项目面对有重要意义的国家级文化机构和单位要首先得到考察：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浪漫主义博物馆，布劳魏莱尔（亦译布劳韦勒——译者注）修道院的艺术收藏馆，德累斯顿国都王宫以及皮娜·鲍什国际舞蹈中心。

鉴于社会的飞速变迁（人口变化、数字化、一体化等等），德国的文化基础设施应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现代化以适应新的挑战。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文化机构和文物古迹的建设自由。

执政联盟将同各州一起开发新的工作方式与合作模式，使人口变迁的潜力在文化领域中得以体现，并突出艺术与文化激发认同感的效应。

加强文化政策研究与必要时受法律保障的文化统计有助于相关领域的分析、交流和反思。这其中也包括进一步发展对参观者情况的专业研究，这一研究是对所提供的艺术产品和活动的宝贵反馈意见。

德国文化情况具有文化多样性的特点，并有大量不断新兴且生机勃勃的自由创意和设计。联邦对自由的当代表现艺术和文化的支持也首先表现在加强跨文化事务的方面。

联邦文化基金会（KSB）可以作为推动机构和关注文化基金的总管理组织发挥重要作用，它所扮演的角色理应得到进一步加强。此外，执政联盟还将在资金上加强现有基金会的自主权和工作情况。

通过在联邦层面上促进音乐事业，执政联盟希望进一步发展以规划为导向的文化促进事业。在联邦层面建立音乐事业基金，促进当代音乐文化，有助于填补促进体系中的缺陷。

舞蹈是一项富有创造力且能产生国际影响力的艺术表现形式。联邦政府应借助与不同国家开展对话继续推进对这项事业的支持，并在合乎时代精神、具有持续影响力的促进项目的框架下对其进一步发展。

联邦政府在柏林的特殊职责是一项长期的任务，《首都财政资助协议》（Hauptstadtfinanzierungsvertrag）需要长期的建设。对于将在2017年到期的《首都财政资助协议》，执

政联盟将同柏林政府签订一份后续协议，以继续在基本法第 22 条第 1 款的基础上严格遵守法律，协调一致解决联邦在柏林作为整个国家象征的城市中之各种基本问题并整顿与之相关的文化资金事务。

通过举办柏林皇宫 / 洪堡论坛，柏林重新获得了一个重要的城市规划的支点。这项工作开展顺利。执政联盟将继续在宣传和捐助方面对柏林皇宫 / 洪堡论坛基金会提供支持。为保障洪堡论坛后期的建筑物运行情况，合理准备建筑的正式使用事宜，并在建筑移交使用者后能够为所有人提供高水平的文化项目，执政联盟将陪伴该使用规划的进一步发展，并将所需资金列入财政预算。

执政联盟将推进普鲁士文化遗产基金会的工作，并继续资助普鲁士宫殿与园林基金会。

执政联盟坚持一个目标，那就是不论每个人社会地位和种族的差别，都使他们可以在所有生活阶段平等地参与文化活动。一个属于所有人的文化包含了包容性、性别平等原则以及跨文化开放性。由联邦政府支持的机构和项目也应运用这些基本原则。

包括媒体教育在内的文化教育特别对于青年人的个人发展包括媒体教育在内的文化教育，尤其对于青年人的个性发展、社交能力及其社会参与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为此，我们需要在可靠的结构支持与有创新性的项目支持之间找到一个恰当的平衡关系。因此我们应对“文化强国——教育联盟”（Kultur macht stark – Bündnisse für die Bildung）项目进行审核，与文化界及各联邦州协调一致，并完善其内容。

艺术家的社会保障

执政联盟将在未来的立法会议任期内致力于创新人才和艺术家的社会保障工作，并设法对其进一步完善。我们将查明艺术家社会保障中的漏洞，并找到解决方案。

我们将保留艺术家社会保险基金并通过定期审查企业履行纳税义务的情况来巩固基金。为此，我们必须防止艺术家社会福利税进一步的上涨。这就要求所有有纳税义务的企业作出贡献。

一个有效的审查程序应当将经济和管理方面的负担减少到最低程度，并实现纳税公平。对此我们也将明晰界定义务工作及艺术工作。

版权改革

我们要使版权适应数字时代的要求和挑战。要考虑到数字使用的实际情况。应以平衡创作者、利用者和使用者之间的利益为目标。为进一步强调创新成果在版权讨论中的中心地位，必须加强社会对知识产权价值的意识。因此，执政联盟愿意支持相应的措施。

为能在世界数字网络中有效保护商标持有者、原创人及其他创造者的权利不受损害，我们将努力扩大欧洲及国际范围内有约束力的相关协议。所有保护知识产权的措施都应符合具体情况。在保护消费者权益、遏制大规模违法行为方面，网络服务商应当承担起更多的责任。针对将商业模式主要建立在侵犯版权行为之上的网络平台，我们要特别加强执法力度。我们将努力消除这些服务商作为所谓虚拟主机商的免责特权，尤其是使它们不再有广告收入。为防止违法行为的发生，我们将加强网络用户的媒体使用能力，并使它们能更好地分辨合法与非法网络产品。

我们将通过利用原创权协会（Verwertungsgesellschaft）加强民众的法律意识，特别是建立更有效建构对原创权协会的监督体制。

我们将更快、更有效、更简洁地处理关于私人复制赔偿数额的谈判与纠纷，并在法律赔偿要求中引入保证金义务。

为改善原创人处境，使创作者获得合理的偿付，需要修订《著作人合同法》（Urhe-

bervertragsrecht)。对此我们必须确定谈判与纠纷解决机制设计得是否足够有效，处理程序是否需要全面提速，以及调停程序的约束力是否需要加强。

我们支持著作权的合同自由，也了解作品常常会在有（不言明的）使用规定的情况下被提供给他人。同时消费者长期使用且不借助仪器使用合法获得的数字产品的权益也要得到考虑。因此，我们的目标是实现并促进已被购买的内容的跨平台使用性。

此外，还应考察如何能够在原创权保障方面切实避免无线信号传递中的技术欠缺。

我们在行动中将更加重视科学、研究及教育等重要事项，并在教育及科学领域设置相关限制。我们将考察是否应当在法律上许可公共图书馆使用电子书。

我们将制定一项全面的开放使用策略，这一策略将优化长期有效使用公共出版物及数据（开放数据）的框架条件。

媒体世界的变化也影响到印刷媒体，然而对作为公共生存关怀一部分的文化与媒体产品进行税务减负的理由是一致的，即使在数字世界中也是如此。执政联盟将保持对书籍、报刊、杂志等已经降低的增值税率，并会在未来将其有效范围延伸至有声读物。在欧洲层面上，执政联盟将倡议在未来对电子书、电子论文以及其他电子信息媒体减少征收增值税。限制书籍价格对保持图书与书店的多样性是不可缺少的，也应受到欧盟法的保障，对电子书亦是如此。

执政联盟也将在今后坚持对文化产业减轻税赋，并维护对公益设施减税的现有标准。执政联盟将考察减轻艺术行业消费税是否可行。

媒体

独立而多样化的媒体是有效运作的民主体制的重要支柱。因此，保障媒体的自由、

多样性和独立性也是执政联盟的一项明确目标。数字化以及与之相伴产生的媒体融合成为媒体世界当今的发展特点。对此起决定性作用的并非传播路径，而是管理制度。因此，联邦政府支持各州努力构建适应媒体融合现状的媒体秩序。执政联盟致力于组织一个“联邦——各州临时委员会”来衔接各州的准备工作，并通过该委员会制定必要的相容性规定以及衔接各法规，如衔接媒体监督、电信法及竞争法等。

随着欧洲及国际媒体行业的发展，一致而强有力地发声显得格外重要。这就要求我们坚持一贯原则，联邦与各州协调一致地在布鲁塞尔代表德国的利益。

执政联盟深知各州的职权，主张实现双轨制的媒体秩序。执政联盟希望所有媒体供应商能够有公平的竞争机会。因此，我们将加强私营企业媒体制作的经济框架条件。媒体制作业应努力追求平台中立性，即无线电广播与远程媒体的发布平台，尤其是市场垄断的平台运营商，要保证无歧视地传递信息及以中立态度获取内容。对公共价值作出贡献的私人 and 公法视听媒体节目以及新闻采编内容，应当在不受歧视对待的情况下进入发布渠道，并得到突出展示。执政联盟将审查视听媒体服务（AVMD-RL）准则，审查将适应媒体领域融合发展现状的需要，并放开广告规定。在网络广告领域，我们支持行业自我规范的设计。

我们需要检验反卡特法需要在多大程度上适应现今的媒体融合发展情况。这不能影响到我国媒体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在频带分配计划（无线电数字化 II 号）中，我们将在国内及欧洲层面上与各国达成一致，重视无线广播电台（DVB-T）及无线生产设备使用者（比如在文化机构中的设备）的利益，必须保留转换到 DVB-T2 所必需的前提条件。

“德国之声”是德国面向世界的重要声音，必须长期得到明显的加强。2013年夏，联邦与各州政府共同协定全面促进“德国之声”与德国电视一台（ARD）及德国电视二台（ZDF）、德国广播电台之间的合作，这一促进工作应在信息领域得到实施。

负责新闻采编的媒体对民主建设、信息自由、舆论形成具有重要意义，且这种意义不依赖于技术的传播。执政联盟支持各州重新引入“官方媒体证”的动议。

我们将进一步实行并继续发展联邦政治教育中心所提出的各种重要提议，特别是对（地方）新闻业的促进工作。

执政联盟将与各出版社及广大记者一起让人深刻意识到，报纸杂志具有文化财富的价值与意义。我们希望保持这一领域的产品多样性，特别是在地方层面上保持产品多样性。出版社与记者需要政策方面可靠的框架条件。

我们认为，报刊批发作为一种中立的销售途径是不可或缺的。它不应因欧洲的法律发展受到消极影响。我们将在新闻法中确定各州对报刊批发的权益。

联邦政府将同各州一道继续发展媒体数据库并支持作为媒体数据的出版数据的统计工作。

鉴于图书邮寄发售方式受大书商影响而不断增加，执政联盟将加强独立书店作为文化传递与汇集地的这一功能，比如通过引入表彰具有创新精神、重视文化的商业模式的年度奖。

我们国家的电影遗产必须得到持续保护，并在数字化时代能够得以体现。为此，在联邦政府促进电影数字化的工作之外，也需要各州及电影业的参与。德国电影资料档案基金会（Die Stiftung Deutsche Kinemathek）作为一个保护并向公众开放展示德国电影遗产的核心机构之一，应得到加强。执政联盟也

将从人力资源和财政方面对联邦档案馆提供支持。

德国电影促进基金会（Der Deutsche Filmförderfonds, DFFF）在过去的几年中为改善德国电影业的经济条件作出了极大贡献，并持续改善德国作为生产区位的国际竞争力。为促进德国电影业发展，我们将取消德国电影促进基金会现行的运行期限，并继续这一成功的促进项目。

执政联盟将在即将进行的修订《电影促进法》（Filmförderungsgesetz, FFG）的过程中，针对各个电影促进手段方法评估效果，使电影促进法能应对未来的发展。

我们将对所有有关负责人士发出呼吁，将德国儿童电影事业作为一项重点任务来抓。

我们要从整体上维持我国影院丰富多彩的现状。并要将那些作为文化场所起到特殊作用而且至今未能满足最低促进条件标准的影院也纳入卓有成效的数字化促进项目之中。

数字媒体

德国应当继续发展成为一个数字文化之国。我们的文化遗产必须数字化，使它流传给我们的子孙后代。

德国数字图书馆作为德国为欧洲数字图书馆（Europeana）贡献的力量承担了保护我国文化遗产的重要任务。联邦政府清楚地意识到数字化开发在传承文化和科学的过程中所肩负的职责，并以此为基础推进与各州及城乡协调一致的数字化战略。由联邦政府资助的机构必须有能力充实其库存。

媒体运用能力在我们的数字社会中是一项基础性的素质，也是每个年龄阶层的人独立使用媒体和网络的基本前提。它与民间媒体相互协作，共同创造了参与媒体和网络的机会，并使使用者对有可能存在的风险更加敏感。联邦政府过去的倡议应当在维护各州权能并与之紧密协调的条件下得到继续稳定

地执行。诸如“儿童之网”(Netz für Kinder)或“芬恩问问”(Frag Finn)等创意项目使儿童能够熟练地使用因特网。“国家首创纸媒”(Nationale Initiative Printmedien)应得到进一步发展并特别关注对儿童和青少年运用媒体能力的培养。

儿童和青少年应当能够利用网络为其提供的机遇与可能性并同时不受有害内容的影响。现代的青少年媒体保护必须在由国家、经济界和社会共同担负责任的条件下进行。我们应通过对话来开发有效进行青少年媒体保护的新方法。

社交媒体中儿童和青少年的数据必须受到特别保护。为对少年儿童提供有效的法律保护,应力求使法律规定适应于儿童保护而不受数字媒体传播方式的制约。这就需要 will 将现行青少年保护的高标准作为传媒的方向定位。在儿童网络保护中心(Zentrum für Kinderschutz im Internet, I-KiZ)有关人员正共同起草一个总体战略。该战略将整治、供应商承担责任和加强媒体运用能力相结合,并保障国际合作。

在我国,数字游戏影响着很多人的日常生活,特别是年轻人的日常生活。我们肯定高价值产品的多样性,特别赞赏具有教育意义的电脑游戏以及游戏开发者巨大的创造性贡献和极高的技术能力。对此我们要继续给予促进,比如设立德国电脑游戏大奖。我们将继续发展这一奖项,使之合乎时代潮流。我们应与市场参与者一道,进一步扩展由联邦议院、联邦政府和电子游戏行业共同发起并建立的数字游戏文化基金会(Stiftung Digitale Spielekultur),为经济与职业培训、教育、艺术与文化以及科学与研究等重点领域带来新动力。此外,我们要为后代将电子游戏保存下来,这就需要考察适当的存档方式。

体育

体育事业具有突出的社会政策意义,也是德国最大的公民运动。联邦政府将自己视为有组织的体育运动的合作伙。我们希望德国能保持一个成功的体育之国的地位。在精英体育领域,我们通过提供良好的工作条件和长期的发展前景,为高水平教练员改善总体框架条件。我们也努力通过资金分配,让所有人获知和理解资助体育事业的情况。通过在体育教育和职业两方面开展的“双轨事业”攻势,我们将与各联邦州在高校和雇主方面共同努力,在协调统一精英运动员的学业、职业教育或工作与精英体育方面创造更好的条件。要努力为精英体育运动、竞技运动及群众性体育运动持续提供富有吸引力、协调恰当、面向需求的基础设施。当出现需要保护人员免受环境影响的法律所规制的矛盾情况时,运动员的利益要得到适当的考虑。因此我们也将研究如何改动相关法律规定。

我们也将将在未来为“以体育促融合”这一富有成果的项目提供可靠的资助。在“人口融合国家行动计划”中,体育必须继续扮演重要的角色。在履行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UN-Behindertenrechtskonvention)方面,政府在促进体育事业的进程中应坚持不懈地进一步扩展包容性思想。我们要将体育事业纳入一个跨部门、促进运行的总体政策中,因为体育、健康促进和疾病预防事业构成一个整体。要保持德国足球的球迷文化。我们希望与各协会、社团及理性的球迷共同营造安全的体育场馆观赛秩序。因此我们欢迎并支持所有预防性措施,并将通过各种法律条件实现使犯罪者远离足球场的目标。

兴奋剂和比赛中的暗箱操作破坏了体育运动的伦理道德价值,危害运动员的身体健

康，欺骗和损害参赛的竞赛者及组织者。因此我们将继续制定抵制兴奋剂和暗箱操作的刑法法规。此外，也会将针对无限制持有兴奋剂用于体育比赛行为的法规及保护体育竞赛公平性的规定纳入考虑范围。同时要保障认定犯罪行为 and 刑法惩罚的适度性原则。法律规定既不能完全限制体育领域受到宪法保障的自治权，也不能损害体育审判权的作用。我们将确保对国家反兴奋剂办事处（NADA）提供持续的资助。在国内和国际层面上，我们将继续坚定不移地实践第五届国际体育及运动部长高级官员会议（MINEPS V）上所做出的“柏林宣言”（Berliner Erklärung）。同时，我们将继续举行国际性活动，首先要促使欧洲委员会制定相关的公约，并尽可能全面引入“良政标准”，以支持德国有组织的自主性体育事业。

在国际大型体育赛事奖项的颁发方面，我们将与自主的体育界合作制定公平且可持续的标准。

4.4. 德国数字议程

这是实现一个强大经济、公平教育和自由而安全的网络建设的机会。

数字生活与工作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们正经历着一场向数字社会转变的大变革。在经济和社会中应用现代科技如今已经成为习以为常的事。绝大多数工作岗位都深受数字技术的影响。在即将开始的数字化进程的下一个阶段中，很大程度上涉及的是基础设施：能源转型计划的成功要素是能源供应的数字化。在交通基础设施方面，无论在私人交通还是在公共交通领域都实现数字化。健康事业中的重大变化在于建设远程信息传送的基础设施。

数字化过程的决定性要素是网络全球化与信息技术领域的国际分工。遍及全球的网络是世界自由的保证。然而，最近发生的

国国家安全局窃听丑闻体现了数字社会的脆弱。信息技术安全成为维护自由权利的一项重要前提。数字化在社会中的发展机会与经济上的发展潜力不能受到威胁。

执政联盟将对一项 2014 年至 2017 年的数字议程作出决定，规定各职能部门的行为，并与经济界、劳资双方、市民社会及科学界共同持续促进其实施情况。

欧洲第一数字化发展大国

我们要继续发展数字经济的信息和通信战略（IKT-Strategie）。对我们而言，这一战略包括在国内及欧洲框架下的尖端研究、数字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及各行业企业的最佳发展条件。为应对全球安全政策的挑战，我们将通过优化框架条件、简化行政体制来促进德国及欧洲的信息及通信产业。

我们要对如汽车与机械制造、物流和健康产业等德国经济核心领域的数字化给予支持，并构建能使这些企业保持国际竞争力的框架条件。

我们要借助“未来工业 4.0 计划”推进传统工业的数字化，并在下一步将其扩展至智能服务领域（Smart Services），加强绿色信息技术领域的项目与措施。

此外，将尖端科研中获得的知识转换到实际应用中也十分重要。应借助技术管理协调中心、示范区和试点项目开始将知识转化到中小企业及传统工业中。

除“未来工业 4.0 计划”外，我们也将重点放在智能移动、智能电网、电子健康和安全性上，并以此巩固德国经济在世界市场中的地位。

为实现这一目标，应建立并扩大尖端产业集群和联合项目。其中经济、生态和社会的可持续性决定性要素。

我们将扩大针对中小企业和工业现有价值链的数字化发展，特别是在云计算、大数

据方面的指导服务。此外，信息技术安全、反经济间谍活动等课题应占重要地位。

我们要将促进大数据研究和创新的重点放在数据分析方法和工具的发展上，要建立技术管理协调中心并创建跨学科战略性应用项目。我们要同各州及欧洲合作伙伴协调一致，扩大德国在高性能计算领域的主导地位。

我们要在德国唤起新的创业精神，构建一种“二次机会”的文化（eine Kultur der zweiten Chance）。对此我们的目标是，创业项目的数量从目前的每年 10 000 家在未来几年持续提高到每年 15 000 家。为此应简化申请的行政程序。此外，我们还将对促进手段进行审查，检验其是否注意到包括回收利用在内的整个创新产业链。

我们希望使企业的建立更加容易：通过简化程序（一站式机构）来实现更快的创业。

我们将使 IT 行业的创业变得更简单，通过经济界推动新成立企业的创新型网络建设，并支持其国际化发展。

为帮助那些既不想放弃他们的收入、又不愿承担失去工作危险的雇员们在工作以外创业，我们将引入一种类似于“家庭照顾假”（Familienpflegezeit）模式的“创业假”。我们希望通过与德国复兴信贷银行（KfW）合作继续发展支持卓有成效的创业者的措施。同时，所提供的支持手段也可与众筹（Crowdfunding）的使用相结合。对失业者的创业应继续发展创业者补贴的办法。此外，我们要通过经济推动新成立企业的创新网络建设，使这些网络能为年轻的企业提供最好的框架条件并支持其全球化发展。

股票期权模式应得到继续发展和标准化，并应作为报酬体系中自愿取得的补充性部分得到建设，要更具有吸引力。

创新企业需要智慧的头脑。因此我们必须在国内通过教育和培训措施提高信息技术专业人才的数量。我们对相关协会提出要求，

为创业者制定公平的标准合同。

加强数字经济中创新人才的力量十分重要。对于“新兴数字经济”顾问组已经启动的事宜，我们将继续执行并扩大。

我们将把德国打造成具有国际吸引力的风险资本投资地，并为此颁布一项取决于融资可能性的独立守则（风险资本法，Venture-Capital-Gesetz），这一守则将特别改善风险投资者的行为。此外，我们要使投资于年轻企业和新兴发展企业的行为变得更富有吸引力。

我们希望通过投资补贴继续促进风险资本投资行为。此外，我们要评估联邦、各州及欧盟促进和资助手段的兼容性，并在必要时进行修改以使其相互适应。

为再次鼓励新兴且增长势头强劲的创新型企业的上市，我们将研究引入一个新型股票市场板块“市场 2.0”。

数字化教育与研究——公正与创新

数字化战略的一个重要部分是提高年轻人的媒体运用能力，使他们能够安全且富有责任意识地使用互联网。

我们认为，传授运用媒体和信息的能力是保护每一位互联网使用者的数据及网络安全的核心措施。因此，我们将评估并进一步发展在托儿所和学校中促进运用媒体能力的现有项目。“数字独立性”的理想也因此成为运用媒体能力的重心。我们支持“数字志愿公益年示范项目”（Modellprojekt Freiwilliges Soziales Jahr Digital），使年轻人将接触与应用新媒体的技术技能服务于公益机构的事业，并支持公益机构实施数字化项目和传授运用媒体的能力。要支持并扩展“儿童之网”的倡议，通过政界、经济界和机构方面的共同努力为儿童提供符合年龄阶段且有趣味性的高质量数字产品。

在开放性（研究）数据库、资源库和科研机构及高校开放性期刊的建设与扩展以及

国内、欧洲、国际范围内的协调联网方面的工作应在其各自项目的框架下得到促进。

对互联网和数字社会的基础性研究应当通过有针对性的项目研究倡议和提供相应资金而得到加强，并在制度上得到持续推动。由公共资金资助的互联网研究所也是跨学科技术管理网的中心点，将研究互联网的技术、经济、政策、法律和伦理。

数字化生活与工作——加强机会与权利

数字化创造了大量方便人类生活、为日常工作提供新可能的契机。通过数字化产生了一些新的可能来协调家庭与工作，例如灵活的工作时间模式。我们要求经济界对此给予支持。我们呼吁劳资双方促进并相应发展远程工作模式，摸索出一种新的劳动合同模式，能够加强雇员对远程工作岗位的自决权。我们将进一步增加公共服务中远程工作岗位的数量。

我们敦促公共管理机构和劳资双方加强扩展劳动者权利中职工的劳动自主权，促进工作与生活更好平衡（例如对缺勤的规定）。此外，我们也欢迎与此相关的企业内部规定。我们也将根据目标群体有针对性地促进和发展新型数字化手段，使之用于企业及公共服务部门的资格培训与继续教育。

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使用在线平台招贤纳士（电子招聘）。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坚守私人领域的界限，不允许规避在社交网络或类似平台上的隐私设置。

通过数字化发展尤其给年轻的父母带来了将家庭与工作相统一的新可能，例如灵活的工作时间新模式。

在健康领域，我们也利用数字化发展的契机，加强远程医疗的应用（例如密切监控危重症病人和慢性病人）。为此，需要高度保护数据。我们将防止病人个人的敏感信息不受控制地被传递给第三者。为从根本上简化

远程医疗的应用，应减少该领域中行政机构和法律上的障碍。我们要加大对智能家居环境（SmartHome-Umgebungen）中智能保健（E-Care-Systemen）的投入与发展，为老年人、需要照顾的人和残疾人群提供技术支持，减轻他们日常生活中的困难。我们另一个重点是电子健康卡（eGK）。我们应继续发展电子健康卡，减少病人在行政程序方面的开支，并改善通信交流状况。为此，数据保护方面的最高标准以及对数据进行安全编码是最基本的前提条件。

数字化日常生活为我们提供了帮助他人的机会，在网络中产生了社交网络和邻里自发组织的公民活动新形式。我们将支持这一发展，并促进“在线志愿活动”项目，比如促进公民与行政部门更好地合作（如，缺陷反馈中心、物品交换中心与志愿服务中心）。我们要表彰突出的项目并推动优秀案例的交流。我们要促进和创建传授运用媒体能力的项目，为避免数字化带来的代际分隔作出贡献（例如鼓励老年人向学生学习）。

我们要加强发展和运用联邦范围内的预警和信息系统，让公民可以通过预警和信息系统从短信、邮件或应用软件等渠道获取事故、危险和灾害的信息。

我们将引入各种应用系统（例如短信报警重要号码或报警软件），并修改《电信法》（TKG），使人们可以在紧急情况中不必接听回拨的电话即可呼叫和求助。

在数字时代，交流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改变，人们通过网络多种多样的平台进行交流。我们反对普遍的网络实名要求，因为匿名交流往往不仅是合理的，而且也是必要的。

除数字化带来的机遇，我们也意识到其风险。因此我们要在联邦范围扩大为网络成瘾行为提供预防和咨询的工作，并用科学的方式参与其中。

在未来四年中，我们将确定发展道路，

使德国和欧洲在对社会和经济进行坚定不移、适应社会、值得信任、安全可靠的数字化过程中占据领导地位。通过经过慎重思考的数字化政策，我们国家未来的机遇、民主和参

与的发展潜力以及创新能力和竞争力都将得到保障。德国将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数字化社会。

（以上由王少辰译）

译者简介：陈扬，丁思齐，王少辰，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硕士研究生。

文 教 论 坛

从人口与家庭看战后德国社会的变化^①

王 涌

【摘要】战后德国，人口和家庭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人口方面，人口总量本应有的增长明显被低出生率和寿命延长抵消，因而，变化主要体现在人口增长方式上，即低出生率，非婚生育，晚婚，晚育，外加人口引进；家庭方面，战后德国的家庭规模极度萎缩，主要以感情来维系，而且呈多样化态势，出现大量非婚同居、单身和单亲家庭。这些变化一方面展现了战后德国在人口和家庭方面具备的高度现代性；另一方面又带有着其特有的保守性，如引进外来人口方面对侨民的偏重，家庭方面仍有相当数量的二代同堂和高生育群体存在。人口和家庭方面，战后德国呈现出了一个传统与现代，保守与激进并存的局面。这是其他西方国家少有的。

【关键词】战后德国 人口 家庭 传统

凡社会变化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应社会转型而来，现代社会经历的最近转型就是由农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或由前现代向现代社会的转化。德国作为西方后起工业国，这个转型主要发生在19世纪，尤其是19世纪下半叶。就社会变化来看，德国社会转向现代的进程早在那时就已开始。但是，刚开始的变化是渐进的，许多方面还不甚明显。到了战后，一方面由于经济发展的加速；另一方面由于前期积累的成熟，这个变化明显呈加速态势，以致明显出现社会性质的变化，即不仅现代工业社会的一些特点凸现出来，而且一些所谓后工业或后现代

社会的迹象也显露出来，这一点从人口与家庭角度可以明显看到。

考察一个社会的现代化有诸多维度，人口、家庭、教育、职业、收入、社会差别、社会保障、生活方式等都从特定角度映现了一个社会的现代程度，其中，人口与家庭尤为直接。就德国社会的现代转型来看，人口与家庭方面的变化虽然从19世纪下半叶就已开始，但真正引发社会性质变化的乃是战后才开始，尤其是德国经济迅速腾飞的20世纪60年代。正是战后德国在人口状况和家庭结构方面的迅速变化，昭示了社会的快速转型，

① 本论文系作者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战后德国经济，社会结构和阶级构成的变化研究”（批准号09BSS016）的阶段性成果。

不仅转向工业时代的现代社会，而且也开启了向后工业时代的后现代社会的转化。

一、人口状况的结构性变化

从人口角度看，战后德国社会的变化似乎在数量方面，即人口数量开始有所上升，虽然幅度不大，但社会绝对人数在稳步上升。其实，这只是表面的，量上的变化，更深层的，实际的变化在人员结构和质方面，因为人口总数的增多很大程度上来自外来移民，而非自身人口的自然增长，即便那些自然增长部分，也很大程度被寿命延长所抵消。所以，战后德国人口方面发生的真正变化主要来自内部，来自结构组成的变化，即增长方式的变化。

从传统角度看，人口的自然增长方式由婚姻而来，而且由于高死亡率的缘故，每个婚姻都会产生诸多下一代。自19世纪末以来，这个传统方式在德国开始渐渐被颠覆。不仅非婚生现象开始出现，且出生率开始下降，尤其在战后至今的几十年里，非婚生现象由于个人自由度及社会认可度的提高，逐年上升。据德国著名人口统计专家格律海特（Evelyn Grünheid）和玛麦（Ulrich Mammey）的有关数据，战后德国（东德和西德）非婚生育经历了50—60年代由于战争导致的低谷之后，从70年代开始明显上升。到了90年代中，西德地区的非婚生育从60年代占社会总生育的约6%上升到了约20%；东德地区

则从约10%上升到了40%以上。^②非婚生育数的提高并不直接导致社会人口总数的上升，因为非婚生育的出现只是表明了观念和生育方式的变化，而不是额外生长出了新的生育份额，那些非婚生育的女性即便以后有了婚姻也大多不会再额外生育。事实是，伴随着非婚生育的出现和发展，社会总体出生率却出现明显下降。早在19世纪末德国已出现出生率下降现象。从19世纪末到一战结束，德国每个女性平均生小孩从5个下降到2个。^③战后，这个下降趋势有了明显增大。1955—1964年，在西德虽曾出现战后的新生儿暴增（babyboom），但那是由于战后呈社会多数的女性一起进入生育期所致。此后出生率又返回下降轨道，1965年到1975年平均每位女性生育数从2.5个下降到1.4个。^④此后基本维持在该水平。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根本不生育的女性明显增多，那大多是由于60后出生的女性开始选择不要小孩。但是只生育一个的女性又不多，要么不生，要生就至少二个。导致这低出生率的另一因素是晚育，从1970到1999年间生第一胎的女性平均年龄从24.3岁上升到28.8岁。^⑤这样的现象在东德不仅依然，而且更甚。1960年开始东德的出生率一直呈下降趋势。战后德国如此持续的低生育率不仅抵消了人口自然增长中的生育数，包括非婚生育，而且还使社会人口状况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即自然增长的社会人口并不是由全体女性共同所致，而是社会中部分自愿女性所致。统计数字表明，战后德国

② Grünheid, Evelyn / Mammey, Ulrich: Bericht 1997 über die demographische Lage in Deutschland. In: Zeitschrift für Bevölkerungswissenschaft, 22, S.377-480.

③ Hoepflinger, F.: Bevoelkerungssoziologie. Weinheim/Muenchen, 1997, S.42.

④ Geissler, Rainer: Die Sozialstruktur Deutschlands, zur gesellschaftlichen Entwicklung mit einer Bilanz zur Vereinigung, Vs Verlag fuer Sozialwissenschaften 2011, S.53.

⑤ Dorbritz, J.: Bericht 1994 ueber die demographische Lage in Deutschland. In: Zeitschrift fuer Bevoelkerungswissenschaft ,19, 1993/1994,S.417.

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女性放弃生育。人口状况的结构性变化在战后德国更大程度地来自寿命延长。据联邦统计局2003年公布的数据,20世纪初,德国人的平均寿命是男人约45岁,女人约48岁;到了战后50年代初男人约62岁,女人约65岁,60年代男人约68岁,女人约74岁;80年代开始平均寿命又开始明显增长,男人由约69岁上升到2000年的约75岁,女人则从约71岁上升到80岁。^⑥显而易见,战后德国出现了一个明显的现象——平均寿命延长,与此相随,人口老化也就接踵而至。因此,战后德国社会总人口的增长中有很程度是人口老化所致,即出生率下降,寿命变长。

战后德国社会人口结构变化中更显眼的是外来人口。外来人口作为社会转向现代在人口结构方面的标志,几乎在所有西方国家都能找到,那是由于经济发展和劳动力短缺所致。战后德国社会的发展自然也留下了外来人口的身影,但与其他西方国家不同的是,战后进入德国的这些外来人口中很大部分本来就是德国人。由于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缘故,这些德国人留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本土以外的地区,战后这些人开始由外进入德国本土。战后德国外来人口经历三个阶段:最初主要由那些滞留在外的德国人回到故里组成(40—50年代),然后是主动引进(60—70年代),最后是被动接受(80年代开始)。二战结束后的1946年时,西德人口有4千6百万,1974年时达到6千2百万。这其中有不少是外来人口或外来移民。最初,40—50年代里,德国的外来人口基本由那些滞留在外的德国人回归故里组成。二次世界大战过程中,由于扩张,不少德国人被有系统地外迁,主要向东部,南部。战争

结束时,不少原德国领土又被割让出去。这就使得战争结束时出现了一股大量德国人涌入的潮流,形成了战后德国的第一波外来移民。这些人有三类:被驱逐者(Vertriebene),难民(Flüchtlinge)和外移回归者(Aussiedler)。前者指那些原属德国领地的居民,战争结束时领地被割让出去,这些人则被新国家主权驱赶出来;难民指那些战争时逃难出去的德国人;外移回归者则指战争时主动移居出去的德国人,这些人往往已加入所在国国籍。这三种人战后进入德国时虽获得了不同对待,但都是社会需要的,成了战后德国重建的一股重要力量。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约有1400万德国人被从东部地区赶出,约230万人死于前往德国本土的逃难途中。800万人到达西德,其中有200万先到东德,稍作停留后又来到西德。约400万留在了东德。这些人是西里西亚人(Schlesier),苏德台人,东普鲁士人。他们对东西德此后的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提供了很好的劳力,部分掌握技术。同时,由于东西德奉行两种社会制度,又导致部分人从东面跑到西面。1945—1961年间,至少有310万人从东德来到西德,而西德只有47万人进入东德。该时间段,西德有200多万人移民去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60年代开始,由于经济飞速发展,西德开始出现劳动力缺口,于是有意识地从外国引进劳工。1961—1974年约有350万外来劳工进入西德,其中大部分是土耳其人。1974年停止引进,但此后又有以家庭团聚方式进入的人口,1974到1989年间这样的人进入了70万。(Rainer Geissler, S. 67)到了80年代,德国社会进一步发展,开始有来自世界各地的难民进入,尤其是东欧解体,边境开放,很

^⑥ Statistisches Bundesamt (hrsg.): Bevölkerung Deutschlands bis 2050, Wiesbaden 2003, S.15. Lakemann, Ulrich: Familien-und Lebensformen im Wandel. Eine Einführung für soziale Berufe. Lambertus-Verlag 1999. S.24.

多人利用这一点来到西德。仅 1992 年就有 438,000 人在德国提出难民申请，达到历史最高；1993 年德国修改了“难民法”，进来的难民人数才开始下降。

至于外移回归者（Aussiedler）这样的外来群体在战后德国从来没有停止过，这些原来自觉从德国移出并加入了所在国国籍的德国人在战后又不断回到德国，主要是联邦德国。政府在对待外来移民问题上对这些人历来奉行宽松政策，一般只要能证明自己曾是德国人就行，不管是否还会德语，都能被接纳。60—70 年代这些人开始进入西德，但数量不大。苏东解体后，由于这些地区的出境限制消失，进入德国的这些人明显增多，而且大多来自原苏联，东欧等国家。由于这股人数急增的潮流主要从 1993 年开始，所以这些人从那时起又被称为晚来的外移回归者（Spätaussiedler）。

可见，20 世纪 40—50 年代里，原西德社会人口中有近 1/4 的人属于外来人口，而且这些人本来都是德国人；60—70 年代里有 400 多万主要来自土耳其的外来劳工进入西德；80—90 年代以来，又有近百万移民从苏东地区，乃至世界各地进入德国。单从数量上看，战后德国人口结构中发生了一系列特有的变化：首先，外来人口成了社会人口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次，外来人口中具有德国血统的人占主导地位，这些人在战后社会发展中从第二代开始就基本被社会同化；再次，土耳其人成了实际外来人口的主导，但数量被外移回归德国人很大程度抵消，也就是说，没有那些回归的德国人，这部分真正外来移民的数量还要大。不管怎样，战后德国的人口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本土人口组成中分化出了本地德国人和移入德国人二部分，他们的后代中也存在这样的差异；另一方面，社会发展不可避免的真正外来移民被控制在较低限度。同时，由于低出生率

和寿命延长的缘故，年轻一代中，本地德国人的份额有渐渐降低的趋势。这又从另一个角度在提升德国人口结构中外来人口的比重，但由于基点太低，这种提升还不足以改变整个社会的人口组成。

以上主要是就联邦德国以及统一后德国的情形而言，至于战后东德则在人口发展上出现了一个特殊情况，战后前三年由于接受被驱逐者，东德人口有增长，但此后不再出现增长，这除了低出生率和寿命延长等因素外，由于政治经济因素而人口外流也是一个重要原因。1948—1989 年间东德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人口没有增长的国家，从 1910 万下降到 1640 万。这或许也是战后东德社会发展一直滞后西德的原因之一。

二、家庭规模极度萎缩和形式多样化

家庭是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分子，前现代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的标志之一就是家庭规模缩小，即从多人口，数代同堂的大家庭过渡到少人口，充其量二代同堂的小家庭，甚至出现一人家庭和单亲家庭。这是社会发展所造就的独立和自主理念的必然产物。低生育率、晚婚、晚育是其具体体现。战后德国的社会变化也很大程度地体现在家庭规模的这个变化上。

家庭成员的减少其实早在 19 世纪末的德国就已经开始，战后经济和社会的飞速发展则明显加速了这个进程，进而使得社会性质开始出现显著变化。就德国联邦统计局 2002 年公布的数据看，战前德国还是 4—5 人以上的大家庭占主导地位，战后则出现了 2—3 人小家庭占主导地位的局面，到了 2001 年甚至有超过 70% 的家庭是由 1—2 人组成，而且 1 人家庭占到了社会家庭总数的 1/3 以上。具体见表 1

表1 1900—2001年德国家庭人口组成(占总家庭数的百分比)

年	1人家庭	2人家庭	3人家庭	4人家庭	5人以上家庭
1900	7,1	14,7	17	16,8	44,4
1925	6,7	17,7	22,5	19,7	33,3
1950	19,4	25,3	23	16,2	16,1
2001	36,6	33,6	14,3	11,3	4,3

资料来源: Statistisches Bundesamt (Hrsg.): Datenreport 2002 – Zahlen und Fakten über 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onn 2003, S.39.

由表1可以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德国家庭中还是3人以上家庭占主导地位,约占社会总家庭数的一半多,其中4人以上家庭占社会总家庭数的1/3。这表明:二代或三代同堂依然是家庭的主导形式;经过战后约50年的发展,情况发生了巨变,社会上2/3以上的家庭仅由1—2人组成,3人以上家庭不到1/3。这表明:二代同堂现象已属少数,而且高份额的1人家庭充分显示:战后德国家庭规模极度萎缩,甚至萎缩到世界范围内数一数二的地步。从德国联邦统计

局2002年公布的世界范围内1993—2000年的平均数来看(表2),德国家庭规模小到仅次于瑞典,系世界上家庭规模最小的二个国家之一,家庭平均人数只为二人略微多一点,而其他西方工业国都接近或达到三人,超过三人的当然是一些欠发达的发展中国家的情形,像塞内加尔这样的落后国家,甚至达到9人。仅从这一点看,战后德国在世界同比中堪称现代性程度极高的国家。如果看一下该数据中包含的大量单身和单亲家庭,就更能彰显这一点。

表2 1993—2000年间世界家庭规模比较 单位:平均家庭人数

国家	瑞典	德国	挪威	法国	意大利	美国	日本	西班牙	葡萄牙
家庭平均人数	2.1	2.2	2.3	2.5	2.7	2.7	2.7	3.0	3.0

国家	中国	巴西	土耳其	埃及	印度	科威特	摩洛哥	阿曼	塞内加尔
家庭平均人数	3.4	3.9	4.2	5.2	5.5	5.8	6.8	7.0	9.0

资料来源: Statistisches Bundesamt (Hrsg.): Statistisches Jahrbuch 2002 fuer das Ausland. Metzler-Poeschel Verlag, Stuttgart 2002.

单身家庭是现代社会的显著标志,战后德国的单身人数一直处于快速增长中。20世纪初德意志帝国的人口与1999年的德国差不多,但当时单身有1百万,而1999年是1120万。(Rainer Geissler, S.420)战后,增速尤其

加快。据雷克曼(Ulrich Lakemann)统计,1910年时德国单身家庭占家庭总数约7%,1945年时约18%,此后开始持续增长,1950年约20%,1970年约26%,1980年约33%,1999年约37%。^⑦与单身家庭相伴随的是单亲

^⑦ Lakemann, Ulrich: Familien- und Lebensformen im Wandel. Eine Einführung für soziale Berufe. Lambertus-Verlag 1999. S.24.

家庭。战后德国，单亲家庭也明显增多。战前，单亲家庭在德国微乎其微，战后开始渐渐增多，到了2000年，德国约有200万单亲家庭，^⑧这占德国总家庭数的约15%。^⑨

所有这些都展现了战后德国社会转向现代的实际面貌，这个面貌无疑体现了战后德国人开始越来越转向独立。但这样的数据背后又隐藏着战后德国高离婚率和高独身率这个事实。据有关统计，结婚人数在战后德国除最初的几年外始终处于下降中，尤其自60年代以来。

1970年西德只有5%不到的年轻男女不结婚，而1998年是30%，在大城市数字更高，乡村相对低一些，尤其女性有一半不结婚。^⑩统计数字显示，80年代结婚的人虽有所增加，但那是由于高离婚率导致的第2或3次结婚。此外，女性第1次结婚的年龄也从1960年23.7岁上升到28.4岁，男性从25.9岁上升到31.1岁。^⑪许多男性25岁后还与父母生活在一起。

东德这方面的情况略微好一些。但统一后，马上与西德呈现出一样的态势。同时，离婚率也在战后德国经济飞速发展的60年代开始明显上升，90年代末上升到最高，至今一直保持在高位，也就是说，90年代末以来德国所发生的婚姻中有40%离掉了，70年代是9%。据有关研究，德国人的离婚大多在婚姻的第5，第6年。^⑫但值得关注的是，东德

的离婚率一直高于西德约一倍，两德统一后开始渐渐拉平。与高离婚率和低结婚率相伴相生的是不结婚而生活在一起的同居人数增多。这一现象在西德是60年代开始出现，70年代后呈明显上升趋势；在东德从80年代初开始出现，之后同样呈明显上升趋势。据德国人口研究所（Bundesinstitut für Bevölkerungsforschung）公布的数据，70年代初的西德约有20万人选择了不结婚而同居的生活方式，80年代初时，这样的人数已上升到50万，90年代初100万，两德统一后又进一步上升，到新世纪达到了150万。这里的同居并不是指暂时生活在一起，而是完全像组建家庭一样生活在一起，并生育小孩，只是没有登记结婚而已。社会对这种家庭方式的认可度也越来越高。战后德国这种反世俗家庭方式的出现自然有其反社会的一面，但这个反世俗中有诸多实际的内涵，如为了避免因结婚而来的财产强制等。家庭内部随着女性从事职业的不断增多，父母角色也开始有所变化，母亲如果职业比父亲好，经常会有父亲在家带小孩的情形出现。

家庭规模缩小和形式多样化几乎在西方所有发达国家都程度不等地存在，德国也没有例外。但是，战后德国的发展，或许由于高速的缘故，不仅使得社会在短短的几十年内快速变化，而且变化的程度也明显超出西方其他发达国家。这就给考察社会的现代转

⑧ Geissler, Rainer: Die Sozialstruktur Deutschlands, zur gesellschaftlichen Entwicklung mit einer Bilanz zur Vereinigung, Vs Verlag fuer Sozialwissenschaften 2011, S.417.

⑨ Statistisches Bundesamt (Hrsg.): Datenreport 2002 – Zahlen und Fakten ueber 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onn 2003.

⑩ Schwarz, K.: Bericht 2000 über die demographische Lage in Deutschland. In: Zeitschrift fuer Bevölkerungswissenschaft ,26, 2001,S.17,S.27.

⑪ Weick, S. Auszug aus dem Elternhaus. In: Informationsdienst Soziale Indikatoren Nr.27, 2002, S.12.

⑫ Fookon I. / Lind, I.: Scheidung nach langjaehriger Ehe im mittleren und hoeheren Erwachsenenalter. Stuttgart/Berlin/Koeln 1996.

型提供了一个典型的案例。

三、人口与家庭维度下的现代德国社会

从人口和家庭角度看社会变化，迄今已经有了一些可以把握的尺度。就离我们最近的农业向工业社会或前现代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而言，人口方面，农业社会一般是没有婚姻自由，没有人口控制，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并存，社会总人口增长缓慢。工业社会不仅有婚姻自由，而且个人实施人口控制，出生率低，但寿命延长，人口老化出现，社会总人口增长缓慢，人口开始出现零星外移，有系统地出现外来移民；家庭方面，前现代时期的农业社会一般是，数代同堂的大家庭占主导地位，劳动与居住都在同一个地方。而现代社会中，那样的大家庭开始消亡，家庭充其量是二代同堂，晚婚、晚育、低生育率、高离婚率和高独身率等都使得单亲家庭和一人家庭增多。同时，劳动和居住地点开始分离，家庭形式出现多样化趋势。就战后德国社会在几十年中发生的变化而言，德国已经实实在在地进入了现代社会，以上所述现代社会在人口和家庭方面的诸特点在战后德国，尤其是联邦德国已经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来。战后德国的低出生率就是人口自我控制的产物，一人家庭，单亲家庭的出现就是婚姻自由的必然结果。同时，零星的人口外移和有系统的外来移民都是战后德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家庭方面，战后德国家庭规模的极度萎缩以及多样化的存在方式近乎以极致方式体现了一个现代社会的征象。

在西方诸工业国家中，联邦德国社会的现代转向自然有其自身特点。一般而言，谁都会用“快速”来描述战后德国社会的变化。勿庸讳言，像联邦德国这样的国家只花了10—20年的时间便从废墟中重新崛起，惊人

的速度，不仅从经济发展角度看，而且从社会变化角度看，都是如此。“速度”无疑可以标识出战后德国社会发展的特点。但是，速度本身只是一个量词，其背后还隐藏着一些更深层的事实，即那些支撑起这个速度的事实。这些事实同样体现在人口结构和家庭组成的变化方面，正是这些事实使得战后德国的现代社会与其他国家不尽相同。

在一个社会的现代转向中，非婚生育、晚育等是普遍出现的现象。战后德国虽也如此，但那是在经济飞速发展后，即60—70年代以后才明显并急剧出现。这一方面表明战后重建的头10—20年里，人们是用前现代时期的热情和干劲在建设家园，这样的人力与现代技术的结合就导致了异乎寻常的速度；另一方面，相对滞后的社会转型又凝聚着惊人爆发力，这就使得虽然后起，但快速、彻底。战后德国人口结构变化方面最能显示出德国特色的地方是在外来移民方面。本来，一个社会的现代转型中不可避免地会有系统地引进外来人口，这是社会发展对人力资源的高需求所致。战后德国，主要是联邦德国，依托自身的历史给定性，在有系统地引进外来人口方面，首先推举那些对本土具有亲近感的国外德国人。战后刚开始的头十几年里，经济和社会重建需要的大量人力几乎都由这些外来人口消化，即所谓的被驱赶者、难民和外移回归者。只是到了60年代，这些外来人口供不应求的时候，才开始真正引进一些外来人口，而且主要来自土耳其。即便在引进人口向全世界开放的80—90年代，那些国外德国人，包括他们的后代，都是被排在首选之列的，正因为此，才有了所谓“晚来的外移回归者（Spätaussiedler）”群体。这样的外来人口，一方面由于“外来”而不断给劳动大军供入新鲜血液，成为一支动力绝佳的劳动队伍；另一方面又由于“同根同源”而

具有着对社会发自内心的认可，这不仅减少了文化摩擦，而且还能加倍地转化成建设的动力。这样的外来人口无疑给社会发展速度提供了其他西方国家所没有的支撑。这是战后德国社会转向现代过程中在人口结构方面的固有内涵，这个内涵从特定角度虽然诠释了战后德国社会发展的速度，但也表明了本土文化的某种凝固性。由于本来需要的外来人口很大程度上被德国人自己所抵消，这就使得本土文化伴随社会现代化本来会有的开放性大打折扣。结果，战后德国社会一方面有着很大程度的现代性；另一方面又在某种程度上缺失现代社会所拥有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人口问题上，现代性集中体现在高程度的非婚生育、晚婚、晚育等方面，保守性集中体现在真正外来移民数以及社会对他们的认可度相对较低。这种现代与保守并存的现象同样存在于家庭构成方面。

现代社会中，家庭的作用本来不可避免会萎缩，乃至退隐，因为农业社会中原来由家庭承担的医疗、养老、教育等开始外移，不再与家庭联在一起。这就使得现代社会中凝聚家庭的核心是感情，社会也由此分化成两部分：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家庭在现代社会里越来越退隐到私人生活领域。其具体体现便是原来几代同堂的大家庭开始被人数少而且充其量二代同堂的小家庭取代。战后德国同样呈现出了这样一个变化过程，而且不仅快速，还很彻底。纵观德国社会的整个变化，这个家庭构成的演变其实从战前就开始，但是，到了战后明显加速，尤其是在经济快速腾飞的60年代以来，以致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彻底颠覆了战前还占主导地位的农业社会的家庭结构，进而使得德国在全世界的同比中遥遥领先。大量1人家庭，单

亲家庭和高离婚率，低结婚率的出现，甚至又将德国社会的现代进一步推向了后现代，因为1人家庭和单亲家庭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家庭了。战后德国如此现代的家庭结构背后还隐藏着其保守的一面，因为新世纪以来占社会总家庭数近1/3的3人以上家庭中绝大部分是二代同堂，而且相当部分是小孩成年后还与父母同在屋檐下，^⑬这在其他西方国家是不多见的。此外，生育问题上战后德国女性要么不生育，要么就生多胎成为事实：一方面表明生育主要集中在部分女性身上；另一方面也表明这些女性的传统与保守。当今世界，可能找不出一个像德国那样现代与传统，激进与保守如此并存共生的国家了。

此外值得关注的是，战后两个德国虽然在政治经济体制和发展水平方面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情形，但是在社会人口和家庭结构方面却没有出现对等的差异。相反，同反而大于异，也就是说，战后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在人口和家庭结构方面出现了大致相同的情形，都开始快速转向现代，乃至后现代。不同的只是在程度和幅度方面，如外来人口的规模方面联邦德国就远远超过民主德国。由此就可得出结论，社会人口和家庭结构变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不平衡性。前者更大程度受到观念等文化方面因素的影响。两德在政治经济方面虽然差异巨大，但在生活观念方面却没有出现如此大的差异，这就使得社会在人口和家庭结构方面大致相同。

总体而言，德国社会的现代转型从战前的帝国时期就已开始。但是，到了战后，或许由于二次世界大战的阻隔和积压，才全方位，并快速和彻底地释放出来，使得整个社会快速转向现代，乃至后现代。快速一方面使得变化来得彻底，另一方面也使得其拖有

^⑬ Engstler, Heribert / Menning, Sonja: Die Familie im Spiegel der amtlichen Statistik. Berlin: Bundesministerium für Familie, Senioren, Frauen, und Jugend, 2003, S.35.

一些保守的尾巴，因为总有一些跟不上、来不及转变的因素被拖进了现代社会中，这往往是在观念和文化方面。从人口和家庭角度

看战后德国现代社会的变化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作者简介：王涌，法兰克福大学哲学博士，华东理工大学外语学院教授。

漫画在外语复合型课程教学中的应用 ——以德语讲授的德国外交课程为例

吴 江

【摘要】本文以四幅政治漫画的教学实践为例，探讨了漫画在外语复合型课程教学中的应用：导入环节漫画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展开环节漫画易于引导学生进行归纳探究；深入环节漫画旨在提高学生的思辨能力；延伸环节漫画利于学生培养多元的跨学科能力。一幅漫画的教学兼顾了语言知识和专业知识的传授，同时培养了学生观察、理解、分析和归纳的能力，是一次思维训练，更是一次对学生认知能力的整合。

【关键词】外语复合型课程 漫画教学 归纳式教学

20世纪90年代末教育部颁布的《关于外语专业面向21世纪本科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见》指出：“随着国际交往的扩大、我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国际交往中经济因素的不断增大和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策，在外语教学中迫切要求我们在原有的文学和语言学基础上增加有关外交、经贸和金融等方面的内容。”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中国的绝大部分外语院校已逐步转变了单一外语的培养理念，一批用外语讲授的结合专业知识的外语复合型课程应运而生。以笔者开设的用德语讲授的德国外交课程为例，课程旨在让学生了解自二战结束后德国外交政策的历史沿革以及德国现行的基本对外政策，讲授外交专业知识的同时提高学生的听、说、读、

写、译的语言综合运用能力以及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既通晓外交专业知识又具备扎实语言基本功的外语复合型人才。

如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既具有娴熟外语能力，又拥有多元专业知识和思辨能力的外语复合型人才，外语课程的教学改革迫在眉睫。笔者在用德语讲授的德国外交课程的教学实践中使用过大量的政治漫画，政治漫画图文并茂，易于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专注力；政治漫画聚焦于某个政治人物或是政治事件，易于检验学生对所学基础知识的掌握；政治漫画蕴含着对政治人物或是政治事件的评价，易于培养学生思辨能力。政治漫画一般浓缩了跨学科的知识，易于将教学延伸到课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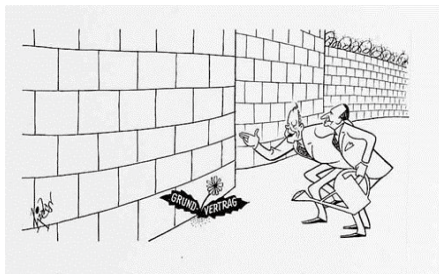
本文以四则政治漫画在德国外交课程第一个单元“德国外交的历史沿革(1945—1990)”的单元归纳课中的使用为例,探析漫画在外语复合型课程的不同教学环节中的教学功能。

一、教学导入环节:漫画与学习动机

当今时代,话语不仅以文本形式体现,还辅之以图像、颜色、声音和动作等多种模式,政治漫画就是一种图像和语言文字这两种符号相结合的视觉模态语篇,属于多模态话语。政治漫画通过图像和语言两种符号共同协作构建意义,从而创造出一个完整的语篇和交际事件,具有着激发外语专业倾向课程学生兼顾语言训练和专业知识学习的先天优势。以下是笔者为此选取的四幅漫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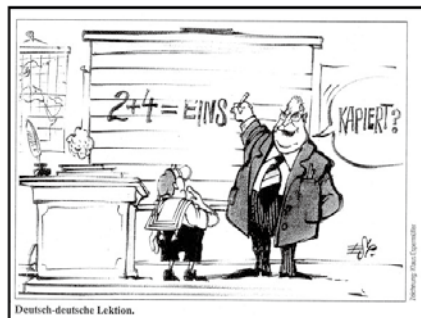
漫画 1



漫画 2



漫画 3



漫画 4

这四幅漫画并非出自同一位漫画作家之手,笔者根据专业知识传授的需要嫁接而成一幅“四格漫画”,力图再现西德历史上四届重要的总理(阿登纳总理、勃兰特总理、施密特总理和科尔总理)执政时期的重大外交事件。“四格漫画”在教学导入阶段的使用可以避免在单元归纳课中机械地重复教学内容,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在温故的基础上“知新”。以下是导入阶段可供选择的教学策略:

1. 设计对话框

对于漫画而言,图片和文字缺一不可。没有图片,文字将失去意义;缺少文字,漫画的图片会是晦涩难懂。文字在漫画中的体现可以通过“对话框”的形式完成。“对话框”让故事中的人物对话成为可能,这不仅激发了读者在观看作品时的听觉感受,读者

还会不自觉地把自己当作正在交谈的一方，从而通过第二视角与作品产生一种更近距离的互动。四幅漫画的核心人物都有着丰富的内心独白，学生也可以小组的形式分别为漫画中的人物设计对话框，甚至是类似酒瓶、小花、沙发或是镜框等物品也可用拟人的手法参与到对话中来。对话框的设计环节为漫画从表意到叙事的过渡奠定了基础，画面和对话框的结合使得漫画从一维走向二维，表现力更为丰满。

2. 叙述故事

早期的漫画只是被当作表意的工具，而没有被当作叙事的工具，因此它只是像美术作品那样以单幅的形式存在。这一定式在19世纪20年代被瑞士人Rodolphe Töpffer改变了。他的作品《Histoire de M. Jabot》(1833)开启了故事漫画的先河。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在设计好的对话框的基础上尝试用德语叙述漫画展现的故事。具体方式可将学生分成四个小组，每个小组负责一张单幅漫画的故事讲解。时间允许的话，也可以这四幅漫画组成的“四格漫画”为主题请学生分组讲解。“格”在漫画中起到了电影中镜头的作用，条件允许的话，学生还可以通过表演的方式进行演绎，使漫画从二维走向三维。

二、教学展开环节：漫画与归纳式教学模式

作为相辅相成的两种科学认识方法，归纳和演绎在教学中各自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归纳法的特点是从具体到一般，学生通过接触具体的鲜活的事物概括出抽象的道理，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易于被学生接受；演绎法则从一般到具体，是巩固知识的必要途径，检验学习效果和延伸的重要手段。然而在传授专业知识的教学实践中，教师经常会

从专业概念或是理论入手，看似高屋建瓴，实则忽略了归纳的过程。殊不知，只有在归纳总结的基础上，学生才能把知识内化成自己的科学意识，并再通过分析演绎出理论体系或具体推论，从而扩大知识层面并解决问题。漫画正好为归纳式教学模式创造了可能，以这堂单元归纳课的教学展开环节为例：

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政治系赫尔曼教授(Prof.Gunther Hellmann)在由他主编的《德国外交导论教材》的开篇就是从概念入手。在列举不同的政治学家对外交的定义之后，赫尔曼教授认为无论对外交的单个定义之间有多大的区别，它们都有一些共同点：外交的核心是一个由“行为者”(Akteure)构成的特殊的群体(多数是指能够通过领土主权予以区别的国家)以及这些“行为者”建立在实现“利益”(Interessen)基础之上的“行为”(Handlungen)。这一总结性的解释明确指明了定义外交的三要素，那就是“外交行为者”(Akteure)、“外交行为”(Handlungen)和“外交利益”(Interessen)。笔者曾试图在德国外交课程的第一节课将赫尔曼教授定义外交的三要素传授给学生，但是学生反映颇为枯燥，教学效果并不好。

仔细研究这四幅政治漫画后，笔者发现如果以“Wer(谁)”、Was(什么)以及Warum(为何)为关键词引导学生进行归纳，恰好分别对应了赫尔曼教授总结的定义外交的三要素。具体的归纳过程详见课堂使用过的PPT：

展开讲解的过程中学生很自然地将这三个疑问词进行归纳总结，并在教师的引导下欣喜地发现三个疑问词恰好对应了赫尔曼教授提出的三个要素。深入浅出的归纳过程发挥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不仅利于对抽象概念的理解和记忆，更为以后用这三个要素分析其他时期的德国外交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Diskussion 展开环节

Adenauer 阿登纳 **Schumacher 舒马赫**

Wer? 谁在吵?
Adenauer + Schumacher
西德总理阿登纳 + 在野党主席舒马赫

Was? 吵什么?
“entweder oder” vs “weder noch”
“一边倒”还是“另起炉灶”?
Warum? 为何吵?
Westintegration vs Dritten Weg
西德总理阿登纳希望倒向西方，在野党主席舒马赫则希望走一条独立的“第三条道路”。



漫画1

Diskussion 展开环节

柏林墙



《基础条约》 漫画2

Wer? 谁在浇花? Brandt + Bahr
西德总理勃兰特 + 外交政策顾问巴尔

Was? 浇什么花? Grundlagenvertrag
此花寓指两个德国签订的《基础条约》

Warum? 为何要浇花? Durchsetzung der Neuen Ostpolitik 新东方政策的实施



Brandt und Bahr
勃兰特和巴尔

Diskussion 展开环节

《北约双重决议》 漫画3

社民党



西德总理施密特

Wer? 谁在悬空? Helmut Schmidt 西德总理施密特


Was? 镜框和沙发指什么? NATO-Doppelbeschluss + SPD
镜框指《北约双重决议》；沙发指“社民党”

Warum? 为何悬空? Protestbewegungen wegen des NATO-Doppelbeschlusses
《北约双重决议》引发的争议

Diskussion 展开环节

漫画4

弄懂了吗?



2: BRD + DDR
2 指两个德国

4: vier Besatzungsmächte
4 指美英法苏

1: vereinigtes Deutschland
1 指统一的德国

Wer? 谁在上课? Helmut Kohl 西德总理科尔

Was? 上什么课? Deutsche Wiedervereinigung 德国统一课

Warum? 为何要上课? “2+4=1”并非简单的数学题，而是寓指迈向德国统一的“2+4”（2指两个德国，4指美英法苏四大占领国）进程。

三、教学深入环节：漫画与思辨能力

漫画之所以脱离普通绘画艺术，标志就在于画家们在其中融入了针砭时弊的讽刺。展开阶段教师主要启发学生自己归纳并领悟德国外交的三要素，深入阶段教师则要结合这三个要素对学生的思辨能力进行提升：

1. 外交行为者

四幅漫画的主角是西德历史上在外交领域立下过汗马功劳的四位总理，教师需要引导学生思考为什么总理在德国外交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同时推荐学生阅读德国的《基本法》，理解德国总理决定德国的大政方针政策，是德国外交最为重要的行为者之一。当然，外交行为者绝非仅仅限于这四

届总理，教师还需引导学生回顾总结在第一单元的学习中还接触过哪些外交行为者，并鼓励学生在今后的外交课程学习中学会分析不同的外交行为者（如总统、内阁部长、议会、协会、媒体等）在多大程度上对德国的外交产生影响。

2. 外交行为

四幅漫画分别对应了西方一体化进程、新东方政策、北约双重决议、德国统一等西德外交的四次重大决策。如果仔细分析每一幅漫画就会意识到：西德每次外交决策的推行都并非一帆风顺，有的决策出台时甚至遭到误解：漫画1中的玻璃碎片表现的是不同党派在选择外交道路时的争执；漫画2中绝处逢生的小花喻示着缓和政策的来之不易；

漫画3中的孤家寡人象征着外交一旦缺少党内支持的举步维艰；漫画4则隐含着德国统一缔造者的远见卓识。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将这四次重大外交决策进行对比，分析每次外交决策背后蕴含的国际环境、政府组阁形式、党派的外交理念、内政状况、领导人的个人风格等。学生在以后的学习和思考中可主动运用这些关键性因素解读德国新时期的外交政策。

3. 外交利益

1990年10月3日，两个德国以和平的方式实现了统一。西德总理科尔作为“德国统一的设计师”载入史册。尽管德国是在科尔执政时期完成了统一，但是其他总理均直接或间接地促成了德国统一的实现：阿登纳选择“西方一体化进程”，旨在使西德结束被占领状态，获得了主权；勃兰特实施“新东方政策”，旨在实现西德同东部阵营国家，尤其是同民德关系的缓和；施密特促成了“世界经济峰会”（G7的前身）的召开以及“北约双重决议”的出台，虽饱受争议，但却提升了西德在世界外交舞台的话语权。可以说，从立足西方到缓和东方，从巩固地位到实现统一，不同阶段的外交利益环环相扣，德国统一的实现绝非偶然。

诚然，思辨能力的提升绝非能在单元归纳课有限的课时内就能解决，定义外交的三要素也并非一成不变，学生需在日后的课程学习中不断用实践来判断，培养学术批判精神。

四、教学延伸环节：漫画与跨学科能力

在多次的教学实践中学生普遍反映漫画1是四幅漫画中最难理解的一幅。仔细分析后发现原因既非专业背景不熟悉，也非语言基

础不扎实，而在于跨学科能力的欠缺。

漫画1中的两个酒瓶发生了碰撞，四处飞溅的玻璃碎片如果放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读者联想到的会是“争执”“事故”，甚至是“惨剧”。可是令人费解的是，酒瓶下的那位穿着马甲的人却是眼角向上飞扬，一派欢愉的表情。究竟是什么导致了遭遇玻璃碎片的“另类表情”呢？

教师不妨在学生提出疑问后逐渐揭开漫画标题的神秘面纱：这幅漫画作品藏于德国波恩历史之家（Haus der Geschichte）博物馆，创作于1949年，作者是奥地利籍的德国漫画作家Mirko Szewczuk，作品标题为“Prost-Scherben bringen Glück.”（“干杯——玻璃碎片带来好运”），标题下方还特意附有一段文字说明：时任西德总理阿登纳和来自社民党的反对党领导人舒马赫围绕西德外交走向展开了激烈的争执，对联邦议会早期的辩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实，专业知识背景扎实的学生也能够没有任何文字提示的情况下领会阿登纳和舒马赫之间的政见不一，因为前期的单元学习中曾讲解过阿登纳和舒马赫围绕“彼得斯堡议定书”展开的口水仗，舒马赫在一次联邦议会的辩论中甚至指责阿登纳为“盟国总理”（Kanzler der Alliierten），为这幅漫画提供了最好的注脚。

可是德文标题为什么说玻璃碎片会带来好运呢？这就需要将对异文化的了解和认知。玻璃碎片之所以喻示着好运据说是来自犹太人的婚礼习俗，在虔诚的犹太教徒的婚礼上，新郎要踩坏玻璃杯，以示纪念耶路撒冷圣殿被毁和犹太人的流散。迄今为止，德国的婚礼上仍旧保持着摔盘砸瓶的习惯，预示着新婚夫妇除去昔日的烦恼、迎来甜蜜生活的开端。漫画家在1949年——西德建立的第一年创作这样的漫画大概也是为了调侃阿登纳和舒马赫之间的争执，希冀争执会预示着西德今后发展的好兆头。所幸的是，西德后来

的发展验证了漫画家的期待，联盟党和社民党逐渐发展成为西德两大全民党，从阿登纳以及舒马赫等老一代西德领导人延续下来的“辩论文化”也使得西德议会民主体制日臻成熟。这样看来，玻璃碎渣喻示的好运和中文中利用谐音效果所说的“碎碎（岁岁）平安”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教学实践中学生还对漫画1中眼神飞扬的人物进行了讨论，讨论的重点是该人物的装扮，尤其是长长的好似马尾辫的装束引起了学生的好奇，细心的学生甚至找到漫画4中也出现了同样装扮的人物。殊不知，小小的人物同样蕴含着大学问。漫画1和漫画4中出现的戴着睡帽（Schlafmütze）的小人物叫米歇尔（Michel），就像“约翰牛”（John Bull）象征着英国人，“山姆大叔”（Onkel Sam）标志着美国人一样，头戴睡帽的米歇尔多出现在政治漫画中，成为普通德国人的代言人。这一人物形象其实最早出现在德语文学作品中，诗人海涅（Heinrich Heine）仇恨专制政权，鄙视德国民族的市侩哲学，曾将政治上不成熟、不觉悟的德国人民比作愚笨迟钝的米歇尔。18世纪开始，米歇尔的形象经常出现在政治争论中，继而被漫画家相中，用来嘲讽当时敦厚老实、头脑简单、面对统治者逆来顺受的普通德国民众。那顶被学生误以为是马尾辫的睡帽将因睡过了头而错失良机的德国小市民形象烘托得活灵活现。

一幅政治漫画浓缩了有关外交、文化、语言以及文学的专业知识，利于教学向课堂外延伸，引导学生按照知识本身的结构规律，通过类比迁移，把所学的知识由点变线、由线变面形成网络。

结语

对于外语复合型课程而言，专业能力是外语复合型课程的“重力腿”（Standbein），

语言能力是外语复合型课程的“活动腿”（Spielbein），两条腿相互配合，缺一不可。漫画属于图像——文字互补式的多模态隐喻，在外语复合型课程的不同教学环节中具有不同的教学功能：导入环节漫画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展开环节漫画易于引导学生进行归纳探究；深入环节漫画旨在提高学生的思辨能力；延伸环节漫画利于培养学生多元的跨学科能力。一幅漫画的教学，兼顾了语言知识和专业知识的传授，同时培养了学生观察、理解、分析和归纳能力，是一次思维训练，更是一次对学生认知能力的整合。

当然，“教学有法，教无定法，贵在得法”。漫画带有价值判断的先天特点说明漫画在教学中的运用是把“双刃剑”，漫画教学并非万能，外语专业倾向课程的教学要遵循专业知识本身的逻辑特点选择合适的策略。

参考文献

蔡伟良：《对外语人才培养的思考——重读〈关于外语专业面向21世纪本科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见〉有感》[J]，载《外语界》，2009（06）。

蒋群：《“中国龙”漫画的多模态话语分析及身份构建》[J]，载《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02）。

潘艳艳：《政治漫画中的多模态隐喻及身份构建》[J]，载《外语研究》，2011（01）。

宋磊：《漫画的三种表现形式及其在艺术上的关联》[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08（03）。

王鉴，田振华：《从演绎到归纳：教学论的知识转型》[J]，载《教育理论与实践》，2013（04）。

吴江：《德国外交的历史沿革（1945—1990）》，载史利国（主编）：《站在大学讲台上——北京高校第八届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

比赛实录及最佳教案汇编》[C], 北京: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4年, 第467—481页。

庄玉兰:《论外语复合型人才的培养》[J], 载《教育理论与实践》, 2012(06)。

Hellmann, Gunther: Deutsche Außenpolitik—Eine Einführung[M], VS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Wiesbaden 2006. S. 15.

漫画出处:

http://www.hdg.de/lemo/objekte/pict/Jahre-DesAufbausInOstUndWest_karikaturSzewczu-

[kAdenauerSchumacher/ index.html](http://www.hdg.de/lemo/objekte/pict/KontinuitaetUndWandel_karikaturHicksGrundlagenvertrag/index.html), 最后访问时间为2015年11月16日。

http://www.hdg.de/lemo/objekte/pict/KontinuitaetUndWandel_karikaturHicksGrundlagenvertrag/index.html, 最后访问时间为2015年11月16日。

http://www.hdg.de/lemo/objekte/pict/Neue-Herausforderungen_karikaturWolterDoppelabschluss/index.html, 最后访问时间为2015年11月16日。

<http://www.dhm.de/lemo/suche/exponatek.html>, 最后访问时间为2015年11月16日。

作者简介: 吴江, 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副教授, 博士。

和而不同

——浅议西方“聚合”理念与中国辩证式和谐观的同与异

赵倩

【摘要】西方学界“第二现代”研究范式中有一个重要理念——“聚合”，该理念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渐渐被应用到了跨文化交流以及跨文化管理的研究和实践中。在这个西方的新理念中，我们能够明显看到与中国传统辩证和谐观十分类似的“和而不同”的特点。遵循这个判断，本论文首先分析了“聚合”理念和中国辩证式和谐观的内涵，而后阐述了“和而不同”的由来与特点；最后在此基础上初步探讨了“聚合”与中国辩证式和谐观中“和而不同”特点的关联以及“聚合”与和谐理念之间的差别。

【关键词】辩证和谐观 聚合 和而不同

一、引言

从上个世纪末开始，西方学界开始探讨“第二现代”^①（Seele, 1989）即“后古典之现代”这个新的研究范式。类似的概念还有比如：“一个新的无法统观全局的时代（Zeiten

der Neuen Unübersichtlichkeit）”（Habermas, 1981）、“后现代之现代”（Welsch, 1991）和“自我生活的时代”（Beck, 2001）。这种范式的重要特征是：过程思维、网络构建、自身活力（Eigendynamik）、模糊性、兼而有之的思维（sowohl - als auch）等。^②在“第二现代”

① Seele 提出“古典之现代（klassische Moderne）”、“后古典之现代（nachklassische Moderne）”和“后现代之现代（postmoderne Moderne）”。所谓的“第二现代”（die zweite Moderne）所指的就是“后古典之现代”。

② Beck, U.: Das Zeitalter des „eigenen Lebens“, 4ff. In: Das Parlament, 29, 3-17.

的框架中，有个重要的概念是“聚合（Synergie）”^③。所谓“聚合”，指的是不同生物、材料或者力量相互促进，能产生出共同的效用，而这种效用往往大于各个部分之和。^④

身为中国人，初读“聚合”这个概念便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再读之下更发觉，这个西方理念与2000多年前中国传统辩证式和谐思想很有些相似，因为它们共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即“和而不同”。

二. 聚合效应与中国传统和谐思想的关联

1. 聚合概念的含义及特点

西方“第二现代”研究范式框架内的“聚合”理念强调异质性和过程性思维方式（Prozessdenken），并能取得 $1+1>2$ 的效应。

从词源学角度来看，“聚合”源自希腊语的“synergía”或者“synergismós”，意为“合作”或“共同作用”。“聚合”这个概念表示生物、材料或者力量能够相互促进，相生相长从而产生出共同的效用，而这种效用往往大于各个部分的效用之和。^⑤

“聚合”最初被用于光纤技术，描述的是借助光波不断相互适应和接近，显微镜下光波的混乱状态能够生成高度有组织光束的过

程。“初始状态的不稳定性和无序性在共生共存（Miteinander）的过程中，由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入一个新的秩序中。”^⑥这只看不见的手，就是事物发展的自身活力。

“聚合”的特点在于其创造性、超越相加之和（Übersummativität）以及优越性三点。^⑦其中的“超越相加之和”这一特点强调的是其 $1+1>2$ 的特性；而优越性则更多的是指“聚合”的结果比“合成（Synthese）”的结果更有价值。

在跨文化交际学以及跨文化管理领域，“跨文化聚合效应”由Adler率先提出，它指的是：“不同文化的重要构成元素（如适应模式、价值观、规则、行为方式等）以某种方式组合起来，这些元素的总和产生某种高质量的有价值的结构，其总和的价值要大于各元素的个别价值之和。”^⑧其宗旨是要充分利用差异的潜力和优点，让差异成为多样化视角以及创新力的基础，以期获得意想不到的解决方案和更优的结果。^⑨

2. 中国传统辩证式和谐观的主要内涵及特点

中国的“和谐”不仅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也是其他传统思想流派的重要理念。其含义从韵律之和、人际关系之和，到国家政事之和，逐步深化。

③ 有人也将“Synergie”译为“协同”。见于景涛：《内聚力发展与跨文化协同》，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0。在本文中，由于作者强调“和”与“同”的差异，所以倾向于放弃“协同”的译法，而选择“聚合”作为Synergie的中文译文。

④（作者不详）：<https://de.wikipedia.org/wiki/Synergie>，最后访问时间为2015年9月28日。

⑤（作者不详）：<https://de.wikipedia.org/wiki/Synergie>，最后访问时间为2015年9月28日。

⑥ Bolten, J.: Einführung in die Interkulturelle Wirtschaftskommunikation. Vandenhoeck & Ruprecht, Göttingen, 2007, 175.

⑦ 于景涛：《内聚力发展与跨文化协同》，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0，第71页。

⑧ 马剑虹，高丽，胡笑晨：《跨文化协同作用研究的3种典型视角》，载《心理科学进展》，2006年，第14（5）期，第757—761页。

⑨ Barmeyer, C.: Taschenlexikon Interkulturalität.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2012, S.154.

通常认为,中国文化中“和”的思想源于远古巫术中的“乐”和“礼”,汲取了“阴阳五行”的思想,^⑩成于春秋诸侯混战的年代。在那个战乱年代,礼崩乐坏,和谐安定是人们最迫切的需要,于是“和”便成了当时各个思想流派共同的主张。古代的先秦文化,从《易经》中“太和”的理念一直到孔子师徒的“以和为贵”、老子的“天人合一”及范仲淹“政通人和”的理念,无不包含有浓厚的和谐思想。^⑪

本文所探讨的是西方“聚合”概念与中国传统的辩证和谐观之间的关联。根据很多学者的观点,和谐思想——尤其是在很多朝代中担当正教的儒家和谐思想——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辩证式和谐观”、“调和式和谐观”和“统治式和谐观”。每个阶段均显现出不同的特征:辩证式和谐观具有动态性、转化型和质变性等特点;调和式和谐观具有中庸性、节制性、不争性、权益性和差异固定化等特点;而统治式和谐观具有同一性、功利性、形式性等特点。^⑫当儒学得到皇权的认可,被权力宗教化之后,它便渐渐失去了学术创新的生命力,^⑬其和谐观中“和”的概念也渐渐接近它的反面——同,而显现出了同一性和功利性等。其中后两个阶段,即“调和式和谐观”和“统治式和谐观”与西方的“聚合”概念差异较大,不具有可比性。因此,本文仅关注聚合概念与辩证式和谐观之间的关联

与差异。

三、“和而不同”——中国传统和谐思想和西方聚合概念的共同特征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发现,“聚合”概念强调异质性和 $1+1>2$ 的过程性思维方式(Prozessdenken),和谐则以“‘多样’为基础、以‘统一’为表征、以‘融合’为关键”。^⑭尽管相对于中国传统的辩证式和谐思想这个庞大丰满的理论体系,西方的“聚合”理念只是一个很小的概念,但“聚合”的核心思维方式却明显与中国传统辩证和谐观相似,二者都明确表现出“和而不同”的基本特征。

1. 和而不同是辩证式和谐观的重要特征

辩证式和谐观强调“和而不同”。

中国哲学中历来就有“和与同异”“尚和去同”的辩证思维传统。那么“和而不同”的命题从何而来呢?

“和而不同”的提出应该追溯到西周时代的思想家史伯。他先于老子、孔子二百多年就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命题(《国语·郑语》),意思是:“和”的确能生成万物,但“同”却不能增益,^⑮即有了和谐,万物便可生长繁衍,而若是一味寻求完全相同一致,则只能止步不前。按照《国语·郑语》的记载,公元前774年,史伯与郑桓公谈论以往

⑩ 于春梅:《儒家和谐思想的基本内容及其现代意义》,载《理论探讨》,2007年,第3期,总第136期,第66—68页。

⑪ 高德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载《求实》,2008年2月。

⑫ 黄曦莉:《华人人际和谐与冲突——本土化的理论与研究》,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9—82页。

⑬ 高德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载《求实》,2008年2月,第32—34页。

⑭ 叶碧:《从“仁”、“礼”、“和”的关系看孔子的和谐思想》,载《浙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第132—136页。

⑮ (作者不详):http://baike.baidu.com/link?url=SvvYD9k0Lv0PnaNIO4IRpxhIAkZBHbBVMoCKi1NBgxQVsIBU5UOd2Q9Li2L_Cw7kCUSYq3Xp9N380Wd7ryRHq,最后访问时间为2015年9月26日。

国君的政绩时，他以“和”与“同”为核心批评周幽王“去和而取同”，厌弃正直的忠臣，亲近无知鄙陋的小人。预言不出三年周必灭亡。^{①6}

如果说，史伯是对比了和与同的结果，从而揭示了前者的重要意义，那么春秋时期齐国的思想家、政治家晏婴则是从状态上对比了“和”与“同”的区别。并提出了“和如羹焉”的比喻（《春秋左传·昭公二十年》）。他指出和是多种不同事物融合而成。“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燂执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意思是，“和谐就像做肉羹，用水、火、醋、酱、盐、梅来烹调鱼和肉，用柴火烧煮。厨工调配味道，使各种味道恰到好处；味道不够就增加调料，味道过重就用水冲淡一下。”^{①7}

在史伯与晏婴的判断之上，孔子提出了“和而不同”（《论语·子路》）的命题，指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学而》），这可以看做是史伯以及晏婴思想的延续。在孔子的心目中，和是君子修养的境界；小人则因求同而违背了和谐的真谛。儒家思想强调“和”是由矛盾的事物共存、互补和融合而产生的。只有相互的矛盾或者相异之物协调一致，事物才能获得发展。“在阴阳（矛盾）对立统一转化的世界观里，统一就是“和”，是存在的形式，对立就是“不同”，是存在的本质。”^{①8}

道家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德经》第四十二章）老子认为道是一种适匀状态，它是由阴和阳在互相对立、冲撞和交汇融合中最终达到的“和谐”状态，万物正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中产生并渐渐成为新的和谐体。

2. 西方“聚合”概念也体现出“和而不同”

综合上述对中国传统和谐思想和西方新型研究思路“聚合”概念的描述，对比之下可以发现，二者之间确有共性，这个共性就是“和而不同”。首先，二者的构成元素均具有异质性；其次在于质变过程能产生新事物。

1) 构成要素的异质性

起初，西周的史伯就认识到二元乃至多元的对立可以慢慢成就最后的统一，他把“五行”看成是能够生成万物的基本元素，强调了不同物质能生成新事物，不断获得丰富和发展，而在这个过程中，“和”发挥着关键作用。而辩证和谐观的出发点是：和谐涉及人与自然的的关系、人我关系、人的身心间的关系；^{①9}既然涉及关系问题，则和谐涉及的对象至少是两个，既是两个则必有差异。因此，辩证式和谐观本身指的就是差异、矛盾等多样性的统一。^{②0}它是一种阴阳宇宙观，认为宇宙中充满了很多对立和对偶，比如阴阳、天地、内外、有无等等，这些对偶是对立的，但同时也是互补的，两者之间能够相生相成。

^{①6}（作者不详）：http://baike.baidu.com/link?url=SvvYD9k0Lv0PnaNIO4IRpxhIAkZBHbBVMoCKi1NBgxQVsIBUb5UOd2Q9Li2L_Cw7kCUSYq3Xp9N380Wd7ryRHq，最后访问时间为2015年9月26日。

^{①7}（作者不详）：<http://baike.baidu.com/link?url=pKthBi716Ivce-FnOjRZJDWEmVniEqTU10NwnHkDzt78Q2KURDtqQDBHjIEWkOCrnVat6NyPfe68irLUm23dK>，最后访问时间为2015年9月27日。

^{①8} 高德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载《求实》，2008年2月，第32—34页。

^{①9} 于春梅：《儒家和谐思想的基本内容及其现代意义》，载《理论探讨》，2007年，第3期，总第136期，第66—68页；高德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载《求实》，2008年2月。

^{②0} 高德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32。载《求实》，2008年2月。

“聚合”概念亦是如此，取得聚合效应的必要基础就是构成要素的异质性。Stumpf把“聚合”定义为两个或者多个不同的、矛盾甚至对立元素，在经历相互协调、补充之后趋于稳定，取得功效的过程。^⑲这个概念的出发点也在于：异质性的事物相互作用、共生共存、不相互排斥，并达成意想不到的好效果。在跨文化交流研究中，跨文化聚合也强调，尽管差异是对立甚至矛盾的，但管理者不应该将不同文化独有的特点和它们之间的差异看成是敌对，甚至当成问题或者误解和冲突的原因，而应该把它们看成一种资源，是可以互补和互生的。^⑳

2) 质变过程产生新事物

中国传统的辩证式和谐思想承认矛盾，并认为天下对立对偶的万物绝对不会永远保持不变或者持久对立，而是会在相互作用下发生变化，并认为和谐本身便是一个动态的结构。^㉑此外，阴阳等对立事物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因此就有了“物极必反”“乐极生悲”或是“塞翁失马，焉知是祸，塞翁得马，焉知是福”这样的说法。总而言之，按照辩证式和谐思想的观点，多样性的事物放在一起，会发生互相作用，而后变化就会产生：旧事物消去，新事物出现并得以发展，和谐统一就会经过这一质变而焕然一新。

西方“聚合”概念强调事物构成元素的自身活力，认为异质性事物被放在一起的时候会显现出自我组织的天然能力。^㉒就如同中国历史上学者们把“和”与“同”划清

了界限一样，“聚合”摒弃了原先的“合成（Synthese）”式思维，放弃了“合成”概念里“1+1=2”的结构式思维方式（Strukturdenken）；而强调聚合的变化过程，强调异质性元素借助自我组织的天然能力相互作用后能够产生1+1>2的增效结果。也就是说，“聚合”过程会导致构成元素如同化学反应一样发生质变，并由此产生超出构成元素之和的具有更高价值的结果。因此，聚合的结果往往被认定为创新。

四、聚合概念与和谐思想的差异

当然，聚合也显现出了有别于中国传统的辩证式和谐观的特点。这些特点主要是，西方的聚合概念更强调差异性，这与更注重整体性和统一性的辩证式和谐观有所不同。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或者哲学理念，辩证式和谐观强调在多端与各异之间寻求平衡与统一。按照道家的说法，世间万物纷繁复杂，相互冲撞，但外界无须过多干预，这些矛盾与对立的事物自会遵循自然法则而慢慢趋于平和。老子强调阴阳二气的自然变化，二者与自然统和之后能够形成宇宙万物的本体，也就是和谐。不同只在于过程，而平和、和谐是整个过程的终点。尽管和谐将被再次打破，上述的过程会周而复始地继续，但每个变化过程都会以和谐为终点。^㉓比如中国人对于分与合的规律性判断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它最终还是落在双方的和合状态上。

⑲ 于景涛：《内聚力发展与跨文化协同》，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0，第71页。

⑳ Barmeyer, C.: Taschenlexikon Interkulturalität.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2012, S.154.

㉑ 黄曦莉：《华人人际和谐与冲突——本土化的理论与研究》，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第70—71页。

㉒ Bolten, J.: Einführung in die Interkulturelle Wirtschaftskommunikation. Vandenhoeck & Ruprecht, Göttingen, 2007, S.175.

㉓ 黄曦莉：《华人人际和谐与冲突——本土化的理论与研究》，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第72—73页。

和谐关注事物的整体关联性。^{②6} 和谐是一种最为自然的状态，强调事物的和谐与统一，就像韵律一样没有杂音。同时强调个人对集体的责任，即当集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相抵触时，个体应当顺应集体利益，

而聚合的重点在于谋求创新结果。在聚合的过程中更强调多样性以及各个构成要素的独立性。Cox (1993) 主张在管理中要力求使机构内保留“尽可能多的异质性和仅仅是必须的同质性”。^{②7} Bolten 也曾提出在聚合范畴中应用多样性 (Vielheit) 代替统一性 (Einheit)。^{②8} 从中可以看出，聚合概念更看重在确保自身功能性，即获取增效的同时，尽可能保留个体的多样性。与和谐思想相比，它更强调的是个体而非集体，更强调在达成创新的前提下保留和利用个体的异质性。

五、结语

Münch 曾对过去几个世纪中世界的科学中心作出了如下的判断：17 世纪的科学中心在英国、18 世纪的科学中心在法国、19 世纪的科学中心在德国、20 世纪的科学中心在美国。其对科学中心的定位与该国的经济实力、发展速度以及思想活跃度密切相关。面对当前中国国家实力的快速发展，立即有人提出，21 世纪的科学中心会转移到中国吗？在今天的多元化世界里，我们恐怕不得不对这个问题作出否定的回答。但同时，我们却也有必要思考，世界是否还能从古老的中国文化中学习到其他一些什么？

作者简介：赵倩，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副教授，博士。

^{②6} 张耀灿：《中国传统和谐文化的当代价值》，载《思想教育研究》，第1期，总第127期，2006年1月，第4—7页。

^{②7} Barmeyer, C.: Taschenlexikon Interkulturalität.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2012, S.154.

^{②8} Bolten, J.: Einführung in die Interkulturelle Wirtschaftskommunikation. Vandenhoeck & Ruprecht, Göttingen, 2007, S.175.

德国政治性电视讨论节目 ——争论文化的体现？

潘 颖

【摘要】作为电视谈话节目的一种，政治性电视讨论节目^①是德国电视媒体上一种非常受欢迎的节目形式，甚至有人将政治性讨论节目称作是德国的“代理议会”（Ersatzparlament）。^②为什么这种电视节目会有此声誉？作为一种媒体公共讨论形式，这种节目有什么特点？本文首先介绍这种节目形式以及它作为媒体节目的特点，再选取德国著名政治性电视讨论节目hart aber fair的三期节目进行分析，从而得出结论：德国政治性电视讨论节目表现出典型的争论文化（Streitkultur）的风格。

【关键词】德国电视媒体 争论文化 谈话节目

一、谈话节目的定义和分类

电视谈话节目^③是德国电视媒体中一种常见且非常重要的节目形式。从上个世纪 50

年代初德国第一个谈话节目^④开播至今，德国电视上播出过大大小小超过 180 个谈话节目。^⑤本世纪初开始，德国各电视台平均每时每刻都在播出一个谈话节目。^⑥目前，仅仅是

① 德文为 politische Fernsehdiskussion 或 politische Talkshow，“政治性的”不能完全表达德文原词的意思，只要涉及政治、社会、经济、民生，与政府政策有关的，都是 politisch 的内容。

② 参见：Gäbler 2011, 105。

③ 德语概念为 Gesprächssendung 或 Talkshow。

④ Schicha/Tenscher 2002, 11。

⑤ Maria M. Held, http://www.t-online.de/unterhaltung/tv/id_70477456/von-anne-will-bis-presseclub-tv-flagschiffe-im-polittalk.html。

⑥ Christian Schicha/Jens Tenscher 2002, 13。

德国电视一台 (das Erste)^⑦ 就同时有 5 个电视谈话节目^⑧。

德国的电视谈话节目经过多年的发展,形式多种多样,彼此之间有很多差别,但是与其他电视节目类型相比较,还是具备一些共同的特征,比如:

- 节目最重要的构成部分是谈话,谈话决定了节目的内容和形式;
- 主持人承担重要角色;
- 最少一位,常常是多位嘉宾参与;
- 连续定期播放;
- 通常有现场观众。^⑨

根据电视谈话节目的特征,可以将其定义为:定期播出、一个或多个主持人在有或没有现场观众的情况下,就任意一个话题与一个或多个嘉宾谈话的节目。^⑩

德国电视谈话节目的类型多种多样,例如谈心节目、调解节目、日间节目、深夜节目、名人节目和话题节目等等。Tenscher 把谈话节目分为三种基本形式,一种是政治性的讨论和访谈节目 (politische Diskussions- und Interviewsendungen), 此类节目通常没有现场观众,讨论话题为政治类话题,主持人通常是资深电视记者,嘉宾则主要是政界人士。第二种是政治性脱口秀节目 (politische Talkshows), 这种节目的特点是:讨论话题通常是政治和社会时事,讨论方式既客观理性,

又掺杂感情和娱乐因素;嘉宾既有政治家、记者、名人,也有平民百姓;节目定期以直播形式播放;有现场观众;主持人是节目的形象代表。第三种节目形式是非政治性谈话娱乐节目 (nicht politische Talk- und Unterhaltungsshow), 此类节目通常有现场观众观看,嘉宾主要是来自娱乐、体育、艺术及媒体界的名人,谈话以娱乐观众为目的。^⑪

Plake 从另外的角度对谈话节目进行分类,他也区分了三类谈话节目:

1. 辩论节目或论坛 (Debattenshow bzw. Forum): 此类节目主要讨论政治性问题或关乎公共利益的问题。嘉宾通常是政治家、当事人或专家等,节目以辩论型的讨论方式进行。

2. 人物节目 (Personality-Show): 这类节目以名人的人物秀为内容,没有固定的话题。

3. 谈心节目 (Bekennnis-Show): 此类节目的嘉宾通常是普通人,以日常冲突、隐私、个人苦难为主要话题。^⑫

从研究者的分类来看,是否以社会、政治话题作为谈话的内容是谈话节目类型的一个很重要的分类标准。这是因为,政治性的时事讨论节目一直都是德国谈话节目的一个重要的类型,尤其近几年,德国公共电视台更是大力发展政治性的谈话节目。所谓 politisch, 主要是以节目内容而言,即节目中讨论的话题通常都关系社会、政治、经济与

⑦ 德国电视一台是德国第一个全国性的公共电视频道,开播于1952年,是德国广播电视联合会 (ARD) 各成员广播电视台的共同体。德国电视一台由9个地方广播电视台组成,例如德国西部广播电视台 (WDR)、西南广播电视台 (SWR)、德国北德广播电视台 (NDR)、巴伐利亚广播电视台 (BR) 等。除了德国电视一台,德国的公共广播电视频道还有德国电视二台 (ZDF) 和德国广播 (Deutschlandradio)。

⑧ 这五个电视访谈节目分别为: Anne Will, Hart aber fair, Menschen bei Maischberger, Presseclub 和 Günther Jauch。

⑨ Schicha/Tenscher 2002, 10.

⑩ Schicha/Tenscher 2002, 11.

⑪ Tenscher 2002, 62-63.

⑫ Plake 1999, 32.

民生，而参加讨论的嘉宾则相应地来自与社会、政治政策有关的社会各界，主要是政界、经济界、媒体等。嘉宾通常持不同观点，针对节目所选取的社会热点问题进行讨论。

二、政治性谈话节目的定义和分类

作为谈话节目的一种，政治性谈话节目的特别之处主要在于讨论的话题和方式。对电视谈话节目的定义进一步具体化，可以将政治性谈话节目定义为：定期播出、一个或多个主持人在有或没有现场观众的情况下，就热点政治、社会话题与一个或多个持不同观点的嘉宾进行讨论的节目。

Schicha 根据讨论的激烈程度，对政治性谈话节目进行了以下分类：^⑬

1. 对抗型谈话

指德国盛行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主要出现在私立电视台的电视讨论节目如 RTL plus 的 Explosive – der heisse Stuhl 和 Sat. 1 的 Einspruch!。最近的代表为 ARD 的 Friedemann”，但于 2003 年停办。此类节目以对峙性很强的争吵为看点，因为其攻击性和表演性太强而广受批评。

2. 适度的争吵型谈话

此类节目综合了信息和娱乐的双重功能，虽然邀请持不同观点的嘉宾出席，但是不刻意营造冲突性强的氛围。从 20 世纪 90 年代末开播、2007 年停播的 Sabine Christiansen 开始至今，德国公共电视台的大多数政治性讨论节目都延续了此种风格。虽然主持人有强势和弱势之分，但是与对抗型节目相比，此类节目总体表现出适度的冲突性。

3. 合作型谈话

此类节目通常以访谈的方式，为政治家、社会名人和其他有故事的人提供发表自己观点和展示自己的舞台，因此具有很大的娱乐性。例如 1999 年开播、2014 年停播的 Beckmann。

德国目前的政治性讨论节目，大都符合此分类中的第二种形式，即适度的争吵型谈话。它的具体表现我们将通过下文的实例分析来展现。

三、电视谈话节目的特征

电视谈话节目与日常谈话和其他机构性谈话有许多不同之处，这是由它的媒体性所决定的。以往研究表明，媒体谈话具有机构性、策划性和多面向性等特征。以下对此进行具体阐述。

1. 媒体谈话的机构性

媒体谈话属于公共机构谈话。它的结构和基本内容是事先安排好的，并且具有很强的目的性。公共机构谈话是“或多或少被规定的、有目的性的行为”^⑭。也就是说，参与者的交际行为受到限制，并且为一定的目的服务。

媒体谈话参与者的交际行为受限体现在不同层面。例如：他们需要遵守一定的话轮转换规定，需要从主持人那里获得发言权等。作为机构代表的主持人有权向嘉宾提出问题，而嘉宾则有义务回答问题。因此，媒体谈话中最主要的言语行为就是主持人和嘉宾之间的问与答。此外，媒体谈话还有时间和空间上的规定。谈话参与者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

^⑬ Schicha 2002, 217-224.

^⑭ Günthner/Kotthoff 1992, 1.

进行谈话，并且在谈话的过程中不能任意离开他所处的空间。这些都是媒体谈话作为公共机构谈话的表现。公共机构对谈话参与者的限制取决于公共机构自身的目的。而电视讨论节目的任务就在于：“提供信息，阐述观点，针对不同的立场进行辩论，提供其他可能措施，并通过交流和妥协获得解决问题的办法。”^⑮

实际上，由于电视节目并非解决社会问题的场所，所以这里所说的最后一点通常很难实现。以往研究也对此得出了一致性的结论^⑯。研究者发现，电视讨论节目的参与者虽然服从节目要求，完成回答提问、争辩问题、提供信息等任务，但是他们行为的目的并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宣扬自己的立场，争取观众对自己的认可。电视谈话的参与者都十分清楚，他们并不是为了谈话而谈话。他们的谈话是为电视媒介的接收者，也就是观众所制作的。

这一点正是媒体谈话作为公共机构谈话的特殊之处。观众才是决定媒体谈话目的的关键。媒体的这种“中间人”角色，使得媒体谈话展现出策划性和多对象性的特征。

2. 媒体谈话的策划性

媒体谈话的策划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媒体谈话并非发生在日常生活条件下，而是经过节目编导的策划，按照已定的结构进行。无论是讨论话题、参与嘉宾还是谈话的进程都是事先策划好的。另一方面，媒体谈话的参与者也通过运用一定的交际方式，表现出他们在媒体谈话的条件下能够自然、真实地进行谈话。^⑰

3. 媒体谈话的多对象性

媒体谈话的多对象性与它的策划性紧密相关。多对象性是指，谈话参与者的谈话并不仅仅以对方为对象，同时以现场及电视机前的观众为对象。以往研究根据媒体谈话的这一特点，区分了不同的交际圈（参见 Diekmann 1985, Linke 1985, Burger 2001）。内交际圈由谈话的直接参与者包括主持人构成，而外交际圈则产生于谈话参与者与观众之间。

媒体谈话多对象性的关键之处并不在于谈话的参与者要针对多个对象来说话，而在于他得同时这么做。也就是说，从交际表面来看，谈话参与者可能在与他的谈话伙伴争论某个问题，但实际上他可以同时向观众宣传自己的立场。谈话参与者可以根据对象，运用不同的交际技巧和策略，来实现自己的目的。谈话者之间的谈话不能单纯地当作他们之间的谈话来看，而必须考虑谈话者同时想向观众传递的信息。另一方面，由于考虑到观众的存在，谈话者的交际行为也受到了限制，例如：谈话者通常不会无所顾忌地辱骂对方，而对对方提出的要求和问题也不能一味地避而不答。

四、政治性电视讨论节目的选题和嘉宾

正是由于媒体节目的以上特征，政治性电视讨论节目在话题和嘉宾的选择上，首先关注节目的可看性。话题通常是社会热点且具备争议的问题；而选择的嘉宾除了代表不同利益、不同观点之外，最好还具备一定的辩论能力，能够强有力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⑮ Schicha 2002, 213.

^⑯ Holly/Kühn/Püschel 1986, 108; Kotthoff 1993, 172; Nussbaumer 1995, 3; Tiittula 1997, 371-372; Tiittula 2001, 209.

^⑰ Schütte 1996, 101.

驳斥对方的观点。

根据 Dacosto 数据分析公司的调查，德国电视一台和二台共有四个最重要的政治性电视讨论节目：Günther Jauch, Anne Will, Hart aber fair 和 Illner Maischberger。在 2014 年邀请的嘉宾中，平均 37% 为政治家，其中大多数（33%—42% 之间）来自执政党 CDU 和 CSU，28% 为女性，嘉宾的平均年龄为 54.8 岁。而最常讨论的话题依次为：伊斯兰激进组织、俄罗斯总统普京、希腊、移民、乌克兰冲突、拜仁主席 Hoeneß 逃税事件、养老金和消费者问题。^⑮

从这一调查结果来看，国际国内热点政治、经济是德国政治性讨论节目的最常见话题，而政治家是节目的主要参与者，但是，不容忽视的现象是：也有 63% 的节目嘉宾并非政治家。这表明，政治性的电视讨论节目成为了政治家与来自其他领域的嘉宾共同讨论社会问题的平台。德国外交部长 Steinmeier 在一次访谈中形象地描述了政治性讨论节目的节目设置：“我们出现在总是类似的谈话节目中，这些节目的编排通常是：来自不同党派三个政治家相互争吵，之后再被两位其他嘉宾教导，说政治本来就是愚蠢和不负责任的。我可能有点夸张，但是这样的模式是存在的。如果说每周电视上都出现几次这样的场景，那么人们对政治的感受同样也是这样也就不足为奇了。我绝对不是想批评媒体，

我们都是这场游戏的参与者。”^⑯

五、实例分析

1. Hart aber fair 节目

Hart aber fair 2001 年在 WDR 电视台首播，2007 年起改在德国电视一台 ARD 播出，每周一期，每期 75 分钟，主持人是 Frank Plasberg。每期参加讨论的嘉宾是 5 个人，有时也会在节目中邀请当事人或专家单独访谈。Hart aber fair 的观众达到平均 300 万以上，收视率保持在 10% 左右。^⑰ 与其他政治性电视讨论节目相比，Hart aber fair 更关心内政的话题，比例达到 31%，例如消费者问题是 Hart aber fair 2014 年讨论最多的话题。^⑱

主持人 Plasberg 以他犀利但平等的主持风格著称，正如节目的介绍所言：“寻求回答，而不是暴露弱点；穷追不舍，但不出言伤人。”^⑲ Plasberg 追求的是“平等对话”^⑳，但是，“只要问题没有真正得到回答，每个人都得继续回答问题”。^㉑

Hart aber fair 的演播室设置自成风格，五位嘉宾坐在一张弧形的桌子后，而主持人则站在旁边的一张小桌子后，小桌子上有一个电脑屏幕，主持人可以在节目中通过点触电脑屏幕播放与节目内容有关的小视频。节目以主持人介绍讨论话题开场，之后画外音分

⑮ (Schriftsteller unbekannt): Politik-Talk in Zahlen: Am liebsten Mann, am liebsten CDU, <http://www.spiegel.de/kultur/tv/polit-talks-will-jauch-illner-plasberg-laden-cdu-ein-a-1022594.html>.

⑯ Steinmeier: Zurück im alten Job—aber mit neuem Blick, Interview mit Welt am Sonntag, <http://www.welt.de/print/wams/politik/article10919820/Zurueck-im-alten-Job-aber-mit-neuem-Blick.html>.

⑰ Münninghoff 2012, 32-33.

⑱ Docosto, <http://apps.dacosto.com/meinungsmaschine/>

⑳ 见 hart aber fair 官方网站: <http://www1.wdr.de/daserste/hartaberfair/ueberuns/index.html>.

㉑ 同上。

㉒ 同上。

别介绍每一位讨论嘉宾和他们的主要观点。随后，主持人向嘉宾提问，随着谈话的发展，嘉宾之间也会直接发生讨论。讨论之间穿插主持人播放的小视频。讨论大概持续 60 分钟左右，然后，节目助理向大家宣读节目进行中收到的观众留言，剩下的几分钟时间，主持人继续和嘉宾讨论直到节目结束。

续表

讨论题目：马肉丑闻 2013.2.18	
Stefan Genth	德国商会联合会会长
Jürgen Abraham	火腿制造商
Silke Schwartau	汉堡消费者中心专家

3)

讨论题目：食品中的糖 2014.1.20	
参加者	身份
Ulrich Nöhle	食品化学专业教授
Werner Bartens	医学记者
Matthias Steiner	体育明星，糖尿病患者
Anne Markwardt	消费者保护组织 Foodwatch 专家
Wieland Kiess	儿科医生

三期节目中，第 1 期节目的参与者中有一位政治家 (Hohlmeier)，占 20%，第 2 期节目中有两位政治家 (Aigner 和 Höhn)，占 40%，第 3 期则没有政治家参与。无论有没有政治家参与，节目中都形成了明显的对峙局面。在第一期节目中主要在 Bode 和 Meyer 以及 Bode 和 Hohlmeier 之间，第二期节目则主要在 Höhn 和 Genth 以及 Höhn 和 Aigner 之间，第三期在 Kiess 和 Nöhle 以及 Markwardt 和 Nöhle 之间。其他人则大体持中立的态度，或不倾向于发生直接冲突。



2. 节目分析

本文选取 Hart aber fair 节目的三期有关消费者的节目，节目的话题与嘉宾情况如下表所示：

1)

讨论题目：食品谎言 2011.6.11	
参加者	身份
Thilo Bode	消费者保护组织 Foodwatch 负责人
Monika Hohlmeier	欧洲议会政治家
Björn Freitag	星级厨师
Werner Bartens	医学记者
Alfred Hagen Meyer	食品企业律师

2)

讨论题目：马肉丑闻 2013.2.18	
参加者	身份
Ilser Aigner	德国食品、农业和消费者保护部部长
Bärbel Höhn	绿党政治家

3. 对立方冲突行为的表现

- 直接称呼对方名字，并自发地与对方发生对话，在对话中使用第二人称。例如在食品谎言，Bode 多次主动向 Meyer 和 Hohlmeier 发难，而在马肉丑闻中，Höhn 也直接向 Aigner 和 Genth 发起质问。
- 批评及指责对方。例如在马肉丑闻中，Höhn 指责 Genth 代表的商业联合会处理马肉事件不力以及阻挠制定对消费者有利的政策，并指责部长 Aigner 政策失误。

在食品谎言中，Bode 指责欧洲议会政治家 Hohlmeier 不作为，Meyer 批评 Bode 混淆视听等。

- 嘉宾多次出现同时说话的行为，以及在他人说话时的插话行为。
- 对立方自始至终坚持自己的立场，之间几乎从来没有出现同意或部分同意的语言行为。

4. 对立方冲突行为的特点

- 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社会身份明确地表达立场，并且不会在讨论中改变立场。例如作为企业律师的 Meyer，尽管屡屡受到消费者代表 Bode 的攻击，但在讨论中始终明确地代表企业的利益。
- 嘉宾们虽然针锋相对，但都没有使用过激的言语行为如辱骂等。
- 嘉宾的发言之间相互承接，没有出现各说各话的现象。
- 嘉宾们都致力于创造一个对自身社会角色有利的自我形象。例如政治家们（Aigner, Hohlmeier）试图通过列举自己的政策树立负责任、有能力的政治家的形象；专家学者（Kiess, Bartens）则通过提出一些观点和论据表现自己的专业能力。
- 讨论过程以严肃的气氛为主，间杂着一些开玩笑的轻松时刻，从而展现出严肃但不敌对的讨论风格。

六、小结

争论文化是西方的一个很典型的文化现象。它不仅表明不同的利益代表应该通过彼此之间的观点交锋对社会矛盾问题进行交流，并且提倡每一个人都应该具有捍卫自己观点和利益的权利。同时，争论文化也认为争吵是一种良性的行为，面对对立方应该就事论事而不是进行人身攻击。虽然作为媒体节目

的德国政治性电视讨论节目，主要以获取收视率为目标，更为重视节目的可看性和娱乐性。但此类节目常年受到观众的欢迎和专家学者的关注，也反映出大家对这类公共讨论形式的认可。通过揭示此类节目的讨论特点，可以看出，德国政治性电视讨论节目是西方争论文化的体现。

参考文献

Gäbler, Bernd (2011): ...und unser täglicher Talk gibt uns heute!“Inszenierungsstrategien, redaktionelle Dramaturgien und Rolle der TV-Polit-Talkshows, Frankfurt/Main: Otto Brenner Stiftung.

Günthner, Susanne/ Helga Kotthoff (1992): Die Geschlechter im Gespräch, Kommunikation in Institutionen, Stuttgart.

Holly, Werner / Peter Kühn / Ulrich Püschel (1986): Politische Fernsehdiskussionen, zur medien-spezifischen Inszenierung von Propaganda als Diskussion, Tübingen.

Kotthoff, Helga (1993): Unterbrechungen, Überlappungen und andere Interventionen, Vorschläge zur Kategorienunterscheidung und kontextorientierten Interpretation, in: Deutsche Sprache 21, S. 162-185.

Münninghoff, Jonas (2012): Hart aber Fair [ARD]-Politik trifft auf Wirklichkeit, in: Thomas Dechant (Redaktion): die Talk-Republik, Köpfe-Konzepte-Kritiker, Koblenz-Landau: Universität Koblenz-Landau, S. 23-36.

Nussbaumer, Markus (1995): Argumentation und Argumentationstheorie, (Studienbibliographie Sprachwissenschaft, Bd. 12), Heidelberg: Groos.

Plake, Klaus (1999): Talkshows, Die Industrialisierung der Kommunikation, Darmstadt:

Primus Verlag.

Schicha, Christian (2002): Die Inszenierung politischer Diskurse, Beobachtungen zu Politikerauftritten in Fernsehtalkshows, in: Jens Tenscher / Christian Schicha (Hg.): Talk auf allen Kanälen, Angebote, Akteure und Nutzer von Fernsehgesprächssendungen, Wiesbaden, S. 213-231.

Schicha, Christian/ Jens Tenscher (2002): Talk auf allen Kanälen, Eine Einführung, in: Jens Tenscher / Christian Schicha (Hg.): Talk auf allen Kanälen, Angebote, Akteure und Nutzer von Fernsehgesprächssendungen, Wiesbaden, S. 9-35.

Schütte, Wilfried (1996): Boulevardisierung

von Information: Streitgespräche und Streitkultur im Fernsehen, in: Bernd U. Biere / Rudolf Hoberg (Hg.): Mündlichkeit und Schriftlichkeit im Fernsehen, Tübingen, S. 101-134.

Tenscher, Jens (2002): Talkshowisierung als Element moderner Politikvermittlung, in: Jens Tenscher / Christian Schicha (Hg.): Talk auf allen Kanälen. Angebote, Akteure und Nutzer von Fernsehgesprächssendungen, Wiesbaden, S. 55-72.

Tiittula, Liisa (1997): Stile der Konfliktbearbeitung in Fernsehdiskussionen, in: Margret Selting und Barbara Sandig (Hg.): Sprech- und Gesprächsstile, Berlin/New York, S. 371-399.

作者简介：潘颖，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讲师，博士研究生。

科 研 环 视

科研新动态

邹 露

一、国内学术会议和报告

- 2015年3月31日下午，哈勒-维腾贝格马丁路德大学法律学与经济学学院Ulrich Blum教授、博士为我校德语系学生做了题为Philosophie ist relevant: Kann China vom deutschen Wirtschaftsmodell lernen? und Deutschland im Euro: Kosten und Nutzen eines europäischen Experiments的报告。报告将经济学、哲学、语言学、社会文化等领域结合起来，内容充实，讲解精彩，为学生的学术性思维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 汉斯·赛德尔基金会与中共中央党校于2015年4月17日在凯宾斯基饭店举办题为“依法执政与依法行政——以中国和德国为例”的学术研讨会。中共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两位教授与德方两位教授：巴伐利亚州行政法院院长、巴伐利亚州宪法法院法官施泰凡·凯尔斯泰恩先生（Stephan Kersten）以及中国政法大学中德法学院德方副院长汉马可教授（Marco Haase）均从不同的角度阐述这一主题，报告之后进入讨论环节。这是一场生动有趣的学术交流。
- 2015年4月30至5月3日，由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合作举办的“‘视角与创新’——第四届中德高校德语专业博士生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外国语大学虹口校区会议中心举行。上外党委书记姜锋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校长贾文键教授、德国拜罗伊特大学Wierlacher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钱敏汝教授、上外德语系系主任卫茂平教授出席大会并致辞。8位中德博士生导师做了专题发言，畅谈“视角与创新”主题和相关问题，特别强调了在科学研究与博士论文撰写中的责任意识、奉献精神和愿意为创新性观念付诸行动的努力与方法意识；22位中德博士生则结合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提纲与计划，紧扣大会主题，在大会和分组讨论中，陈述自己的思考与问题，得到了与会博导量身定做的点评和指导。
- 2015年5月，柏林自由大学政治学系博士Peter Schisler教授为北外德语系外交经济方向硕博研究生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学术讲座，讲座内容包括欧盟架构、德国的欧洲政策、德国外交政策、德国与其他国家双边关系、德国媒体理论和大众传媒等主题。Schisler教授任柏林国际

关系学院“通信与新媒体”专业教授，退休后曾在北京大学讲学。

- 2015年7月8日，《冷战后德国与中东欧关系》学术研讨会在同济大学举行。本次研讨会由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中东欧研究所联合举办，也是同济大学欧洲研究中心所获欧盟让·莫内课程项目的重要学术活动之一。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领导向会议发表致辞，希望中东欧研究所在学科专业规划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中东欧研究所所长杨焯教授主持了会议，与会学者就德国对中东欧转型的影响、欧盟东扩后德国对中东欧的政策、德国与欧盟东部伙伴关系、德国与维谢格拉德集团关系、“一带一路”战略下中欧地区地位和作用评析等发表见解与观点，对《冷战后德国与中东欧关系》项目的学术成果进行分析和评价，使该项目成果的学术价值进一步提高。德国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郑春荣教授在会议结束时做了总结，对《冷战后德国与中东欧关系》项目的研究进展做了高度肯定。
- 2015年7月10日下午，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和德国艾伯特基金会联合举办的“着眼于未来——关于德国社会史的图片 and 文字资料”巡回展北外站开幕仪式在图书馆举行。副校长闫国华、德国艾伯特基金会驻京办主任 Pohlmann 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由德语系主任王建斌主持。开幕式结束后，与会人员共同参观了展览，Pohlmann 为大家做了细致的讲解。展览对广大师生了解德国社会保障发展史、理解中国的现状大有裨益，也将促进我校相关领域研究的发展。展览的下一站将会移师广东佛山的北外南方研究院。
- 2015年8月23日至8月30日，五年一届的第十三届国际日耳曼学会世界大会

(IVG) 于同济大学拉开帷幕。本届 IVG 大会主席是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德语系主任朱建华教授，在本届 IVG 盛会上，来自 70 个国家和地区的 1200 多名中外学者就语言学、文学、文化和教学等四个板块的主题展开学术交流。

二、科研与获奖成果

1. 《德国经济治理》，徐聪著，北京，时事出版社，2015年4月。

《德国经济治理》从德国的经济政策、欧债政策这两个角度对德国当代的经济治理思想做了多维度的分析。治理产生效率。中小企业促进和二元制职业教育体系改革中可以看到德国政府将政府的调控作用与市场化的运作结合起来，创造激励型国家模式的努力。“2010 议程”则确立了将经济改革与社会政策改革相融合的路径，在欧债危机的负面性环境不利状况中，德国依靠成熟的经济治理工具和策略实现了本国经济的增长和政治稳定。

2. 《德国与中国：历史中的相遇》，（德）顾彬著，李雪涛、张欣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4月。

本书为“听顾彬讲汉学”第一辑第二种，内容为顾彬教授 2011 年秋季学期的演讲集。在书中，著名汉学家顾彬教授依托翔实的外文资料，构建起全新的中德关系研究框架：从东西方概念的界定，延伸至德语世界对中国认识的进程，由历史个案升华到哲学层面，阐发对东方主义与汉学的理解，提出要与中国一起进行哲学思考的结论。本书所采用的资料均源自最近出版的英、德文著作，材料新颖，观点独特，体现学术前沿动态；内容旁征博引，分析入木三分，语言严谨不失幽默，为从哲学、文化角度思考与研究中西关系不可或缺的参考文献。

3. 《德国蓝皮书——德国发展报告（2015）》，郑春荣、伍慧萍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5月。

本书的政治篇评述了大联合政府开局之年的表现与得失，分析了2014年德国东部三个州举行的州议会选举的结果及其影响，并对德国社会中新近兴起或得到强化的抗议文化和疑欧、反伊斯兰化等思潮进行了剖析；经济篇分析了德国的经济表现，德国工业4.0战略的优势、风险及其可能带来的机遇，并对能源转向推行以来取得的成效展开分析；外交篇聚集乌克兰危机，分析了德国在乌克兰危机应对中的原则立场及其国内存在的分歧，并重点关注了中德关系的新动向，包括中国对德国直接投资的特征、趋势及其影响。

4. 《欧债危机背景下的德国及欧盟》，刘立群著，江燕楠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5月。

本书是中国欧洲学会德国研究分会第15届年会的会议论文集，也是对中国德国研究会成立30周年的献礼。本书汇集了中国德国问题研究学者的优秀论文，涉及当代德国的内政、外交、经济、社会等方面，这些学术成果对加深中国对德国全面的了解和理解，推动中德两国的学术交流有重要的贡献。

5. 《文化与强国：德国札记》，樊鹏著，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5月。

本书是作者在德国挂职工作期间观察、调研的产物。不同于一般文化研究，这部书从政治学视角研究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强国问题，内容涉及德国的文化体制、文化财政、文化政策、文化组织、文化产业、文化外交以及公共文化体系建设等重要领域。人们往往习惯于将西方国家的文化繁盛想象成为一个自由社会的标志，文化“软实力”常被神化为自由的艺术家和自由的文化社团、

企业创造力的产物，本书则告诉读者，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文化的发展繁荣也离不开国家能力，隐含在文化与强国背后的，是国家在财政、政策、激励结构、体制机制等各方面“有形之手”的支持与干预，由此不仅使各类社会力量、社会资本形成积极而有效的参考，活力竞相迸发，而且使文化对内成为一项重要的国家“上层建筑”和“政治实施”，对外成为国家“软实力”的标志。

6. 《德国继承法（第六版）》，（德）雷纳·弗兰克（Rainer Frank），（德）托比亚斯·海尔姆斯（Tobias Helms）著；王葆蔚、林佳业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5月。

《德国继承法（第六版）》是德国目前最新版本的继承法教科书，其立法、案例和文献均更新至2013年7月1日。《德国继承法（第六版）》着重论述德国继承法实践中的疑难问题，如共同遗嘱、继承证书、遗赠等，力图使读者在有限的篇幅中掌握德国继承法的概貌；书中附有大量图标和示例，便于读者理解；附录中的若干案例分析，有助于读者了解德国法学教育中的法教义学分析方法。

7. 《直面寒冰——默克尔的德国十年》，（德）海尔福·伯尔曼著；董玲编、周思婷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年5月。

2005年，安格拉·默克尔当选德国总理，随后三次连任。她不仅拥有德国选民的广泛支持，还是欧洲政坛最有影响力的领导人。2005—2015年，正是默克尔主政德国的十年。本书是一本关于德国总理默克尔的纪实性图书。它从默克尔的执政理念及政治态度上全面讲述了在默尔克领导下德国呈现出的崭新面貌。本书以默克尔为主线，从默克尔热爱歌剧及足球的“普通生活”到对欧债危机的

应对，从默克尔执掌的保守党到关乎民生的核能问题，从默克尔的战争策略到她的“国家原则”，从默克尔对资本主义的态度到她认为的“权力本质”，从德国作为欧洲领导者的地位到默克尔的未来，全面而详尽地阐释了默克尔政府的对内政策及对外策略。总的来说，本书是一本以最详实的研究、完整的信息脉络，为读者全方位展示默克尔完整的政坛生涯和职业女性风采的图书。

8.《信仰与生活——16世纪德国纽伦堡的改革》，周施延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5月。

纽伦堡是16世纪德国最大的城市之一和帝国议会的所在地，这个城市当时的宗教改革吸引了德国各个阶层的注意力。这一改革提供了最为有益的例证，说明德国社会生活形式与路德新教之间的互动。这一改革实际上是一种新旧体制的转换，它将中世纪的教会、慈善、隐修和圣礼婚姻加以甄别，把它们改造成成为具有近代特色的社会救济、政府管理宗教事务和世俗婚姻制度。这样一来，纽伦堡改革就凸显了市民阶级的意志并且展现了由民众推动德国社会变迁的图景。全书展示了各种原始资料，有许多是第一次被译为中文并加以分析，由此说明近代的制度和社会生活是如何起源并遍布德国的。作者还突破了从宏观角度研究宗教改革的传统，仅专注于一个城市的分析，为未来的德国宗教、社会研究确立了新模式。

9.《论德国职业教育本质特征及其发展动力》，陈莹著，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5月。

《论德国职业教育本质特征及其发展动力》讲述了在我国职业教育企业缺位，职业教育地位低下的状况。与此相反，在德国，企业有着联合培养劳动力的传统，职业教育享受着崇高的社会声望。然而，我国引进德

国“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所面临的困难，使得作者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何“以一种正确的精神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去研究国外教育制度”？从系统的角度出发，分析德国职业教育的本质特征及其发展动力，是《论德国职业教育本质特征及其发展动力》的主要内容。德国职业教育的本质特征是“职业性”（Beruflichkeit）。从历史角度来看，德国职业教育的“职业性”特征和社会需求、政治需求和文化需求这些发展动力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在缺乏这些发展动力的情况下，要借鉴德国职业教育制度，必定是无果而终。

10.《德国精神的向度变型——以尼采、歌德、席勒的现代中国接受为中心》，叶隽著，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5月。

本书选择尼采、歌德、席勒这三位德国文学大师及其代表作在中国的接受史进行深入分析，希望能以小见大，其研究思路是：凸显全球化与现代性的整体语境，强化“东西”二元的文明太极一体架构，强调“东学西渐”与“西学东渐”作为互动两极之“流力”因素的重要性。在具体设计中，试图在传统的比较文学层面，以影响研究为基础，形成多重层面的二元维度，包括“德—中语境”“时—空相峙”“诗人巨像—文学镜像”“原相变形—向度变形”“主体原则—资源向度”（本来民族地位—外来思想学说）等。其中既展现冲突、对抗的一面，也注意呈现其融合、化生的成分。

本文讨论的现代中国语境里的德国精神向度变型，就自然应将主体研究对象聚焦于国人本身，相比较此前或系统论述、或个案研究的研究路径，这里特别关注个案本身之间的相互关联，尤其是在相当数量个案研究积累基础之上上升到群体层次，注意总结和呈现群体接受的特征，并进而尝试不同群体

之间的接受维度比较的丰富场景，既要在具体史实层面尽可能回到现场，同时又能不为现场还原所限，而进一步探讨“致思”的可能。在空间维度上，受制于资料，基本上还是选择精英叙述的“上层阅读空间”，即多半是由教育、文学、思想等不同文化场域的精英文子之发言、讨论；在时间维度上，上溯自19世纪90年代由留日学人展开的西潮涌动，下延至20世纪50年代留德学人不得不随之共舞的民众之声。尽可能在有限的范围之内，凸显现代中国语境的复杂多元与时代变迁。当然如此呈现历史屏幕的大幅跨度，并非敢于“泛泛而论”。所有研究基本都建立在对个案人物的深入探究后的“同情之理解”基础上，即便“虽不能至”，也是“心向往之”。

11.《二战的决定性战役（德国观点）》，（德）汉斯·阿道夫·雅各布森（Hans Adolf Jacobsen）等著，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编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6月。

汉斯·阿道夫·雅各布森编著的《二战的决定性战役（德国观点）》是一本集体写作的战史。书中描述的10次重大战役，分别由10名德国作者撰写。这些作者有的是亲身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德国将领，有的是德国研究战史的专家。他们所搜集的史料以德国的为主，同时也采用了一些英美和苏联的资料。英译本专门冠以“德国观点”，说明这些作者是站在德国人的角度来探讨德国在各大战役中失败的原因。也可以说，这是一本有关德国人总结第二次世界大战失败教训的战史。这本书对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的参考价值在于，它可弥补英美各国及苏联出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图书所存在的某种局限性。阅读此书可能对第

二次世界大战中若干重大战役的经验教训有个更全面、更客观的了解。

12.《狼群出击——二战德国海军U型潜艇》，（英）阿兰·加洛普著，姚军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5年6月。

U型潜艇是特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海军使用的潜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指挥德国潜艇的海军上将卡尔·邓尼兹发明了“狼群”战术，在大西洋上击沉大量盟国战舰及货船。本书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海军VII型（7型）潜艇为代表，详细介绍了U型潜艇建造厂与基地分布、结构特点、艇员生活条件和作战情况、潜艇装备、实战战例、王牌艇长等内容，并配有大量平时难得一见的珍贵历史照片。本书适合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潜艇战感兴趣的军事爱好者阅读与收藏。

13.《希特勒这样输掉了二战——德国的致命决策》，（美）贝文·亚历山大（Bevin Alexander）著，江燕楠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5年7月。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欧洲历史上最惨烈的战争时期之一。人们常认为，盟军通过合理地运用军事力量和战略战术赢得了胜利。但鲜为人知的是，希特勒独特的个人品性和错误的军事战略，对导致德军彻底战败也至关重要。

本书配有精心绘制的最新地图，翔实描述了二战中的重要战场，解答了一些最令人疑惑的战略问题。作者超越了种种历史假设，首次详细分析了希特勒面临的一些机会，他原本可以借此赢得胜利，但事实却南辕北辙，他的偏执心理和致命决策，使纳粹接连犯下战略错误，并最终导致第三帝国的覆灭……

作者简介：邹露，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博士研究生。

大事记

德国外交经济大事记

(2015 年 4 月 1 日至 2015 年 9 月 10 日)

李倩瑗

2015 年

4 月 1 日，乌克兰总理亚采纽克访德，期待西方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对俄问题上给予乌克兰帮助。

4 月 2 日，伊核问题六国（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欧盟和伊朗在瑞士洛桑发表共同声明，宣布各方已就伊核谈判主要焦点问题达成框架性解决方案，并将立即着手协议文本的起草工作。

4 月 6 日，希腊财政部副部长马达斯提出，因纳粹德国在二战中给希腊造成巨大损失，德国应向希腊支付约 2787 亿欧元赔款。4 月 7 日，德国副总理兼经济部长加布里尔称，希腊要求德国赔偿其 2787 亿欧元的二战损失是“愚蠢的”。

4 月 13 日，德国、法国、俄罗斯和乌克兰四国外长在柏林举行会晤。乌克兰外长克里姆金称，会谈很艰难，关于若干问题未达成一致。

4 月 15 日，在德国吕贝克举行的 G7 成员国外长会议单独通过了一份关于海洋安全问题的声明，涉及南海和东海局势，这在 G7

近 40 年历史上尚属首次。

4 月 18 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德国北部城市施特拉尔松德出席一场经济论坛时谈及与俄建立自贸区事宜。她表示，德俄两国将来有可能共同建立自贸区。默克尔说：“从长远来看，我们有可能建立一个大型自由贸易区，包括俄罗斯在内。”

4 月 22 日，德国经济部长加布里尔说，政府预计本国经济 2015 年将增长 1.8%，比年初预计的 1.5% 明显乐观。加布里尔说，德国经济前景向好，目前劳动市场稳定，岗位收入增加，预计今明两年德国的经济增长主要靠私人消费增长拉动。同时，欧元贬值促进了德国出口。他强调，为改善中期经济前景，政府必须增加在教育、科研和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同时改善私人投资环境。

4 月 23 日，欧洲联盟领袖就地中海难民问题在布鲁塞尔举行紧急会议，会议讨论的一个主要建议是采取军事行动，打击在利比亚的人口贩运集团；加大对地中海沿岸巡逻的力度，英国、法国、德国均承诺派出船只前往地中海地区应对愈演愈烈的非法移民危机；欧盟将设法与非法移民的所在国、转移

国，尤其是利比亚周边的国家进行合作，以期限制非法移民的数量。

4月27日，德意志银行宣布因受25亿美元罚单的影响，该行第一季度净利润仅为5.59亿欧元，同比下降了50%。德意志银行总裁贾恩和菲琛宣布将采用新战略，在未来一年内关闭旗下200家分行，并减持下属的邮政银行的股份，直到2016年控股低于50%。

4月28日，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三个轮值主席国瑞士、塞尔维亚和德国的外长伯克哈尔特、达契奇和施泰因迈尔举行会晤，呼吁加快乌克兰危机的政治解决进程。

5月1日，德国总统高克说，针对希腊政府追讨二战赔款的要求，德国政府应予以考虑。德国是重视历史的国家，现在的德国人是二战期间给欧洲造成损失的那些人的后代，理应做出赔偿。

5月6日，德国总统高克来到位于德国北威州东北部小城施洛斯霍尔特-施图肯布罗克的苏军战俘营纪念公墓，出席在那里举行的二战结束70周年纪念活动。

5月10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在访问俄罗斯期间呼吁俄罗斯政府采取更多的行动，敦促乌克兰境内民间武装遵守相关的停火协议，终止同乌克兰政府军之间的战事。普京表示，俄罗斯方面将发挥一切可能的影响力，来劝说民间武装结束战事。

5月18日至19日，在柏林举行第六次“彼得斯贝格气候对话”，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到2050年，德国将把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80%至95%，并承诺将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财政援助。

5月27日至29日，七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齐聚德国东部城市德累斯顿，重点探讨如何重振世界经济。与会各方就世界经济增长、国际税收合作、加强金融监管等问题交换意见，并就亚投行和人民币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问题协调立场。

5月29日，英国首相卡梅伦在柏林会晤德国总理默克尔，强调只有修改欧盟条约，英国才有可能留在欧盟之内。默克尔表示，德国的态度非常明确，希望英国留在欧盟中。为了能留住英国，修改欧盟条约是可行的。默克尔强调，在欧盟境内如何对待滥用社会福利以及劳动力自由流动问题上，两国的利益非常接近，对此德国也有改变的需求。

6月1日，法国总统奥朗德、德国总理默克尔与欧盟及欧洲中央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领导人举行会谈。各方敲定发放希腊救助资金的协议草案。草案规定希腊进行改革，以换取资金援助。

6月1日，联合国气候会议在波恩举行。

6月7日，美国总统奥巴马抵达德国小镇克吕恩(Krün)，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会晤。美德两国领导人在对俄制裁上达成统一立场。

6月7日，为期两天的七国集团(G7)峰会在德国举行，希腊债务危机和乌克兰持续的暴力冲突是峰会重点关注的问题。此次峰会由德国总理默克尔主持。

6月8日，七国集团领导人表示，为了大幅削减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应在本世纪大力发展低碳经济。七国集团领导人呼吁，到本世纪中叶，与2010年相比，全球的碳排放量应降低40%至70%。

6月9日，德国联邦劳动局(BA)公布最新统计数据：2015年5月德国的失业人数为276.2万，比上月减少8.1万，较2014年同期减少12万，失业率降至6.3%，为24年来的最低点。

6月10日，德国财政部宣布，德国政府已经批准德国加入中国牵头的亚投行，德国将对亚投行出资45亿美元。

6月11日，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与欧盟第二次峰会召开之际，墨西哥总统培尼亚和德国总理默克尔进行双边会晤。双方表示，两国目前有着很大机遇，在贸易、政治

对话和合作方面加强关系。

6月18日，德国联邦教育与科研部宣布，将加大对高等专科院校的科研资助，以此推动地区经济发展。德国政府将启动“强大的高等专业大学——助力地区发展”资助项目，计划8年内投入约1亿欧元资金，以促使高等专业大学与地方中小企业建立更多的战略性研究与创新伙伴关系。

6月23日，俄罗斯、乌克兰、德国、法国四国外长在法国外交部举行会谈。在会谈开始前，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法国外长法比尤斯举行了双边会谈。“诺曼底四国”外长讨论如何通过联络组机制帮助落实解决乌克兰危机的明斯克协议，包括促使基辅与东部民间武装的直接对话。

6月24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访问德国期间敦促欧洲防止发生分裂。在国宴上，德国总统高克称，德国将支持与英国就欧盟改革举行的对话，欧盟需要英国，因为英国是欧盟的一分子。

6月29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以下简称亚投行）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基本大法”《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的签署仪式。前三大股东分别是中国、印度和俄罗斯。而排在第四位的就是德国。

7月4日，德国议会通过新的居留法案，据此，有刑事犯罪、申报材料造假或材料不完整的外籍人或难民将比此前更快地被驱逐出境。但是融合度高且在德国生活至少8年或带未成年子女共同生活6年的外籍人可以更快地获得居留许可。为此，将有3万人受益于新居留法。

7月6日，德国政府宣布，将向阿尔巴尼亚提供总计1.075亿欧元的贷款补助，用以支持该国发展能源和供水项目。

7月9日，德国与法国宣布，会为移民问题承担各自相应的责任。然而，欧盟仍在为6万名难民或寻求庇护者的分配而努力，以缓

解意大利与希腊所承受的巨大移民压力。据报道，未来两年，法国与德国将会分别接收9100名及1.21万名难民，共占难民总数的1/3，这正与欧盟的期望一致。这些难民主要来自叙利亚及厄立特里亚。在结束与欧盟其他国家内政部长于卢森堡举行的会议后，法国及德国的内政部长宣布了以上数据。

7月13日，在经历了17个小时的马拉松式谈判后，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宣布，欧元区领导人就希腊援助协议达成一致，将对希腊提供新一轮援助，避免其脱离欧元区。当日公布的协议中规定，希腊未来须将国有资产存放在一个专门创建的基金里，并准备在“相关欧盟机构的监督下”出售资产。

7月13日，在伊朗核问题六国（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与伊朗在维也纳达成伊核问题全面协议后，欧盟表示将对伊朗制裁的冻结期限延长至2016年1月14日。

7月15日至17日，德国副总理兼经济部长加布里尔访问中国。除了在北京与中国领导人会见之外，他还在沈阳出席经济圆桌会议，该会议旨在为德国的投资优势造势。目前中国在德国的累计直接投资金额已经达12亿欧元，比2010年增长118%。约2000家中资企业在德落户，创造了近27,800个工作岗位。

7月20日，正在德黑兰进行访问的德国副总理兼经济部长加布里尔和伊朗政府达成协议，重启已停滞14年的战略合作，不过他同时也承认分歧的存在。7月22日，德国经济和能源部长加布里尔与伊朗央行行长赛伊夫会谈后表示，两国将建立联合委员会，来解决任何与银行业合作有关的问题。

8月4日，德意志银行（美国）已经同意因被指有员工参与操控Libor（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而必须缴纳250万美元的罚金；5日，又被指没有向顾客提供足够的风险提醒

咨询而牵涉 5000 万美元的罚款。

8月11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暨“反独促统”柏林大会十五周年纪念大会在德国首都柏林隆重举行。来自全德、欧洲及世界各地的400余位嘉宾出席会议，共同纪念人类历史上这一伟大胜利。中国驻德国大使史明德在大会上致辞。

8月14日，德国联邦统计局宣布，2015年第二季度，德国国内生产总值比上一季度增长0.4%。这股积极的推动力主要来自于德国出口额的增长。德国2015年上半年的出口额已经创下了自2011年以来最高的半年出口总值纪录。

8月20日，社民党老将、德国前总理勃兰特的亲密战友埃贡·巴尔去世，享年93岁。他是社民党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家之一。巴尔曾与勃兰特共同推出了“新东方政策”，目标是促进联邦德国与东方集团国家之间的

关系正常化，尤其是与前苏联和东德。

8月25日，约150人封锁了莱比锡的一个体育馆，体育馆里有51名准备前往海德瑙的难民。封锁体育馆的示威者和警察爆发了冲突。

8月26日，德国总统高克访问了位于柏林市维尔默斯多夫的一个难民安置点。他表示，所有生活在这里的人都有权利融入一个“光明的德国”。联邦总统对这些难民表示欢迎。

9月1日，有近2000名难民抵达慕尼黑，还有数百难民随后到达。数百位志愿者自发来到慕尼黑火车站，为难民提供帮助。

9月7日，德国政府计划2016年为难民危机问题拨款60亿欧元。默克尔表示，德国做好了接收难民的准备，然而，欧洲各国公平分配难民也很重要。根据欧盟委员会的决议，德国需要继续接收约31,000名难民。

作者简介：李倩媛，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博士研究生。

《德语国家资讯与研究》稿约

一、本刊是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主办，研究德语国家政治、外交、经济、社会 and 文教问题的刊物，但凡上述内容的稿件，一概欢迎。

二、请用电子邮件投稿。来稿一律投编辑部邮箱。

三、正文使用 Word 文档，五号宋体，注释用小五号宋体。

四、来稿请在正文之前附上 300 字以内的中文摘要或 150 字以内的德文摘要和 5 个以内的关键词，并附上中文及外文标题和作者简介。资讯稿件总篇幅以 1000—5000 字为宜，研究稿件以 5000—8000 字为宜（包括注释）。

五、文中第一次出现不常见的外国人名、地名及机构名称或专业术语时，请在中文译文名称后加圆括号注出原文。

凡涉及引文或引证的观点，请注明出处，体例如下：作者（外文姓名也是姓在前，名在后，但用逗号隔开）：书刊名，期刊号，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份，页码等。引用外文著作的注释请用原文，无须译成中文。引用网络资源，请注明具体网址和访问日期。

每篇文章注释一律采用脚注，脚注编号通篇连续。

六、本刊编辑部可能对来稿作一定的修改或删除，作者如不同意，请在投稿时声明。

七、本刊编辑部在接稿之日起三个月内将通知作者有关处理意见，在此期间请勿一稿两投。未被采用的稿件本刊不负责退稿，请作者自留底稿。

八、凡作者在本刊发表的文章，一律文责自负。

九、来稿需注明作者的真实姓名、单位、地址、邮编、职务、专业等信息，写明电子邮箱及电话以便联系。凡学生来稿请务必注明学校、专业和年级。发表时可用笔名。来稿一经采用，即付相应稿酬。

十、本刊亦有电子版，请上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网站（<http://de.bfsu.edu.cn>）上阅看。

十一、《德语国家资讯与研究》编辑部地址：北京西三环北路 2 号，北京外国语大学 24 号信箱。邮政编码：100089，电话：(010) 88816516, 13641271934, E-mail: dygjzxyyj@bfsu.edu.cn。